

目 录

- 辛亥革命回忆.....朱 德 (1)
- 我的回忆.....何香凝 (11)
-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黄炎培 (59)
- 辛亥革命前后杂忆.....仇 莹 (67)
-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马 湘 (86)
-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李书城 (136)
- 回忆先君克强先生.....黄一欧 (174)
- 广州起义亲历记.....熊克武 (184)
- 黄花岗起义与炸毙凤山亲历记.....陈其尤 (191)
- 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记.....熊秉坤 (198)
- 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王缙承 (214)
- 癸丑讨袁回忆录.....耿 毅 (245)
-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程 潜 (268)
- 回忆辛亥革命.....张奠若 (293)
- 辛亥上海光复前后..... (321)
- 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于树德 (340)
- 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刘星楠 (347)
- 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鳞半爪.....王文德 (368)
- 哈密维吾尔农奴起义.....包尔汉 (374)
- 伊犁革命回忆录.....邓宝珊 (388)
- 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博彦满都 (394)
- 回顾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情况
.....桑颇·才旺仁增 朗顿·贡嘎旺秋 (397)
- 辛亥前后彭泽民先生和吉隆坡
 华侨的革命活动.....陈其瓌 翁会巧 (403)
- 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赵 昱 (409)

辛亥革命回忆

朱 德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一八四〇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开始的，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达一百〇九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多次说过的，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一百〇九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止的前八十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一九四九年为止的后三十年，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輩的中国人，是亲自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这两个时期的，并且接着又亲自经历了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来，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结果，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宣布成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次革命引起了全国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打开了道路。但这次革命远远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所谓“中华民国”很快就成

了有名无实的东西，代替清朝封建统治而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回忆辛亥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次革命的光荣传统，吸取它的宝贵的历史教训，在今天还是有重大意义的。

辛亥革命是经过了长期酝酿而发生的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辛亥革命的公认的领袖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十九世纪末，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中间，出现了两个派别，这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的失败，使幻想清朝政府可以实行某些改良的维新派破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包括“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清朝的统治来“建立民国”，这在当时，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的。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会员们很快地就分头回国到各地去组织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就我当时在那里上学的云南省来说，法国那时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已达到昆明，并且掠夺了七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英国也伺机侵掠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省的加紧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云南人民更感到“内巩国基，外御强

敌”的迫切，于是积极起来反抗。一九〇七年，云南同盟会会员创办了《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一时以昆明、腾越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这样，云南就成为策动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

孙中山先生当时很重视军队工作，注意在敌人军队中开展工作，这对辛亥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〇八年，孙中山派黄兴到云南河口发动起义，不幸失败。接着同盟会员杨秋帆等又在永昌举行起义，结果也没有成功。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的影响却在云南日益扩展起来。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〇九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

云南讲武堂，原来是一九〇九年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为了培养清朝政府的军事人材办起来的。同年冬，云贵总督李经羲到昆明上任，把新军第十九镇的随营学堂也并入了讲武堂。当时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那时，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向李经羲推荐，担任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

作了很好的掩护。

一九一一年，讲武堂第一批学生一百人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派到蔡锷部下当军官，他们就在士兵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我当时被派到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排长，标统是罗佩金，管带是刘存厚。新军士兵都是从乡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就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士兵中撒播开来。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这给了云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也在士兵中间加紧了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云贵总督李经羲在总督衙门内外修筑防御工事，并下令捕捉革命党人，第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也被撤换。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守卫，但是就在担任守卫的队伍中，也潜伏着革命力量。李经羲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被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楼秘密通知了革命党人，这时，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十月三十日（旧历九月九日），在昆明的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当夜由李根源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外北校场发动，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校场巫家坝发动。讲武堂、陆军小学的学生以及李经羲的卫队，也都响应起义。我所在的那个标（团），就是第七十四标。还在举行起义以前，清朝的文武大员因为害怕新军暴动，就停止给士兵发子弹。我们是借用演习打靶的机会，每人暗地里准备了四五发子弹的。原来预定夜间十一点钟发动，可是还不到九点，北校场的枪声就响了。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候，蔡

得将军在南校场出现了。部队的秩序很快恢复了。这时，李经羲也听到了起义的枪声，他象在梦中一样，还打电话向蔡锷求救。蔡锷将军放下电话筒，就立刻走到待命出发的部队前面，严肃地宣布云南起义了。

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很快出发攻打城门。我当时被指定为连长。住在我们附近的炮兵团也受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全团参加了起义。当我们向昆明城进攻时，李经羲调来把守城门的骑兵团不但没有阻挡我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门。十二时，我们全部入城，天将黎明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经占领所有的城门。接着，我就参加了攻打总署衙门的战斗。在攻打总署衙门的时候，因为卫队营和我们秘密联系，我自己过去也曾经奉命在卫队营中间作过一些革命活动，因此，当起义军攻打总署衙门的时候，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经羲仓皇逃走。城内敌军最后两个据点——五华山和军械库，也在初十日的晚上被先后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鍾麟同也被击毙。不久，大理、临安两地的新军同时宣布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十一月一日，成立了云南军政府。

云南起义以后，清朝政府正布置向革命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就进入了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于是云南革命党人决定派兵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等于旅)共八个营入川。旧历十月间，援川部队从云南出发，这时我仍在援川军中担任左队队官(连长)。援川军分为两路，一路经昭通，向叙府前进；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我们这一路沿途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受到群众

的热烈欢迎。在占领叙府以后，就转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驻有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驻有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军队一与我们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正当我们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我们也就回到云南。

当时云南是很穷困的一个省份，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境地，从前方转战回来的军队，没有钱发饷。当时，就连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还没有觉悟到，要彻底根绝帝制，废除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废除封建的经济制度及实行土地改革。蔡锷更不例外，那时他是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之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这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促成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很快就发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转眼之间已经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得到外国侵略者全力支持的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一面从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装他自己赞成共和，同时派遣军队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让给他，以便实现所谓南北之间的“和平”。所谓的“南北议和”按照袁世凯的条件完成了，辛亥革命也就失败了。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在客观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

动势力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主观方面，即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分子的联盟。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达到真正的胜利，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帝路线，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盟会内的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依附于同盟会的“反满”的汉族地主分子，很快就接受了反革命方面的议和条件，迫使孙中山先生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结果是，宋教仁遭到了袁世凯的杀害，大批国民党的议员遭到迫害，国民党遭到禁止，议会遭到解散。在这以后，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为靠山的袁世凯，干脆宣布恢复帝制，把“民国”这个招牌扔掉了。

在这以后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企图挽救革命失败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一九一三年袁世凯解散议会以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伐袁世凯。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黄兴在南京响应，其他一些省份也有响应的表示。但是，由于革命力量缺乏坚强的团结，又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结果讨袁战争陷于失败了。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接着又于同年十二月宣布做皇帝。在袁世凯称帝以前，蔡锷由北京秘密逃回云南，他凭借着以前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这时，唐继尧迫于形势，也宣布云南独立，并由蔡锷、罗佩金、李烈钧、何国钧等领导组成护国

军。第一军总司令是蔡愕，参谋长是罗佩金。当时确定的任务是北出四川，然后进攻武汉。第二军总司令是李烈钧，参谋长是何国钧，任务是出两广，然后相机进取湘赣，得手以后与第一军会师武汉。第一军共有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我担任第三支队司令，随护国军进入四川。由于护国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的拥护，战斗力也比较强。第一军入川不过六千人，与北洋军阀曹錕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结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

由于蔡愕将军的首义，和各省的相继响应，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接着就病死了。但是在打倒袁世凯以后，反袁的联合战线也就分裂了，不但革命党与进步党分裂，而且革命党内部也呈现了分裂状态，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自己就变成了新军阀，只顾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孙中山先生说过的“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国贼而奠国基”这些话，根本丢到脑后。因此，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结果是北洋军阀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凯，在中国继续实行卖国反人民的统治。

继袁世凯而起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继续卖国独裁，破坏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七年号召护法，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这时云南、四川的队伍，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但是由于唐继尧等人排斥孙中山先生和进行分裂活动，以致护法运动没有成功。后来又因为唐继尧想当“云南王”，并且企图控制川、黔，引起川、黔方面的不满。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就更进一步地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而最根本的失败原因，则是当时的革命运动，没有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作支柱。

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完全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其所以行不通，就因为当时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几次企图挽救革命的斗争，主要是被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军阀们打败的。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要取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很明显，要战胜帝国主义，就非深刻地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持久的革命斗争不可。这样的领导责任，是资产阶级所决然担负不起来的。这个领导责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毛泽东同志说：除了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又说：“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

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所作的一个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我自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我当时担任云南军队的旅长驻防在四川。如同前面所说，当时由于四川军队和云南军队之间的矛盾，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到了一九二一年滇军回滇时，我就在这年的八月离开了军队，第二年，罗佩金被唐继尧杀害，我就从四川到了上海，准备到俄国或者德国去学习。就在上海，我会见了景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不久，我就动身到德国去了。我在德国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并且这时又在党的指示下重新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活动。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也吸取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勇敢地走上了同共产党、同工农、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的道路。孙中山先生真不愧为一个卓越的不屈不挠的不断进步的革命家。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许多仍然忠于革命事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的人们，采取了同共产党和人民合作的正确立场，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人民的可贵的朋友。

我的回忆

何香凝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小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二十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一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即一九〇二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一九〇三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瀬寅藏，就

请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本语文。成濑寅藏对我的学习问题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本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一九〇三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仲恺和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象一般年青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

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一九〇三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材。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为他们管理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是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谈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一九〇四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

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梦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远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恺，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就被清政府逮捕后牺牲。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长知、寺尾亨和山田纯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敢同我们多所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留学生中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

一九〇五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时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

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恺返回香港筹措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那时我还住在本乡。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加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难眠。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后，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我家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规矩，

进门就要脱鞋，人如果来得多了，都脱下鞋子，很多鞋子就会堆在门口，是会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走狗侦探怀疑的。因此，当孙先生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除了做好看门开门、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做收藏鞋子的工作。孙先生收发信件也很多，有时还用假名。寄来邮件中有写“中山”、“高野”、“逸仙”、“孙宅”收的书信，我都收妥，交给孙先生。由于孙先生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决定将来成立的新国家称“中华民国”。当时加盟者已有数百人，盟员籍贯遍及中国十七省。只有甘肃因为还没有留学生到日本，所以还没有甘肃省籍的盟员。及后不到年余，加盟的已过万人，国内各省都成立支部，从此革命风潮，日甚一日。

在我入盟以后大约两个多月，仲恺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仲恺有志革命很早，当晚孙先生来到我家，仲恺在晚饭后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山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孙先生向他解释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一直辩论到深夜三时以后，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可见胡汉民后来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反对实行三大政策，是早有原因的。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孙先生当年组织同盟会提出的口号，它初步概括地体现了孙先生当时的革命理想。这四句口号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应该分割。那

那个时候虽是革命浪潮汹涌，有志青年纷纷趋向革命，同盟会发展迅速，固然出人意料，但是每一个加入同盟会的人，在加盟时都要宣读这四句誓言，把这四句话作为服膺奋斗的南针。可惜的是在全体同盟会员之中，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便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一九〇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抗取缔规则”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验了我们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恺，还有很大一部分同盟会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拢我们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课对他们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费，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计，他们是主张妥协不罢课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当然，

要说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一九〇五年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一般参加同盟会的人思想状况，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上表达出来的和一般的思想动态，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仅有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等。第二类人则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做“屠富”。我记得仲恺那时候曾同我开玩笑，说：“你的爸爸是个大资本家，也是将来要在打倒之列的，你不怕么？”

当时中国同盟会参加者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十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当时武装斗争是抓得紧，而思想建设就比较松了。后来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在刚刚推翻清朝、袁世凯上台的时候，就完全倒过去了。第二类人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候，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而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不幸在一九二五年因病去世。朱执信又牺牲在先。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跟随孙先生，忠心耿耿地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比较进步的，自由、平等、独立、富强的国家的国民党人，便只剩了廖仲恺等少数人，仲恺后来又被往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暗杀牺牲。政权落到蒋介石、汪精卫等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派手中，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因而被推迟了二十多年。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约一年之后，我们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们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孙先生对此极为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绝不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严词驳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论调，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孙先生还叫廖仲恺、朱执信和我联名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们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赞助革命。在这期间，我虽然只会讲广东方言，还不会说普通话，但是

通过笔谈，也在留日同学中交接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从事革命的好青年。同盟会的著名女盟员秋瑾和后来在黄花岗之役牺牲的千叶医学科学学校留学生方声洞，就是我在这个时候结识的。

一九〇六年秋天，我结束了女子师范预科的学习，再考入日本女子大学博物科攻读。半年之后，因患胃病停学，在家休养。那时我们住在大久保。病好不久，又怀身孕。一九〇八年生下了承志之后，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绘画，端管紫川先生就是教我绘画的老师。我同时也是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的学生。我每星期到他家里学两次画，我学画老虎、狮子就是跟田中赖章先生学的。那个时候，日本文化界也很重视中日文化交流，教画的老师知道我是中国留学生，又见我是个女的，都很重视，都很热心教导我。这一段时期，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一直都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讯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

我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工作的整个期间，生活都比较俭朴清苦，娘家给我的钱统统都给我花用在这上面了。为了准备起义，孙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购运军火，我们大家都帮忙筹措旅费。我这样做，还完全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因为当时革命叫做“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会株连九族的。

为了使中国革命取得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和赞助，孙先生曾派仲恺到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联络。当时，仲恺正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还没有毕业，但是仲恺为了革命需要，立即停止学习，奉命回国，完成任务以后再回日本，转入中央大学三年级继续学

政治经济。那已经是一九〇八年的事了。由于国内起义几经失败，孙先生注意到，如果要起义成功，除了筹募足够的经费以外，还要做好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当时，中国南方起义已经失败了几次，孙先生想改在北方筹划起义。一九〇九年，他再派仲恺到营口及吉林秘密做策反的地下工作。那时仲恺已在中央大学毕业，他经由天津转到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并以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做翻译作为公开职业来掩护。仲恺与林伯渠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吉林时常过从的。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国内几次武装起义失败，革命转入低潮。为了积极筹划再行发动武装起义，孙先生一方面派人到香港，另一方面又亲到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一九一一年春，我已在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毕业，也回到香港娘家居住。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前，香港就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接头地点。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次战役，但是这次起义的准备事宜，我都有些预闻。这次起义是孙先生指示黄兴领导进行的，朱执信也参与了此役。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都是我们同盟会的优秀同志，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方声洞、林时爽等就是留学日本的有为青年，还有一些南洋华侨。这次震动中外的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了，却激励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正在海外宣传革命，募集革命基金，其他革命党人也很分散，革命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军阀、官僚、政客、立宪党人乘机夺取革命果实，许多宣布独立省份的军政大权都落入他们的手中，政权由封建帝王转入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手里。孙中山先生十二月从海外回到上海，

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同盟会自根据宋教仁的提议改组为国民党后，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都参加进来，其中有不少人根本就反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甚至有的手上还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一种政治投机，目的不外想钻进来升官发财，根本谈不上实现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更谈不上采取各项革命措施了。这样，国民党就渐渐失去了他的革命性。当时有国民党中的极右派分子劝孙先生：“中国弱，不宜于过激地反对列强，中国穷，也不宜于过激地反对资本家。”孙先生听了这些谬论很愤慨，在一次演说中驳斥他们说：“如果我不反对列强，我就不这样辛苦革命了。”又感慨叹息说：“现在国民党人，多已丧失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今后恐难有大作为。”这时候，袁世凯凭借他的地位和武力，已经做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攻革命的新工具，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革命发动了进攻。袁世凯一面指挥军队攻击革命军，另一面试探议和，甚至伪装他也同情革命。袁世凯的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当时革命内部的许多人发生了很大的威胁和欺骗作用。甚至不少人被袁世凯所收买，成为他在革命内部的坐探和代理人。孙先生是十分反对和议的，他认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孙先生提到的所谓反对列强就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思，平均地权就是削弱封建主义的基础，节制资本就是想避免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爱国而又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当然不是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封建买办分子所能接受的，而一些对帝国主义还存在敬畏心理和抱有幻想的分子，当然也不会真正赞成这些激进主张。封建、买办势力特意制造出一种“非袁莫属”的论调来打击孙先生，帝国主义者更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袁世凯。在国民党内占优势的右

派分子都一致主张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往日同盟会员中也出现了为袁世凯说话的人，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一个。真正信仰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的，真正拥护他的领导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兼迫之下，孙先生在当选三个月之后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表明他革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权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至此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下迅速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

但是，孙先先以及忠实于他的革命理想的同志并没有向反革命势力屈服，而继续组织革命力量同袁世凯进行斗争。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因胃病加重，遵照医生建议完全停止工作。

为了争取当时的议员反对袁世凯，仲恺奉孙先生之命来到北京做运动议员反袁的工作。可惜后来仲恺的活动都被袁世凯密探知道了，在他们预备捕人的黑名单上就写有廖仲恺的姓名。就在袁世凯发动对革命党人大搜捕的前夜，仲恺得到友人密告消息。虽然形势已经极为危急，他幸而能够只身离开北京去天津，平安回到广州。而当时与仲恺时相过从的议员伍汉池，则在这次大搜捕中被捕，惨遭杀害。一九一二年四月，胡汉民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仲恺掌理财政，朱执信任核计院院长。这时候革命派只直接掌握了很少数的武装力量，以前一时投机依附革命的军阀都同袁世凯勾结起来，反戈进攻革命政权，广州革命政府就是在内无群众基础、外受军阀龙济光的威胁的形势下而垮台的。广州革命政府瓦解之后，我和仲恺分头仓卒离开广州去香港。英国当局视我们为政治犯，不许入境，限我们四十八小时离开。老牌的英帝国主义，一向就是这样敌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我们迫得在极端困

难的情况下，亡命日本，在东京千駄谷安下家来。

孙先生深知国民党人革命精神泯然无存，反袁定难成就，痛心之余，决定到日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新号召进行反袁工作。那时，我们已先在日本。孙先生积极革命，早已深为袁世凯所忌。袁世凯通过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想组织暗杀团在孙先生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幸得犬养毅、宫崎寅藏、头山满等告诉了我们消息，除此之外，他们还临时组织了“刺客击退团”，及早进行防范。当天，犬养毅、头山满等亲自同我一起赶到火车站迎接孙先生，孙先生安全下了火车。我们就在孙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在日本积极筹备反袁工作。

一九一四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我和仲恺、邓仲元、陈其美都参加了，仲恺并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次长。黄兴、汪精卫都始终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朱执信确实是稍后参加的。我记起来了，是孙先生示意叫他劝汪精卫做些工作，因此故意延缓一下。当时，我们居住在涩谷附近的青山七丁目，孙先生与孙夫人居住在青山四丁目。一九一五年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已有百余人，党内各项事务开展，又专门在青山六丁目设立了中华革命党的事务所。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期，有几个日本朋友也直接参加了一些中华革命党的活动，从现在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日本朋友。

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执掌当局却完全无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睦相处的善良愿望，不断侵略中国。当完全丧失民族气节的、出卖国家权益的卖国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的时候，我们都一致表示坚决反对。我过去一向在日本留学生中做宣传

联络的工作，这些年我自己虽然已经结束了留学生的生活，但是为了反对卖国政府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上还演讲过几次。有一次当我激动地讲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泪来，座中留学生苏君，曾为此劝我不要太激烈，因为在日本居住，不宜过于激烈地反对日本政府。但是，我觉得我即使住在日本，也应该以祖国利益、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一九一六年一月，袁世凯僭称皇帝，蔡锷为首在云南起义，宣布反对袁世凯，要求袁世凯退出皇帝位，成立了护国军，朱德同志也就是护国军的一个少壮军官。西南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皇帝没有做成，六月死在“新华宫”。这时，我们都还在日本。孙先生本来希望推翻袁世凯之后，中国能够真正出现统一共和的局面，不料各省军阀不听调度，各自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盘据一方，大好中国被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孙先生由于自己没有军事力量，不得不利用军阀的军队，以保护民主主义的旧约法为名，进行革命斗争，是以有护法之举。可是，这些军阀官僚却利用孙先生的名义专去扩大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一定时期，又排斥孙先生。在这个期间，孙先生已经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比较进步的武装来支持革命力量，是没有办法可以顺利进行革命的。所以孙先生一面不断和军阀进行斗争，一面不断研究摸索中国革命在下一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孙先生后来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恰恰就是在他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和军阀作斗争当中，一次又一次地得以不断加深和巩固起来的。

袁世凯倒台了，可是革命依然没有成功。段祺瑞企图操纵国

会，依然继续北洋军阀统治的局面，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当中，根据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表示要对德宣战，实际上是将德国在中国的影响排出去，而代之以美国、日本的势力。为这样做，段祺瑞组成督军团，后来终于引出张勋出台，演出了一幕复辟的丑剧。

当时，孙先生对是否对德宣战，是另有明确主张的。朱执信在广州就曾经根据孙先生的意思，写了一本小册子，严格主张中立，说明世界大战参战双方，都是列强争夺世界霸权，既无什么正义可言，又没有中国必须参与一方的义务。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是发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孙先生再次提出了“护法”的口号，反对北洋军阀，因而再次回到上海主持工作。

孙先生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仲恺协助孙先生运动北洋海军军官彭春源等南下护法，我则被分配做北洋海军的妇女家属工作。我在哈同路的寓所里接待一些海军家属，对她们讲解护法的必要，配合做些说服动员工作。七月中，孙先生亲率肇和、永丰两艘炮舰南下护法，我们也相随到了广州。孙先生在到达广州黄埔之时，曾在欢迎大会上说到“中国共和已有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这不是共和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共和国的执政人，用假共和的面孔来行真专制之手段的原故。”自孙先生率海军南下，伍廷芳、章炳麟、唐绍仪等人和一些国会议员亦响应护法号召，到达广州。八月，到达广州的议员已差不多有一百多人。这虽然未满足议会法定人数，但在非常事变发生期间，可以开

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军政府。标榜护法、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的军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文规定，在临时约法的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军政府大元帅行之。又规定了军政府组织大纲，至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的职权完全行使时才宣告废止。九月，孙先生被选为大元帅并就任大元帅职。财政部长为唐绍仪，外交部长为伍廷芳，内务部长为孙洪伊，陆军部长为张开儒，海军部长为程璧光，交通部长为胡汉民。仲恺协助管理财政。

但是，在广州的议员们、部长们却未能洞察美日帝国主义的阴谋，终于表示对德宣战。唐绍仪毫无问题是亲美亲日的。这样，对德宣战的布告，是经过军政府及非常国会决定后发出来的。这就形成非常奇怪的局面：北洋军阀对德宣战，而反对北洋军阀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德宣战。段祺瑞就利用对德宣战的口实，预备趁機对护法各省用兵力解决。冯国璋为了扼制段祺瑞不使段的势力再扩大，一度高唱和议。但是，孙先生为了维护共和体制的尊严，坚决表示除恢复国会和约法之外，无磋商余地。和议不成，又打起来。湖南、湖北都有激战。孙先生在当时一度发表文告，坚决表示对北洋军阀作战到底。孙先生这回出兵，却是他自己军政府内部勾通北洋军阀的、顽恶成性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人所绝对不会赞成，或者是说绝不愿意赞成的。当时陆荣廷、唐继尧等人虽然在军政府中被选为元帅，但他们始终不肯就职。他们虽然口头反对段祺瑞，却奉冯国璋为大总统。他们本来就是因为个人要求不遂，才与段祺瑞对抗的，并非真心来参加护法，并非真心为打倒北洋军阀而斗争。孙先生坚决与倪嗣冲、曹錕、吴佩孚、张敬尧等南犯的北洋军阀一再对抗作战，陆荣廷等都是很不满的。

孙先生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比较可靠的力量是海军和国会中的一部分人。一九一七年广东省长朱庆澜想交二十营兵给陈炯明，以便将来编练改为护法北伐的武装。那时广东兵权操在桂系之手，桂系军阀当然不希望军政府除了拥有一些海军之外，又有直属的陆军部队，因而一再从中阻挠。最后几经曲折，才勉强同意将二十营兵交与陈炯明。孙先生就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仲元、许崇智为副司令，二十营兵全体奉命开赴福建。部队内部有很多革命青年，如邓演达、李章达等，士气充沛，不久队伍开到漳州。不过，这批军队一向受桂系军阀歧视，枪械给养，均受桂系军阀控制。仲恺曾经几次遵照孙先生的意思，多方设法筹款接济他们。孙先生在上海的房子就因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都由仲恺亲自带到漳州交给这批驻闽粤军了。孙先生满希望这批军队将来可以成为比较进步的革命武装力量。可是，这批粤军回粤以后，其中邓仲元固然成为孙先生在军事方面很得力的助手，而陈炯明却在一九二二年利用孙先生苦心帮助他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背叛了孙先生。

桂系军阀在军政府内部制造纷争，当时还曾经一度集中在所谓省长问题之上，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当时，广东人不满任用桂系人物为省长，想叫胡汉民当省长。桂系军阀又表面上叫当时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广东省长及督军，程起初也是不愿就任的，程璧光是北洋政府阁员之中南下护法的唯一始终拥护军政府的人。他后来被陆荣廷派凶手暗杀了，凶手是在程璧光乘艇横过珠江、刚抵海珠对岸码头之时向他开枪的。程璧光死后，拥护军政府的人，又少了一个。

由于孙先生的提倡号召，非常国会已着手准备制定宪法。当

非常国会召集宪法会议起草的宪法稿已到第二读将告完成之时，桂系军阀与政学会的人恐怕有了宪法，与北方调和更无希望，因而阴谋运动与他们相接近的议员阻止宪法完成。陆荣廷与唐继尧等，曾经屡次想牺牲护法以求议和，只是碍于军政府在孙先生领导之下坚持护法，不得遂愿。他们要想另行组织各省联合来对抗军政府，却又苦无根据，于是变通作法，以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把元帅制改为总裁制。

一九一八年七月，军政府改设总裁制，非常国会举出孙先生及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林葆懌、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孙先生知道他们改组的宗旨，完全为了和北洋军阀妥协议和，不是为了护法，当然不肯参加。七总裁之间意见也各不相同，他们既不愿反对列强侵略，也不喜欢用国民党的人，连伍廷芳也在被排斥之列。孙先生的革命主张不能实行，立即放弃总裁职，再赴日本。

反袁护法二次革命的结果，中国仍然又落到军阀盘据的混乱局面。那时我们已先到日本，住在东京九段。我与朱执信得知孙先生抵日，曾同赴神户迎孙先生到东京。从“革命同盟”的时候起始终与孙先生忧患与共的廖仲恺、朱执信，至此仍然追随在孙先生的左右。这时候孙先生备受了几次惨痛教训，于是一转而着手宣传革命主张的工作，同时在最穷困的情况下接济在福建的革命部队，准备夺取一块适合地盘，再向北洋军阀进行斗争。

一九一九年孙先生又回上海，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建立事务所，从事《建国方略》的著作，创办《建设杂志》，继续作反对军阀的工作。我们亦回到上海。那时林伯渠同志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事务所帮孙先生工作，我们时常见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正如警

钟一样，唤醒了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孙先生感到利用军阀，终非长久之计，因而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下决心仿效苏联。那时孙先生与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起草来往稿件的工作，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帮忙。孙先生还想派人到苏联学习，特意叫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先学俄文，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每日到长滨路民厚里我们的寓所来教俄文。这时学习俄文变成很时髦的事了，甚至连陈璧君这样的人，也加进来一起学俄文。孙先生觉得那时中国正处在军阀各自割据的时期，要推行革命措施，势必受到很大阻力；而进行革命，就非要根据地不可。那时北京是北洋军阀窝子，打不进去，上海是帝国主义的堡垒。武汉更是吴佩孚的地盘，等闲取不得。这样，唯一的理想根据地仍只能是军阀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广州了。要取得广州，配合在福建的武装力量的反攻，就必须布置广州的内应工作。孙先生决定先派朱执信到广东去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做反对桂系军阀的工作。可是，桂系军阀却在虎门布置了陷阱，以虎门要塞部队可能起义的假消息诱骗了朱执信，朱执信因此在虎门要塞附近被暗杀牺牲。朱执信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也是国民党左派的一大损失。如果他还健在，他很可能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孙先生在这期间又多次派仲恺到福建漳州驻军那里做动员联络的工作。一九二〇年冬，原驻漳州的邓仲元、陈炯明、许崇智等广东部队打回广东，收复了广州之后，不久孙先生和我们也回到广州去了。第二次收复广州，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又南下集中到广州。广州成了革命根据地了。一九二一年，孙先生在广州经过国会一致通过，就任临时大总统职。陈炯明为陆军部长，邓仲元为参谋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唐绍仪为

财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次长，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同年，中华革命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又有很多人参加进来。

一九二一年桂系军阀残余陆荣廷等盘据广西反对革命，很多广东军队都出发广西，征讨桂系军阀。孙夫人和我集合广东妇女界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孙夫人任会长，我任总干事，会址设在总统府，办理慰劳讨桂军队事项。我并且和慰劳队工作人员一起到过广西，慰劳讨伐桂系军阀的部队。这就是中国妇女界为了慰劳义师第一次办起来的慰劳会组织。

一九二二年，孙先生决心彻底扫除军阀势力，决意北伐。苏联已经先派马林前来与孙先生联系，鲍罗廷也曾先来过广州一次，初步谈判，略有进展，联俄计划正预备逐步实行。但是，早有阴谋野心的陈炯明看到政府履行革命政策对他自身不利，更增加了他的叛心。虽然孙先生对他优容宽大，情感理喻，同志们对他解释劝告，希望他心回意转，但是他总是不听，继续密谋反革命，并和北洋军阀有所勾搭。孙先生北伐的时候，参谋长邓仲元留守后方，仲恺管财政，筹措军饷，不遗余力。陈炯明的人先下手为强，使人在广九车站暗杀了邓仲元。

在邓仲元被刺后不久，有一天邓仲元夫人来找我，她说：“陈炯明现在又想反对孙先生了，不要闹出事来才好。”我说：“陈炯明不赞成孙先生的主张，这样下去，我也很担心。”邓仲元夫人即时对我透露：“我听说陈炯明不敢来参加邓仲元的追悼会，意思是怕孙先生会不利于他。”我立即表示：“孙先生不会这样的，我可带子女作人质，如果孙先生不利于他，可以由他杀我一家。”我还预备约邓仲元夫人一起去石龙，劝陈炯明回心转意。岂料就在六月十四日，陈炯明给仲恺打来一封电报，假意说请仲恺去

惠州领款，并说“有事相商”。仲恺也想见见陈炯明一并做些挽救工作，就在那天到惠州去，甫抵石龙，即被陈囚于石井兵工厂。陈炯明还说：“这一次就把‘孙大炮’的荷包给锁住了。”陈炯明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邓仲元、廖仲恺两根“眼中钉”拔去，于是在两天之后（六月十六日）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公然背叛孙先生。

当晚，有人秘密来向孙先生报告，孙先生当时悲愤得竟欲以身殉职。一直延至十一时，孙先生左右的人见形势实在危急，都力劝孙先生先行离开总统府。在孙先生的意思，本来想和孙夫人一同离开。但是孙夫人以为孙先生责任重大，避难宜急，她若同行，不惟要慢些，还容易被认出来，故仍请孙先生先行，勿以她为念。孙先生于是才离开总统府。午夜一时，火烧观音山，孙夫人在马湘副官的护卫下，也冲出了总统府。当时从孙先生住宅到总统府，是要经过一个天桥的，那里有几千陈炯明的军队包围着，又放了火。驻在总统府的守军陈可钰、李章达部队已向陈炯明部队开火，孙夫人当时冲出来的危险情形，可想而知。她这种为顾全大局，不顾个人危险，勇于牺牲个人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我怕陈炯明加害于小孩子，先把梦醒、承志打发去香港。我一个人留在广州奔走，找孙先生和仲恺的下落。

我终于在陈炯明开会的地方找到陈炯明的部下，要他们让我去找孙先生孙夫人，他们推三阻四。我起先向他们取通行证，他们不答应。我就向他们说：“孙先生就任大总统职的时候，你们不都是去庆贺过的吗？为什么现在又来反对他呢？”他们还是不答应。我接着又说：“你们应该追念孙先生是推翻清朝、手创中华民国的人。你们不都是由于孙先生倡导革命，以及黄花岗等各次战役烈士们流血牺牲，激发起全国同胞共同奋斗，推倒清朝，成立了中华

民国，才有中华民国的官做的吗？你们今天饮水思源，不应该这样对待孙先生。”他们仍然不答应。我看提起孙先生说不动他们，便又换了一种理由和他们说：“你们纵不让我去找孙先生，也必须让我去找孙夫人才行。你们应该还记得，孙夫人是我们慰劳会的会长，当去年你们讨伐莫荣新、沈鸿英等的时候，她不是和我发起出征军人慰劳会，募了十几万款慰劳你们吗？你们总该容我去找她呀！”他们还不答应，并以危险来吓我。我说我不怕。后来，洪兆麟来说：“你这样忠心”，就派给我两个卫兵（其实是监视我），叶举又给我车子，另一个军官杨某又派一个副官带口令跟我一起去，这样我们才出来。这些人，我都慰劳过他们的，他们对我尚有好感。

我们一行出发，但是沿途实在太危险了，派来的卫兵曾经对我说：“停车吧，那边又开枪、开炮了。”我说：“如果你怕危险，就请你回去吧，我是不需要人来警卫的。”他们当然不敢回去。我们又继续到处找，直到后来司机看实在太危险了，就停下来。

我们在树荫之下，停了两个钟头。卫兵问我口渴不渴？我说有点口渴，他就去拍老百姓的门，要去取茶。我立即对他说：“这样抢老百姓的茶，抢来我也不吃的，要人家情愿给我，我才能吃。”卫兵后来就拿出两分钱铜币，给那家老百姓，叫老百姓泡一壶茶来喝，并亲手递了一杯给我。所以兵是好的。

这天找不到，要第二天再找，我回家之前，告诉那个副官，请他给我口令，我好带了口令第二天再找。最后才打听到孙夫人在她同学的家里暂住，我在岭南大学一所小房子里找到他，孙夫人在途中小产了。我们谈到陈炯明这次叛变，都很伤心。

后来知道孙先生在永丰舰，我马上去找他。因为天热，孙先生已经晒得很黑了。孙先生在船上住了这几天，也很辛苦。孙先生

问起外边情形怎么样？我说，“我已找到孙夫人。仲恺则被陈炯明扣留，不明生死。现在人人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了。”孙先生也很痛心。我见孙先生的衣服被汗污了，也没有替换的，回来之后，想到古勤勤身材与孙先生相同，就去古家找古太太（古本人亦已离开），借一件古勤勤的衣服，送去给孙先生。我这样先后来往送信息送衣物与孙先生，共去永丰舰上三次，每次都是以大义责骂守卫的士兵，他们才让我通过的。士兵们对我也是很好的。

在仲恺被囚后的第十天，我找到陈炯明部下一个军官熊略，说动了，他借给我电汽船到兵工厂去看仲恺。我到了兵工厂，戒备极为森严，在一个楼上，我见到了仲恺，但是被禁止说话。他身上被三道铁链锁起来——手上一道，腰间一道，脚上一道，都系着很长的铁链子，锁在一张铁床上。我走到他近前一看，才知道他身上还是十天前冒雨到石龙去的时候穿的夹衣，已经汗污得不成样子了。他住的房间又是朝西的，天那么热，再穿下去怎么得了？可是他全身锁着，脱也没有法子脱。我第二次去见他，带了一件衣服给他，也只好用剪刀把脏衣服从背后替他剪下来，才换上另一件衣服。我后来又打电话给陈炯明部下的熊略、钟寿南等人，要他们设法替仲恺开锁。过了几天，他们得到叶举的允许，才替仲恺开了锁。

我在这一段日子四处奔走，真是心力交瘁，适巧又患痢疾，医生说天天打针，迫得进医院医治，和伍廷芳同一个医院。火烧观音山之时，外交部长伍廷芳也住在总统府，他因晚上火警，惊慌过度，病在医院。伍廷芳死，我也是亲见的。

就在这个时候，陈炯明的同宗兄弟陈达生在香港被人暗杀。据说布置行刺的人透露出口风，说是因为陈炯明囚禁了仲恺，所以一定要杀陈炯明的人云云。陈炯明和他的部下因此决定再过几天

就要枪毙仲恺。我本来正在医院治疗痢疾，但一听到传闻陈炯明想加害于仲恺的消息，我也顾不得等病好，又再出来奔跑。

那时我拖着痢疾的病体，天天要去医院看病，又天天要出外奔跑，精神、肉体均痛苦不堪。这两个月，我是很痛苦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不尽力做，谁去做呢？就是苦也没有法子，一定要去做的。

我第三次去看仲恺的时候，陈炯明要杀害他的这个消息，仲恺本人也知道了，他作了一首诀别的诗给我。那首诗是这样的：

后事凭君独任劳， 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 胜似屠门握杀刀。

又：

生无足羨死无悲， 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 好从解脱悟前非。

还有一首是给孩子们：《诀醒女、承儿》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我这次去看他，有五个卫兵看守，不许我近前与他谈话，并用枪拦住我。我与仲恺相隔一两丈，但见他示意有一张纸要递给我，我要去拿，被卫兵用枪拦住。我气极要用手去抢那支枪，并且大声说：“你们放枪吧！放枪吧！我是不怕的。”他们被我吓住了，就松了手。我马上赶紧去伸手把诗接过来。卫兵也许是看到我那个样子，有点良心发现，也说不定。所以我说兵是好的。

也就在这个我为孙先生和仲恺到处奔跑的时候，一天夜里，一

个陈炯明手下颇为得力的师长洪兆麟来对我说：“现在永丰舰天天向我们打炮。我们知道你几次来往永丰舰都没有事，是否你肯再去永丰舰一次，我们派两三个人跟你去，叫孙先生今天晚上不要打炮。如果你都能做得到，我们明天就放廖仲恺。”本来放仲恺是好的，但派两三个人跟我去永丰舰，假如他们加害孙先生，又怎么办呢？我不能为了仲恺而加害孙先生。我就对他说：“你们叫我这样，我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孙先生的。我是不会离开广州的，你们想什么时候派人来抓我，我也不怕。”我明白那时我已经是半俘虏了。但我看陈炯明也不敢真的来抓我。如果他真的抓我，我大不了拼却一死，他反而成全了我的志愿，而他自己叛徒的臭名，却一定传扬得更远，所以我是不会怕的。洪兆麟很扫兴地走了。

当时，据说陈璧君、伍朝枢、古勤勤等人在香港，预备筹措收买绿林人物去劫狱。起初，托人带密信来给我，我不赞成。因我去探视仲恺三次，见警卫森严，重重把守，足有一营兵力，仲恺个子矮小，眉毛有痣，人家很容易认出来，藏在哪里呢？他们叫朱执信夫人来和我谈，我也照样向她解释，拒绝了。

后来陈璧君自动自香港回到广州，住在广州市沙面维多利亚酒店（解放后改名为胜利大厦）。她叫朱执信夫人来告诉我：“我们已经决定今晚劫狱，不管你赞成不赞成，我们也决定这样做，现在留在广州的只有你一个人，事成之后，怕陈炯明再危害于你，所以盼你今日到旅馆来谈谈，商量一切。”我就去了。我还是坚持我的主张，极力反对劫狱。

当天我就留在这个旅馆。这是一间专门租给外国人居住的旅馆，我们住进去都是很秘密的。来往维多利亚旅馆的人多是海员，海员对我和仲恺都很好。在旅馆我看到报纸登载以前邓仲元的部

下梁鸿楷第一师发生兵变，有一部分人加进了陈炯明派。我看了报，叹气说：“糟糕，北伐军要失败了。”我本来是希望北伐军胜利，孙先生就可以得救的。但陈璧君却说：“北伐军一定不会失败。”我说：“现在会失败的。”她跳起来说：“你想北伐军失败，仲恺可以出来罢了。”我说：“我怎样亏心，也不会希望孙先生死而仲恺能够出来呀。”我真气极了，一巴掌打到她脸上。陈璧君胆小，但是为人奸狡。她也不气，也不吵，却连声赔不是。过了两三个钟头，她就跑回香港去了，我也不留她。我早知道她靠不住的。我想不如回家吧，但又怕陈璧君把我的踪迹说与外人知道，当晚就先不敢外出，仍然留在旅馆里。

当天晚上，叩门声响了。我警惕地去开门，一看进门的是一个日本人，我竟一下子认不出是谁，心里十分诧异。只听见那个人开口说：“我就是日本山田良政之弟山田纯三郎，我是化了装来见你的。你现在也很危急，如果你想离开广州，我们日本朋友有船就在这里珠江附近，我可以帮助你找船去香港。”我答他：“现在孙先生还在永丰舰，仲恺又被囚禁，我除非等到他们都安全脱险之后，我是不离开广州的。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还可以替孙先生送信送衣物，我现在其实已经是个半俘虏了。在孙先生和仲恺还是生死未定的时候，我是决心不离开广州的。”谈到孙先生和仲恺的情形，我伤心流泪，山田纯三郎也流下泪来。日本朋友在危难当中对我们这样真诚相助，对比军阀陈炯明对孙先生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行为，真使我感慨万分。

所谓劫狱也是假的，这已经在我意料之中了。第二天，我就回家去。

对待在危难中的孙先生和仲恺，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生活常常就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严峻地考验了每一个人。

在军舰上被困五十多天之后，孙先生因为北伐军南下的计划由于梁鸿楷所属部队投降陈炯明而归于失败，永丰舰孤立作战已无意义，所以他就回到上海去了。

八月里，有一个以前在日本留学的龙荣轩来看我。他从小在日本认识我们，他在日本学军事，当过武官。他说：“明天陈炯明总司令在白云山开会，我要去参加，廖先生现在怎么样呀？”我说：“我只听说要枪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他说：“我明天见陈炯明，去给他说说吧。”我说：“说也无效，倒不如你去的时候，我坐你的汽车一起去吧。”这本来是犯法的，但他也答应了。

八月十八日，我去白云山是乘龙荣轩的汽车去的。到了山下，天色阴沉沉地，也叫不到轿子，我就走上山去。正走在山道上，忽然天下起大雨来，我又没有带雨伞，淋着雨爬山，心里更是着急，不意一脚不稳，滑到山沟里，弄得满身是黄泥，头发衣服全湿得不成样子。正巧碰着洪兆麟上山开军事会议，他就领了我上去。

这时陈炯明正在开军事会议，军官很多，桌上还摆了茶点。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陈炯明拿了一张藤椅给我坐，递了一杯白兰地酒给我喝，并说：“廖夫人，你身湿了，喝点酒吧，不然要受寒。”我喝了酒，但还不进去。后来陈第三次来见我，说：“叶举有家眷在此，你换一件干衣服吧。”我说：“雨湿有什么要紧，我今次来，还打算血湿呢。我问你，仲恺有什么对你不起？你们说仲恺帮孙先生筹款，要把孙先生的荷包锁起来，就囚禁了仲恺。但仲恺何尝不在民国九年之时帮助你们呢？你们在漳州两年

多，把孙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抵押了三次来帮助你的不也是仲恺吗？难道只有帮助你才对，帮助孙先生就不对了吗？同样都要帮助，帮助孙先生更要紧，我们没有对你不起。这些远的事不说，就拿眼前的一件事来说吧，不久以前，邓仲元夫人到我家来说：为仲元开追悼会，想请你到广州参加，怕孙先生会不利于你，问我的意见。我听了她的话，我就大拍胸脯地对她说：

‘我相信孙先生绝不会对他不利的，你尽管请他出来好了，我可以带子女到惠州去作人质，来担保他的安全。’这件事你可以打电话问问邓仲元夫人的。我今天来到，我也不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酱我也不怕。仲恺是杀是放，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雨湿有什么要紧？”

陈炯明就拿了一封电报给我看，表明“这都是部下做出来的，详情我不知道”。他又假意写了一个条子叫我和龙荣轩去兵工厂，把仲恺押到白云山。

我拿起条子看了一眼，觉得他是意在敷衍我，并无即刻释放仲恺的意思，我把条子掷还他。我就又厉声地对他们说：“我今天来，是没有打算回去的。人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你们就把我斩成肉酱，我也不怕。今天我死虽然轻于鸿毛，但我相信将来会有价值的。对于廖先生，我也不一定要你们放他，但是，我一定要你们今天给我一个决断的答复，就是放他或者杀他。”边上的人都说我脾气太大，然而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的确又是激愤又是悲伤，也实在忍不住了。

在这时候，陈炯明一个部下马玉航走来劝我说：“把廖先生放到白云山来就是放他的了，你为何对总司令还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就对他说：“这是明放暗杀，要放他就让他跟我回家去，要杀

他就留他在白云山上。”他把我的话对陈炯明说了，陈又来问我的意思要怎样办，我就直截了当和他说：“你作事要磊磊落落，要杀仲恺就随你的便，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要解到白云山来，押上白云山是明放暗杀。”陈炯明也自知理屈，而且他觉得那时孙中山先生已离广东，原在韶关的北伐军亦已离开粤北，革命势力对他的威胁已经暂时解除；他又觉得以前留驻漳州的那批粤军干部对仲恺还有好感，也不敢遽尔杀害仲恺。踌躇再四之后，便下令释放了仲恺，并派龙荣轩、缪培南两人送廖仲恺回家。龙、缪二人便陪我到兵工厂接仲恺。

仲恺回家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谈起这次事件，我的主张是立刻离开广州，因我觉得今天陈炯明之所以这样放仲恺回家，只是一时良心冲动，明天又不知会不会变卦了。但仲恺还是愿意留下，总说要处理执信学校的事（因传闻执信学校有女生在陈炯明火烧观音山之时，被兵强奸）。我对他说：“只要留有生命，回来可以再办学校的。”争论之后，我们就在半夜三时乘船离广州到香港，然后由香港再转到上海去。那时孙先生早已抵达上海了。果然，在我们离开广州后，第二天早上十时，陈炯明又派军队来我们家里重新逮捕仲恺。可见那夜立即离开的主意，是没有错的。

这次仲恺被囚，虽能幸免于死，也不过多活了三年零两个月，但是总算多做了一件事，即多做了帮助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联俄、确定三大政策这一件大事，多一个贡献，也是好的。

孙先生脱险到达上海之后，更坚定了他联俄的决心，更坚定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志向。快到九月重阳的时候，苏联派来的代表越飞

已经来到中国，正要开始与孙先生谈判，就被上海英租界特务跟踪，只好改去日本。适巧孙先生因事需要留在上海，只得改派仲恺到日本与越飞接谈。仲恺的哥哥是北洋政府派驻日本的公使，我们虽然利用了公使馆的有利条件来掩护，可是和越飞的谈判还是被日本东京的“特高课”发觉了，又只好各找借口到热海温泉会合。越飞先以治疗足疾为名，先行到达热海，那时我因奔父丧已由日本回香港，梦醒身体较弱，仲恺便借口携带女儿梦醒养病，也来到热海。仲恺与越飞就这样在热海共同研究中苏联合、反抗帝国主义的初步意见，为后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先行研讨了细节，做好技术性的准备工作，准备了双方交换意见的基础。为了保证苏联代表的绝对安全，为了谈判进行顺利成功，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极端秘密，连很熟的日本朋友也避开没有会面。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中苏友好会谈，就是这样曲折艰险地穿插着与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特务的斗争而进行的。

但是实现这些理想，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孙先生直接掌握下的武装力量又非常微弱，一九二二年底，孙先生只好利用广西、云南的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队打败了陈炯明，我们才算又回到了广州。一九二三年，孙先生抵达广州，开始商议改组国民党。

当孙先生一提出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时，马上遭到那些早在同盟会时期就想把中国引上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的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之类以及稍后参加进来而又抱有同样类型思想的冯自由、张继、邓泽如等各式各样右派人物的激烈反对。因为冯自由反对改组，我亲耳听见孙先生驳他：“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孙先生又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张继反对改组最为激烈，孙先生当时甚至想开除张继的党籍。有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无理取闹，孙先生叫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在正式公布改组的时候，邓泽如和林直勉二人联名上书孙先生，极力对改组表示不满。孙先生以为邓、林二人仅是思想糊涂，所以在信头上一一批示解释，希望能使他们明白。但是邓、林二人是另有意图的。他们非但不听孙先生的解释，反而趁国民党海外代表齐集广州开会的机会，发起所谓“组成一会，为救党准备”，甚至连章程也指定由邓泽如、谢良牧、林直勉等人起草。在章程已经写好，他们那个组织也将要成立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报告孙先生，孙先生立即命令邓泽如召集海外代表到他家里，严加责备。这件事才停止进行。不过右派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决定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争夺代表席位，希望把持大会。当时右派之中，运动争夺代表席位的，除了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外，还有古勤勤也在其他方面秘密进行。他们双方还彼此照应，认为“殊途同归，将来必要之时，可以互相联络”。当时中共办的刊物《响导》很受欢迎，宣传力量很大。右派也预备办一种报纸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以示和中共所办的《响导》相对抗。他们预备在必须与共产党决裂之时，就利用这个报纸来攻击共产党，攻击国民党革命派，这个报纸就是后来在孙先生死后出版的、经常刊登反苏反共言论的《国民新闻》。

当时公开反对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固然大有人在，但也有些表面随和而实际对孙先生抱阳奉阴违态度的人，比如邹鲁、胡汉民、许崇智、吴铁城、伍朝枢等人。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有在暗中反对，消极怠工，却不敢公开说反对的

话。这批右派当时虽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活动，但他们的罪恶阴谋，却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在企图推倒廖仲恺的右派反革命大联合的多次集会中，全部暴露无遗，全部明朗化了。

斗争激烈尖锐地展开了。孙先生和他领导下的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和公开反对他们的国民党中最反动的一派，一方面又和只在暗中反对他们的国民党新右派不断斗争，排除万难，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孙先生的支持下召开了。会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正式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些革命措施，仲恺和我都极赞同。仲恺并且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筹备策划工作。国民党改组之后，仲恺被选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

黄埔军校创立，仲恺任党代表。为了办好黄埔军校，仲恺也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孙先生和仲恺之所以这样苦心孤诣地创办黄埔，就是深知军阀终不可靠，一定要成立一支进步的、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足以反抗帝国主义，并最后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武装。这就是为什么军阀杨希闵把持了广东财政，始终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别是对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处处留难；同时也是为什么孙先生和仲恺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也坚

持一定要把黄埔军校办下去的原因。

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员有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匏安、周恩来、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林伯渠、李富春、吴玉章、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熊锐、恽代英、邓中夏、杨殷、刘尔崧、阮啸仙等，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恺关系是很密切的。中国共产党员对开展农工部的工作，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的。

我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妇运工作。在孙先生领导下，又得蔡畅同志、邓颖超同志协助，妇女部出版《妇女之声》月刊，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筹款设立女工学校、贫民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加强反帝反封建宣传，联络争取有志革命的青年女学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与法西斯派的妇女组织展开斗争。

当时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都齐心一意的投身到革命风暴中来。广东到处都洋溢着蓬勃的革命气息。但是在国民党中，也有一些企图在孙先生已经改组国民党，已经公布实行三大政策之后，仍然想把中国革命扭向右转的人。戴季陶就是这类人中的典型。汪精卫当时是自行标榜为“左派”的，但那是假左派。所以没有多久，他就公开坏了。

戴季陶本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活动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本来与朱执信、廖仲恺同时，同是属于介绍传播早期社会主义思想那一类型的。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变节退出了。他也不赞成改组国民党。本来当戴季陶背叛共产党的时候，他曾向孙先生提出

过改组国民党的事，但他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有他个人的野心和目的，纯然不是为国家为人民设想。孙先生看穿了这一点，当时就没有答应他。一九二三年要决定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戴季陶不忘前事，别有用心，对改组国民党极力反对，百般中伤，态度恶劣，至为无耻。在改组的初期，戴季陶迟迟不肯前来广州，一直蹲在上海。他还竟然提出“为什么以前说要改组国民党，孙先生不肯采纳，而现在要联俄、联共才实行改组国民党呢？”这样荒谬绝伦的问题。他在上海还写了一封信给仲恺，特别提到联合共产党的事。他在信中写道：“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作为正菜。”就因为戴季陶早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以后，北伐那一年，我们到了庐山，戴季陶还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看外面正下大雪，国民党要亡了，大雪正象给国民党戴孝。蒋先生待我这样好，我只好殉友了。”虽然我当即以“为什么要殉友呀？我要就殉国，不能殉友”这样的话来警告他，他还是不知改过。戴季陶就这样在以后一直到他死之日，还跟着蒋介石走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到路。

在国民党改组完成之后，孙先生为明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曾先后对党员发表多次演讲，反复阐述唤起民众的必要，指出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我也按时每天前去听讲。

孙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抓党员的思想建设工作，就是希望党内全体同志都有正确的革命思想目标，希望党内的右派人物会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赞成三大政策。很多同志都在这个时期接受了孙先生的教导，如柳亚子、彭泽民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骨干。可是头脑顽固、思想反动透顶的右派人物，虽经孙先生反复理喻，却转变不多，或则表面随和，实际阳奉阴违，甚至有的死硬反对

到底，终于变成革命事业的敌人。

国民党改组完成，广州革命政府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立即迅速展开。由截留关税余款，抗议英帝国主义派遣炮舰进行威胁，直到消灭了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商团武装，经过了一系列斗争，广州革命政府的影响日益扩大了。

一九二四年冬，孙先生北上，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向朝野上下宣传。他绕道经过日本、天津，然后抵达北京。

北洋军阀政府深怕孙先生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会恼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得罪了帝国主义，所以都认为孙先生过激。

孙先生在广州尚未北上之前，就不很健康。在不利于航行的冬天，又经过日本、天津，然后到达北京，身体更觉不支。到了十二月，他的病已经很重，医生都劝告他，假如再不摒除一切，切实休息，怕是很难治的。可是，孙先生是巴望我们中国人民快快得到解放、革命早早达到成功的人，怎么能够片刻把他的工作放开呢？于是他的病只有一天天的沉重下去了。

我记得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那天，仲恺对我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参与策划，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我对于孙先生的病本也着急得很，仲恺这么一说，我就匆匆整装于四日北上了。到了上海，又接着电报，说是医生认为孙先生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我到达北京，即住进铁狮子胡同，先到那里侍病的，已有几十人。

北洋军阀段祺瑞那时正在北京，我们从广东来的这一些人到了北京，都是由他们接待的。他一方面对我们接待得很好，多方笼络，希望我们同情他的“不要过激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另一方

面又先派许世英见过孙先生，劝孙先生说话要和平一些，不要太过激烈，免得引起“列强交涉”。孙先生听了很气愤地说：“假如不颠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那时孙先生的病更沉重了。我看孙夫人日夜地侍病，从没有正常睡过，真使我感动。

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孙先生尚在协和医院里医治，孙夫人也是住院陪伴着的，因为病总不见起色，后来张静江、李石曾等主张请中医诊治，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便迁回铁狮子胡同。可是服了中药，也并无多大效果。

当时大家因为孙先生病得很沉重，整日环侍左右，时时商议医治的办法，大家都很巴望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继续领导我们建设这个他亲手所建立的国家。

不过那时候孙先生的病总是一天天加重，服用药物很少有效。大家眼看着孙先生的病势，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觉惶急，生怕他的病万一治不好了，将来怎么办呢？因此，迫不得已才和孙先生婉言请示以后的事。他本是学医的人，也知道自己的病势厉害，他点头答应了。记得是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和孙先生谈立遗嘱的事，到二十四日，遗嘱已经全写好了。预备的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民党开会常念的那个，由孙先生口说，汪精卫在旁笔记的；还有一个是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本来孙先生口述的遗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曾经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

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汪、陈二人也不满。

这三个遗嘱，在一月二十四日都已写好，本来当天下午孙先生就要签字，但是将要签字的时候，孙先生听见孙夫人在隔壁房间很伤心，他为了安慰孙夫人和周围一同伤心难过的人们，便表示暂不签字。那时我们也就安慰孙先生说：“你是一下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孙先生因为立遗嘱伤感得很厉害，当夜就睡不着，病又加重了许多。

后来，大家怕添了孙先生的病，再也没人敢提这件事了，只是每天每夜想法子怎样可以医治好孙先生的病。而他的病状，也有时好，有时坏，没有根本好转。

记得是三月十一日早晨八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霭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那时正是中午快要吃午饭的时候。

为什么我那天那么着急呢？因为孙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即使在孙先生未死之时，也有很多人公开反对，假若再不签了致苏联的遗嘱，以后国民党右派的人一定会更明目张胆来反对了。

三月十一日的下午，孙先生情形更不对了，他说话的能力渐渐退减。但他看着我们，还很悲慨地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汪精卫答他：“要怕敌人，我

就不革命了。”汪精卫后来投降帝国主义，就是恰恰为敌人软化了。孙先生这一段话专门对汪精卫说，可见不是偶然的。

后来孙先生又喊我：“廖仲恺夫人……”，喊了两声，便咽哽舌僵，不能作声，但又象还要说什么。本来在平时，孙先生都是用日本话喊我“巴桑的”（“巴桑”是日本话，即老太婆的意思，是日本人呼叫年纪稍大的女服务员时用的），当时我一听到他那样郑重地沉痛地叫我“廖仲恺夫人”，我就很伤心地掩泪和孙夫人一起走到孙先生的床前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当时孙先生一听我的话，就潸然握住我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他握住我的手，有十分钟才放开。弥留的时候，孙先生又支撑着精神挣扎地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在第二天早晨九点十分，这位革命领袖，便永远离开我们而长逝了。这里我还要追记的是：孙先生当时对于他的遗体 and 葬仪，他也明白吩咐过。关于遗体，他叫送给协和医院作医学解剖研究。至于葬仪和棺材式样等等，他也吩咐都仿照苏联的殓殮办法，也要任民众瞻仰遗容。孙先生灵柩移到碧云寺那天，民众参加的，多至二三十万人。

由于广大群众对孙先生不幸逝世的沉痛哀悼，我有一个预感，我觉得民众已经跟着我们起来了，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自孙先生逝世以后，经过殓殮、移灵，丧事算是大定，我们准备动身南下时，光阴已过了一个多月。我陪着孙夫人先到南京勘察一下墓地，然后再去上海。当我们南下到浦口时，南京的同志约有一二百人结队到江边迎接我们，里边青年同志占多数，也有不少女

同志。

后来南京举行孙先生的追悼会，我和孙夫人、孙科又都去参加。追悼会会场在秀山公园（后来改名为“中山公园”），是南京学生联合会和我们的同志主办的，规模很大，追悼刊物和其他宣传品很多，凡到会的都分发一份。会场内的挽联、标语，触目皆是。当我们进会场时，南京的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们，也正一队一队的来祭。记得那天午后，正下着大雨，我以为到会人数不会太多，岂知出我意外，到会的人多得很。我那天穿着布鞋，踏着泥水，被引进会场，那里已挤得满满的，站了几百青年男女。

轮到我登台讲演的时候，我说的广东官话，许多人听不懂，会场的主席又用国语替我扼要地翻译一遍。我说完之后走下讲台，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慰，我发现我们革命的思想，在南京很多青年男女的心里生根滋长了。

参加南京追悼大会之后，回到上海停留了不多几天，我便回到广州。我一踏到广州的地面，觉得气氛比我离开的时候不同得多了。在到处张贴的标语里，在市民的眉宇间，在黄埔学生和士兵的气概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我们革命的精神又发扬光大了。可是到家里见了仲恺，他在这几个月里又憔悴多了。自从孙先生逝世，仲恺更领导着同志群众，加倍努力工作，弄得眠食失常，真可以说是拼着命干。我一方面对于当时蓬蓬勃勃的气象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仲恺的健康担心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旬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以迅速行动，解决了云南广西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反动武装。六月二十三日，继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广州沙基惨案爆发。接着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广州的革命气氛更高涨了。

当时仲恺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已经面对面地展开。如果说，在孙先生未死之前，国民党右派的矛头，是指向坚持改组国民党、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孙中山先生的话，那么，在孙中山先生死后，右派的矛头，就转而指向遵照孙先生的遗志、贯彻孙先生主张的廖仲恺等人的身上。

七月初，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朝枢、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在这会议上，右派集中攻击仲恺。他们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夫”。所以他们运动把他们那一派的人选入执行委员会做秘书长，把持会务，并且制造口实，诬蔑海陆丰共产党“刑人掠产”，广事宣传。同时还决定向苏联代表鲍罗廷表明态度，甚至还具体指定专人去和鲍罗廷代表谈。他们为着更便于实现他们的野心，对于把总理制改为委员制一点，也是不赞成的。孙科也参加这些会议。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由此可见当时这些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内容了。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又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十一次之多，每隔数日即开一次，参加的都是这十几个人，商量的事，大多与第一次集会时所谈者相同。

右派除了开秘密会议，阴谋伤害仲恺，阻挠革命事业之外，还经营了一间类似俱乐部性质的“文华”，专门做聚会的场所，大事聚赌吃喝的勾当。右派常常在那里纠合随从，公然大放厥词，辱骂仲恺和他的执政主张，其中骂得最厉害的，有胡毅生等人。

他们的目的，不单是要暗杀仲恺，不单是要把仲恺这样一个人

除掉。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民党全体右派人物联合起来，企图使廖仲恺倒台从而企图全盘推翻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阴谋了。

在右派这样猖獗的进攻中，仲恺丝毫不为所动，仍然毅然决然、孜孜不倦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工作。

当时真心拥护孙先生遗志、拥护仲恺坚守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的主张的人，还有徐谦、彭泽民、柳亚子、经亨颐等人，此外还有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组织的广大工人群众，在农民方面的有农民协会，学生方面的新学生社和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些革命的群众组织，都是仲恺在执行孙先生遗志的一系列工作中的坚强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反革命右派也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他们的拉拢拼凑活动，他们在黄埔军校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在学生中也发展法西斯派的组织，就是当时所谓“士的党”。这些组织，都是反对三大政策的。我们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和他们对抗斗争。

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也是依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他们以国内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利益为利益，以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利益。右派不独反对我们发动省港大罢工，而且对于孙中山先生截留关税余款，平定商团之乱，都是不赞同的。他们生怕开罪了外国帝国主义，生怕开罪了资产阶级、买办阶级。仲恺极力和协助这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遭到右派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反对，更是势所必然的了。

正如仲恺生前所说：“凡是为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造福的，就是革命派。”仲恺是一个革命派，他当然不会做有利于右派、有利于外国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工农大众的事。所以仲恺是绝

对不合右派的胃口的，也绝对不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胃口的。

在出事前几天，我们本来也曾经接到过密报，据说搜到一个法西斯派的学生有一封信，里面写着“黑衣领袖有奖励”。我们当时还莫名其妙，不知道黑衣领袖指的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指法西斯党的领袖莫索里尼。

就这样，大概在仲恺未遇害之前一个星期的光景，我们就晓得有人暗算他，而且想要加以谋害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反革命这样宣传他们的行刺的计划，无非是希望仲恺听到这些，就会退却。可是，他们的威胁宣传，一点也没有用处。当这个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便和仲恺商量着说：“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他听了很不以为然。他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要谋杀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他说的自然很有道理，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是防备一下好些，到底又派了一个便衣卫士随从他，并知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吴铁城。谁知，吴铁城也是参加反对仲恺那一伙的。

八月十九日夜晚，仲恺又忙于替黄埔军校筹款，到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刚过八点，又有人来向他请示公事，等他把公事交代完毕，已经是八点多钟差不多快九点了，仲恺还没有吃早餐。因为我们预先接到通知说是九点开党中央的常务会议，我催他说：“快点吧！开会的时间到了。”仲恺于是匆匆忙忙

地只吃了几口白稀饭，就和我一起上车出门。唉！现在想起来，也真象催他去死一样。

车子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着陈秋霖同志，他正要上我们家里商量事情。仲恺一看见就招呼他说：“你是找我吗？”陈同志说“是的。”仲恺说，“那就请上车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同志便登上车了。

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停下，我们先后下车。我刚一下车，抬头看见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向她说：“停二十分钟我就到妇女部，我有事情和你们商量，请等着我。”正在这说话的时候，我就听见“拍拍、拍拍、拍拍拍”地好象放爆竹的声音，我心里还以为谁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转过脸来，看见仲恺已倒在地上。陈秋霖同志痛楚地挨着两步，也倒下去。在我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着了。四人同行，三个男的都中枪了。我这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俯身抚着仲恺，当时仲恺已不能回答。当我刚刚低下头去抚仲恺的时候，又是一阵枪声。头上嗖嗖地有枪弹飞过，我头皮还感觉到热气。那时我若不是弯身去抚仲恺，一定也是完了。在我大喊“快些捉人呀”的时候，就有五六个凶手从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窜出来，原来凶手是预先躲在中央党部门前的。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岗，但那时却迟迟不见有警察来捉人。只有一个在妇女部工作的女同志刘家桐从里面跑出来帮助我。邓泽如那天早已到了中央党部，他就始终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把仲恺架了起来，只见满地殷红。他衣服上的鲜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我的心里，说不清是悲痛还是愤恨，但没有惧怕。到了医院，仲恺已是不救了。大概是在路上就绝了气。陈秋霖同志也

在负伤后几天牺牲了。

事发之后，有凶手陈顺因头部被我们的卫士打伤，眼睛也打坏，当场被我们逮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些单据，按日期顺序，早几天的是当衣物的当票（证明这个人本来很穷），后几天的是分钱的单（证明那个人后来收到人家分给他的钱）。那个陈顺在临死之前，还供出：“香港有两百万元打共产党。”

陈顺又供出：“有几十万元打‘猛人’”（猛人是广东方言，意即有名声、有权势的人）。问他：“猛人是谁呢？汪精卫够‘猛’吗？”陈顺答：“不。猛人是廖仲恺、谭平山。”可见当时是有人主谋打击国民党革命派，打击共产党。从这些零星的细节看来，我们不难看出谁是杀害仲恺的幕后真正的凶手了。

仲恺被暗杀之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立即提出非常正确的主张，要把胡汉民、胡毅生等有嫌疑的人逮捕起来，但是立刻遭到右派喽啰的反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就坚决不赞成，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这就是后来出现了所谓胡汉民出国游俄的这样一幕戏，以及许崇智、梁鸿楷全部武装之所以被缴械的由来。当时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不止办有报纸，把持了武装，还有公开的政治活动，居然召开密谋反革命的会议，可见他们是有组织、有行动的。当时广州的公安部门掌握在吴铁城的手里，这就说明为什么那天中央党部开会，而门岗并没有一个守卫的警卫人员。仲恺当时身中四枪，三枪伤口较大，查明是口径大的枪打的。但有一枪伤口小，应该是口径小的左轮手枪打的，而当天被捕的凶手却没带左轮手枪的。可见当时除了在中央党部门口的凶手开枪打仲恺之外，一定还有一枪是从党部里面打出来。那天本来是九点钟开会，一贯公开反共的邓泽如却很早就来到中央党部，预先蹲

在楼上。所以这一枪，我很怀疑就是“邓泽如的卫士”打的。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充分说明这个反革命政变是多么的阴险毒辣。所有参与这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人，都是仲恺的十多二十年的老朋友，在暗杀仲恺的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他们还是朝夕见面的。而这个阴谋已经进行了这么久，布置得这么机密，以致我们当时并没有发觉。这件事，直到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值得我们深为警惕的。

被捕的凶手供出，这次行刺事件，是朱卓文一手布置的。据说朱卓文以前做县长曾因办事不力，被仲恺免职，所以结怨于仲恺。由此我们又查明主谋暗杀仲恺的，还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赵公璧（胡毅生的妻舅）等人。然而就在对这些人的通缉令发出之前，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三个人便偷偷离开了广州，逃到香港去了。梁鸿楷在他的部队缴械之后也逃到香港，被捕的就只有林直勉一个人。

中共党员杨翰安，他是很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的。直接审讯凶手的还有周恩来总理。

廖案发生之后，虽然捉了凶手，我还是觉得很怀疑，因我听说吴铁城很优待凶手。

有一天，蒋介石来看我，我说：“廖案吴铁城是有责任的。因我在廖案发生之前，到公安局找过吴铁城，我说过‘有人要暗杀廖先生，请你注意’。中央党部本来应有警察守卫的，但是那天却恰恰没有。而且这次朱卓文漏网没有捉到，显然是有人放走了朱卓文。放走朱卓文，吴铁城是有份的。”我又问蒋介石，“吴铁城那么优待凶手，你又为什么这样优待吴铁城呀？”蒋问我：“吴铁城不好，李章达好吗？”后来蒋委任李章达做公安局长。李章达扣留过吴铁城，

不久，吴铁城又被蒋介石的人放走了。后来李章达又被蒋介石免职了。

从仲恺遇害的那一天起，我哀悼死者，并忧伤将来，精神体力都有些支持不了，几天没有出家门。等我到外面一看，虽然仍然忍不住我的眼泪，可是一切气象，都使我感奋极了。在每个追悼会上，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总都是充满着悲愤之情与坚毅果敢之气。“我们要替廖党代表报仇！”（国民党改组之后，仲恺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这些呼喊的声音，到处洋溢，充满人人的耳鼓。仲恺出丧的那一天，参加的同志有黄埔军校的学生、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和市民群众共有二十多万人，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绪之热烈、严肃、悲壮，在广州来说，都是空前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仲恺所流的赤血，已变作了革命的火花。我何曾孤单？我们有了这么伟大的队伍，——广州已经都是我们的革命力量了呀！我流着感奋的热泪，望见了革命胜利的前途。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仲恺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期间，他们二人一起合作共事，亲密相处，真诚无间。仲恺不幸去世，周恩来同志特别为仲恺写了篇以《勿忘党仇！》为题的纪念文字。文中大意指出：“廖先生一生为党为国，现在又在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不幸牺牲。可以说，廖先生是为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而牺牲的。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件伟大事业的做成，大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廖先生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当然会招致帝国主义之忌，尤其是招致香港政府之忌。廖先生

一向为反革命分子所忌视,为帝国主义者所忌视,现在又终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推动革命运动、为推动工农运动而被暗杀牺牲,我们一定要为廖先生报仇。”

仲恺的去世,使当时的革命事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使当时刚刚开始南方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运动和反帝运动也受到了一些波折。由于仲恺生前爱护工农群众,致力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仲恺出殡的时候,各地工会、农会送来了挽联,简朴的言词,表达了革命群众对仲恺的深切爱戴。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

黄炎培

辛亥以前十年中间，一九〇〇年唐才常起义湖北不成；一九〇四年黄兴(克强)谋起义长沙不成；一九〇五年吴稚(孟侠)谋刺出国考察宪政之载泽等不成，吴自身被炸死。一九〇六年江西萍乡党人起义不成；一九〇七年徐锡麟(他和我还是壬寅乡试中举人同年)因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杀。同年，孙文(中山)、黄兴等攻镇南关(今睦南关)不克；一九〇八年云南河口黄兴等起义不成；一九一〇年汪精卫谋刺载洋不成被捕。在此以外，一九〇三年沈荇被清廷惨杀，章太炎、邹容被捕，一九〇七年秋瑾被杀，大大小小事件，在这里不完全列举了。这些事实，给全国人心以很大很大的愤激，觉得再不能忍耐了。

那时一般激进青年的作品，如：

秋瑾感时律诗(节录两联)：

瓜分惨祸临眉睫，	呼告徒劳费齿牙。
祖国陆沉人有责，	天涯飘泊我无家。

赵声(伯先)从天津寄赠吴稚绝诗(四首节录两首)：

一腔热血千行泪，	慷慨淋漓我有言。
大好头颅拼一掷，	太空追覆国民魂。

* * *

临歧握手莫咨嗟， 小别千年一刹那。
再见却知何处是， 茫茫血海怒翻花。

这些足够代表那时激进青年们思想的了。写到这里，同志们这样慷慨就义，我起敬，我还在淌泪。

有不少爱国志士，看到无法救国，竟至自杀。我有一亲密的同志湖南人姚宏业（定生），他是日本回来创建中国公学者之一，某天给我一信，说了几句隐语，第二天从黄浦江里找出了他的死尸。

吴稚和赵声别后，就去北京前门火车站行刺了。我是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我因演说揭发清朝腐朽，被捕判处死刑，脱险，亡命日本，是一九〇三年事。那时清政府说我是革命党，实际上同盟会还没有成立哩），入会后，我负责联络各地同志。赵、吴都是我秘密收藏着的同志名单中的人。每人都有一商店式的别号：赵声同志是“震康”，吴稚同志是“祖茂”，这名单我至今收藏着，单上共四十九人，还有秘密电码。

辛亥年三月，黄兴、赵声等起义广州，攻督署不成，死难七十二人。黄兴幸免。赵声病不及参加，旋即病死。

清廷宣布铁道国有，四川人民抗议，被川督赵尔丰大屠杀。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x x x

辛亥革命，那时我是什么身份呢？我在这中间怎样参加工作的呢？

那时我任江苏省咨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省教育总会（设上海）常任干事、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办处参议。这工巡捐局是上海县地方自治组织的前身，实际上已成为上海地方

性的权力总机关，李燮珪（平书）是总董。

我在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其中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如马良（相伯）、张謇（季直）、赵凤昌（竹君）、姚文枬（子让）等。我们在上海很自然地成立起几个据点来，经常集会。教育总会是一处，工巡捕局是一处，望平街时报馆上层息楼是一处——《时报》是当时最进步的报纸，负责者狄葆贤（楚青）。又一处是赵竹君的家惜阴堂，张謇来上海，时时会集在那里。而奔走联络这几个据点的是我。

马相伯老人还时时招去徐家汇问大局情况。

那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是清朝的大官而很得到人民拥护的，为的是他做过一件突出的事。

程德全是四川云阳县秀才，黑龙江省候补知县。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年），帝俄大举侵略东北，程德全请赴前敌，将军寿山命程德全和俄交涉，无效。俄国隔江发炮攻城，寿山自杀。程德全当时以身当炮口，俄人大感动，中止发炮。黑龙江人民认为以程德全一人的牺牲精神，使全城保全生命。请求清廷命程德全为将军。适清太后招待外宾，俄公使夫人盛称中国有好官程德全。那时黑龙江改省，清廷就破格以程德全为黑龙江省巡抚（根据多禄所写《庚子交涉隅录》），到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三月调任程德全为江苏省巡抚。

× × ×

辛亥革命开始了。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义武昌，总督瑞澂逃。推黎元洪为都督。接着黄州于二十四日、沔阳于二十六日、宜昌于二十七日先后起义。各省纷纷响应。

二十四日，上海赵竹君电话招我去情阴堂商时局前途应付方法，定了一些策划。

二十五日，我和沈恩孚（信卿）、雷奋（继兴）、杨廷栋（翼之），还邀到了张謇同去苏州阊门外惟盈旅馆。张謇受程德全委托，代草劝请帝后逊位奏章。这事保留着一幅“秋夜草疏图”做纪念，我曾题诗一首，收入我的诗刊《苞桑集》。

那时，民军和清军战于武汉一带，互有胜败，忽进忽退。

九月十三日下午，上海民军和商团巡警联络成熟，在闸北突然起义，上海全市挂白旗。当夜会攻清军惟一的武装集中地制造局，不得手，陈其美被捕。李鍾珏那时兼任该局提调，早把是非利害向局总办张士珩反复劝导参加起义，张不允。陈其美被捕后，李又去劝张释陈，仅得不杀。继而民军和商团巡警陆续进攻，十四日上午八时终于胜利地攻破制造局，张士珩逃。

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李鍾珏为民政长，上海道、县的官印都接收下来了。

十五日下午，江苏苏、松、常、镇、太五属人民在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公推代表去苏州劝程德全起义。我被推为代表之一，立即上车，到苏州则程已宣布独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十四日民军五十余人由上海专车到苏州，会同枫桥新军营代表见巡抚程德全。那天，上海起义的消息已到，苏州人民纷纷推代表见巡抚劝响应，程德全慷慨地说：“此举我亦赞成，但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

我在五属代表中先到苏州，但我到时已满街悬白旗了。

江苏宣布独立，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我就被留下办公。

程德全就都督职，首先表现一特点，不杀伤一个满人——他

省有大杀满族平民的。都督府发出六言告示：“照得民兵起义，同胞万众一心。……旗满视为一体，……大家共享太平”。通电全省各属，即日反正，别伤害满族平民。

我留都督府办公，首先做两件事：(1)参与起草新的官制，(2)和同事分向所属各衙门收取印信。在这里又表现一特点：我被命收取提学使樊恭煦印信，那时樊十分战栗。我受程都督谆嘱，十分亲切地向樊说：“此举出于全民公意。你如愿留苏，就留下，给生活费。愿回原籍（樊浙江人），当送回籍川资。”樊愿回籍。所属各卸职人员包括撤换的各知县，一律这样待遇。大家感觉民国比清朝大大不同

都督府任张一磨（仲仁）为民政司司长，未到任前沈恩孚代。我任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

又一特点：都督每月工资五十元，司长三十元，科长和各县县知事（民国不称知县，称县知事）二十元。大家低工资，大家精神奋发。一片新气象。

南京江苏咨议局无形解散，设临时省议会于苏州，十月一日行开幕式。

我的任务比较广泛，有奔走各方的必要，为的是商量问题，大家认为有一同盟会会员在座较好。我就推荐张志鹤（伯初）入都督府（伯初一九〇三年和我同因演说被捕，亡命日本），而我往来苏州、上海间。不久，陈陶遗从南洋归来，我们这一群中又添了一个同盟会会员。

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

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报上一披露，整个报馆那里还站得住？这样一片独立声、胜利声，震动全国，腐朽的清廷狂骇了。

在这里我保存摄影两幅：一是在民军占领上海以前从各报馆集中的望平街南望；二是在民军占领上海以后从各报馆集中的望平街北望。

但那时南京还被清廷的走狗张勋盘踞着，他正在极端残害人民。各地民军公推江苏都督程德全统率联军进攻南京。程都督慷慨就道，发表了一篇誓师文。这篇誓师文，曲折反映程都督思想，写得激昂恳切，当时很博人们传诵。中有警句：“……欲求政本之廓清，端赖国体之改革。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将混贵贱高下为一大平等，须合行省民族为一大共和。……仗诸君热力，再造河山。是民国义师，威遵纪律。……”此文是省议会秘书长孟森（莼孙）起草的。十月十二日，联军攻下南京。

那时各地民军大大小小不等，但从它们旗号计算起来，不下十七、八个单位。各推代表集合起来，程德全亦到，黄兴亦到，十月十四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国名定为中华民国。黄兴等建议规定国旗式样。经过反复研讨，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我还保存着两幅摄影：一是中华民国共和联合会大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时门前之景；二是会场之景。（以上四幅

摄影，都是青年沈云荪赠给我的。他的老辈沈绶云创设上海信成银行，在辛亥革命时，以资财赞助革命。）

自从武昌起义，清廷起用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统兵驻京津。袁立即电召张一麀去北京。上文所说“惜阴堂策划”从此开始。

惜阴堂赵竹君等认为：全国人心是一致要求独立的，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惜实力太不足。腐朽的清廷看到各地纷纷起义，已很惊骇；各省督抚纷纷劝清帝让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谁能说袁世凯呢？只有久在袁世凯幕下的张一麀能说世凯。经过多次函电往返，只见世凯部下冯国璋兵忽而猛击民军，忽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感觉无从捉摸。最后电张一麀面询袁世凯真意，袁答：“诸位懂拔树方法么？几百年大树，专用猛力，虽折断，无法去根。只有左右‘晃’的一法。‘晃’，‘晃’，晃之不已，根土松动，全根一拔即起。我的军队忽进忽退，就是‘晃’的一法”。

没有几时，汪精卫被释放了。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代表，民军公举伍廷芳为代表，双方在上海进行和谈。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袁世凯和清廷间商定：（1）清帝让位，（2）汪精卫释放，（3）提出清廷满意的优待条件。而袁世凯和民军间商定：（1）清廷让位，（2）改建民国，（3）总统职位给与袁世凯。

十一月六日，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了。十日，直、奉、鲁、豫、鄂、湘、粤、桂、闽、晋、陕、滇、赣、皖、蜀、苏、浙十七省代表集中南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孙文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十三日，孙文由上海专车去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确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那天就是中华民国

元年一月一日。

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公布优待清室条件。孙文辞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周旋其间的是汪精卫和副议长陈陶遗。

辛亥革命写完了么？还有一件事，我不能不附录在这里。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号焕卿）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说是陈其美命蒋介石刺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说来，总是一件很大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管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雇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焕卿以为竹卿是自己的人，请他入室，就被刺死。光复会终于又刺杀了王竹卿。”我所收藏同盟会会员名单上，陶焕卿别号济世。

辛亥革命前后杂忆

仇 莹

(一)

我原名曜元，号炳生，一九〇二年入长沙府学。早年好读《船山遗书》，后来看到清朝一些大兴文字狱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纪事以及黄菊人的《黄帝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愤恨清朝的专横暴虐，起了参加革命的念头，就改名“楚遗”。一九〇四年四月，我首次到日本，一面学习师范，一面同罗杰、余焕东、赵縻、仇亮（式匡）等组织新华会。这时，黄克强、宋教仁等已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筹备起义。东京的新华会就是为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两湖留学生参加的最多，覃振、刘道一、田桐、白逾桓、沈鸿烈、樊锥、盛时等都是会员。这时，日本已同帝俄开战，征兵进行短期训练。我和樊锥、盛时、覃振等报名应征，以两个月的时间学完了步兵操典。日俄在我东三省境内开战，清廷不能保卫国土，任凭外人宰割。我们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所以我们那时进行的革命，主要是从对于清廷压迫汉人的仇恨出发。人人都想造反，人人都要推翻清朝。以后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治纲领。但当时也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大多

数人还只是知道种族革命。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一般人更是莫测高深。

一九〇四年秋，黄克强、刘揆一、马福益、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运用华兴会和同仇会的组织，筹备新旧军和会党起义，预定阴历十月十日（公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西太后六十生辰之日发动，省外各地五路响应。我们在东京得悉华兴会的革命组织有所发展，仇亮、赵缵和我三人就兼程回国，准备参加行动。不料到了上海，长沙起义已在事先泄密失败，马福益被捕就义。黄克强、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幸免于难，逃匿上海租界。我在革命秘密机构（公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里，初次会见黄克强。感到他气魄雄伟，态度磊落，意志坚定。他说湖南的组织未散，基础还在，仍可回去继续进行。我们三人依照他的指示，转道湖北回湘。

我们三人当时都只二十几岁，心粗气浮。在用钱方面也没个打算。到了汉口，住在后花楼长春栈。各自检查行囊，三人只余一块多钱，仅够开支行李运费，以后的生活费用更是毫无着落。仇亮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下来就写信给上海机关的黄克强求助。我和赵缵也没有拦阻。第二天，仇亮和我过江到武昌寻找亲友。我在一个朋友的父亲处借到五元。时已傍晚，走到汉阳门，城门忽然提前关闭，听说是要捉拿下江来的革命党。我们二人大吃一惊，提心吊胆地绕至文昌门，幸而城门尚开。出城赶到汉阳门轮渡码头，轮渡也已临时停止，看见岸上满布军队帐棚，如临大敌。只好坐“划子”（小渡船）过江，从王家渡上岸。听得江口的风声更紧，仇亮忽然想起他写给上海的信，可能被官方检查出来，泄露行迹，就害怕起来，走到旅栈门前也不敢进去。我把仇亮引到旅栈

后面的茶馆里坐着等候。我窥看了一会四面的动静没有异样，走进旅栈。赵缘安然坐在房里，这才通知仇亮进来。我们幸而未被官厅的侦探们发觉，第二天就匆匆走了。

回到长沙，原来的革命机关已被破获，一时找不到负责的同志。我便同仇道南（仇亮的父亲）、江海宗等办湘阴师范，利用学校暗地鼓吹革命，并准备进行暗杀。罗良铎从日本带回几枚小型炸弹，江海宗取一枚到岳麓山高处试验不灵，暗杀无从着手。一天，听说陆军大臣铁良到长沙来视察新军，我和一位同志大力士易希谷兴奋起来，决定持挺狙击。我们二人到小吴门等候，我任巡风，他任挺击。他带着一条坚实的粗棍，预备给铁良当头一棒。但是铁良那天没有从小吴门经过，我们这种“古侠客”式的行刺便落了空。

一九〇五年，因为湘阴师范有些老先生革命性不强，我同彭枚生、赵缘另办私立第一中学作革命宣传机关，彭作校长，我作教务长负实际责任。我们开办这个学堂，得力于唯一中学校长禹之谟的帮助很大。禹之谟在湘乡、长沙办有毛巾厂，他是当时长沙的商会会长兼教育会会长，原与黄克强有联系。

一九〇五年秋，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克强领导的华兴会，蔡元培、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合并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所有三会会员均为同盟会会员。我们一度组织的新华会，原为响应华兴会，至此也并入同盟会。黄克强这时密函禹之谟，在湖南成立同盟会分会并推销《民报》。因此，禹之谟就成了我们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首领。《民报》经我们想尽方法偷运偷销，在湖南各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日（阴历十一月十二日），我早年在求实

书院的同窗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次年五月六日（阴历四月十三日），留日归国的湖南学生姚洪业又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来激励国人进行革命，使革命党人深受感动。陈天华遗体由日本运沪后，湖南旅沪人士派人将陈、姚两柩送回长沙。禹之谟、彭枚生和我提议公葬于岳麓山，借以垂之永久。官厅不予同意，但也未明白禁止。我们决定在七月十一日（阴历五月二十日）举行公葬，事先并发表宣言。届时由唯一学校和私立一中为首，发动学生及其他各界并少数外宾共约数万余人，结队护送陈、姚二柩于岳麓山顶，沿途高唱哀歌，队伍绵延十余里，学生身穿白色制服，一片缟素。公葬仪式举行时，禹之谟当众演说，万众振奋，民气大为伸张。官厅这时已无法阻止，因而对我们非常嫉视。恰巧不久发生了长沙学务处要员俞诒庆、漆旦湘宿娼被私立一中学生捉住的丑事。原来俞诒庆、漆旦湘素行不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走入娼家，被附近私立一中学生看见。星期白天亮一群学生拥入娼家把他们捉住，赤身捆绑起来。学生因彭枚生和我都不在校，请得禹之谟到来，当场照相后才予释放。禹之谟指斥俞、漆为士林败类，不能领导学界。俞诒庆等怀恨在心，向官府大吏密告我们是革命党，秘密推销《民报》，准备起事。官府等到暑假，趁大部学生回家，于八月十四日（阴历六月十一日）借故逮捕了禹之谟，后移解靖州被害。彭枚生、赵縻等闻风逃走。我在暑假回到湘阴，还不知消息。开学前返至省城，朋友们立即把我藏匿起来，并代为照料妻室，筹措旅费，我才得秘密取道武汉、上海，逃亡日本。

(二)

一九〇六年十月，我二次到东京，改名仇鳌。除代仇亮担任同盟会湖南主盟人，从事组织活动外，并参加了《民报》的管理工作。《民报》针对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把保皇主义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

这年十一月四日，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中的贵族子弟和保皇派集会对付《民报》，居然提出三项办法：（一）凡是参加《民报》的官费留学生停发官费；逮捕参加《民报》的私费留学生的国内家属，以示惩戒。（二）也办一报与《民报》相对抗。（三）采用以汉制汉的办法，运动梁启超、杨度攻击《民报》；他们说：“能战胜《民报》固佳，否则亦是乱彼汉人之耳目。”第三项办法，他们虽然实行了，但却得到相反的结果。

同年十二月二日，《民报》在锦辉馆举行创刊周年纪念庆祝大会，这是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的最盛时期，到会的达五千多人。大会由黄克强主持，章太炎（时任《民报》总编纂）宣读古调盎然的祝词，中山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阐发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精义。接着，章太炎、日人断水（革命评论社社员）、外柔（社会学学者）、宫崎寅藏等均有演说，黄克强、田桐等也相继发言，无不慷慨激昂。有人当场发起捐助经费，共捐出七百余元。散会时各赠“天讨”券一张。从上午八时直开到下午二时方告散会。会上悬有某君（忘其姓名）赠中山先生集唐人句一联云：“岂有蛟龙愁失水，不教胡马度阴山”。

《新民丛报》经《民报》同人集中火力痛击，有一蹶不振之势，

在东京留学界和国内的影响大为削弱。一九〇七年，保皇党人梁启超、蒋智由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十月十七日开成立大会于锦辉馆，梁启超特由横浜来作宣传演讲。陶成章、张继等事先组织革命党多人参加，我也按时前往。我们都带有结实的手杖，准备开打。我到会较晚，会场里已有一千多人。政闻社社员只有一百多人，坐在前面，衣上带有三角形红色结子，颇为引人注目；有的担任招待员，四面应酬。日本名流犬养毅等十余人也应邀到会。开会时，梁启超已坐在台上右侧，主持人稍讲几句，梁启超就上前讲话，下面掌声不多。他说：“我国必须立宪，需要有国会。现在朝廷下诏立宪，诸君应当欢欣鼓舞……”话还未毕，张继即站起来高声大骂：“马鹿！狗屁！打！”我们四百余人就举起手杖，冲向讲台。梁启超急忙转身，向台后面楼梯逃走。张继奔到台上，政闻社主持人慌忙上前阻挡，被我们另一位同志推倒。台下已经大乱，手杖齐挥，喊打声四起。带着红结子的政闻社社员，不免挨了几下，纷纷扯下红结子，夺门逃走。张继在台上宣布讲话，大家鼓掌欢迎，重行坐定。张继讲了些革命的道理，又对来宾犬养毅提出质问，说犬养毅素来赞成革命，怎么忽然帮助立宪。宋教仁接着上台，把同盟会的革命宗旨，详细发挥了一番，全场掌声雷动。犬养毅随后也讲了话，说立宪也好，革命也好，他都赞成，希望早有行动。这样，张继就宣告散会。本来是保皇党人的会场，却被同盟会革命党人利用了。这天，蒋智由没有到会，他回国作请愿立宪的勾当去了。章太炎曾将这幕丑剧，在《民报》十七号著文宣布。

(三)

一九〇七年初，清驻日公使杨枢请求日政府驱逐中山先生。

日方表面以劝说为名，送旅费五千元，请中山先生离去。日商铃木久五郎素日表同情于中国革命党，也赠送一万元。中山先生召集左右会商，决定接受，于这年三月四日（阴历正月二十日）偕同汪精卫、胡汉民往新加坡转至河内，设立革命机关，进行粤桂滇的起义准备活动。临行时留给《民报》维持费二千元，余款供给军用。当时章太炎大不满意，要将中山先生受赠事公诸《民报》，黄克强予以阻止。随后黄也离日，刘揆一代行总理职务。秋间，孙、黄计划在粤南钦、廉一带大举，派日人萱野长知（同盟会员）在日购运枪械。章太炎听说所买枪械陈旧，竟用《民报》名义拍发明电，告知香港《中国日报》（同盟会机关报）冯自由另行订购。中山先生得知，认为章泄露军事机密，通知东京本部，并对章表示不满。章也反唇相讥，并与陶成章乘着潮惠起义失败，鼓动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桓等主张召集大会，罢免中山先生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克强继任。刘揆一深恐发生内阕，更于钦、廉起义不利，力加反对。刘同张继为此揪打起来，结果张自认理屈，风潮暂时中止。刘揆一随即致书胡汉民，请劝中山先生向东京本部引咎。中山先生复书说，党内纠纷须查明事实才能解决。黄克强也来函说：“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能获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这样，才结束了那次的党潮。

一九〇八年春，因章太炎脑病发作，张继又离日，《民报》二十号到二十三号由陶成章主编。陶成章编了三期《民报》，仍交给章太炎主持。陶化名出走南洋，进行筹款。他要求中山先生介绍向南洋各处华侨募捐，未得允许。从此陶决计恢复光复会，与同盟会分离，把徐锡麟、秋瑾起义事件编成《浙案纪略》在英属、荷属各地进行宣传。这时，湖南李燮和（柱中）在南洋檳港设有同盟

会分部，声势浩大，颇得华侨信任。陶到檳港煽动李燮和纠合江浙湘楚闽粤蜀七省在南洋的部分华侨，列举中山先生“罪状”，上书东京同盟会本部，要求罢免中山先生的总理职务，本部置之不理。他们就在南洋重振光复会，举在东京的章太炎为会长，发售江浙皖闽赣五省革命债券。李燮和把同盟会支部改为光复会支部。一九〇八年河口之役，中山先生派汪精卫到荷属文岛筹款接济，大受光复会会员的排挤，未有结果。一九〇九年，陶成章又到东京，运动黄克强反对中山先生。黄不但不为所动，并致函李燮和为中山先生申辨。

中山先生一九一二年元旦就临时大总统后，当即派员迎接章太炎到南京，相见尚欢。但临时政府没有给章相当的位置（见下节），他随即在沪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倡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年三月，同盟会在南京举行死难同志追悼大会，他送一挽联云：“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以后又与张謇等组织统一党、共和党，拥护袁世凯和黎元洪，专门与同盟会作对。

（四）

一九〇八年十月，我因奔父丧由日回国返乡。治丧完毕后本想潜在省内活动，但长沙捉拿党人的风声很紧，自己曾被通缉，匿居不易，只得于一九〇九年初东下。过南京时，进城同党人联系，有同志告以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幕府要角；他并告我说，曾在刘处见有党人名册，第一名仇楚遗，估计就是我，嘱我谨慎，不要露出形迹，免遭暗算。我本预备南往

龙州，联络蔡锷，恰值吉林办理教育的友人来电相召，便改道北行，前往吉林，任自治讲习所教员。党人赵赓、江海宗等也先后到达吉林，筹划在边远地区建立革命基础。这一计划本是中山先生和黄克强所决定，东三省各地都派有党人进行活动。但今年由于熊成基（化名张建勋）谋刺载洵，被人出卖，在哈尔滨被捕（次年就义），清吏防范党人十分严密，我们的计划没有成功。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义。十一月初，我到上海时，上海新告光复，陈其美任上海军政府都督。李燮和主持吴淞军政分府，称光复军总司令。李为湖南安化人，也是我早年在求实书院的同窗。我到上海后，李以同志和同学的关系，坚邀我担任吴淞军政分府的秘书长。

十一月下旬，江浙联军共同进攻南京。十二月二日（阴历十月十二日），联军一举而下金陵。南京的光复，以浙军和光复军第一协黎天才部^①作战最为勇猛。黎率部首克乌龙、幕府两山，被称为黎老虎。但黎部纪律很差，当黎率队先入仪凤门时，竟肆行劫掠，我随李燮和到后才加以制止。这时镇军林述庆入驻清总督署，称江宁都督。联军总司令徐绍桢自不能居其下，而程德全自苏州光复，早已被推为江苏都督，于是三人大争帅印。后经宋教仁赶来调停，徐绍桢、林述庆才肯把都督让给程德全。

南京光复的那天，黄克强由武汉回到上海。他早已连电在海外的中山先生迅即归国。党人在沪所办的报纸又尽力宣传中山先生已向海外华侨筹得巨款，购买五艘军舰及大批械弹回国，准备北伐军事的种种消息。这一宣传使气息奄奄的清廷和野心勃勃的袁

^① 黎天才所部为粤军，原隶龙济光，又称济军，驻在吴淞。吴淞光复后，李燮和改编黎部为光复军第一协。

世凯大为震动。

中山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到达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第二天，黄克强、汪精卫、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国民党要人公宴中山先生于哈同花园，决定先期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夜间又在中山先生住所集会，讨论组织政府方案。宋教仁主张采内阁制，以黄克强为总理。中山先生主张暂不设总理，将来再定。黄克强支持中山先生，劝宋教仁不要坚持己见。

十二月二十八日，黄克强、宋教仁等先到南京，晚间出席各省代表会，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并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等等，宋教仁发言仍主张内阁制。讨论结果，照黄原提案通过。二十九日下午举行总统选举会，十七省代表以十六票选举了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另一票投了黄克强。各省代表多数不是革命党员，但无一票选举黎元洪，证明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当然，党人事先的宣传也有相当的影响。

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仪式庄严而朴素。一月三日，中山先生以临时总统的身分出席代表会提出部长名单，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鍾瑛
外交总长	王 宠 惠	内务总长	宋教仁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后改程德全)
教育总长	章炳麟	司法总长	伍廷芳
	(后改蔡元培)	实业总长	张 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		

先开预备会加以审议。初提的名单如次^①：

预备会审议结果，对宋教仁、王宠惠、章炳麟多不同意，并主张伍廷芳改任外交。经黄克强与中山先生商议，黄提议内务改为程德全，教育改为蔡元培，外交伍廷芳，司法王宠惠。中山先生说，内、教可改，但伍、王不必对调。黄又将中山先生的意见，向代表会委婉说明，代表会乃正式开会，就修改的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接着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十七票当选。中山先生又委胡汉民任秘书长，黄克强兼参谋总长，蒋作宾为陆军次长，汤寿潜为海军次长，魏宸组为外交次长，居正为内务次长，王鸿猷为财政次长，吕志伊为司法次长，景耀月为教育次长，马和（君武）为实业次长，于右任为交通次长，钮永建为参谋次长。

各部总长只有黄克强、王宠惠、蔡元培是党人。张謇、程德全、汤寿潜本属立宪派，在江南负有声望，尤其是张謇以清廷状元、实业界领袖的资格为社会各界所推重。黄克强为了笼络各方，所以把他们拉入临时政府（本来约张謇担任财政，张不肯就，才改为实业）。至于各部次长多为党人，各部实权均操在次长之手。黄克强为组织政府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这里还要插一句，章太炎虽未当成教育总长，二月初，中山先生又聘他任临时政府枢密顾问（同时发表两人，另一人为张静江），但他未就。

（五）

中山先生把临时总统让于袁世凯后，一九一二年四月，临时政

^① 初提的名单是据当时居正所谈。后并见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梅川日记》。

府迁往北京，宋教仁北上就任农林总长，我也随往。宋约我担任农林部参事，我未允。我自知学识不足，决心研究政法。宋虽同意，却主张我同时办报。他说他对农林也是外行，不想久干，中国要走上政党政治的前途，须借报纸鼓吹。他筹了一笔小款，并把接收清廷农工商部的印刷机器、铅字设备等拨给我用。我在粉房琉璃街租定房屋，一面设立“共和印刷局”从事营业，一面出版《东亚新闻》。所以取这一名称，不过想扩大报道新闻的范围，没有别的用意。大约在五月上旬出版。我任社长，易象任总编辑，赵缵编杂俎，还有不少的记者。每天出版对开报纸两大张，印数不过千份左右。

《东亚新闻》除了报导中外消息外，主要是宣传政党政治。

一九一二年二月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新会章，进行选举。由于章太炎等一部分党人已经分离，造成南京与武汉对立的气氛。宋教仁建议扩大招纳会员，加强组织，把黎元洪也拉入会内。中山先生接受他的意见，但政纲方面，还是以中山先生的主张为重点。大会选出中山先生任总理，黄克强、黎元洪分任协理。会章规定干事部设主任干事五人，分掌总务、交际、政事、理财、文事五部，人选由会员票选十人，呈总理选任。大会选出干事汪精卫、胡汉民、宋教仁、马君武、张继、居正、平刚、李肇甫、田桐、刘揆一等十人，但中山先生并未选任，随着南京政府的结束就搁置起来。黎元洪对此也未作表示。以后的同盟会怎么办呢？中山先生与宋教仁有不同的意见。中山先生主张退为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宋却主张联络原与同盟会有关系的党派，合并改组成一个大党，先在议会中获得优势地位，然后组成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内阁，积极前进而不是消极后退。黄克强和多数党人赞同宋的意见，汪精卫高倡“六不”，自鸣清高，胡汉民回任广东都督，中山先生只

好听凭宋教仁去进行，让他实际上作了总务部的主任干事。我认为从当时的局势看，宋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我也附和他的主张。

宋教仁得孙、黄的允许，就在北京展开活动。他不仅是长于辞令的演说家，而且是下笔万言的理论家。以“桃源渔父”为笔名的长篇论著，经常见诸于《东亚新闻》，读者莫不钦佩。这时，北京的政党林立，除同盟会外，最大的还有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共和党是与同盟会相对抗的。统一共和党则居于中立的地位。同盟会和共和党都想争取统一共和党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结果宋教仁获胜，把统一共和党拉了过来。终于把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及另三个小党派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初拟定名民主党，后因已有同名小组织出现，未用）。他代表同盟会，同其他四党的重要人物商妥，并把规约（党章）、通告等文件以及理事、参议名单预先拟出，到上海向孙、黄报告，作了最后的决定。八月十三日对海内外发出通告和组党宣言。八月二十四日，中山先生到京，二十五日国民党就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

《东亚新闻》关于宣传组织国民党、主张责任内阁制及孙、黄来京的报道各方面，尽了很大的力量，发生了相当的作用。宋教仁要我办报的目的总算初步达到了。

此外，这个报纸还有一项特色，那就是提倡女权。

自一九〇七年四月秋瑾在绍兴密谋举义未成牺牲以后，女子参加革命的有如风起云涌。辛亥革命时，各地起义反正，几乎都有女子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女子继续奋起，力争参政权。宋教仁和我均主张开放女权，著文提倡。同盟会总章第三条政纲第五项即有“主张男女平权”的规定。政府北迁，唐群英等结队向袁世凯政府多番请愿，每次呈文都是由我代笔。《东亚新闻》不仅作了

女子参政的论坛，报馆有时还作了她们秘密集会的场所。国民党的政纲里未将男女平权列出，而仅在政策中振兴教育项内提到女子教育、发达女权。我曾为此向宋教仁力争，宋以合并的其他党人多数不同意，没有办法列入。唐群英向宋大兴问罪之师，甚至挥拳动武，宋挨了她一掌，未与计较。就提倡女权来说，《东亚新闻》只是放了一阵空炮而已。

当时巾帼英雄中，不乏卓越的人物。但如沈佩贞那样放荡不羁，卖弄风流，却给了封建士大夫们以攻击的口实。我原对沈的谈吐言论，认为非同凡响。可是她竟追求唐绍仪，百般献媚。一天我问她：“你声言要嫁唐，难道不知道他使君有妇，甘为姨太太吗？”她居然笑着回答说：“我不过想利用他一下罢了。”我为之气沮，以后就不敢领教了。

宋教仁组成国民党以后，成为最出风头的人物。我也荣任了国民党政治部干事，颇为欣喜。宋以为袁世凯堕其彀中，可以实现组织责任内阁、建设中国的雄心壮志。那知不到七个月，他竟被老奸巨猾的袁贼所暗算了。

（六）

宋教仁被刺经过，已在现代史书中记载颇详，不待赘述。这里叙述宋案发生前有关湖南选举和政局的一段重要事实，聊供补遗。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公布后，国民党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随即开始布置各省的选举工作。这时，恰恰湖南省司法司司长洪春台死了，大家以为选举是和法律有关的事，宋教仁就要我回湖南去作司法司司长，以便掌握选举，支援国民党的竞选，同时改组湖南同盟会为国民党湖南支部。

当时我在北京主编《东亚新闻》，并从事于政法的研究，不愿回湘。宋教仁极力敦促，我才答应，但仍以事成回京为条件。等我回到长沙以后，才知道办理选举属于行政范围，是民政司的事，与司法司无关。那时湖南民政司司长是刘人熙，不是国民党员，湘督谭延闿便设法将刘调开，让出民政司司长给我。我即着手筹备选举事务，自兼选举总监督，并按湖南五道，派出监督五人。结果，湖南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胜利。宋教仁为了竞选，这时也回到湖南，到处演说，博得各界人士的称赞和同情。他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

宋教仁在选举胜利后，有一晚上，约了谭延闿和我在国民党支部谈话。他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他即将转道沪宁回京，准备组织第一任政党的责任内阁。他约请谭延闿参加新阁，以湖南都督兼任内务总长。他认为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和袁世凯的上辈袁甲三是把兄弟，谭、袁有世交的关系，容易谈得拢，可以使袁世凯同新内阁合作。谭延闿已参加国民党，那时确实想帮助宋教仁，当即表示同意。至于湖南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据点，必须牢牢抓住。宋教仁预定在谭到北京后，要我护理湖南都督。因为我在湖南同各方面的联系已有基础，对各方面都还能抓得住，宋一定要我掌握这个基本据点。只是民政司司长地位不高，他提议将民政司改为民政长，同都督地位平行，谭进京后，才好护理都督。我原约定办完选举即行离去，坚决不肯接受，但他们也不问我是否同意，就由谭延闿电达袁世凯请将湖南民政司改为民政长，并以我为民政长。袁世凯接电后，转电上海黄克强询问究竟。黄克强尚不知宋在湖南计议的详情，又电谭延闿询问。这时宋已前往上海，谭电复黄

说候宋到后详谈。其实，宋教仁的这些布置，只是一方面的想法；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和袁世凯之间的利害冲突，以为关键问题就在竞选，国民党选举既然获胜，其他都可迎刃而解。那知袁世凯早已把宋看作眼中钉，派遣暗探，随时注意宋的行动。尤其是当袁接到湖南暗探报告有关我们在湖南这一计划的消息后，就更大吃一惊，感到非立刻下手不可。宋终于在进京的那晚，在上海车站遭到了袁世凯的毒手。这位年仅三十二岁、正当英年有为的政治家竟抱着责任内阁的遗恨赍志以终了。他留下的致袁遗电，还说什么“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实在太天真了。

我在宋教仁被刺后，即辞去民政司长转往上海。湖南都督谭延闿后来虽也宣布独立讨袁，但还是出于被迫的。讨袁失败，湖南党人四散亡命。我也以“四凶”^①之一被袁通缉，于一九一三年底出走东京作亡命客了。

(七)

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自一九〇五年八月在日本东京结交，旋即共同创立同盟会，七年间心腹相托，患难与共。但是从一九一三年宋案发生至二次革命失败出亡日本，孙黄间意见相左，一度各行其是。

宋案发生后，中山先生于三月二十五日由日本赶回上海。接着案情破露，凶手竟为袁世凯、赵秉钧所遣派，民党无不大愤。中山先生召集重要秘密会议，主张立兴问罪之师，武力解决。黄克

^① 当时袁世凯曾诬称湖南有所谓“四凶”系指谭（周震麟）、凤（谭人凤）、龟（仇警）、龙（龙璋）。

强、陈其美等都认为民党所控制的军队正在整理训练中，不堪作战，应候法律的制裁。中山先生拟再行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援，黄等又以中国内务不便乞外援相劝止。四月，袁世凯向五国借款二千五百万镑不经国会通过，违法签订，全国哗然，群起反对。中山先生又召集各省民党要人会商，决定声罪致讨。他令胡汉民回广东宣布独立，而胡答谓时机尚未成熟；令上海发难，而陈其美复一筹莫展；商由黄克强促使南京独立，而南京部队间（第一师与第八师）、军官间意见也不一致。黄克强等仍主加强国民党议员的力量，利用国会进行合法斗争，以达推翻袁世凯的目的。中山先生在气愤之下，叫朱卓文秘赴南京，运动部队下级军官除掉其将领，以便亲去指挥独立。部队中人到沪向黄报告。黄克强恐南京局势于中山先生不利，自请赴南京主持军事，由陈其美进攻上海。适李烈钧湖口起义失败，上海又连攻七日夜不下，完全失败。黄克强认为无能为力，于七月底一走了事，过沪不停，径往日本。八月后，安徽、广东相继失败，福建、湖南亦取消独立。中山先生乃偕陈其美等大批党人先后出亡日本，我也在内。二次革命不到两月，就这样结束了。

中山先生到东京后，责备黄克强不该放弃南京，私自出走；黄说由于孙自己运动军队造成了混乱的局势。陈其美同黄克强之间也因军事责任问题发生了争执。因此，中山先生决心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把官僚政客排斥出去。他在激动的心情下，采取江湖会党的方式，要求入党者立严格的誓约，并须在誓约按印指模。黄克强既不赞成重新组党，更反对立誓约、按指模。他说党中整饬纪律是应该的，可是这样做，是要大家盲目服从。他在负气的心情下，于一九一四年三月携眷同李书城、石陶钧等前往美国。不少

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对于立誓约、按指模也感到难堪，后来渐渐认识到过去的失败确是有负于中山先生；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领袖是断难成功的；大家有了这样的认识，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也就一天天多起来。这年六月，党人先开大会选举中山先生为总理，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宣告正式成立，协理一职始终虚悬，留待黄克强归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东京设法政讲习所培养政治人才，在大森设“浩然庐”培养军事人才；并办《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主编，宣传反袁。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钮永建、彭永彝、白逾桓、张孝准等有欧事研究会的组织，因为他们不肯入中华革命党，以致有孙黄分立的传说。实际上黄克强并未过问，这个会以后也无形取消了。

我在东京期间，鉴于很多流亡军人不懂政治，生活散漫，曾与彭允彝、殷汝驷等商同日本寺尾博士组织政法学校，招纳他们入校读书，所用讲义多由戴季陶、殷汝驷等翻译。我们在亡命党人中造成了研究学术的气氛，同时对于接近孙、黄的同志，也作了些协调转圜的工夫。以后这个学校就同法政讲习所合并了。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取消帝制，中山先生和我们一批党人陆续回国。黄克强于六月三日由美抵日，向日方借款购械，准备回国训练五师精锐军队，作为倒袁的武力，事先已由张孝准代表黄进行商妥。旋闻袁病死，因而作罢。黄克强随即返国，住在上海。他听从周震麟和我的劝告，先到中山先生寓所会晤，中山先生也回访了他。两人时相过从，和好如初。不幸黄于十月间旧病复发，延至三十一日病故，年仅四十三岁。中山先生亲临致祭，痛悼不已。

我是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民报》周年纪念会上，始见

到中山先生，听到他的演说，以后他往南洋，直到辛亥年归国，才又见面。一九一二年上半年，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听了他多次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讲演。一九一三年九月到一九一六年五月这两年半在日本的长时期内，更不断受到中山先生的教诲。他的寓所内，四壁图书，琳琅满目，十三经、二十四史、中外政治经济书籍、各种地图，应有尽有。他经常读书，手不释卷，融会贯通，能得要领。中山先生心地光明，待人诚恳，接近党员，和蔼可亲。只要是为了革命，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人人感动，努力奋发。中山先生革命品格感人至深，是我终身所不能忘怀的。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马 湘

(一) 中山先生到美国巴索

我第一次得见孙中山先生，是在美国的巴索。我是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县）人，少年失学，十五岁即离开家乡，到美洲墨西哥谋生，在一间外国人开设的餐馆佣工，后又转到美国巴索的一个农场做工。一九〇九年，中山先生来巴索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当地大部分华侨尤其是致公堂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在由当地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召集的华侨大会上发表演说，把清朝入关压迫残害汉人的史实以及种种昏庸腐败的情况对到会群众作了详尽的叙述，并指出我们中国眼见就要被列强瓜分共管，全体同胞必须立刻起来推翻清朝，才能挽救危亡。这次演说足足讲了三个多钟头，言下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听讲的人个个都非常感动，我也激动得流下泪来，恨不得立即回国去和清政府拼个死活。

当天晚上，华侨团体公宴中山先生，我也参加了。入席时，各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纷纷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席。我看见中山先生就座后，立即跑到他跟前，很恭敬地叩了一个头说：

“我要跟随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革命是会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我答道：“杀头？杀就杀，我不怕。我们同胞兄弟三个，杀了我，还有两个兄弟侍奉父母；我

又还未娶妻，没有子女，怕什么？”中山先生说：“好，好！你有这样决心参加革命，很好。但你替我挽皮包，我却没有钱给你工资啊！”接着又说：“我可以写信介绍你到日本找陈少白、廖仲恺和朱执信等人，跟他们做革命工作。”我得先生允许我参加革命，高兴异常，就准备搭船往日本。有一天，我往见先生。他告诉我，将要往加拿大联络华侨，鼓吹革命。这时我的父亲马厚庶在加拿大温哥华经营商业，是加拿大洪门（即致公堂）首领，也是当地华侨领袖，可以助中山先生一臂之力。因此，我把父亲在加拿大的情形告诉先生，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请他到加拿大时找我父亲。

（二）中山先生号召美洲华侨回国讨袁

我在美国巴索拿到先生的介绍信，正欲到日本去见廖仲恺、朱执信和陈少白等参加革命时，不料美国政府在巴索大捕没有出生证的华侨，有三百多人被捕驱逐出境，用船送回上海，我也是其中之一。船过日本时，因被驱逐出境的一律不准上岸，我既不能登岸，只得到上海后转回家乡。我在家乡住了两年以后，又到加拿大的爱孟顿，在一个农场里佣工，每日不是耕田就是打猎。我乘机苦练射击，不到两年工夫，发枪就没有不中的了。

一九一五年冬间，一天早上，卖报纸的人特别喊得起劲，买报纸的人也特别踊跃。原来报上发表消息说，袁世凯要做皇帝，中山先生号召华侨回国参加讨伐袁世凯。我便决意回国，实现我跟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志愿。随后又得知中山先生派夏重民和胡汉贤组织华侨敢死先锋队，在域多利埠的新民国报馆设立机关，并

由胡汉贤和蔡鹤朋在爱孟顿成立一个军事社，进行训练。我便和黄惠龙一齐报名参加，总计参加的共有五百人。我恐被父亲知道，受到拦阻，报名时化名为黄升。

讨袁敢死先锋队成立了不久，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日本横滨训练；过了五个月，又从日本横滨调到山东潍县周村。各队员都没有枪枝，只配备四个炸弹，在对襟衫上标着“华侨敢死先锋队”几个大字。当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是居正，副司令是许崇智，华侨义勇团团团长是夏重民。我们在潍县训练，正要出发进攻山东省会济南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死了。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上海集中。我们几百个队员到了上海后，都住在徐园招待所。中山先生亲来慰问，并对全体队员演说，一连讲了四小时，散会后又到张园欢宴全体队员。后来他又派廖仲恺到徐园慰问各队员，并发给每人大洋三百元。当时我用不着这么多的钱，因此就没有要。

廖仲恺来慰问时，问起我的姓名。我说：“我原名马湘，在加拿大爱孟顿参加敢死队时，是用化名黄升报告的。”廖仲恺答道：“中山先生叫我来找你。他还说：‘演讲时看见一个人身材不高，好象是在美国巴索会过的马湘，如果是他，带他来见我。’现在请你随我去见中山先生吧！”我听说之后，十分高兴，便随着廖仲恺到环龙路六十三号中山先生的寓所去。

中山先生一见面就指着我说：“你是马湘吧？我在美国巴索见过你。你昨天很用心听我演说，我估计一定是你了。我和你父亲马厚庶是旧好，你是我的世侄，你来了很好，就住在这里吧。以后见我可不用通传。”我很愉快地答应了，便退出来。

我奉命之后，马上从招待所搬来中山先生的住宅里。从这天

起，我就跟随着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队长和副官等职务，一直到先生在北京逝世为止。先生在上海居住时，原来担任卫士职务的只有马伯麟一人，自我到来后，便有两个人了。

（三）中山先生在上海的生活

孙中山先生住环龙路六十三号，马伯麟、朱执信、廖仲恺和我都一起住在这里。对门四十四号是办公的处所，也是陈少白和秘书连声海的寓所。经过两个月后，有四位旅美华侨来见先生，出门时拉着我谈话，问我姓名，接着便说：“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象样了，是他自己的么？”我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哪里有房子？这房子每月要付出租金六十五元。”他们齐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那里面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他们说完之后就走了。

原来这四位归国华侨，集合了许多股本，准备在上海开化妆品工厂。他们自从见过先生后，知道先生还是租房子住，便开了一个股东会议，提议拿出一笔钱购置一所象样的住宅送给先生。各股东都一致赞成，就买了莫利爱路四十六号一所住宅，一切家具陈设以及花园里的花木和网球场等都布置得很整齐美观。于是他们再来拜访先生，并说明来意。中山先生说：“送房子给我么？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经过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后，先生觉得不好推辞，便从环龙路迁到这所新房子来。

先生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清晨起床后常常和夫人在花园打网球。早餐后就开始办公。他常常和朱执信、廖仲恺、陈少白等聚谈，又喜欢与章太炎等研究学术。晚上多是阅书、读报，或是

写作，每每至夜深十二时才就寝。

那四位归国华侨创办的上海化妆品工厂开幕时，他们请先生莅临指导。先生到厂参观后，对各创办人能够回国兴办实业极为嘉许。他还对职员工人作了演讲，大意是说：“中国实业极为落后，即如此种化妆品工厂，本来不需很多资本，机器亦不复杂，但经营此种工业者仍不多见。”他勉励各股东和工人争取更多的海外同胞回国兴办实业。全体员工听了都非常兴奋，鼓掌之声常常把先生的演说打断了。后来全厂员工都加入了国民党。

那时在北四川路有一家广东馆子叫趣乐居，生意十分发达。经理孙陆洪与先生同族，他曾介绍过五十余人来见先生。后来这五十多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我和孙陆洪相熟以后，便劝他把趣乐居的赢利拨出一部分来组织一个工界协进会，并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医务所，使工人子弟有书读，患病能治疗。我随将这个意见告知先生，他认为很对。后来孙陆洪请先生到趣乐居吃饭，并把劝他组织工界协进会的事告诉了先生，并对先生说，他本人也很愿意这样作。先生对他极为嘉许，并请他从速进行。不久，这个工界协进会便成立了。

上海广肇公所，产业极多，由温宗堯、刘维炽和陈兴汉三人为公所总理。他们入息甚丰，不特个人生活豪奢，而且往往巧立名目，将公款随意开支，宴会频繁。先生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特把他们请来谈话，指出他们各人都有很多收入，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不应滥用公款；要他们将公所的公款办几所中小学和医院，不特使在上海的广东人的子弟都有读书的机会，其他外省学生亦可一并招收；有了公医院，贫苦病人就可以得到治疗。先生并进一步对他们说：“趣乐居一家商店就能组织工人协进会，创办一

些社会服务事业，你们应该很好仿效。”不久他们就遵照先生的指示，把中小学和医院办了起来。

先生生活非常俭朴。家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膳，每天菜金不超过二元。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饭，吩咐我去趣乐居买了一只卤水鸡来待客。唐绍仪很快就将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肴馔。中山先生见他还在等待上菜，便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又问我说：“马湘，还有什么菜？”我答道：“厨房里只有咸鱼。”先生便命拿上来。唐绍仪一边用咸鱼下饭，一边说：“我大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十元啊！”

有一次，伍廷芳、伍梯云和唐绍仪几个人一起来，先生留他们吃晚饭。伍廷芳说：“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一些鲜鱼，不惯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吧！”先生也不加以强留。

林焕庭某次来见先生，报告华侨汇款来的事情。先生说：“好！款存在你处吧！”有一天，先生、夫人和我到林焕庭处取了百多元，缓步走到棋盘街，走进一间旧书店里，选购了一大堆线装书。我将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但是太重了，不容易拿回去。我便对先生说：“可否雇一部马车搬回去呢？”先生说：“好，这样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的。”说着把手向衣袋一摸，又说：“钱已经买书用完了。”夫人也说身上没有钱。先生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说有四角钱，遂雇了一部马车回去。先生随即命林焕庭购置书橱，并和夫人把书籍分门别类地放在橱内。

先生有一次还带着我雇了马车到北四川路购了一大批外文书籍和制图仪器等物。他常常绘制地图，哪里应该筑铁路，哪里应该筑公路，哪条河流应该怎样改良和怎样利用，哪里有什么矿藏，

那里应该修建什么商港和军港等等，他都陆续详细地绘出图来。原有绘图仪器很粗劣而且多有损坏，因此又购了一批仪器回来。

上海有一位裁缝师名叫王克利，先生到他店里定制一套西服和一件大衣，并留下了地址，吩咐他制好了送来。不到三天，王克利便把衣服送来。他看见先生，毕恭毕敬，露出十分荣幸的样子。夫人把价款给他，他不肯收受，一定要把衣服送给先生，表示一点敬意。先生自然不肯随便要这几件衣服。王克利又诚恳地说：“些少敬意，请赏脸收了吧。这些衣服是我十分用心制成的。”先生觉得他如此诚恳，便点点头，表示接受。王克利又说：“可否亲笔写‘王克利’三个字给我印名片？”先生便写了“王克利”三个适合印名片用的字给他。王克利万分欢喜，拜谢而去。

上海永安公司大部分都是澳洲华侨股本，经理郭彪时常来拜候先生。有一次郭彪叫人送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来，我转报先生。先生惊讶地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还给他吧。”我便拿了这件皮大衣，找着了郭彪，对他说：“中山先生多谢你，但皮衣先生不需要用，命我送还给你。”郭彪只得收下。隔两天，郭彪又来访问。中山先生对他说：“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够将赚得的资金拿来办工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东的钱来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需穿这样华贵的大衣。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

上海先施公司经理马应彪、大新公司经理蔡昌同为香山县（即

中山县)人,郭彪对他们说:“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唯一的伟人,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们为何不去见见他呢?”马、蔡两人都十分希望能见到中山先生,只是没有机会。后郭彪用电话找我,说马应彪、蔡昌希望能来拜见先生,请先生给他一个日期。我接电话后便转报先生。先生说:“我每日都开会,有暇时再通知他们吧。”

某天,一位美国中将请先生到他住所晚餐。先生雇了一部马车,着我跟随,按时前往。将近到达时,忽然坏了一个车轮,天又下起大雨来,车中只有一柄雨伞,便由我撑着雨伞遮着先生,冒着大雨前去,虽然路途不远,但衣服都湿透了。我跑到门前把电铃一按,没有人开门。停了一会,再按一下,有人来开门了,但只开了一道缝,向门外张了一张,便又把门关了。我从短墙上望见一个外国人站在台阶上向外面张望,遂用英语对他说:“孙博士来了。”这个外国人才跑下台阶,开门让先生进去,并和先生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进门后,门房问我孙博士是什么人,我说:

“孙博士你也不知道么?他就是孙文。”这人惊奇地说道:“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载的孙文,他为什么不坐汽车来呢?到这里访问的人没有不坐汽车的,刚才门铃响,因没有听到汽车响声,我还以为是顽童作弄,所以没有开门。”我骗他道:“原来是坐汽车来的,但到了街口汽车坏了。”餐后,美国中将送先生出门,并准备用汽车送先生回寓。先生说:“谢谢你,不用汽车了,我还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找一位朋友。”这位主人十分恭敬地送先生出门,握手告别。这时雨也止了,先生便步行回寓。

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

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将，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有一次，先生偕同夫人、陈少白、李谋之和黄大伟夫妇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西湖游玩，我和黄惠龙跟随护卫。先生戴白通草帽，穿白夏布长衫，携手杖，还戴上深色墨晶眼镜，以免惹人注意。到了杭州下车时，忽有警士三人时前时后地跟着走。先生带同各人来到李谋之的别墅“李庄”，两个警察又跟踪而来。我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说：“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我们已有一个警士返区署报告了。”我便入内对先生说：“有两个警察从车站跟着我们来到这里，说是要来保护贵人的。”先生说：“蠢仔！有什么‘贵人’？”说毕便跑到门前对警士说：“警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正说话间，杭州警察厅长率同警士十人前来保护。先生吩咐他不要告知别人，并叫他们从速回去。先生在杭州游玩了三天，才回上海。

每逢端午、中秋、国庆和新年，总有一百几十个人先先后后地来拜候先生。这些人多数都口口声声说，他们从前追随过先生革命，把私人的财产弄光了，现在不特没有得到好处，而且生活十分困难，请求先生资助。先生识透这些人生活实际上并不困难，不过是假冒对革命有功，企图骗取资助而已。有一次有五个这类人来，装起愁眉苦脸对先生诉苦说，几天没有饭吃了，请求帮助些生活费。先生说：“你们肌肤丰满，面色红润，而且衣履齐整，那里象几天没有吃饭的人？我每天虽然吃三餐，气色还不及你们丰润哩。”他们知道先生不可欺，便告退了。以后我因为每逢年节，

都有这班无赖来啰嗦，便约同黄惠龙对先生说：“我们打算以后不让这些人进来，把他们驱逐出去，好不好？”先生答道：“其中也有真的为革命出过力，而且生活确是困难的。不可这样做，我不会感到麻烦的。”

(四)中山先生南下护法

一九一七年北洋军阀段祺瑞破坏约法，先生号召国会议员及北洋海军往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国会议员及北洋舰队均纷纷表示响应，相率集中上海，待机而动。惟当时财政支绌，且一时尚不能解决。这种情况被哈同（犹太人，上海大富翁）得悉，他遂向其好友曹亚伯说：“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现孙中山先生财政有困难，我极愿助一臂之力。”曹亚伯将哈同的话转告先生（曹亚伯为归国华侨，原籍湖北，亦为老革命党员）。翌日，哈同宴请先生，先生偕同夫人前往，我随行护卫。同席者还有曹亚伯。席间哈同表示极愿帮助先生南下护法经费，先生极为嘉许，但表示拟作为借款。哈同表示捐助此款，出于他的诚意，不必作为借款。中山先生以哈同如此诚恳，便应允了。翌日曹亚伯来访，并带来五大麻袋钞票。先生命曹亚伯用电话向哈同致谢，并告知明日即离开上海。

先生命吴景濂、林森二人管理财务，率领参众两院议员和北洋舰队南下，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一日抵达广州。五月十九日，程璧光发表海军护法宣言。八月十一日，国会在广州开会，制定护法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先生为海陆军大元帅，设大元帅府于广

州河南土敏土厂。

桂系军阀莫荣新当时任广东督军，手握广东军政大权，开烟开赌，滥收捐税，弄得民不聊生，土匪遍地。广东人对他非常怨愤，广东总商会、慈善团体、各界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曾召开秘密会议，选出代表十五人向先生请愿，要求撤换莫荣新。各代表入见先生时，均肃立不敢就坐。先生很客气地请他们坐下，并吩咐勤务端茶敬烟。各代表向先生陈词，请求大元帅惩办莫荣新，挽救广东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先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表示一定想办法挽救广东同胞。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先生派北洋舰永丰、楚豫和永翔三艘从黄埔驶入省河大元帅府门前。先生率同参军和卫士登永丰舰，向二沙头进发。此处岸上原驻有桂军炮兵一营，乃向之作试探射击，岸上并无反应。先生即命参军祁耿寰带领少数士兵登陆。祁耿寰登陆后，只发觉有徒手桂军十余人，或坐或卧，各堡垒中之山炮均缴去撞针，亦无炮弹。先生续命各舰再进至大沙头。大沙头原有桂军一团驻守，此时亦无举动，而且隐蔽甚周，不能发现目标。先生遂命各舰向督军署、越秀山及各桂军驻地发炮轰击，连续五十余发，均未见还击。先生于是说：“黄惠龙！马湘！你们到大沙头搜索！”我答：“我们二人只能够带手枪。”参军祁耿寰也连忙向先生说：“万不能，万不能。桂军在大沙头必有准备，而且现在潮水已退，虽舢板亦不能靠岸，沿岸泥泞没膝，又不能涉水前进，牺牲二人，实在无益。”先生用望远镜细察，果然发现有机枪阵地隐蔽于丛莽之中。祁耿寰续向先生献议，谓时将入暮，而且下雨，请回大元帅府从长计议。先生遂率同各舰长及参军、卫士返回大元帅府。是晚开会，至十时散。

翌日，莫荣新身穿白夏布长衫，手执长烟杆，来见先生。我引莫至副官室，并说明自己有拱卫大元帅的任务，所以对于来见的人都十分注意。我一边说，一边拿起莫之烟杆烟袋留心细看，又问他还有什么东西带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便站起来双手把自己身体由上向下扫了一下，并说：“没有其他东西，请你搜查好么？”我笑着说：“莫督军，那里需搜查啊！”我觉得他所穿衣服甚少，白夏布长衫又是半透明的，实在不能暗藏什么武器，遂请他入见。先生与莫荣新相对而坐，祁耿寰坐先生右侧，蔡公时等四五人站在先生背后，我在门口站岗。先生对莫荣新说：“我为什么要用大炮轰你？因你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弄得民不聊生。国家的主人就是人民，你将主人如此虐待，实在违法乱纪已极。你知道么？现在广东同胞有代表来见我，要求将你从严处罚。”莫荣新很恭敬地回答：“是我的错，我办得不好。我来时没有坐汽车，沿途步行视察市面，觉得甚为萧条，烟赌林立。我回去必定要大加整顿，不负粤人之托。”先生望着祁耿寰说：“祁参军，你可和莫督军谈谈。”祁耿寰遂将大元帅府经费支绌、各职员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四角等等困难情形向莫说明，请他将广东财政收入拨出一部分作为大元帅府经费。莫荣新立即应允，并说：“大元帅有命，我一定服从。”祁耿寰又问：“既然应允支援大元帅府经费，可否立即派员跟随莫督军回署提取？”莫荣新又立即应允，连说：“好极，好极。”祁耿寰即请参军蔡公时、庶务陆华轩随莫到督署提取。

福军司令李福林派了胡新率领步兵一连，为大元帅府卫兵。莫荣新用港币五百元及以团长任用为饵，引诱胡新，使其行刺先生。胡新竟为所诱，遂于某日深夜十二时，身穿便服，携带驳壳手枪

二支，来至先生寝室楼下，见有卫士守卫，遂退去，如是者几次。有一次胡新又来，竟欲登楼。我发觉后，立即上前制止，并说：“大元帅吩咐就寝后无论任何人都不得上楼。”胡新诡称是来护卫大元帅的。我说：“大元帅府的警戒是你的任务，应在府门外四周执行。大元帅办公和睡觉的地方，有卫士负责，你不能随便深夜穿便衣携带枪械来到这里。”胡新不敢再辩，只得退去。翌晨，先生问：“马湘，你深夜与何人争论？为着什么事？”我便把胡新深夜进来和与他争论的经过说了一遍，并说：“胡新这人是李福林派来的，李福林是贼头出身，难保胡新不是坏人，我极为怀疑这个人。”先生遂命我打电话请李福林来。李福林接电话，问大元帅找他有什么事。我答：“大元帅没事，就不找你了”。不久，李福林乘小电轮到大元帅府门前，刚上岸，望一望卫兵室说：“刁那妈！胡新那个契弟去了哪里？”这时先生正在开会，我遂领李福林到副官室稍坐，请他候一候，并对他说：“我不识字，你也不识字，什么礼法我们都不知，但是见大元帅时就应该恭恭敬敬的啊。”李福林很高兴地回答：“刁那妈，好在你讲明白，你唔讲，我就乜嘢都唔识。”中山先生会议完毕，我报知李司令已到。先生命请他进来，并吩咐我站在身旁。李福林进来坐下，挺起腰，双手放在膝上，状貌十分恭敬，随说：“大元帅有什么吩咐？”中山先生说：“你今天精神十分好。”李答：“都和平时一样，不过今天刚剪了发。”接着先生便问他：“你的部队有没有训练？”李答：“极少，极少。”先生又说：“你派来守卫的士兵，我很少看见他们出操。我的卫士天天都由队长卢展柳率领操练。胡新连长近来的举动行为，你知道么？你要问一问马湘才好！”李福林请我告诉他。我就把胡新如何深夜便衣携械欲

登大元帅寝室的情形，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李福林听罢，勃然大怒说：“我几乎被胡新害死。”我问李福林有没有发给胡新两支驳壳手枪，李福林只说发过大号左轮一支。先生说：“登同（李福林字），你好好地查明胡新这个人。”李福林出来，我劝李对胡新不可动火，可一面请胡新饮酒，灌醉他，一面派得力人员搜查他的住宅，这样就容易把这事查明白。李福林连说：“使得，使得。”后来我接到李福林电话说，他依照我的办法去做，一面请胡新晚膳，一面派人搜查他的住宅，果然查获莫荣新收买胡新的确凿证据，当即将胡新扣留枪毙。

桂系军阀盘踞广东，勾结北洋军阀，收买南下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北洋舰队，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五日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先生洞悉其阴谋，认为护法目的暂时难于实现，遂于军政府改组之前一日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五）中山先生回粤任大总统

先生离开广州到上海后，护法军政府被桂系军阀把持。他们表面上挂着护法招牌，实则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并大开烟赌，弄得乌烟瘴气。先生命驻闽南粤军回粤驱逐桂系，李福林、魏邦平等在境内策应。驻闽南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派袁德墀为代表来沪谒见先生，请派得力人员到福建策划军事。先生命袁稍待数天，并用电话叫张静江转电奉化蒋介石来见。翌日，张静江来，他说蒋介石因母丧，坚要在家守满三年孝，才肯担任职务。先生当即写了一封信，命张静江亲身带往奉化交给蒋介石。张臂缠黑纱，

赶往奉化，表示愿替蒋守孝，要他立即赴沪。蒋只得随张静江来沪。当先生与袁德璜、蒋介石商谈时，适有越南归国华侨谭光汉来访（谭在沪经营汽车业，常常来见先生）。先生介绍他与蒋、袁相见。谈到粤军回粤军费问题时，谭表示愿尽力帮助，并赠蒋介石旅费一万元。蒋乘船至汕头，协助陈炯明、许崇智策划作战。不久，粤军回师进至增城，李福林、魏邦平乘机响应。莫荣新战败，率桂军残部退回广西。

同年十一月，先生偕同夫人乘永翔军舰回粤，马伯麟、黄惠龙和我跟随侍卫。经过福州时，先生曾访问福建督军李厚基，约一小时余回舰。当永翔军舰开出闽江，先生站在甲板上浏览闽江景色时，忽然对舰长说：“现潮落数尺，若仍照进口航路开出，必致搁浅。”言时又以手杖指示方向，把从某处至某处应该靠近某山某岸航行，向舰长指点得清清楚楚。舰长不甚置信，虽然连声说“是，是”，但没有实际照着做。不久，军舰果然不能前进，舰长才不得不表示敬服。他说：“我生长福建，而且出身水师学堂，现在还担任舰长职务，乘船经过闽江也不知有多少次，可是对闽江水势，反不如先生了如指掌。”先生说：“中国各河流及海港，我都有过细心研究。”舰长设法驶离浅沙后，遂依着先生的指示，开出闽江口。

永翔军舰将达汕头，先生说：“这里海鲜甚佳，大家可以一齐上岸用晚膳，尝尝滋味。”舰长听了异常高兴，坚要作东道。于是各人就随着先生登岸，找了一间馆子，共用了十块钱，由那舰长掏腰包。饭后回到军舰，继续向广州航行。

一九二一年四月，国会议员在广东省府财政厅大楼举行非常会议，讨论护法政府组织及选举大总统等重要问题，全国各地都

有议员出席。有一位议员在会上反对选举先生为大总统，被议员周震麟用墨盒掷击。及投票结果，先生被选为大总统。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先生就大总统职，总统府设在德宣路。这一天，全市悬旗结彩，热烈庆祝，农工商学各界团体也都到总统府庆贺，真是旗帜如林，锣鼓喧天，十分热闹。各工会、会馆和武术馆纷纷表演舞狮艺术，各武术馆还表演双人对拆、单人拳棒等国术。先生看得高兴，叫我和黄惠龙也上台耍耍拳棒给大家看。我们都换上精武体育会的练武服装。登上演武台。黄惠龙手握竹节钢鞭，向观众拱手行礼，一连表演了百多节鞭法。接着我也耍了一套八卦剑。各武术馆拳师和观众都纷纷鼓掌助兴。我们表演完毕之后，先生说：“你二人的国术都练得不错，革命军人应该学习这些技术。”

一天，旅美归国华侨陈仪禧^①来见先生。他一见面就说：“大总统，你就是孙文，在美国谋生的唐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你做大总统，名义还不够好。大元帅名义更不好。最好还是登上皇帝座位，做个真命天子啊！”先生听了，就耐心地把致力革命的目的和封建社会的皇帝是什么东西，向他解释一番。陈仪禧又说：“我的家乡原叫新宁县，现在改叫台山，山怎能够抬得动呢？还是叫新宁吧！”中山先生又把新宁改名台山的原因和取义告诉了他，并说要代他制订一个发展宁阳铁路计划书，使这条铁路可达大洪古海湾，同时要发展大洪古、广海和闸坡一带渔业。陈仪禧看见先生这样关怀他，十分高兴，要请吃晚饭，先生因事情太忙，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① 陈仪禧，台山人，从小在美国某火车站当清洁工人，未读过书，惟对于铁路经营及行车管理极为留心，曾帮助中山先生革命经费，后来募集华侨资金回国投资，创办宁阳铁路。

先生为了贯彻护法主张，决定先行肃清桂系残余势力，然后出师北伐，乃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率师援桂。粤军所向皆捷，很快就平定了广西全省，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取道越南出走。先生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并决定由桂林入湖南，出师北伐。先生道经梧州稍作勾留。某一天早晨，先生乘山兜（即滑杆）登梧州附近望夫山，视察梧州形势。未及半途，山兜槓子折断。先生率领三十名卫士披荆履险，徒步而登，我佩水壶跟随，历一小时半始达山顶。略为休息，先生使用望远镜四处观看，随看随说：某山应该有煤矿，某山应该是铁矿，某处一带没有树木的是石灰岩，是制造水泥的原料，某处河流如加改良，灌溉附近的荒地，就可成为最好的农田等等。至下午二时，视察完毕，各人四处寻觅比较容易下山的道路。先生用望远镜向山下察看，发现有一处自山顶至山麓都没有岩石，茅草非常茂密，高可蔽人，但山势十分险峻，不能步行而下。他遂令四名卫士分作两批，先由二人臂扣臂地坐在茅草上，象幼儿园学生溜滑梯一般，向山脚直溜下去。约半小时，他们四人都溜到山脚下，站起来用手势表示没有损伤。先生遂命黄嘉龙在他左边，我在他右边，三个人臂扣臂坐在茅草上向下直溜，毫不费力便溜到山脚，不特没有受伤，而且衣服也没有破损。其余各卫士也跟着陆续溜了下来。山脚下是一大块荒地，方圆足有十多里。先生把手一指说：“这块土地很大，附近又有河流，可惜没有开垦。”说完之后，率同卫士步行回来，到达行辕，已将入暮。晚上，先生决定明日召集梧州各界人士开大会，讨论开发那块荒地的问题。我劝他说：“先生从早到晚都是爬山和跑路，太疲劳了，可否休息三天，然后再开会呢？”中山先生只答应休息一天，随即通知梧州市市长戴恩赛于第三天召集梧州各界举行开发近郊荒地大会。先

生还利用休息这天写了一个开荒计划。到了第三天，各界齐集开会，先生到会讲话，把开垦这块荒地的重要意义和计划都说得很详细，在场的人无不赞成。散会后，先生又命卫士引导戴市长和各界人士到荒地勘察，并把他拟好的计划交给他们。

一九二一年十月，先生到南宁视察，广西省长马君武召集工农商学各界开大会欢迎。先生在会上演说，历时三小时余。演说还没有完，先生忽然说：“请大家到外面操场上集合，然后再讲。”当时到会的许多人都是破衣烂鞋，甚至还有赤着脚的。先生就说：“看看吧！各位穿的衣服都这样破烂，多数还没有鞋着，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陆荣廷、谭浩明一班军阀剥削你们，弄得你们生活这样困难。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现在广西的军阀已经打倒，马君武做广西省长，必定要负起这个责任，使人人都丰衣足食。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马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齐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各人听了，都非常兴奋，不断高呼“大总统万岁”。先生又说：“南宁附近有很多荒地，各位主人可以马上去开发，入息必定很快就能增加。”

先生在南宁视察完毕，回梧州后，命我到广州去接夫人。先生在梧州每天开会，十分忙碌，约一个多月才出发到桂林。夫人因事回广州，在越秀楼只住了四天，便由我和张发奎护送赴桂林。先生自桂林到阳朔迎接，沿途饱览阳朔山水，始返桂林。

先生驻节桂林，湖南督军赵恒惕派代表来见，表示他绝对服从先生。苏俄亦派马林由廖仲恺、陈友仁和李禄超三人自广州陪

同前来。先生和夫人、廖仲恺、陈友仁同马林密谈了五天，其他的人没有参加。

（六）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

先生在桂林指挥北伐，十分忙碌。当时军事部署已逐步完成，第一步计划是先克长沙。正在准备向湖南进发时，不料陈炯明蓄谋叛变，违抗命令，停止接济军需。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遂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由桂林回到广州，首先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并把桂林一带的军队开回广州，又从广州开向韶关。北伐各军在韶关集合后，先生便由广州到韶关，在那里设大本营，准备取道江西北伐。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先生又由韶关回广州。当火车到达新街站时，自广州前来迎接的人，都登车来见先生。其中一位华侨邓三伯向先生说：“陈炯明在惠召集他的爪牙频频开会，显有谋乱企图，请由其他车站下车，不可直到黄沙，免受陈炯明的暗算。”其他的人也以为然。但先生却不以为意，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至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火车到黄沙站，先生登上陈策派来的兵舰开到天字码头，再坐汽车回到总统府。第二天，先生带着黄惠龙、杨仙逸和我从越秀楼往震武楼、文澜阁各处巡视，看见文澜阁后面的越秀茶室驻满军队，墙上还凿了许多对着越秀楼的枪眼。有许多士兵在这一带来来往往，好象是新开到的。先生向这些士兵问题：“你们的官长是谁？”士兵回答：“是洪兆麟司令。”先生又问：“洪司令驻在这里么？”士兵回答：“是李旅长率领我们驻在这里。”先生又问：“你们是从那里开来的，李旅长有什么任务给你们？”士兵回

说：“我们是从江西开来的，不知道有什么任务。”先生和他们谈话后，便回到越秀楼。翌日，先生命侦缉队长李天德调查总统府附近驻军的人数、番号和军官姓名。十四日那天，从早到夜都有人接二连三地来报告陈炯明造反的消息。先生向黄惠龙和我说：“今晚有什么举动，要立即报告。”不久，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说，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第二天早晨，陈策又向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谈了一小时余才退出。到了下午，陈少白来见，先生说：“刚才得陈竞存电报说，只要我交出一个人，任由他把这个人杀掉，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个人是谁，我也想不出来，竞存为什么要杀这个人？”说完便把陈炯明的来电给陈少白看。陈看过电报之后想了一想，便说：“我闻得陈炯明部下说，‘一定要杀胡汉民，杀了胡汉民就一切事情都可以服从’。陈炯明提出要杀的人，大概是指胡汉民吧。”先生说：“展堂是一个好人，决不能使他受冤屈。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竞存部下，叫他们不要妄动。”陈少白退出之后，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下午六时许，陈策用电话向先生报告。先生答道：“这是外间的谣言，可以不必置信。”先生把电话筒放下后命副官陈煊于第二天早晨往宝璧舰把存在该舰的面额二角的钞票数十万元提回总统府，准备运往韶关大本营作北伐军军费。至夜十一时，陈策、魏邦平连续从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并说情况已十分危急。先生说：“无论如何，我不离开，我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来不为个人谋利禄，是人所共知的，陈炯明何至要谋反？”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都是报告陈炯明已布置军队，快要开始向总统府攻击的消息。这些电话都是由我接听了以后转报先生的。他每

次听了我的转报后，都没有什么表示。不久，又有某处来电话，先生接听以后对我说：“马湘，你率领卫士小心守卫越秀楼。”说完之后，态度和平常一般，非常沉着。我找到卫士大队长姚观顺，把先生的命令转告他，并和他商议守卫计划，随即下令各班班长率领全部士兵严密戒备。至十二时，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十分匆忙地来向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把陈军在今晚深夜一时开始攻击、口号是“食饱饭，杀民贼”的消息告诉给他，这个消息十分确实，情形很险恶，因此请大总统速往别处，暂时避开。先生说：“竟存纵然恶劣，料不至如此。即使竟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竟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林树巍说：“粤军素来野蛮，不能不防备。”先生说：“我已将警卫调往韶关，即是表明我对他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阴谋，亦何须用兵？如果竟存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可以杀他。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叛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牺牲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貽笑中外，玷辱国家？”林树巍各人苦劝了多次，先生总是不从，他们只得退去。

十五日晚深夜一时，越秀楼上已听到远处有集合号音，不久，连部队的嘈杂声都能听到了。先生从卧室出来，命卫士准备防范。林树巍、林直勉和陆志云三人又急速跑来，力劝先生离开越秀楼。先生说：“竟存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林直勉等见事态危急，又知先生决不肯躲避，遂由几个人用力挽着先生离开越秀楼。我和黄惠龙请求跟随保卫。先生说：“你们不必跟随，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们要坚

守越秀楼。明天我若不回来，马湘带夫人到家中暂避。”说毕，他就被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拥着离开了越秀楼。后来我护卫夫人到黄埔，才知道先生脱险的经过是这样的：先生离开越秀楼后，由小路到达德宣路，即见有许多陈炯明部队向总统府进发。当走到惠爱路，正欲横过马路入桂香街时，被陈军的哨兵拦阻，不准通过。林直勉指着先生对他们说：“我的母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来这位医生到家里诊治。”但他们仍不许通过。林直勉又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不信，就请一齐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见先生穿了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十足像个医生，就让他们通过了。及到靖海路，又遇陈部叛军，先生态度非常从容镇定，叛军没有怀疑，便又安然通过了。从此一直沿长堤走到海珠海军总司令部，再乘小电船到了黄埔。

(七) 越秀楼奋战杀贼

卫士大队长姚观顺、第一队长黄惠龙和我(第二队长)奉先生之命，坚守越秀楼。当时武器有一百发手提机关枪三十支(这批手提机枪是杨仙逸从檀香山新购回来的)，其余就是驳壳手枪、五响步枪。我请夫人把厨房里的白米、鲮鱼和咸鱼给大家饱餐一顿(这些鲮鱼是梅光培送来的，因先生患胃病，需要吃鲮鱼，所以他挑选了上等的九龙吊片鲮鱼送来)。各人饱食之后，就佩好武器，准备迎敌。我请姚观顺大队长下令所有卫士不准离开，并命一个排长把守门口。大约在十六日上午二时，叛军开始向我们进攻，并从镇武楼上用机枪向我们扫射。姚大队长指挥作战，我则负责护卫夫人。我请姚观顺大队长下令各卫士只准打敌人的军官，不准

打敌人的士兵。敌人用电筒照着向我们射击，我们则对准电光还击。敌人一连冲锋三十多次，都被我们击退，死伤惨重。将近天亮时，姚观顺腿部一连被击中两弹，不能指挥作战，我就请准了夫人，由我继续指挥。姚观顺负伤后，斗志动摇，竟命亲信士兵把白被布拿来，以备竖白旗之用。我发觉了，就问他取白被布何用。姚答：“现在敌人过千，而且不断增援，我们子弹已将用尽，又无外援，眼见就要打败，不投降便没有办法，白被布是准备竖白旗的。”我立即将姚的话报告夫人，并请夫人授权给我，无论何人投降，都予以枪决。这样，姚观顺就不敢乱动了。战至天明，李云复叛军死伤三百余人，尸骸满山；我们只有四个人受伤。我看到子弹快要用光，立即从天桥跑到总统府找到叶挺，把作战的经过简单地告诉他，并向他要子弹。叶挺大声道：“打得好，打得好！子弹随便拿去。”我左手一箱，右手一箱，提着从天桥赶回来。将到越秀楼大门，敌人用机关枪向我扫射，一弹从头掠过，把头发烧了一大块；一弹从腋下穿过，一弹从大腿掠过，衫裤登时冒出烟来，但我一点没有受伤。我急令士兵取一百发手提机关枪来，对准镇武楼上的敌人机枪阵地扫射，一连伤毙敌人数十，敌人的枪声就沉寂下来了。下午二时，我再到总统府，请警卫团团长陈可钰派兵增援越秀楼。陈说，他的兵员守卫总统府还不够，实在无兵可以增援越秀楼，最好还是请夫人到总统府来，以便护卫。这时叛军总指挥从白云山用电话找陈可钰，责陈打死他们官兵几百人。陈答：“不是警卫团打的，是马湘和总统卫士打的。”叶举高叫：“如有拿获马湘，领赏一千元，把马湘立刻斩头。”我见陈可钰不能分兵相救，只好跑回越秀楼，把这些情况告诉夫人，并请从速逃避。夫人亦认为不能再留，遂由黄惠龙先行，夫人居中，我殿

后，从天桥向总统府跑步前进。我们刚刚过天桥，天桥即被叛军炮弹击中，登时焚毁。到了总统府，陈可钰向夫人报告说：兵力太薄弱，实在不能分兵增援，现在夫人来到，正好商量。我乘机请黄惠龙护卫夫人，自己跑到电灯机房找着电工头，和他一齐跑到林直勉卧室，弄开保险柜，把先生与苏俄的来往文件烧毁，并取出大总统印带回来交给夫人。这时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副官马毓藩来调停。陈可钰与他商议，提出三个条件：1. 保护夫人安全退出，沿途陈军不得侵犯；2. 保障总统府全体官兵生命及家属安全；3. 驻在总统府的警卫团全体官兵开往燕塘集中，然后将枪械搭架点交，并发饷一个月解散。不料正在商议中，叛军已从后门攻入。我们见事态危急，遂与黄惠龙合力保护夫人，由前门冲出。跟随夫人的女工怀着那颗大总统印接着冲出，但她慢了一步，被叛军截回了。

（八）保卫孙夫人脱险

我和黄惠龙二人以身躯掩护夫人由总统府前门冲出后，埋伏在附近的叛军看见有人出来，即蜂拥上前。我身上怀有面额二角银币五十元，立即拿出来分向左右两边掷去。叛军纷纷俯拾，我们乘机抢过马路，进入斜对面的小巷里。这条巷是死巷子，没有通路，巷内有十来家住户，其中有一家门户虚掩，我们便推门入内。恰好门里前面一座房子没有人在，黄惠龙和我急把军服手枪投入井里。这时夫人十分疲劳，我把她送入一间卧室休息，然后和黄惠龙坐在厅里。忽然一位老妇人从后面走出来，看看我们，又看看房间里，接着便怒气冲冲地大骂：“你们是什么人？擅自进入人家屋里，

连我新媳妇的房也进去了。你们马上滚出去！我儿子当排长，他回来你们就不得好死了。”夫人在房间听见了，立即跑出来。我看见这种情形，只得捏造一些事实，指着夫人向老妇人求情说：“她是我的姑母，在汕头当教师，因放假来探望我们。刚才打算到市上买些蔬菜鱼肉，谁知马路上遇到很多军队，害怕起来，又不熟识路途，因此躲到府上，请你原谅！”老妇人听了还是坚持要我们离开。正当这时，忽闻扣门声甚急，我和黄惠龙便准备搏斗。老妇人开了门，一个穿便服的少年走进来。老妇人指着我们，说我们闯进他家里，要那少年立刻驱逐我们出去。我料定这少年是老妇人的儿子，便把刚才对老妇人说的话再向他说了一遍。幸而这少年没有责怪我们，也没有要我们走，便直到房内去了。我们认为非跑不可，就由黄惠龙先行，我跟着到门外探视。谁知黄惠龙刚跑到巷口，即被叛军抓去了。我只得退回屋里，找些泥土把内衣裤略为弄污，然后去请那少年出来和他攀谈。原来他姓朱，当消防警察，新婚不久，新妇刚归宁。我见他很和善，就恳求他带路。我说：“我们住在卖故衣的四牌楼，因刚从乡下搬来，路途不熟，烦劳你带带路好么？”少年答应了，我便和夫人跟着他出了巷口，转入内街，很快就到了四牌楼。我便对这位少年说：“来到这里，我们认得路了，不敢再劳，请你回去吧！将来我们一定要买些礼物到府上答谢。”这少年向我们道别，便回去了。夫人袋里还有些钱，我就拿来买了些鱼菜辣椒酱之类放在竹筐子里，装作厨夫的样子，向高第街前进。刚转到维新路时，又见许多叛军把守着。我跑上前说：“弟兄！加菜么？”跟着把筐子给他们看。他们拿了一瓶辣椒酱说：“谢谢！”我和夫人急急横过维新路，转入高第街，一直来到同福里马伯麟寓所门前。马此时任长洲要塞司令，只有一个名叫九妹的妹妹在家。当我敲门

时，她竟不认识我。我低声告诉她：“我是二叔。我常常到你家来，你怎么忘记了？”她很惊讶，急忙把门开了。我们立即闪进去，关上门。跟着又有一个人叩门，原来这人是马伯麟的亲信勤务，是奉马之命回家烧毁文件的。我焦急地问他有没有看见中山先生到他们那里。他连声说：“看见，看见。”夫人听了很高兴，立即写了一封信交他带给先生。这时我忽然想起夫人已两天没有吃东西，便请马九妹叫仆人弄些饭菜来。夫人大概因疲劳过度，不愿吃。我安慰了她一番，并说：“如果夫人不吃，我也不吃了。”夫人才勉强吃了半碗。吃过饭后，我请马九妹把床铺让给夫人休息。晚上十时，马伯麟的勤务兵回来报告说，各处已经戒严，车船都没有开行，因此把信交还夫人。第二天一早，我请马九妹吩咐仆人到仰忠街找马超俊来。不久，马超俊和他的妻子沈蕙莲都来了。他们看见夫人已脱险，并知道先生亦已到了黄埔，十分欣慰。相谈之下，各人都认为这里不能再留，遂决定冒险到沙面自来水厂工头李国斌处暂避。各人都换了普通人穿的衣服，步行前往，马九妹和马伯麟的弟妇也跟着去。当走到沙面西桥时，大家都已进入桥上的铁闸，我因走在最后，被四个叛军发觉，跟着追来。我急跑入闸里，对守闸的沙面工部局华差说：“这几个匪徒要抢我的东西，不要让他进来。”华差果然上前制止他们进闸。我赶上夫人等一同到自来水厂找着李国斌，向他说明来意，一面由马超俊打电话给岭南大学校长锺荣光，请他派电船来接。但这天电船没有来，我们就在厂里过了一夜。翌日上午八时，电船来了，我们遂乘电船到岭南大学。是日适为星期，锺校长信基督教，赴礼拜堂尚未回。这时忽见一建筑工人偕中山先生外籍顾问那文同来。我一看，这个工人原来就是黄惠龙。我看见他的蓝色衣服上沾满了白灰黄土，便问他是怎么脱险的。黄

惠龙说，他被叛军拘至一小巷掠去他的手表，就放了他；后来他到东山那文家，见邻近有一建筑工人，就把这个工人所穿的衣服买来，化装为建筑工人，与那文同来。不久，伍廷芳、伍梯云、魏邦平也自黄埔乘小电船到来。我急问伍廷芳见过先生没有，伍说：“中山先生在黄埔，很平安。”各人一起来见夫人。锺荣光校长礼拜完毕也回来了，请夫人午饭。这时夫人和大家都急欲往见先生，遂急不及待，乘魏邦平的电船驶向黄埔，黄惠龙、那文和我随行。到黄埔后，在长洲要塞司令部见到先生。我急上前报告：“越秀楼没有守住，楼里的东西都烧了，我只保卫了夫人脱险，没有完成固守越秀楼的任务，请按军法办罪。”先生说：“蠢仔！你打得好，是个英雄好汉。你能够保卫夫人脱险，将来升你为团长。”此时虎门要塞司令何振来见，报告虎门要塞已失守。先生没有理会他，与夫人入要塞司令室密谈后，夫人即偕那文复返岭南大学。翌日，便由那文送夫人至香港转往上海。

那文送夫人到港后，旋即返黄埔转往广州。以后那文每隔一天，即由广州来黄埔一次。

（九）中山先生驻节黄埔

先生驻永丰舰，由我和黄惠龙跟随侍卫。有一天，来见的人较少，我趁着这个机会对先生说：“现在只有我和黄惠龙两个卫士，力量十分薄弱，须要增加些人。各军舰的给养，恐怕也有问题。”先生说：“现在没有办法。长洲要塞的军费也是马伯麟自己筹划。李安

邦司令只有士兵五六十人^①，还需要协助长洲要塞的防御，不能调充卫士。”先生说到这里，恰好马伯麟带了一个身穿黑胶绸便服的人来见。这人叫徐树荣，住在隔河的村子里。他纠合了弟兄一百八十人前来替先生效力，并拿出各弟兄签名的名单给先生看，同时举起右手宣誓：“徐树荣带同弟兄一百八十人立誓服从中山先生，护卫中山先生，如有违背，坠海而死。”先生甚为嘉许，立即委他为别动队队长。翌日，徐树荣带同一百八十人来见先生。他们皆穿短衣便服，十分威武，有些携驳壳手枪，有些背五响步枪，也有长短枪俱备的。先生命他们在长洲要塞司令门前集合，对他们训话，一连讲了两小时余。他们听了先生的训话，个个欢欣鼓舞，高呼“大总统万岁”。先生吩咐徐树荣率部在长洲要塞一带布防，与海军互为犄角，然后返回永丰舰。这时我又对先生说：“现在增加了徐树荣一百八十人，李安邦五六十人，再加上李天德的卫队，防守力量已足，可否写信给我到香港找伍学焜筹集军费、粮食、煤炭、以充实军备？”先生说：“很好，很好”，便写了一封信，命我往港面交伍学焜。我奉命后，就搭省港轮船到香港找到伍学焜，把先生的信交给他。伍学焜看了后，立刻请伍于簪、杨西岩和林护等来商议。我等他们到齐了，把陈炯明造反和中山先生在军舰指挥讨陈的事扼要地说了一遍。伍学焜说：“陈炯明造反的事情，我们已知道了。大总统有命令，我们一定遵办。现在有一艘比利时货轮可以租来运载军需品至黄埔。三日之内必定有钱、有粮食和煤炭运到。我们不写回信了，请你回去代我们告知大总统，请大总统快些扫平陈贼。”伍学焜

^① 李安邦本来有士兵百余人，大多数是华侨子弟，他们都忠勇非常，枪法准确，从前曾披了五六十人充总统卫士，越秀楼失守后，尚未归队，故现在只有五六十人。

又另送五百元作大总统膳费，托我转呈。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又跑到永安公司见经理孙智兴，把陈炯明叛变的事简单地告诉他，并说：“中山先生仓卒退出越秀楼后，一切应用衣服和物品都没有，你这里各种货物俱备，我想顺便带些回去，以应中山先生急需。”孙智兴说：“这些小事我们应该效力，你要什么就取什么吧。”我便把需要的东西如线衫、内衣、皮鞋、袜、毛巾、牙刷、香皂、咖啡、可可、炼乳、麦片和其他罐头食品等都拣了一些，用大皮箱装起来。各事办妥后，距省港轮船开行尚有数小时，便又跑到海外联义社，看见有几十位社员在那里休息。我急上前告以陈炯明造反，中山先生现在黄埔准备平乱，希望他们到黄埔效力。各人听了都愤激起来，登时有二十四人和我一同起程。二十日抵达黄埔，我即向先生报告办理经过。先生说：“你很周到，我没有吩咐你办衣服和应用什物，你居然都想到了，又带了几十个联义社海员参加讨贼，实在难得。”说毕又吩咐我请各海员来见。他们进来都很恭敬地向先生行礼。先生问明了各人的专长和所愿担任的职务，便一一分派工作。翌日，急闻有轮船鸣号进口，我心里猜想可能是比利时的货船，细细一看，果然看见这船挂着比利时国旗，从远处驶来。我马上去告诉先生，先生步出甲板，用望远镜一看说：“马湘，你带李安邦的士兵六人，到船上去看看。”我带同士兵登上舢板，等船驶近，就登上船去，在甲板上会见了船主，向他说明来意。船主知道我是中山先生派来的人，便把伍学规的信件托我转交先生。我把士兵留下看守轮船，自己回永丰舰复命。先生看了信后，立即吩咐打旗召集各舰舰长前来，叫他们把应领的伙食、煤炭、军饷等都开列清册，并具备领据到比利时货轮提取，同时命令全体官兵除值班勤务外，一律到永丰舰听候训话。不久，各舰的官佐士兵纷纷驾着舢板前来，各舰

的人数，多者有五六十人，少者有二三十人。他们听了先生讲话后，都衷心表示服从和愿意加入国民党，并高呼：“服从大总统”，“大总统万岁”。

有一天，陈树人自香港来，表示愿在先生身边任秘书。先生不同意，要他马上往上海，从速对各地华侨宣布陈炯明的叛逆罪状。后李禄超也自香港来，传达谢持在香港所得北伐军回军讨逆的消息。

黄骚来舰向先生报告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逝世的消息。先生听了流下泪来，在座的同志和海军将士也都很伤心。先生对各人说：“陈逆叛乱，祸国殃民，伍总长忧劳过度，遂至不起，我们后死者自应同心戮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之英灵，完成革命大业。”

有一西报访员来见，先生对他发表谈话，内容大概是说：“总统为国会选出，责任重大，无论任何困难，绝对不能放弃职守。陈炯明称兵叛国，我身为总统，自应负起平乱讨贼之责，才对得起全国同胞。”谈了些时，西报访员才退出。

七月七日，洪兆麟派代表陈家鼎来，要见先生。我一见他，非常气愤，向他大喝道：“洪兆麟是个什么东西？除非你拿了洪兆麟的头来，才有话说。”先生在房里听见我高声大骂，便问：“马湘，你和什么人吵嘴？”我说：“洪兆麟这个东西派代表来要见先生，我不觉愤怒起来，把他大骂了一顿。”先生说：“不要这样，让他进来吧！”我遂喝叫陈家鼎登舰，把他周身严密检查了一遍，耽搁了一些时间。先生问：“为什么还不见陈家鼎进来？”我于是急急带了陈家鼎入见。陈家鼎把洪兆麟的信恭恭敬敬地呈上，并说：“洪司令原意是想偕同陈炯明一齐前来向大总统请罪的，陈炯明已经做错了，请

大总统不必计较，现在洪司令希望大总统回省城，再任陈炯明为总司令。”先生没有答他，只命人写了一封信命他转交洪兆麟。

海军司令温树德接受了陈炯明的巨款，甘心附逆，把海圻、海琛、肇和三艘大舰驶离了原来的位置。这么一来，永丰座舰便顿时失去了掩护。先生接到情报后，立刻命令这三艘大舰发炮轰击鱼珠炮台，以试探他们是否附逆。结果，三舰竟违抗命令，把灯火全部熄灭，在夜深十一时驶离黄埔。这时先生所统率的军舰火力，已不能与鱼珠炮台的火力对抗，而黄埔背后的那条河道亦已久无轮船航行，大家都认为无法通过，已处于被封锁的恶劣形势。先生忽然下令各舰驶入那条小河，再出三河口至新造附近停留，以避开鱼珠炮台的火力，免被叛军封锁。这时各兵舰都认为那条小河从没有较大的轮船通过，但又不敢抗令，只好在三大舰离开黄埔时驶入小河，果然没有一些困难，顺利通过了。这条小河可以航行永丰舰等这样大小的兵舰，当时除了中山先生外，是没有人知道的。

中山先生率领各舰到达新造附近后，鱼珠炮台的叛军向长洲炮台密集射击，掩护叛军渡河，长洲要塞司令部和鱼雷局均被击中。马伯麟、李安邦、李天德、徐树荣率部与渡河叛军作殊死战，已将敌势遏止。不料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忽率部叛变，响应叛军，致令马伯麟各军不能再战，只得各率所部退出长洲。于是广州附近的陆上据点，遂全入叛军手中。

（十）中山先生进驻白鹅潭

在长洲失守这一天晚上，先生下令各舰从新造出发，进攻车歪炮台，事先曾召集各舰官佐商议攻击计划。当时各舰官佐皆认为

车歪炮台附近，叛军炮兵密布，地形险要，因而畏缩不前。有人还主张全部开入西江，再图进展。先生认为开往西江必须经过鱼珠、牛山各炮台，那里又有海圻等三舰监视，火力悬殊，势难冲过，现在只有冲过车歪炮台，进入省河，以待西江、北江各军回师，并嘱大家努力作战，使叛军不敢轻视。各人听了后，均奋勇接受命令。先生遂命永丰座舰先行，率领豫章、楚豫、广玉、宝璧各舰从新造溯流而进。翌日天微亮时，先生见车歪炮台已入射程之内，便下令各舰作试探射击。此时叛军在两岸及在河中心的车歪炮台均布置重兵，各舰官兵皆觉胆怯，面现难色。先生急召集各舰官佐训话，勉励大家鼓起斗志。至上午九时，先生亲率永丰舰先行，各舰紧密相随，一齐发炮向鱼珠炮台轰击。两岸及车歪炮台叛军的大炮也集中射击永丰舰，登时炮声隆隆，烟焰冲天。由于先生亲自指挥作战，各舰官兵均斗志昂扬，勇气百倍。我与黄惠龙各持手提机关枪不离先生左右，每发一炮，即高声喊杀助威。战了十余分钟，各舰都冲过了叛军大炮的射程范围。永丰舰被击中六弹，官兵略有损伤，惟主炮的弹药已用尽，旁炮亦仅存七弹。其余各舰中弹较少。至于叛军则受创极重，我亲见他们的炮兵阵地有四五处被击毁，仅发了几炮便寂然无声了。我们陆上部队，因人数太少，只占领了东塍一带几处乡村。

舰队进入白鹅潭后，原在这里的北洋舰永翔、同安两舰均表示服从，一致讨贼。同时广东江防舰广亨、广贞两艘亦从珠江下游来附，但因舰身太小，火力太弱，不能冲过车歪炮台，驶至东塍附近即不能再进，遂会合陆上部队向江门方面退去。

英国领事来舰对先生说：“白鹅潭虽然接近沙面，但外国人不能保护你们，而且战事发生，万一损及沙面，更会引起外交问题，还

是请你离开白鹅潭吧！”先生严词驳斥他说：“这里所有的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沙面也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主，你们是客，只有我们保护你们，没有你们保护我们之理。”英领事无言可答而去。

一连四五天接到各方面传来消息，都说北伐军回师讨贼，节节胜利。有的说已克服翁源，有的说已逼近韶关，韶关指日可下。各人听得这消息，都十分欣慰。先生还发了电报慰劳许崇智、朱培德各将领。

一天，先生正在午膳，忽然一声巨响，全舰震动得十分厉害。后来查悉是叛军企图用鱼雷爆炸永丰舰，因鱼雷在距离永丰舰数丈处爆炸，故舰身没有受伤。事隔五天后，在芳村的河面拿获了一个名叫徐直的叛军，审讯时他直认曾用鱼雷爆炸永丰舰，并供出叛军派陈永善到江门装备了几十只小火轮，准备用来分途向各兵舰袭击，同时在芳村、花地、河南各地布置炮队，以掩护各小火轮进袭。审讯毕，立将徐直枪毙。

到了八月，接到各方面的消息，都说北伐军败退，南雄已失守。有的消息则说北伐军正在反攻，叛军将领翁式亮已被击毙，并有不少叛军反正，宣布独立。先生对各同志说：“现在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我们都不能轻信，仍要照原定计划，严密防御敌人的偷袭，等到接获前方确实报告后，再作其他部署，以免打乱步骤。”

程潜自沙面到永丰舰，劝先生离粤，另谋进取。先生认为在未得前方败退的确实报告之前，决不忍抛弃患难相随的海军官兵而自己先行离开广州。

(十一) 中山先生离粤赴沪

有一位从越南归国的老华侨(已忘记他的姓名)亲身跑到韶关

探听北伐军回师讨贼的消息以后，在八月九日到永丰舰见先生，报告北伐军已从韶关、翁源一带败退，南雄已于六日失守，现在退守龙南。先生素来知道这位华侨十分诚实，因此认为他此次自动冒险跑到前方探得的消息，一定是确实的，遂马上召集各舰长会议。各舰长一致认为：南雄已失守，北伐军已被截为数段，失去联络，欲收集败军，保存实力，既有困难，更无力量再回师讨贼，即使大总统仍然驻节省河，也于事无补，究不若暂时离开广州，徐图戡平叛乱。先生略为沉思一下，认为各舰长所提意见可取，即命人通知各国驻沙面的领事，说因北伐军回师讨贼未能成功，决定离开广州。各领事接到通知后，英国领事、日本领事都请用他们的兵舰送先生到香港。英国领事还托人向先生说：“十日适有俄国皇后号邮船由香港往上海，孙总统如果决定赴沪，请于今日下午乘英国炮舰到香港，由英领事先以电报通知港方代为预定房间，以备孙总统乘坐。”先生遂于这一天下午三时，率蒋介石、陈策、陈群、陈煊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离开广州，临行前派林直勉、李章达和我留下办理一切未完的手续。

先生离开永丰舰后，有几十位海军官佐向我索饷，说我是管理军饷的，要我负责发饷。我对他们说：“我不过是一个副官，那里能够管理军饷；管理军饷的人在沙面，你们可以派代表和我一起往沙面领取。”他们同意了，遂派一位代表和我同到沙面。我本来想借此为脱身之计，谁料到沙面找到居正，他竟然拿出了面额二角的广东毫券，发给他们一个月的饷。原来这笔款就是中山先生派副官陈煊从宝璧舰上取来的，原定六月十六日解往韶关大本营充北伐军费，后因陈炯明叛变，未能提去，遂由居正接管。我因留在沙面没有什么作用，遂秘密搭省港轮船至香港，再赴上海，到莫

利爱路四十六号先生住宅，依旧担任侍卫的职务。

(十二) 中山先生返粵任大元帅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先生回到上海。过了好几天，林伯渠和李大钊来见。又隔几天，林伯渠、李大钊介绍苏俄特使越飞来访先生。先生与越飞相见之下，极为喜悦，当即与越飞在楼上客厅开始会谈，孙夫人、林伯渠和李大钊亦参加，一连整整谈了六天。在这期间，先生吩咐我，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过了几天之后，林伯渠来，我问他前几天会谈的是什么问题，关防为什么要这样严密。他告诉我说，这次谈的是关于革命党应以苏俄为师、苏俄帮助中国革命、打倒军阀的问题，要我保守秘密。

我跟随先生回到上海后，仍旧住在莫利爱路，薪水十分少，每天只领取零用二角，因此生活要特别节俭，衣服也是自己动手洗濯。有一天，夫人在楼上看见我在下面洗衣服，叫我上楼对我说：“朱卓文之女密报说，你受了陈炯明港币二万元，准备暗害先生，并说你已把此款在港买了洋房。起初我已不大相信，后来我见你常常自己洗衣服，不象是一个受了人家一大笔钱的人，就越发使我不相信。现在我把这事告知你，你不要怀疑，好好地干！”我说：“我不知这事，莫说二万元，再多到算不出，我也不会受人家唆使的，请夫人放心。”夫人说：“不用你说，我一向知你诚实可靠。”

伍学焜、伍于簪、杨西岩和孙科自香港来见先生，报告陈炯明在广东搞得十分坏，广东同胞无不恨之刺骨。他们认为趁此时机下令讨伐，必可成功。他们又表示愿尽力筹划经费。先生遂分别

派员向驻福建的许崇智、李福林各部，驻两广边境的杨希闵、刘震寰各部、驻湘粤桂边境的谭延闿、朱培德、沈鸿英各部和西江一带的粤军传达命令，叫他们各率所部头向陈炯明攻击。他们奉到命令，都切实执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把陈炯明驱出广州和西江、北江一带地区。陈炯明率残部分别退回东江惠州、潮梅、汕头一带和南路琼崖各地，负隅顽抗。

先生以广州已收复，遂和夫人自上海乘邮船取道香港返粤，黄惠龙和我跟随侍卫。邮船到了香港，港中各行商、知名人士和香港大学都纷纷开大会欢迎。先生忙个不了，每次大会都演说数小时。在香港大学欢迎会演讲的时候，各欢迎者热烈鼓掌，频频高呼“孙博士万岁！”我还大略记得先生说：“……我从前在香港读书，康德黎老师很喜欢我，我也十分敬重他，师生感情极为亲切。后来我转到檀香山读书，适他也到该地游历，道上相逢，遂我同车四处游览。这时我头上还拖着辫子。而今已隔数十年，回忆起来，当时情景还一一如在目前。……当我在香港读书之时，中国人不懂得西医，更可以说中国没有西医。我学医不是谋个人的利益，而是志在救世，更借行医以暗中进行革命，推翻满清帝制，恢复中华。在我开业行医时，诊金多少不论，贫者更赠医赠药。此时广东省城和澳门都没有西药房，因此要常常到香港采买西药。……各位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学成之后，首先要以济世为目的，为国家为民族效力。……”在散会时，“孙博士万岁”之声震耳欲聋，各欢迎者还一齐拥上来，把先生团团围住，高高抬起，从大礼堂直抬至休息室，又纷纷环请先生题写纪念册，以留纪念。

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职，设大元帅府

于广州河南土敏土厂。有一天，李烈钧、杨希闵、刘震寰、朱培德和许多高级将领都在座，先生对几位参军、副官、卫士队长说：“你们试试枪法给大家看看！”言毕即率各人到网球场，在短墙上排列五只瓦罍作靶子，命各参军、副官等用手枪作短距离射击，每人以五发为限。马伯麟首先发射。他手持驳壳手枪，一连三发，击碎了三个瓦罍，但后二发没有击中。参军祁耿寰用驳壳手枪一连击中了五个瓦罍。外籍副官马均也中了三枪。我用大号左轮手枪，从左边第一个瓦罍依次向右射击，把五个瓦罍都打得粉碎。黄惠龙中了二发。姚观顺中了三发。最后是卢展柳，五发也都中了。射击完后，先生向大家说：“各人的射击技术都很好，虽然有些不能完全命中，但如果靶子大一些，就可以枪无虚发了。革命军要有一个打一百个的精神和技术，我希望全体革命军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样，革命就会很快成功。”夫人说：“从前在越秀楼抵御陈军和保卫我脱险，卫士们都是有这样技术的。”先生又问杨希闵、刘震寰等各高级将领，有没有认真训练部下实弹射击。他们都说子弹补给困难，要求大元帅今后多拨给一些。先生当时曾命黄昌谷把此次实弹射击的情形笔记下来。

先生在大元帅府把越秀楼杀贼奖章颁发给卫士，所有各总司令、军长、司令如朱培德、谭延闿、杨希闵、刘震寰、李烈钧、魏邦平等许多高级将领以及大元帅府各级官佐全部都参加。越秀楼杀贼的卫士自大队长姚观顺以下六十五人首先列队到场，全场所有武职人员一律穿著整齐军装，仪式十分隆重。先生即席训话说：“我自致力革命以来，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大小战役，但从来没有颁发过奖章，这次算是第一次。这次卫士队能以六十五人抵抗贼军千余人，血战一昼夜，歼灭贼军数百人，而且还能安全撤

退，没有一个阵亡，实为战争史上所未有。你们都是革命军的好模范。现在陈炯明负隅顽抗，必须加以讨伐，凡我革命军人都应该仿效各卫士越秀楼杀贼的精神，迅速扫平叛逆。”训话毕，夫人亲自把奖章挂在各卫士的襟上，全体卫士均十分兴奋，认为这是无尚的光荣。

有一天，伍学熹、伍于簪、杨西岩、杨仙逸偕华侨十余人来见先生，魏邦平夫妇亦在座。先生与各人略谈了几句，便招呼大家到门前码头，登上大南洋电船，吩咐开往鼎湖山。原来他们都是事先约好的。船开行后，先生和各人一面浏览沿途景物，一面畅谈。约五六小时即到达高要县属罗隐涌，登岸步行约十分钟至庆云下院。僧人备山轿，先生不用，步行而往。各人因先生步行，也只得徒步相随。至半山亭休息约半小时，继续登山至庆云寺。寺僧合十出迎，竭诚款待，晚斋后，开精舍留客。先生与各人畅谈建国方略和北伐大计，至十一时始就寝。翌日早斋后约十时，先生偕各人至鼎湖寺游览后，循着原路回到庆云寺。第三天早斋完毕后，即向寺僧告辞，僧众送出山门外，先生偕同各人步行下山，转向飞水潭。这里有瀑布从山上直泻而下，分上下两级，上级浅而狭，下级深而广。先生独自一人跑到上级大瀑布之下洗澡。我见他身子浸在水里浣洗内衣，便上前说：“先生，把衣服给我洗吧！”先生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你以为我洗得不够干净吗？”他把衣服洗完，才叫我到夫人那边把内衣裤拿来穿好，加上外衣，然后下来与各人一同下山，至下午九时三十分，始返抵广州二沙头颐养园。

先生亲自督师讨伐陈炯明时，有一次率同各卫士，偕顾问鲍罗廷到最前线——惠州城外之飞鹅岭，指挥炮兵使用刚从虎门运

到的要塞炮向惠州城贼军袭击。一连发了十炮，逆军既没有还击，也不敢对飞鹅岭作争夺战。后来杨仙逸在东江河面用四艘大民船临时装配炸弹炸药，准备轰炸惠州城。先生偕顾问鲍罗廷下船视察，看见炸弹炸药制造成功，十分快慰。视察完毕，既偕各官佐卫士上陆。迨料离船不到二十丈远，忽然轰隆一声，只见烈焰冲天，波涛汹涌，四艘大民船已被爆炸得无影无踪。先生流下眼泪说：“杨仙逸遇难了！”及回到大元帅府，夫人得知此事，也流起泪来。黄埔造船厂厂长苏从仙，也在那次遇难。其爆炸原因，据说是抛弃烟头不慎，引起炸药爆炸所致。

先生督师东征陈炯明，前后三次。但因杨希闵、刘震寰等不肯认真作战，不仅迟迟不能歼灭陈贼，甚至还有许多次遇到危险。有一次逆军杨坤如率部大举来袭，我军纷纷溃退。适樊鍾秀率豫军约一旅赶至增援。先生问樊有何需要，樊说：“一概都不要”，说罢一气吃了四五只馒头。时叶恭绰在座，对樊说：“我愿献一万元以备樊将军犒军。”樊连说：“不用，不用，不敢领受。”言毕即匆匆上阵率部直冲陈军。陈军原以为胜利在握，忽被樊军纵横冲杀，遂自相践踏，四处奔溃。此一战役，双方都受重大损失，造成以后相持状态。先生以此役樊鍾秀功最大，特任樊为豫军总司令。

有一天，先生稍有余暇，命我跟随雇小艇渡河，乘汽车至东山戴恩赛家找卢夫人。我在门外等候，约一小时余，先生的女公子（卢夫人所生，戴恩赛之妻）送先生出来。先生登上汽车，命开至黄花冈，在烈士墓前凭吊。有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痲疯病人来到先生跟前跪下求乞。我见他太接近先生的身子，急忙喝他跑开一些。先生说：“不要吆喝他，你是人，他也是人，他患了痲疯

病，无法谋生，十分凄惨。”说毕又问这人的家庭状况，父母亲是不是也患痲疯。这人说：他的父母都在东莞耕田，还有弟妹，昨年他独自来广州谋生，结识了一个少妇，不料同居了几个月，他的痲疯就发作了，被她驱逐出来。说到这里，这个人便频呼肚子痛，拉开破烂的裤子痢泻起来。先生伸手打算替他诊脉。我急说：“他脓血遗体，万不能接触。”先生把手收回后，问我有没有钱带来。我回说只有二角子。先生命我将钱给他，又问他住在那里。这人说住在伍廷芳的墓门。翌日，先生命李禄超办函把这痲疯病人送往石龙痲疯病院。

先生偕同夫人和朱培德、马超俊、李禄超、黄大伟等许多人到白云山巡视，我和黄惠龙跟随侍卫。汽车至沙河圩，被农民发觉了，备山兜纷纷来接。先生一向是不坐轿的，婉谢了他们，率领着各人缓步前进。约一小时余，至白云寺，寺僧出迎，请留午斋。先生婉谢，转至寺旁九龙泉休息，嘱卫士们取出牛奶、饼干、苹果，与各人共作野餐。先生与李禄超等谈，白云山土质甚佳，倾斜角度亦不甚大，较为平坦之处适宜早作，可以种植杂粮，斜度较大的地方可以造林。餐毕与各人直登最高峰，虎门、长洲各要塞，广三、粤汉、广九各铁路，石井兵工厂，广州附近的河流、田野和乡村，均历历在目。先生用望远镜四处观看，向马超俊询问石井兵工厂的状况甚详（此时马任兵工厂厂长）。忽有几十个农民跟踪而至，衣服破旧，一望而知他们生计困难。先生对他们说：“我刚才所见山下附近的乡村，不是茅棚便是坭墙小屋，可以料定你们的生计是不充裕的。这原因都是地权制度不好，耕田的人每年要付出很大的田租，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把它解决。白云山各处的土质都甚佳，可以大加开垦，多种旱作物，高

粟、包粟、落花生、大豆都可以种。同时也可以造林，多种松、杉、苦楝之类。请各位回去宣传鼓吹，切实进行，不过数年，生活必定可以得到丰裕。”各农民听了之后都说：“大元帅的指导，我们一定要照着去做。”接着高呼：“大元帅万岁！”

有一个时期，陈炯明部在惠州石龙一带进扰，来势猖獗，大有威胁广州之势。沈鸿英看风驶帆，把驻在北江和韶关一带的部队秘密向广州移动，准备响应陈炯明。先生事先接到情报，命滇军范石生率部防守北郊和大北门、越秀山、小北门一带战线。当沈鸿英实行叛变，率领集中在广州北郊石井圩一带的部队向广州急进时，先生立刻率领黄惠龙、我和几十名卫士渡过珠江，乘汽车直上越秀山五层楼。沿途看见小北门、越秀山一带的滇军并没有作战准备，连守卫和岗哨都没有布置。先生进入五层楼，望见范石生躺在床上吸食鸦片，三个勤务兵一齐动手烧烟装斗，还是供应不上。先生登时震怒非常，指着范石生说：“范军长，我已命你警戒这一带地区，现在敌人已迫近了，你不特全无准备，并且绝无察觉，如此将置军法于何地？”范石生正在吞云吐雾，忽闻有人向他大骂，抬头一望，才知道原来是孙中山先生，登时手足失措，慌慌张张地爬起来，作立正姿势，行一鞠躬礼，但身子仍然不住地颤动。先生高声说：“马湘，你立即率领各卫士拿这里的机枪去布置阵地，听我指挥。”我大喊：“奉大元帅命令，取机关枪杀敌。”随即取了范军的轻机枪三挺、重机枪二挺，至五层楼西边至大北门一带城墙上，选择了地形和射界，布置好了阵地，等候先生命令。先生步出五层楼，在城墙上用望远镜探视，黄惠龙和几个卫士持手机枪随着，范石生也跟随在后面。此时范石生的部队已知道了大元帅和范军长亲自督战，都佩好武器，纷纷赶到，坐下的坐下，卧

倒的卧倒，准备作战。沈鸿英军先头部队大约有二三百人，快步前进，进到距离大北门约七八百米突，便纷纷蹲下，放了一轮步枪。先生见敌人蹲下，也把身子卧倒。这时敌人的子弹纷纷从上空掠过，呼呼作响。先生十分谨慎地用望远镜注视敌人的动作。敌人放了一轮枪之后，又纷纷起来向大北门急进。及至敌军进到距离四五百米突时，先生忽然站起来，大叫“快放！”登时五挺轻重机关枪、二十几挺手提机枪一齐劈劈拍拍响了起来，滇军的步枪、机枪也接着开了火，各卫士个个都是一等射手，枪无虚发，一轮猛烈的火力立刻把敌人压倒了。几百个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跑的跑不到几十步也倒了。敌人的后续部队也纷纷溃退，行伍大乱。先生看清楚了这些情况，遂高叫：“范石生，你立即率部追击，不许敌人有喘息机会，一定要把敌人消灭。”范石生振起精神说：“我尽力去干，不敢再负委任。”言毕，对他的部属说了一些话，便带同卫弁和千多名官佐士兵，从大北门向三元里急进。先生态度安详，在城墙上时时用望远镜细心观看。不及两小时，敌人已败退二十余里。不久范石生以军用电话来报：石井圩已克复，俘获敌兵敌械不计其数，现在向残敌穷追。先生遂率领卫士们返回大元帅府。

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樑在第一公园行结婚礼，事前来见先生，请先生作证婚人，得到先生应允。到了那一天，赵把中央公园的结婚礼堂布置得异常富丽堂皇，所用一切器物无不极尽豪奢。先生进入客厅坐下，接着杨希闵，刘震寰等高级将领都进来了，纷纷向先生敬礼。先生有些不耐烦，催促赵成樑举行婚礼。婚礼完毕后，先生即起身告辞说：“我因公事极忙，不能参与盛筵了。”赵成樑恳求稍待，一面吩咐开席。先生说：“不能，不能，公事急需处

理，”赵成梁不敢再说，只得送先生登车。翌日，赵成梁派员送一百元席金来，先生放在办公桌上，没有理会。过了一个月后，我对先生说，“赵成梁送来的席金还在台上呢。”先生说：“你拿去，我不要。”我又说，“先生用来加菜好么？”先生很不耐烦，甚至带着一些怒气说，“你拿去，你拿去！”

先生在一九二四年，每星期都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有一次刚到北岸步出码头时，见一妇人坐在堤边哭得很苦，大家都没有理会她。先生走上前去，看到这个妇人抱着一个面黄肌瘦、大约有四五岁的小孩，衣服也破烂得很。先生问她为什么哭得这样凄苦。妇人说：“孩子病了十多二十天，没有钱医治，看看将近要死了，叫我怎不伤心？”说完又痛哭起来。先生伸手替她的病孩诊了诊脉，对妇人说，“你不要哭！小孩的病虽然重了一些，但脉搏、呼吸都还好，不会死的。”说完命我用电话告知广东大学医科附属第一医院，请他们派十字车把这妇人和病孩载往留医。他吩咐完毕，才到广东大学去讲演。

先生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都是从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乘坐电船渡江，然后再乘汽车前往。同行的人有秘书黄昌谷和副官卫士等十多人，需用汽车三部。有一次先生回到大元帅府，吩咐副官把庶务请来，问他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往返的汽车费多少，庶务回说：“每往返一次，三部汽车共计要一十五元。”先生说：“往返路程不到五华里，便付出车费十五元，花费太多了，以后不必用汽车。”从此以后，先生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都是率领着副官、卫士等步行前往。

广州人有很多都认识先生，原因是先生每星期到广东大学讲三民主义时都是步行，而且时间和所经过的道路都有一定。因此，

知道这种情形而又希望瞻仰先生仪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先生所经过的街道，常常两旁都站着许多人。有一次，有一个约八九岁的孩子，满身肮脏，在马路上来跑去。一个卫士见这小小孩阻碍着先生前进，便跑上前把小孩推开。先生面上马上露出不愉快的颜色，回到大元帅府后，叫这位卫士进来对他说：“刚才回来时，你把路上的小孩推开，这是极不应该的。我自然会让开这小孩，小孩怎能阻碍我走路？他年幼无知，倘若把他推倒，更要使我难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你可把我的话报告队长，叫他命令全体卫士注意。”

有一次，先生在广东大学讲民族主义，因为礼堂不大，听众又多，加上天气又热，因而有许多听讲的人十分疲倦，有的还睡着了。先生为了提起听众的精神，便串出一个故事说：“我少年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看见了很多苦力工人聚在一起，谈得十分起劲，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摇头叹息，还有些不管旁人谈话，聚精汇神地赌博。我觉得奇怪，大笑的是笑什么？既然有人大笑，为什么同时又有人叹息呢？便上前问个明白。有一个苦力说：‘后生哥！你读书好了，知道我们的事于你无益。’又有一个说：‘我告诉你吧！我们有一个行家，辛辛苦苦地积蓄了五块钱，买了一条马票。我们都是没有房子住的，住在骑楼底下。他便把马票藏在日常用来挑东西的竹槓里，用烂布塞住槓头，人不知鬼不觉，既不怕被人偷窃，更不会遗失。他把马票的号码牢牢记着，安心等候开奖。后来马票开奖了，中头奖的正是他，便喜欢到万分，以为领奖之后可以买洋房，做生意，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根挑东西的槓子讨生活了，便把这根槓子狠狠地向大海里一丢，跑到售马票的商店探问领奖的手续。店员告诉了他，並叫他拿马票到指定的银行提取奖金和开户存款。这时苦

方才猛然想起马票放在竹槓里，便拼命跑到海边去，希望把竹槓寻回。可是哪里还有什么影子呢？我们笑的是笑他钱还未到手就把竹槓丢了，还带有幸灾乐祸的思想。叹息的是可惜他一个现成的富翁做不成，是带有同情的思想。现在我们这位行家因刺激过甚，神经十分错乱，到现在还没有上工呢。”先生说完了这个故事便接着说：“民族主义就是这根槓子。”听讲的人听到中山先生所讲的故事后，果然都大笑起来，再没有人打瞌睡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中旬，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先生莅临主持，主席台上有廖仲恺、李济深、周恩来、邓演达、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人。几百个学生穿着苏联式的军装，个个精神焕发。先生在开学典礼讲话中说：“在几十年的革命事业中，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也取得了失败的教训。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现在无论那一支军队都是假借革命之名，实行割据之实，只知争夺地盘，截留税款，开烟开赌，以扩充实力，并没有真正为革命效力的思想。现在为了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誓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我们应该感谢苏联给我们的帮助，希望大家发奋图强，好好学习。”

（十三）中山先生北伐和北上

一九二四年春，陈炯明势穷力蹙，退据广东的东江，不敢再作进窥广州之想。先生乃派出得力部队东征。同年秋，先生督率湘、滇、粤、桂、赣、豫、川、陕各路大军，出师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南华寺。豫军总司令樊鍾秀请增拨弹械，愿率所部作前驱。先生允其

所请，樊遂率部奋勇直前，入江西，过湖北，经河南进至陕西。

顾问马苏（东莞人，以贩卖中国旧画至外国为业）至大本营，听到副官马均（加拿大籍，犹太人）说：“大本营参军处由我指挥，副官处由我指挥，秘书处也是由我指挥。”马苏很惊异，找我谈这事。我说：“哪里有这一回事？马均不过是一个少尉副官，每个月支薪水三十元。他这样吹牛，定有其他企图，在外招摇撞骗更是意中事了。请你有便把这事向大元帅说明。”不久马苏对先生谈起这事。先生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示，第二天军需处把马均叫了去，给了他三百元，并对他说：“大元帅叫你另寻职业，不必再来工作了。”从此以后，马均就一直再也没有再见到先生。

北洋军阀张作霖派代表徐光汉，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先后到南华寺大本营来见先生，邀请先生到北京共商国是。先生遂决定北上。

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离开广州，十七日到达上海。这时有某军阀派凶徒多人，准备在码头上行刺，被民智书局职工所探悉，向我密报。我遂与黄惠龙等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又持枪分向前后左右警戒，同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因此并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

先生到上海后，招待新闻记者和老革命党人开会演说，发表谈话，整天忙个不了。先生在上海停留约两星期，然后乘船经过日本，前往天津。夫人、戴季陶、黄昌谷随行，我与黄惠龙跟随侍卫。轮船抵日本神户时，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百多人前来欢迎，一致表示愿辍学归国听先生驱策。先生勉励了他们一番，并嘱他们用功研究军事学科，将来回国为国家出力。他们还打算公宴中山先

生，先生叫他们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辞谢了他们。第三天，日本各界人士和学生共千余人，在神户大学礼堂开欢迎大会（日本皇族没有参加）。先生演讲达四小时余，听众频频鼓掌，情形十分热烈。翌日，日本知名人士头山满、山田、萱野长知等以及先生在日本时认识的七八位友人后来看，稍作叙谈即告辞退出，只头山满一人留下，由下午九时起一直谈至天明。头山满还用电话请了一位日本大财阀（忘其名字）到来，介绍与先生相见。这位财阀对先生执礼甚恭，头山满表示这位财阀能帮助中国建设，建议先生回国被选为大总统时聘他为顾问，中国建设事业就不患无资本，又表示他诚心希望中国富强，中日互相帮助。隔了一天，先生带领副官、秘书等搭长崎丸回国。

十二月四日，长崎丸到达大沽口时，赵超、刘维炽、李仙根、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十多人来接。到天津时，学生界搭大牌楼欢迎，先生当即对学生们演讲。先生和一班随从人员都住在张园。到天津后第三天，张作霖派员来说，在天津行辕举行欢迎大会，请先生莅临。先生带同我和黄惠龙前往，和张作霖会谈了四小时。翌日，张作霖到张园来见先生，一连来了二十辆汽车，卫士足有百多人，戒备十分森严。张作霖向先生表示，他决心追随先生，并说他愿作先生的卫士队长。我和黄惠龙、邓彦华、赵超各人都站在客厅阶前，张作霖的卫队也有十多个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其中有一位戴着上校肩章的军官问我说：“孙中山先生的随从卫士有多少人？”我回说：“六人。”他听错是“六营”，觉得很惊奇，伸出指头问我说：“一、二、三、四、五、六？是六营？驻在哪里？”我觉得他这个样子实在可笑，便再说明是六个人，不是六个营。他又很诧异，觉得人数太少了。他看见我佩着一支银色的新式手枪，便请我给他看。

我说：“大元帅有命，‘武器不能给人家看’，对不起了。”他又问这种新式手枪能抵敌多少人。我说，“一发可以击毙十人。”他没有露出怀疑的样子，好象很相信我的话。

(十四) 中山先生临终以前

先生从广州到上海，由上海经过神户，由神户到天津，每到一处，不是招待记者，便是出席欢迎大会，或与各地知名人士会谈，尤其是与头山满、张作霖的谈话，所费时间更多。先生稍有余暇也不休息，还要读报纸，由于忙碌过度，在张作霖来访之后，便生起病来。那时请了一位德国医生替先生诊病，每天服药，注射，一连八九天都不见效。到了年底，先生为了急于与段祺瑞、张作霖等各人会商召开国民会议问题，不顾身体健康，扶病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先生到北京之后，病势加重。当时大家商议，拟送先生到俄国医院就医。先生以俄国医院设在东交民巷，不愿进去，因此仍在北京饭店，每天都请德国医生来看病。过了十多天，先生病势有增无减，转到协和医院就医，孙夫人同往，又请中医施今墨诊治，也没有见效。过了半个月，进行割治。在施手术时，只限四人进入手术室，这四人是鲍罗廷、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我在门外听到先生说：“不怕痛，开刀吧！”开刀后发现肝脏遍布白点，鲍罗廷主张把白点割去，医生不同意，仍把伤口缝合。经过开刀之后，夫人看到先生的病势实在危险了，不住地流泪，问医生先生需要经过几小时才醒。医生说要二十五小时。我在手术室外用小凳坐着，等候先生回醒过来。医院的看护不允许，只得站在门外守候了一天一夜。先生醒了以后，刚好马超俊到来，我请他暂时守卫，自己回去吃饭、

洗澡，稍事休息。天刚亮，我又急急到来，和马超俊等轮流站着守卫。李石曾煎了几次人参汤给先生喝。过了十天，先生问医生：“我究竟患了什么病？几时才可以痊愈？我也懂得医学的。”医生答：“请孙博士写遗嘱吧！”各人听了医生的话，觉得先生的病已危在旦夕，于是用电话通知孔祥熙、孙科等速来医院，又请俄国医生再来诊断。各人到了之后，决定用十字车送先生至行辕，由孙夫人、俄国医生、协和医院护士和我四人护送。下车时，因先生伤口未愈，不能过于震动，遂由我用双手把先生托起，慢慢地从车上送至床上。护士整理床上洁具，交我洗涤。我见先生排出的粪便其色甚黑。张静江看见了问我，先生每日吃的是什么？我告知他先生每日只吃牛肉汁，都是由我到协和医院取回来的。有一次，先生要吃葡萄，但这时葡萄甚少，我乘着汽车几乎找遍了北京城，才买了一些回来，先生只吃了二三枚，就不愿再吃了。何香凝每天都来慰问孙夫人。过了三天，夫人对我说：“先生命你进去。”我遂到先生床前站立。先生说：“我双足麻痹得很，抱我起来坐坐！”我说：“先生伤口未愈，不可起来啊！”说着就傍着床沿跪下，把先生的左足放在肩上，慢慢地按摩。按摩了一些时，先生睡着了，我又替先生按摩右足。天将亮了，先生醒来，对夫人说：“我一定要死了，马湘一生跟随我，必须养他过世，教育他的子女到大学毕业。”再过了三天，到了三月十一日的晚上，我又进到先生卧室，这时先生、夫人和护士都睡着了。到夜深三时，先生醒来，呻吟不绝，并且不断地喊着：“同志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我看见先生这样痛苦，于是叫醒了夫人，又把人参汤给先生喝。到翌日早上六时，汪精卫来看视先生的病，握着先生的手说：“先生！我是精卫。”接着何香凝、宋子文和俄国医生都进来了，宋子文请俄国医生用安眠药给先生吃，

让先生好快些死。我听说大怒道：“你要用安眠药药死先生，我先打死你！”宋子文就不敢再说了。这时客厅里徐绍楨、李石曾、马超俊、张静江等很多人在座，段祺瑞也派许世英代表前来问病。许世英来至先生卧室门外，行最敬礼后恭敬地说：“大总统！段执政即要来见。”先生就在这时候死了！孙夫人见先生已死，痛不欲生，何香凝等一直不离左右，扶持劝慰。先生在病中已几十天没有理发，我遂将理发匠林耀光请来，替先生遗体理发。林畏缩不前，我向他解释说：“你跟随先生担任理发，时间已不少了，接触也惯了，又不是陌生的人，为什么生时不怕，死了就怕起来呢？待我用棉被靠着他的背部，用手扶着他的头部，你来动手吧！”他起初还是很勉强地操作，但后来也就不怕了。夫人将剪下的头发用玻璃盒保存起来留作纪念。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 的革命活动

李 书 城

(一) 武昌起义以前

一九〇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三十多人，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速成师范，定期八个月毕业，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黄克强先生和我分别从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被派出国。在武昌出发时，我才认识黄先生。从三书院派出的同学，还有李熙、卢弼、金华祝、李步青、周维桢、张继煦、冯开藩、余德元、万声扬、王式玉等。到东京后，同班上课的还有浙江学生周树人（鲁迅）、汤炳（尔和）、许寿裳、寿昌田等十余人。弘文学院院长由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兼任，教师都是日人，梁启超的弟子范源涛任翻译。那时，梁启超正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中附和者不少，弘文学院学生亦多对梁启超表示崇敬。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戴翼攀、刘成禺、程家桢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曾在孙中山先生居住日本时，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

州及十日记》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我们回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以来，遭受外国人的侵侮日甚一日，将有亡国灭种的惨祸，这都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抑压汉族民气所致的。我们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

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他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他与湖南学生陈天华、杨笃生等共同创办了《游学译编》。这个刊物同留日的浙江学生出版的《浙江潮》、江苏学生出版的《江苏》、湖北学生出版的《湖北学生界》，都是宣扬革命理论的刊物。同时，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杨笃生所著《新湖南》以及各省留学生所著宣传革命的其他各种小册子，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因而曾引起查禁报刊、停止留学生官费的一场风波。黄先生与万声扬、李步青、金华祝和我毕业回鄂时，大为梁鼎芬所不满（梁在当时是张之洞所最宠信的红人，执掌湖北教育大权）。他对我们四人大加申斥，不派职务。于是李步青、金华祝分别赴天津、江西从事教学，暗中宣传革命。万声扬赴上海开办昌明公司，表面上是经营普通书店业务，暗中发售革命书籍，

并为国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机关。黄先生回湖南，同教育家胡子靖办明德学堂，培养革命青年，同时创办华兴会，准备起义。我在武昌闲住数月后，得东京同学资助，再赴日本，作自费生留学。当日俄战事爆发，东京留学生组织义勇军时，我曾参加，受过军事训练。我深感革命须靠武力，希望进日本陆军学校，但陆军学校不收自费生，须由清廷驻日公使保送，而驻日公使保送须由清政府或各省督抚造送名册。恰巧浙江抚台保送名册中，有一永嘉县“丁人俊”的名额是预填的一个假名，准备留给革命同志顶替入校的。我就顶替了“丁人俊”名入振武学校，升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国第五期士官生。

一九〇五年，黄先生在湖南起义失败，潜赴上海，再到东京。适孙中山先生也来东京，他们会面之后，认为各方革命团体须统一组织起来，才能步调一致，力量雄厚，遂结合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纲。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满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才宣誓入党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他们的党纲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所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建立民国”时，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讲解“平均地权”时，是举德国在青岛所订地价税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

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湖北共进会的誓词与同盟会的誓词相同，但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意谓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在南北议和时，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以为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以为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算是开始“建立民国”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抱着这种看法。

孙中山先生不常在日本，自日政府禁止孙先生入境以后，同盟会总理职务即由黄先生代理。黄先生是留日学生，又长住日本，因此，国内外同盟会会员多与他直接商讨问题或通信联络，他和同志间的感情也就深厚起来。特别是黄先生与军人的关系，由于有一段特殊原因而更加密切。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我所能记忆的：第四期有张世膺、周承蒞、张承礼、蒋作宾、吴鍾谔、金永炎、覃师范、王家驹、高佐国、吴经明、何澄、刘一清、刘毅、翁之谷、成桃、史久光、周斌、刘维焘、曾继梧、刘绳武、邓质仪等；第五期有王孝缜、黄恺元、何成濬、陈乾、李浚、陈之驥、姜登选、李书城、袁华选、全恕、石陶钧、王凯成、吴和宣、殷承瓛、杨源濬、朱先志、齐琳、高筭等；第六期有居扶一、李兆祥、王兆祥、刘祖武、孙燊、吴藻华、陈强、欧阳武、张华辅、赵复祥、李根源、林爽、尹昌衡、胡万泰、刘存厚、卢启泰、刘宗纪、胡学伸、官其彬、黄国梁、刘汝赞、罗佩金、阎锡山、孔庚、李鸿祥、叶荃、杨曾蔚、李敏、高声震、仇亮、朱树藩、姚以价、程子楷、张

开儒、纪堪颐、李乾璜、耿颢文、张凤翥、黄毓成、顾品珍、朱绶光、温寿泉、唐蟒、唐继尧、董锡梁、孙方瑜、赵恒惕、田遇东、李烈钧、程潜、刘洪基、华世中等；此外还有陆军测量学校的黄郛、曾昭文等。其余的人记忆不起了。

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织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据我了解，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颢文、李乾璜、仇亮、杨曾蔚、陈强、孙槩、高弢、杨源濬、殷承瓚、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黄先生还鼓励家有资财的同志出货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团员中黄恺元用银一万两捐得道台，陈之骥用银六千两捐得郎中。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先生在日本同孙中山先生组织了同盟会，又将同盟会中的陆军学生组织成更严密的丈夫团以后，乃秘密回内地，亲率革命同志，在广西的钦、廉、镇南关（今睦南关）和云南的河口等处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最后，他在广州集合各省最坚贞勇敢的同盟会会员八百多人，组织敢死队，于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旧历

三月二十九日)攻打督署,结果又失败了。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壮烈牺牲的精神震动了全国。

(二) 在武汉前线

黄克强先生在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曾经考虑过全国的形势,在起义地点方面,他主张“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载《辛亥八月十四日黄致冯函》)

是年,宋教仁、谭人凤(石屏)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加强长江各省的革命运动。谭人凤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早有联系。黄先生曾寄给谭人凤一首诗,极力主张在长江上下游特别是在武汉起义。诗云:

怀维不遇粤途穷,	露步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雄戈指日,	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	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年频败北,	马前趋拜敢称雄。

一九一一年旧历七月,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召开会议,策划武装起义,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迎黄先生来鄂主持。黄先生从香港复电说,须俟九月初(旧历)约十一省同时起义。不意孙武在汉口因炸弹失慎爆炸,武昌革命秘密机关被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被捕就义。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十月十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晚九时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澂、统

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树起十八星旗，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

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又能支持战争达数月之久，是因为当时武昌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二十多年，提倡新政，改良教育，设汉阳兵工、钢药两厂及武昌纱、麻四局，并设银元、铜元局。他又成立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所招士兵必须识字，后且命题考试，衡文以定去取。兵士入伍以后，还有机会考入陆军特别学堂、将弁学堂，提升为官佐，或派赴日本学陆军。如蓝天蔚、襄秉钧、石星川、成炳荣、蔡绍忠、杜锡钧等都是从士兵中提拔出来派送出洋的。再则当时还有一批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志士如张难先、李六如、蒋翊武、刘静庵、江炳灵等，为了便于联结兵士，运动革命，都投身行伍，在新军中散布革命种子，他们成为组织革命团体的中坚人物。从一九〇二、一九〇三两年以后，湖北废除科举，兴办了不少学堂。如陆军测绘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小学堂，普通中学堂，工业、农业、商业、矿业、铁路、方言、理化、省师范、道师范等学堂，武昌五路小学堂，以及教会所办的博文、文学两中学和文华大学等，总计武汉三镇的学生约有一、二万人，从这些学生中派往东西洋留学的先后也不下数百人，自费到日本留学的人数更多。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怵心惊。其中接受孙中山先生政治主张的人，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在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除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书秘密输入湖北之外，并且在东京出版《湖北学生界》，枝江张继煦、汉川李熙、潜江李书城等复在东京撰印《致湖北同学书》，皆用激烈的言辞鼓动革命。湖北的学界、军界受到这些革命书刊的影响，大为振奋。湖北留日学生并捐购

幻灯机片运至武汉放映，观者甚众。留日归国学生如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常于放映幻灯时，讲演国内外形势，宣传世界各民族反抗压迫进行革命的情形，对于激发爱国思想，亦收效不小。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武昌革命潜力甚大，经过数年的酝酿，在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组织统一革命机构以后，革命势力在军队中更加强大起来，遇到机会成熟，便即爆发。起义以后，武昌、汉阳两处存储的枪枝、弹药，足供几万兵士之用。武昌藩库存银及银元局、铜元局、官钱局所存硬币及台票，合计约有四千多万元。兵械充足，物力丰盈，由此可见一斑。而团结一致、有纪律有训练的士兵，亦不下五千人。武昌起义就是在这样人力、物力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动起来并取得初步胜利的。

武昌起义半个月后，黄先生于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的掩护下，扮作医疗队队员，偕同夫人徐宗汉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从上海乘江轮上驶，于二十八日到达汉口。黎元洪都督派兵一队从武昌江岸迎至都督府。黄先生听说汉口战事紧急，立即赴汉口担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各军士见黄先生亲来指挥作战，士气大振。

先是，汉口民军总指挥何锡藩受伤，以张景良继任。旋张景良因通敌正法，又以姜明经继任。姜明经又因战事失利，避匿不出（张、姜两人均系起义前的中级军官，未参加革命团体），战线上无人指挥，士兵各自为战，仅能守住现有阵地。作战十余日来，军民死伤已有数千人，大智门、刘家花园、外沿铁路、华洋街、水坛、硚口等处均先后失守。黄先生重新部署以后，连日反攻，夺回了几处阵地，但每到夜间辄不能固守。士兵依靠市街房屋作掩蔽，射击来攻敌兵，敌亦不敢进逼。因此，敌人乃纵火焚烧市

街房屋，使我军无藏身之所。到十一月二日全市大火，我军难以立足，遂全部向武昌撤退。黄先生回到武昌，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他在报告中分析汉口战事失利原因有五：一、各队新兵太多，未受过训练，难以指挥。二、军官多从弁目提升，指挥能力太差。三、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兵均甚疲劳，一闻敌方机关枪声，即纷纷后退。四、兵士是在武汉附近招募来的，夜间多私自回家，战斗员减少了多少，军官亦无法查实。五、我军只有步枪而无机关枪，且只有山炮，亦不能抵御敌方的管退炮，因此较敌人的损失为重。但黄先生又指出，我军有一优点为敌人所不及，即我军冲锋时异常勇猛，敌人虽系北洋久经训练的军队，每遇我军喊杀时即后退；我军所恃者全靠这一点猛劲。

这时接到汉口报告说，在汉口作战的第三协协统林翼支已于十一月一日晚间离汉潜逃（初逃襄阳，又匿随州，后被枪决）。以后又接汉阳报告，负责防守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擅率所部向湖南撤走（宋退至湖南，由黎元洪电请湘督谭延闿逮捕正法）。会议当即一致决定：先在汉阳防守，俟湖南援军开到后再反攻汉口。

我是从北京经上海乘江轮于十一月二日到汉口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我即随同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到保定，计划举兵响应。忽接军咨府大臣载涛的电令，命我即日回京。我原是军咨府的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即遵令回京。载涛命我同科员黄郭赴南方与革命党人商议罢兵言和办法。我与黄郭即日携眷出京，从天津乘海轮赴沪。到沪后，黄郭留沪帮助陈其美攻取上海，我则乘江轮赴汉。十一月二日船抵汉口时，我见全市火光熊熊，烟雾弥天，枪声已息。即换渡轮到武昌江岸，岸上有一队学生军来迎。到都督府后，会见黎元洪、黄先生及首义各同志，并参加当日举

行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黄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我为参谋长。

十一月三日晨，黎元洪命各部队派代表到阅马厂广场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借以鼓励士气。授印时，黎元洪、黄先生都有演说，士气大振。是日，即将总司令部人员组织完成。以吴兆麟为副参谋长（吴原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未参加革命团体，八月十九日夜闻起义士兵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时，推他为临时总指挥，由他下令攻打督署。他曾向张之洞所聘请的日本铸方大佐学过参谋学，以富有军事学识著称），姚金镛、金兆龙、高尚志、甘熙绩、耿丹、辜仁发、吴兆鲤、余鸿勋等为参谋，田桐为秘书长，王安澜为兵站司令。以后王季缜从北方来鄂，任为副官长。原在武昌起义的湖北及外省学生共同组织的学生军，由刘绳武为标统，田化龙、赵士龙、余子祥为管带，共约三百余人，调归总司令部直接指挥。是晚，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同赴汉阳，在伯牙台设总司令部，嗣因敌方枪弹能射至院中，次晨移往昭忠祠。

四日晨，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登龟山顶观测汉口敌方阵地。敌方大炮向龟山射击，炮弹都落入龟山后方的江中，无人受伤。寻沿河边防线视察一周，决定利用汉阳兵工厂、钢药厂的铁板、木材，沿汉水南岸构筑防御工事。因部队都系新兵，须受训练，不令担任此项任务，另由各部队招募民工，按日付给工资，由官长督修。当汉口大火以后，火烬多日未熄，敌人亦不能踏过火场来攻汉阳。因此，两岸枪声沉寂，我方沿河岸每日虽有数百人修筑工事，敌军亦未来扰，工事得以顺利修成。工事修成后，我方即向敌方进行宣传，夸说防御工事如何坚固，形容得好似铜墙铁壁一样，借以使敌人有所畏惧，以延缓其进攻企图，并掩饰我方援军未到、汉阳守军

空虚的弱点。

黄先生初到汉阳时，只有蒋肇鉴协统的步兵第一协守在兵工厂附近。第一协协统原是宋锡全，他把部队带赴湖南后，黎都督派蒋肇鉴继任第一协协统，其时只剩一营兵士，蒋接任协统后才陆续补充。其他调到汉阳的部队，有张廷辅所率的步兵第四协、熊秉坤所率的步兵第五协、胡效騫所率的步兵第四标。十一月六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与我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未加入同盟会）率所部开到汉阳。九日，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率所部徒手兵开至武昌，领取枪支后也开到汉阳。湘军两协士兵开到汉阳后，在汉阳防守的士兵都大为兴奋，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了。

从各方来汉阳参加作战的，有留日陆军同学曾继梧、程潜、程子楷、唐蟒、曾昭文、王孝缜等，他们曾在汉阳前线或后方分别担任各项临时的或固定的工作。有从南京陆军中、小学来鄂的学生蒋光鼐、李章达、陈铭枢、陈果夫等数十人，由队长张我权、副队长徐源泉带到汉阳，作为总司令部的督队员。有一日本军人大原大尉亲来汉阳向总司令部投效。他每日在汉口探防敌情来汉阳向我军报告，但十一月十七日以后即未见其再来，后来听说，他于是日我军进攻汉口时牺牲了。

上海光复以后，当地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推庄蕴宽来鄂，为组织统一革命机构事向黄先生和黎元洪征询意见。我以前在广西作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兼陆军小学堂监督时，庄蕴宽是广西督练公所督办，我在广西的一切革命活动他都知道，也是暗中维护我的。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开明官吏，因邀约了一群革命同志到广西作革命活动，被广西巡抚张鸣岐胁迫而离开广西的。他告诉我来鄂的真意，是请黄先生到上海去。他说，上海方面的人认为

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党领袖，而孙中山先生还在海外未回，现在只有黄先生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他敦促黄先生早赴上海。但是黄先生对他说：“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我现在还担任武汉方面的作战任务，不能离开武汉。看以后情形如何再说。”

袁世凯曾派鄂人刘承恩来见黎元洪与黄先生，表示愿意停战言和。黎元洪和黄先生曾分别函复袁世凯。黄先生函中略云：“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黎元洪复函中的措词亦大致相同。是时，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

吴禄贞于十一月六日夜在石家庄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后，革命同志对清廷更加愤恨，发誓出师北伐，以雪此恨。甘兴典率所部湘军开到汉阳后，几乎每日到总司令部来催促下令反攻汉口，并说他的部队都愿意上前线杀敌，不愿缩在壕沟内消磨锐气。当时又探得汉口敌军日益增多，与其待敌军兵力充实后向我来攻，不如我乘其兵力尚未充实时先发动进攻。总司令部提出这个意见后，得到都督府的同意，遂作进攻汉口的准备。从武昌运来的枪弹每个

士兵都领到四百发左右,可供几天战斗之用。架桥材料也运到渡河地点。一切进攻准备就绪后,黄先生于十一月十六日下令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第一路由步兵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逸青率所部乘装甲小火轮及民船由汉阳东北岸出发,向汉口龙王庙强行登陆,占据阵地后相机进攻。第三路由驻在汉阳的各部队组成,归黄先生直接指挥,是此次进攻汉口的主力军。这一路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所部为右翼,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所部为左翼,鄂军步兵第四协协统熊秉坤所部为总预备队。其余炮兵第一标及工程第一营均随同前进。黄先生命令第三路各部队在十六日黄昏后开始行动,从琴断口渡过浮桥,向指定地点集合,进入阵地,准备次晨拂晓向汉口玉带门及硃口一带之敌进攻。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于是晚十时许渡过琴断口浮桥。时正遇大雨,天黑不辨路径。先渡桥的部队把桥头一间草屋点火燃烧,作为照明之用。黄先生知道后,立即找到房主,给予房屋赔偿费。再往前进时,不见甘兴典部队的踪迹,甚为惊讶。不久,发现该部都藏在民房内避雨,或蹲或卧,拥作一团,每个士兵的背上都负着一捆稻草当作雨衣,状似一群难民。我看见这种情形,实出意料之外。我对黄先生说:“我们的作战命令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兵士的素质。这些士兵遇雨即如此狼狈,对战线上打来的弹雨怎能抵挡得住呢?现在还未接到第一路、第二路出发的报告,是不是同这里情形一样,深为可虑。预料敌人现在还未发觉我军的动作,可否改变计划,先把部队整理一番后再行进攻?”时陆军同学唐麟在侧说:“革命军人有进无退,退则沮丧士气。”黄先生叫我们先把藏在民房的兵士喊出来,再看情况。于是总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督战员都到各民房把

兵士一一叫了出来,要他们赶快到指定的阵地上去。将近天晓时,这些士兵都被喊出来走上阵地了。学生军最勇敢,首先向前开了火。随着,左右两翼部队都向前推进,形势似很有利。不料中午以后,敌人运到了机关枪和大炮,向我军猛烈发射。甘兴典的士兵有几个受了伤,向后退却。甘兴典也骑着马向后奔跑,以至引起他的部队全部溃退。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及督战队持刀拦阻兵士后退,并砍伤了几个后退的士兵。但溃兵汹涌而至,竟要向拦阻后退的人开枪射击。不得已,只好让他们后退。他们在后退途中,有些士兵被敌军打到我阵地后方的炮弹炸伤了,于是又惊慌起来,拼命抢渡浮桥。因人多桥断,溺水死者达数百人。幸王隆中所部湘军是从新军扩编成协的,受过训练的兵士较多,他们在阵地坚守至日暮,才撤回汉阳。熊秉坤所部鄂军虽被敌包围,尚能且战且退,全部渡河,回到防地。我军退却时,敌人并未追击。他们探知我军已全部撤退后,才开至河岸,与我军隔河相持。我与黄先生在将到日暮时,踏着泥泞道路后退。黄先生身体肥硕,行路很吃力,由人扶持步行。我由广西干部学堂湖南学生首斌沿路搀扶,一步一滑,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汉阳。是晚,下令汉阳各部队彻夜警戒,作战斗准备。

次晨,知甘兴典并未退回原防,竟率所部向湖南逃走。同时得知第一路军亦未按照原定命令从青山渡江向刘家庙进攻,原因是协统成炳荣是日酒醉,下错命令,竟命军队向与青山相反的方向开动,及至发现错误,再叫士兵向青山开进时,兵士因行军半夜已极疲劳,又值天雨路滑,都不肯遵令行动,故第一路军未能按照命令执行进攻任务。第二路军因标统杨选青适于是晚在家结婚,未亲往指挥,故亦未遵令从汉阳东北岸向汉口龙王庙进攻。黄先生将

以上情形报告黎元洪后，黎即将成炳荣撤职，改以蹇秉钧继任步兵第三协协统，将杨逸青正法，并电请湖南都督谭廷闿于甘兴典到达长沙时立予正法，将其部队缴械遣散。

这次进攻汉口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所致。从战略上说，我军若不进攻汉口，敌人是不敢轻于进攻汉阳的。因为汉阳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并且作了些夸大的宣传，使敌军望而生畏。且敌我两军隔河对峙，船只都靠在我方河岸，敌若渡河攻坚，地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我若坚守汉阳，可争取时间，得到更多省份的响应和所派援军的支援。如果这样，汉阳是尽可不失的。从战术上说，我不懂得兵士是作战的基础，未查明军官和兵士的训练程度，只照书本上的作战公式下命令，结果三路进攻的负责军官一个被撤职，两个被处死。士兵不仅在战场上死伤了很多，而且在退却途中并无敌军追击，落水而死的亦竟达数百人之多。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进攻汉口的失败，又引起了汉阳的失守。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

十一月十七日进攻汉口既未获得胜利，兵员、武器、弹药却损失不少。甘兴典既率部逃回湖南，他原来守的防线不免薄弱，从而不得不加重了王隆中部队的负担。这支部队能战能守，但经多日的拉锯战，兵员损失也不少。特别是连日继续作战，不能休息，兵士疲劳过度也是事实。王隆中竟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率领他的部队擅离汉阳，退到武昌两湖书院，说要在武昌休息几日再赴汉阳作战。我

奉黄先生命，到武昌劝他开回汉阳。但他对我说，兵士实在太疲劳，不休息几日不能作战。我商请黎元洪允给该部五十万元犒金，只要该部开回汉阳。他还是执意不肯开回，竟至向我下跪。我未能说服他，只得回去报告黄先生。黄先生也无法可想，只是和我共同叹息而已。

十一月二十五日，湘军协统刘玉堂率所部千余人来汉阳增援。刘系山东人，身干魁梧，性情豪爽，旧式巡防营出身。他初见黄先生时，即问前线情形如何，并表示愿率所部到紧急的前线去作战。黄先生命他到花园前线抵御从仙女山来攻的敌军。他率所部到达阵地后，数次向前冲锋，因敌军用机关枪扫射，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刘不幸中弹阵亡，所部兵士纷纷后退。在花园山、扁担山防守的鄂军均在黄昏后全部退却，日间所守阵地都被敌人占领。总司令发出的当晚作战命令都已无人接受，传令兵只好带回，交还总司令部。我们发现总司令部所在地已成为最前线了，乃将驻在后方的辎重营调到前线来作总司令部卫队，并在学生军中征集敢死队员百余人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防。

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已危在旦夕，实难再守。我与黄先生商议，将战况报告黎元洪，请早将兵工厂机器、存储汉阳的弹药、粮秣以及一切军用物资撤回武昌，以免资敌。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到武昌向都督府报告以上军情，当即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大家都赞成作有准备的撤退。惟都督府副参谋长杨玺章慷慨陈辞，主张坚守汉阳，虽至一兵一卒亦不放弃。于是杨玺章自告奋勇，组织参谋部同志十余人赴汉阳助战。我因连日疲劳已甚，向黎元洪请假休息一天，当晚宿在都督府秘书万声扬家中，睡至次日午后才醒。醒后，惊闻杨玺章已于是日午前在汉阳阵

亡，汉阳守兵正在向武昌撤退，退兵在渡江时伤亡不少。晚间，黄先生退到武昌，向黎元洪报告失利情形后，即率一部学生军同徐宗汉夫人、张竹君女士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乘江轮赴沪。

黄先生离汉时，我未赶上，次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始偕同汤化龙、万声扬、胡瑞霖、陈登山、黄中垔等乘江轮赴沪。我在这四天的航行途中，除饮食外总是沉沉酣睡，因在汉阳二十多天的紧张繁忙的生活使我疲劳已极，这时得到休息，真觉睡眠是人生最舒适的享受了。

我们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开会。汤化龙和万声扬提议：我们离开武昌时未向都督府请假，应该发一电报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个争强好辩的人，他道：“电文措辞不要表示道歉，应该指摘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各种歧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黄中垔也赞成胡瑞霖的意见，说这是说真话。电文由胡瑞霖起草发出。以后武昌方面对汤化龙竭力排斥，其原因即在于此。

（三） 南京临时政府和留守府时期

十二月二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四日，公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各省代表复于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先生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黄先生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

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们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这一晚的谈话，使我深深印在脑海，永不磨灭。我看他以后处理一切事、对待一切人，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到达上海。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议决中华民国纪年改用阳历，以旧历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孙先生即在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最初，各省代表曾欲仿法国制度，设总理一职，并拟选黄先生为总理。后因孙先生主张采用美国制度，不设总理，此议始作罢。孙先生向参议院提出黄先生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得同意后，黄先生即赴南京组织陆、参两部。黄先生本预定以我为陆军次长。当我正在上海南海会馆陆军招待所同北京陆军部、军谘府南来的同学商量南京陆军部各司局人选的时候，湖北陆军革命小团体中最年长的同志陈裕时要我把陆军次长让给北京陆军部的科长蒋作宾，因为蒋为人一团和气，又曾当过科长，在南来的陆军同学中他的官阶最高，他当了次长，则部内的各司局人选由他安排就比较容易，免得我作次长时引起同学的地位争执，不好处理。我接受了陈裕时的建议，即请

黄先生任蒋作宾为陆军部次长(蒋以后从南京陆军部转到北京陆军部,受到段祺瑞、徐树铮的种种轻侮,他都能忍受;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他入总统府作黎的幕僚,又经常与专横的段、徐二人打交道,他确是很有耐性的)。参谋部次长是钮永建,他在江、浙军界中是相当有威信的。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汤、林两人在上海当过黄先生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文电都是他两人草拟的。后来湖北方面因衔恨汤化龙曾在上海电责武昌首义人士,特电致南京反对他任陆军部秘书长。汤乃离宁赴沪。林长民在南京街头上曾受到老同盟会会员的当面讽刺,说他从前反对革命,现在又混进革命队伍来了。他因此也辞职赴沪。他们两人后来成立民主党,与国民党为敌。

某日,安徽军军长柏文蔚来陆军部领开拔费,说奉孙大总统手令,要他的军队即日开赴江北布防。黄先生因陆、参两部都不知道有此命令,遂与我商议,由我到总统府任军事秘书,以便与陆、参两部联系。我到总统府后,又请孙总统加派耿寰文为军事秘书。以后总统府发出的有关军事文件,都是由我二人草拟的。

那时总统府的秘书长是胡汉民。秘书中有吴玉章、任鸿隽、王夏、张通典、谭熙鸿及宋霭龄等。

当时黄先生所担心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并且需用甚急。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正在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日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但今日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

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黄先生出来后，默默无言，心中似乎很着急的样子。以后他即未再向孙先生询问借款事，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时，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在向外国借款的问题上，孙先生比较乐观，而黄先生则认为外国政府如果攫取不到中国的特权，是不肯借款给我们的。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海外的友人大率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经过黄先生这番说服，同志们对孙先生的责难也就平息了。

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扫除了中国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这种制服以后称为中山服，流行至今。孙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很平民化。他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横幅赠给同志。孙先生以亲身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一种新时代的风气。黄先生对孙先生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继续停战，两方和议代表仍在上海

开会。袁世凯所希望于南方的，是要南方选他为第一任大总统。南方所希望于袁世凯的，是要他促使清帝退位，改专制为共和。两方代表对此都早有默契。谈判中间曾有过几次波折：一是南方已许举袁为大总统，而又选出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就职，致引起袁之怀疑，认为南方无诚意，会议曾因而一度停顿，经解释后仍继续开议。一是清廷有些顽固派阻挠清帝退位，袁乃故意使和议停顿一下，同时授意段祺瑞等四十二个将领联名拍电威胁清廷，迫其就范。清帝终于在民国元年二月十三日下诏退位。和议告成后，孙先生即向参议院辞去总统职。

在议和期间，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

这时，在北京出狱不久、在同盟会中素负盛名的汪精卫已到上海。汪早已同袁世凯及其子克定密商决定袁在北方推倒清室，他劝南方推戴袁为大总统。他曾派人到武汉告知黎元洪、黄先生和

武汉首义同志，他们均表赞同。这时汪既任南方议和代表，仍坚持他的主张，甚至不惜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他并邀约当时负社会重望的吴稚晖、李石曾等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他自己也故意力辞广东都督不就，以表示他个人的“清高”和“言行一致”。此外，光复会的领袖章太炎、陶成章等对孙先生因早有误会，也曾对孙先生大肆攻击。攻克南京有功的浙军司令朱瑞系保定军校学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这时已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拥袁上台。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堃、王芝祥等，本系清廷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以张謇为首的上海名流们曾替袁世凯划策，怂恿他推翻清室，并在上海起草清帝退位诏书，送交袁世凯用隆裕太后名义颁布。他们当然对袁有好感，也是不肯反袁的。同时，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温宗尧等既已切实允诺举袁为大总统，并且因此才换得一纸清帝退位诏书，他们当然也要实践诺言，不肯失信。还有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军的实力。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经验看来，想依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在国际方

面，那时袁世凯已同英政府暗中勾结，英政府随时可给他援助。其他各国也大都希望中国形成分裂的局面，以便于他们任意要挟宰割，他们自然绝不会愿意中国有一个新兴的、由进步的势力组成的统一政府，来抵抗他们的侵略。因此，凡是考虑过以上各种情势的人，都主张对袁让步，举袁为总统。曾在日本、欧美学过法政的同志如宋教仁、王宠惠等，主张用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力。当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随即修改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行动了。此外，参议院还通过了建都南京、要总统在南京就职的两个决议。但是这些纸上的决议都被袁世凯种种设辞和阴谋手段（如南方迎袁代表到京后诱使兵变）所撕碎了。袁世凯终于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窃取政权的野心。我们当时主张让袁世凯做第一任总统，当时的背景约如上述。关于这个历史问题的是非得失，从今天看来，应该怎样判断，应该如何吸取经验教训，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撤销以后，设立南京留守府，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宁的军队。黄先生被任命为留守府的留守，我为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良（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濬为总务处处长，耿颛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团长。黄先生经常在上海同各方面会商国事，他的留守职务由我代行。当时最感困难的问题是南京拥有十余万人的军队，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曾允俟到北京就财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军费到南京来，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给，虽经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不理。我曾用南京留守府总参议名义，公开指摘他的失信，他还是不理。我不得已，只得把

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了，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二十万元，暂维现状。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经过这次兵变，我才认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我当时曾想到，在兵多而无饷的情形下，黄先生与其担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作一个江苏省的都督，可以有丰富的财源，来训练几师精兵保卫国家。我正拟将此意写信到上海向黄先生建议，不料上海方面已推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我感觉到出路已穷，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负一天危险的责任。袁世凯一面迭次挽留黄先生，请黄先生不要辞职，一面又总不拨给军饷。这明明是袁世凯的毒计，要使黄先生堕入陷阱，身败名裂。我遂商请黄先生从速结束留守府。

在结束留守府以前，在南京驻扎的军队除江苏军队划归江苏都督管辖外，其余浙江、广东、湖南的军队分别调回原省，剩余的军队一律在南京遣散。但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师的枪支有两套，一套分发士兵，一套存储仓库备战时扩军之用。饷项归中央陆军部直接发给。师长陈之骥是直隶（今河北）省人，日本陆军士官第五期学生，同盟会内的丈夫团团员，为人忠实耿直，尚义气，重然诺，曾经捐过郎中，又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女婿。他被推为第八师师长，是陈裕时首先提出来的。陈裕时是一个多计谋、喜用策略的人。他那时从广西带来一支军队，编入第八师为一旅，他也被推为第八师的一个旅长。他认为陈之骥是

冯国璋的女婿，在北方有靠山，不会受袁世凯的抑压，将来还可大有发展。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推举陈之骥为师长。同时，推定两个旅长，除陈裕时之外，另一个旅长是从广西桂林带来一支军队的司令赵恒惕。王孝缜、黄恺元、何遂、陶德璠、刘建藩、张华辅、张厚琬等先后为团长，吴和宣为工兵营营长，袁华选为参谋长。其后，陈裕时辞职，赵恒惕也调到湖南，由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兼任旅长。我们当时只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得坚实健全，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应裁的军队就设法促其迅速裁遣，以便早日结束留守府。我看到有些师、旅长对裁遣军队进行不力，就订出一个限期裁遣、饷项包干的办法，即：先发一个月的全饷交师旅长掌握，过期不再发饷，从早遣散了士兵，所剩余的饷项也不上缴。这样，各师就不待催促，都尽先裁遣士兵，以便留有余款作官长回家的旅费。正当各师大力裁兵的时候，第八师的同志就急忙从他师被裁的士兵中，挑选精锐来补充自己的队伍。此事被各师发觉后，他们纷纷来留守府控告，指明第八师的团长何遂招收了遣散而尚未出城的士兵，要求处理。留守府知道裁遣各师而只保留一个第八师，这件事早为各师所不满，现在各师又把第八师违令招兵的事实来府控告，若处理不善，恐有碍裁兵的顺利进行。我遂忍痛将何遂同志撤职，以暂平各师的攻击，准备事后再令何复职。第八师不同意，要我收回成命。我坚持不肯，王孝缜同志还气冲冲地到留守府来要打我。我还是照原令执行了。裁兵完竣以后，留守府即取消了。

（四）宋案前后和癸丑讨袁

南京留守府取消以后，袁世凯即派同盟会会员张钫来沪邀请

黄先生赴京。是时孙中山先生已在京多日，与袁世凯商谈国事，尚称融洽。黄先生到京后亦参加会谈。袁世凯对孙、黄两先生不仅招待极为隆重，而且态度也表现得很谦恭，表示他一定要遵照孙、黄两先生的政见次第付诸实施。孙、黄两先生对袁世凯也表示信任。孙先生在袁世凯召宴的筵席上说：“让袁总统作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建设，把铁路线延长至二万里，民国即可富强”云云。袁又发表了八大政纲，谓系他与孙、黄、黎共同协商决定的。袁请孙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在上海设立办公室；请黄先生担任粤汉铁路督办。黄先生想早日建成南北交通干线，促进南方的建设事业，亦允担任。但黄先生离京后，派我同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铃商量职权问题时，朱坚持督办应受交通部管辖，一切用人行政事项均须向部请示批准。黄先生认为与原议不符，知袁世凯实无诚意，遂辞不就职，在上海闲居。湖南革命同志拟请黄先生回湘为都督，但黄先生因不肯取代谭延闿的职位，亦不同意。

黄先生离京时，曾与袁世凯商议，留我在北京作总统府军事处次长，以便联系。军事处总长是庸昌，我与他都无事可办，负实际责任的是参议唐在礼。所有关于军事机密事宜都是由段芝贵与参谋部次长代理总长的陈宦直接同袁世凯密商办理，连陆军总长段祺瑞也不令参与。袁世凯那时对待南方革命军人表面上极为优渥，凡来府谒见的，他都亲自接见，褒奖备至，离京时赠送珍贵礼物，并随时赏给文虎章或嘉禾章，以资笼络。袁对肯受收买的人更给以高官厚禄，使其甘心作他的爪牙，经常在各省内部捣乱，并把各省内情密报北京。

袁世凯侦知宋教仁联系南方各省，在国会议员中能获得多数选票，可能被选为内阁总理，乃与赵秉钧密谋，唆使奸人于一九一

三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车站向宋行刺。宋遇刺后于二十二日四时身死。宋案发生后，很快便发现这是袁世凯的阴谋。袁世凯本来照例每星期中总有一天约我同段芝贵、陈宦与他共餐，会谈南北双方情况的，但自宋案发生后有两星期没有约我聚餐。我心中怀疑他对我有所疑忌。恰巧一个素有神经病的同乡名叫刘端吾的来找我，向我说：“你不要怕，我今天已写信给袁大总统，说你是个好入，不要怀疑你有什么举动。”我听了他这番话，怕他这封信反而提醒了袁世凯对我有所行动。我为了免被袁世凯暗中监视或者暗害，即于是晚借送客上车为名，跳上京沪通车一直回到上海。未出京的军人同志仇亮和林述庆，以后都被袁杀害。我却因这个神经病者的一番话，得以幸免。

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都回电声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南京第八师的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说第八师兵士缺额尚多，以前归第八师指挥的林虎一个团已调往江西，湖南都督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又把该师陶德瑶的一个团由赵恒惕率领调回长沙。他们还责备我在留守府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又撤了一个团长，以致他们不得不把招兵计划延缓下来。因此，他们的结论也是：现在还不能出兵。我们回上海向孙、黄两先生报告南京情形后，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

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是时，上海法庭曾根据所得证据票传赵秉钧到案，赵拒不到庭。同时北京方面亦借口在京破获了国民党的暗杀机关，通知上海法庭转传黄先生到案。黄先生为了揭穿这个阴谋，便按时向上海法庭报到。袁阴谋终不得逞。

是时，袁世凯到处派人收买革命军人，广东驻沪代表覃肇钦已被袁世凯收买，态度暧昧，行踪诡秘，上海同志都对他特别警惕，袁世凯并派北京平政院院长庄蕴宽来沪探听我的意见。庄对我一向关怀，且知道我的性格，他不直接找我而托他的秘书问我愿不愿离开上海。他的秘书对我说：“袁总统托庄院长告诉你，如你愿意回京，不必再入总统府，可出任绥远都统。如你愿出洋。袁总统愿送你旅费八万元。这是袁总统的意思，托庄院长回沪之便向你转达的。”我说：“黄先生在沪一天，我绝不会离开此地。如宋案得到合法解决，我与黄先生也都不会长留在上海的。”

孙先生在那时还是主张出兵讨袁。他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还派陈其美、戴天仇（后改名戴传贤）来与黄先生辩论。黄先生仍然坚持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意见，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孙中山先生这时想亲自到日本寻求日政府的援助，但黄先生和在沪同志多不赞同此举。黄先生认为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而且袁世凯反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各国求援。

袁世凯在对南方的军事部署就绪、大借款成功以后，就下令把

广东、江西、安徽三省的都督免职。此时大家都感到保全实力、隐忍待时已不可能了。江西都督李烈钧离职赴沪后，又返湖口，于七月十二日宣布独立，树起讨袁旗帜。

南京第八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缙、黄恺元于七月十三日午后仓皇来沪，向黄先生密报说：朱卓文从上海携款二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并请孙先生莅临南京主持讨袁军事。但未受运动的营、连长向王、黄两人报告了这个消息，并主张先发制人，除掉这几个营、连长。他们两人认为第八师主张慎重，不轻于发动讨袁，是为了替本党保存实力，留在将来起更大的作用；现在若内部自相残杀，必至两败俱伤，第八师实力势将完全消灭。他们两人感到，与其自己消灭自己，不如一致对付敌人，虽实力不能保存，也算作了光荣的牺牲。因此，他们两人嘱咐告密的人把这个消息极端保密，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报告陈之骥师长，因陈是个性情耿直、胸无城府的人，恐怕他听了这个消息，暴跳起来，反误大事。他们两人在向黄先生报告了如上经过以后，就对黄先生说，现在事已至此，虽准备未充分，也得树起讨袁的旗帜，请黄先生赴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一致服从，但千万请孙先生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南京，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请孙先生去组织政府。

在商讨总司令部组织时，他们建议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人选可俟黄先生到南京后再行公推，只是声明不要钮永建、李书城两人担任。因为他们认为钮在广西督练公所作帮办时，遇事迟疑不决，顾虑太多，往往对重大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而李在留守府主持裁兵过激，曾撤过第八师一个团长的职，致使该师兵员至今还不足额，官兵对他有意见。黄先生见势已至此，遂应允他们的要求，决定次晨

赴宁。他随即往见孙中山先生，说他自己愿赴南京举兵讨袁，请孙先生在初举义旗时暂勿赴南京，俟创立一个局面后再请孙先生前往主持，并谓南京独立后，须有上海方面的兵力、财力的支援，请孙先生在沪督促陈其美赶快占领上海。孙先生同意后，黄先生乃囑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当夜赶回南京，布置起义。

七月十四日晨，黄先生装作赴南京游览的姿态偕同眷属乘沪宁火车到达南京。是晚即在李相府陈之骥住宅开军事会议，与会者有南京第一师师长章梓、第七师师长洪承点、第九师师长冷通、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等。会上决定出兵计划，各部分担任务如下：原驻江北的冷通第九师，加上从第八师编成的一个混成团（团长刘建藩），共同配备在蚌埠铁路沿线，抵御冯国璋南下的军队；章梓、洪承点两师布置在淮扬一带，防守长江要塞，阻止张勋部前进。黄先生于次晨（七月十五日）赴江苏都督府会晤程德全，请程通电各省宣布独立。程德全被迫应允，并推黄先生为讨袁军总司令。

当黄先生在江苏都督府会客厅候晤程德全、程尚未出见时，江苏都督府参谋长兼江苏第一师师长章梓突然宣布前第一师师长陈懋修、讲武堂副堂长蒲缙、要塞掩护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南京要塞司令吴绍璘等通敌，均予枪毙；尚有张一爵、张斯麟两人闻风先逃，未被捕获。据陈之骥告我说：被章所杀的那几个人，多是留日陆军学生，曾在徐绍桢统制下作过军官，因与章梓素积嫌怨，遂为所杀，并不是由黄先生或程德全的命令执行的，也不是由南京几个师长会商决定的。

程德全虽被迫宣布独立，但于七月十七日托故离宁，设办事处于上海，飭南京取消独立。南京宣布独立后，第八师组织一混成

团，由刘建藩指挥向江北进攻。在该团尚未到达前线与第九师会合时，第九师的前线指挥官迫不及待，首先单独发动进攻，与敌军交锋未久，即被击退，溃不成军，纷纷后退。刘建藩率所部进入阵地后，因人数不多，只能采取防御战术，坚守待援。与此同时，陈其美、钮永建攻取上海，亦告失败，敌军将从上海进逼南京，而溯口方面失利的消息又传到南京，南京将有三面受攻的危险。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见南京形势危迫，深恐黄先生悲愤自杀，日夜守在黄先生左右，并极力劝请黄先生离宁赴沪。黄先生离宁时，师长陈之骥赶来送行，知黄先生身无一文，临时找卫队长凑集了银币七十元送交黄先生作旅费。黄先生坐日本停在下关的运煤船，与黄恺元同赴上海。据陈之骥说，黄先生临行时曾嘱咐他要维持南京秩序，不要让残留在南京的兵士扰害商民。

南京取消独立以后，第八师将开往江北的部队绕道瓜洲调回南京，并将蚌埠桥梁炸毁，以阻止敌军南进。接着，何海鸣运动守卫都督府的第一师残部，又在南京宣布独立，自称讨袁军总司令，旋为第八师的部队逼令取消。第八师兵士受何海鸣部下的煽动，向官长索饷，鼓噪不已。代理团长李浚召集士兵训话，严加谴责。士兵即将他打死，纷纷四散。第八师的军官亦全部离宁，各自逃亡。南京第八师的实际领导权一向为旅长陈裕时所掌握。上海方面的革命党人认为第八师初则反对出兵讨袁，继则一遇战事失利，就在南京取消独立，这些都是陈裕时在暗中主持的，因而对陈啾恨甚深。他们已组织几个暗杀人员，拟俟陈由沪赴宁进入城门时将他杀死。此消息为他的妹夫何遂所探知，乃急电陈中途返沪，陈始倖免于难。又陈裕时为使第八师获得保障与发展，曾与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暗中有联系。在袁称帝时，陈裕时为表明自己的立场，曾约

请黄恺元赴长沙劝说汤芗铭，他自己也亲赴成都劝说陈宦，敦促汤、陈通电反袁，后黄恺元出家为僧，在杭州一小庵内修闭关法，因病圆寂。陈裕时亦在家学佛，参访汉、蒙、藏佛学大师，颇为虔诚，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死于重庆。

上海、南京讨袁军既相继失败，广东、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的讨袁军亦先后崩溃。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此次讨袁失败原因在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但当时各省将领起初所以不肯举兵，都是因为各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及早发动。举兵讨袁，也不一定就能取胜，因为成败关键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五)亡命日本以后

黄先生离宁所乘日本轮船未在沪停留，径直开往日本。他曾在船上写一密信告我说，他在吴淞口不能上岸，只得去日本。我还记得他信中有“这次上了当”一句话(大意如此)，不知意何所指，以后见面也未再询问究竟，至今还不明白。

南京、上海讨袁战事失利后，我还未打算离沪。有一天，我在上海电车上看见上海护军使的悬赏布告，写明缉拿黄兴、陈其美，各悬赏五万元，李书城、黄郛各二万元，且不论生死，一律给赏。我觉得不可再留在上海，遂同何成濬离沪赴日。

我们在神户上岸，在所住旅馆的旅客簿上填上假名，并向来访的警察打听黄先生的住址。警察未肯相告。我们忽接到一个自称是“同情”我们的日本人来信，说他有一件极机密的事要当面告知我们，请我们于某日某时乘某路电车到某站下来，他穿某种衣服在站迎接云云。我同何成濬照信中所述时间、地点前去。

果然有人在站迎接，把我们请到他家中。这个人向我们说，他愿意为中国政府效劳，刺杀黄兴，只要我们在中国驻日使馆取得一支手枪给他，他即实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看错了人，把我们当成袁世凯的爪牙了。我们同他敷衍几句，即回到旅馆，把当地警察找来，告知他这件事。警察听说，并不惊讶，谓可一笑置之。这时，他才把黄先生的住址告知我们，并陪同我们到黄先生那里去。

我们不久即同黄先生移住东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同志也陆续来到日本，大家交换意见，筹谋善后办法。这时，孙先生提出了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意见。他把本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并且认为黄先生应负更大的责任。孙先生说，在南北议和时期，他愤袁氏狡诈，曾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但黄先生不赞成；以后他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南来就职，黄先生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他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先生也不肯听；他欲再赴日本求援，黄先生又力阻其行；最后他本拟亲赴南京出师讨袁，黄先生忽自告奋勇，阻其前往，致招挫败，全局瓦解。孙先生既把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归之于党员不听话，尤其是黄先生不听话，所以他主张改弦更张，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且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写誓约，打指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服从孙先生的命令。陈其美、戴天仇、杨沧白首先赞成，并邀约在日亡命的同志都一致参加。但一般首义有功的同志，尤其是在首义时作过高级将领的同志，都认为这种写誓约、打指印的做法有失身份，不肯附和。孙先生仍然坚持一定要这样做。陈其美复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肆攻击。黄先生曾约请胡汉民、汪精卫两人设法婉劝孙先生改变这种做法。胡、汪两人说，他们最初曾

尽力劝阻过，但后来鉴于孙先生的意见异常坚决，为暂时照顾孙先生的情绪，他们两人都勉强按照孙先生规定的办法履行了入党手续，等候时机再设法进劝。黄先生以为长此在东京相持下去，恐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故决定离开日本，远适欧美，以便使孙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黄先生遂于一九一四年夏由日本乘轮先赴美国，并准备遇有机会再到欧洲游历。

同黄先生赴美的有其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秘书石陶钧和我。翻译唐月池则先期前去办理入境手续。我们到达美国旧金山时，唐月池与先在美国留学的黄先生长子一欧、女振华以及旧金山的许多侨胞都前来迎接。因时临夏季，在旧金山未住几日，即在旧金山北面的一个海岸避暑地住了一个多月，随即赴纽约小住。不久就在费城郊区租赁一所住宅定居下来。

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黄先生都被邀去作了访问。各地华侨同胞除开会欢迎外，并拟筹集款项送给黄先生作革命活动的经费。黄先生每到一处，除了说明旅外侨胞历来帮助革命，贡献很大，向他们表示感谢之外，并详述袁世凯背叛民国的事情，鼓励华侨继续奋斗，共同打倒袁世凯。他并嘱华侨同胞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寄东京交孙先生支配，声明他自己这次是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他每与侨胞谈及孙先生时，都表示很尊敬孙先生，从未讲及他自己与孙先生在党的改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因为他唯恐因此使侨胞热爱祖国的情绪受到影响。

黄先生旅美期间，欧战已发生，日本也接着对德宣战。聚集在东京的一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会员认为时局严重，相

约组织“欧事研究会”，经常商讨当前时局及应付的方针，并函告黄先生，征求黄先生的意见。

黄先生到美国后曾商请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这个刊物在当时对革命起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有些同志在东京创办了大森浩然庐和东京法政学校，专收亡命日本的同志学习军事和政治。殷汝驩主办浩然庐，彭允彝主办法政学校。两校的经费是由黄先生和李烈钧负担的。

黄先生在美听到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立即向国人表示，为了举国一致反对日本无理要求起见，即时停止反袁活动，以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护国权。国内外同志多响应黄先生的号召，作了同样的声明。后来袁世凯阴谋推翻共和、僭称帝号时，黄先生听到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加入筹安会，洪承点等签名赞成帝制的消息时，极为愤恨，骂他们是革命党中的败类，认为这是革命党人的耻辱。

黄先生在费城郊区住下以后，正拟从事美国国情的研究，并计划参观访问一些地方，以广见闻，不意在某晨起床以后吐血数升，经医生诊断为胃溃疡病，须妥速治疗，并作长期休养。为使黄先生能静心养病，我与石陶钧迁出黄先生住宅，另在附近各寄寓一家庭旅舍，一面学习英文，一面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石陶钧不久移居旧金山，寻又先行回国。我学到几句英语后，即坐火车从费城到旧金山，又从旧金山经美国南部绕道华盛顿回到费城，计往返时间约一月有余。

我在这一个多月的旅行期间，结识了一些美国友人，增长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对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触甚深。当我旅行归来，同黄先生谈到这

些问题时，黄先生说，我们回国后，一定要用政治力量来尽量防止这些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同时他也谈到了他对于将来建设中国新社会的理想。他说，将来中国要由政府开办养老院、慈幼院、卫生院、残废院，经费全由国家供给，不收费用。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由国家设立，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学生只要考试及格，即可入校读书，使穷苦人家的子弟也能受到教育，不让有钱的子弟占有特权。黄先生还时常谈到男女平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受孔教的影响，对女子压抑太甚，要矫正这个积习，应先让女子能与男子受到同等的教育，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权、选举权、劳动权，只有这样，所有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童养媳、孀妇不能改嫁等恶习才会自然消除。他还说，中国人口本多，如果占一半人口的妇女从沉睡中觉醒起来，同男子一样把力量贡献给国家，中国的富强就可以赶上欧美。他认为这是我们在回国后应该大家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袁世凯在打败国民党的讨袁军队后，更加肆无忌惮，公然帝制自为。黄先生在这时期，加紧与国内外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当全国讨袁声势重新高涨的时候，国内同志及一些日本朋友都电催黄先生早日回国。黄先生遂于一九一六年五月由美国乘轮回到日本。轮船甫进入神户港内，尚未靠岸，头山满、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即乘小轮迎接黄先生先行上岸，寻赴东京。日政府先已借给岑春煊^①二百万日元，以半数作军

^① 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两广反袁部队组织都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八日，组织军事院子肇庆，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兼抚军长事。

费，半数在日本购买军火，这时又提出借给黄先生五百万日元作为招集旧部编练军队之用，并无任何条件。黄先生嘱我到上海筹备。我到上海不几天，袁世凯就死了。于是黄先生回到上海，各地同志都来上海会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在国会恢复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如何在国会内进行斗争的策略问题。在此期间，黄先生与孙先生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

黄先生回国以后，病体并未恢复，又因应接繁忙，生活习惯骤然改变，以致胃溃疡旧病复发，又未能及时转地疗养，照常会客谈话，病情因而日趋严重。十月十日，黄先生因胃血管破裂，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延至三十一日午后竟溘然长逝，享年四十三岁。

黄先生的死耗传出后，国民党同志固然感到十分悲痛，即素与国民党敌对的政党或个人亦多函电致唁或在报章上著文表示悼念，并对黄先生一生待人诚恳、笃实厚重、效忠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称道不已。

黄先生临终以前，李根源向他辞行时，他曾对李根源说：黎元洪太懦弱，段祺瑞、徐树铮专为北洋派打算，恐怕全国统一无希望；对内搞不好，更谈不上对外了。并对李根源嘱咐几件事：一、胡瑛无志节，可恨可怜，闻他很穷，望念旧交，维持其生活；二、谭人凤修宋教仁墓尚未完工，应有人负责；三、李烈钧队伍快到饿饭地步，须请黎元洪妥筹办法；四、国会要注意立法，法立而后政治始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不可收拾。

黄先生死后，孙先生继续奋斗，经过一再遭受失败之后，终于一九二四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走上了新的道路。我常常这样想：黄先

生如不早死，能活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他也可能同孙先生一样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将成为帮助孙先生实行三大政策的一个好助手，对中国革命事业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忆先君克强先生

黄 一 欧

华 兴 会

一九〇三年夏秋之间，先君由日本回到了长沙，在明德学堂教书，暗中联络同志，酝酿组织一个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团体。

这年十一月四日（阴历九月十六日），是先君三十初度。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号希明，长沙人）家里，借为先君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菜，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彭渊恂、周震麟、张继、柳聘农、陈方度、徐佛苏、谭人凤、苏玄瑛、吴禄贞、陈天华、宋教仁、黄牧、柳继忠等二十多人。会上，决定设立华兴会，公举先君为会长。但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一百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当时还提出了两句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口号，骤然听起来，象是谈的生意经，实则含有“扑灭满清”的意思。这次集会，可以说是华兴会的一次筹备会。到了次年二月十五日，才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正

式召开成立大会。

华兴会成立后，先君又另外创立了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策动会党参加起义的机构；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机构，陈天华、姚宏业、陈方度、黄牧等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一九〇四年的出走

一九〇四年秋，先君谋于西太后“万寿”节在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化装改名逃走。关于这一段史实，言人人殊，其说不一。那次出事，我是在场目击者之一，印象最深，虽然隔了五十多年，记忆犹新。

那年，我随先君在明德学堂小学乙班读书，陈果夫时名祖焘，与我同班。当时明德学堂师范班设在湘春街左宗棠祠，中、小学设在西园周氏花园。我家则赁居紫东园，离左宗棠祠仅二三百步。阴历九月十六日，为先君三十周岁。这天，他亲自下寒菌面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妈。大约是早上七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多钟头，龙研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说，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继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马上去，回来再吃面不迟。

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来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吗？”（先君原名轸，字廛午，后改字克强。）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

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宗棠祠走。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役们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门口久候不见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只得将三个轿夫带走，把他们打得皮破血流。记得在一九一二年，曾有其中一个罗姓轿夫的家属来过我家，先继祖母还送过他一笔钱。

我原来是在学堂里住宿的，那天因是先君生日，头一天晚上就回家了。我看到先君出门就碰到差役来捉他，心里惊慌万分，便飞跑到学堂里，告诉平日最接近的沈迪民老师。沈老师叫我待在他房里不要出去，他自己急忙走了出去，找人设法让先君脱险。

先君先由明德学堂躲到西园龙宅内室，以后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黄吉亭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先君化装海关人员，由黄吉亭、曹亚伯护送，乘一小船至靖港，搭轮船赴汉口转往上海。从圣公会临走前，黄吉亭嘱先君到达上海后来一电报，俾使此间友好知道他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并为了保密起见，约定电报只署一“兴”字。先君到上海后，如约打了一个“兴”字电报给黄吉亭。从此以后，他就改名“黄兴”了。

习 射 击

先君于一九〇四年起义失败出走后，有株连全家的危险。因此，一九〇五年秋天，我便同湘潭黄积成（后在士官学校习测量）一道去日本。到日本时，正是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先君已往南洋去了。次年秋天，先君自南洋回到东京，住在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记得初到林馆的时候，先君就要我到相距不远的麹町区靖国

神社去参观（那里陈列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所夺得的战利品）。先君说：“你去看一看，就晓得我们国家成了个什么样子！”

每逢星期日，如无特殊事故，先君必定抽空前往麹町区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有好几次是带着我一道去的。当时参与比赛的，除了各阶层的日本人之外，中国人去的也不少，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湘阴陈嘉会，就是经常和先君同去的一个。

“武术会”的竞赛，每次先分小组初赛，再由各小组优胜者进行决赛。先君的射击技术很好，每射必中，弹无虚发，因此，名次总是很高，得的奖章不少。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各式各样的奖章堆得满满的，有银质、铜质的，也有一种象景泰蓝一样的质料的。我有时趁先君外出未归，打开抽屉，拣出几枚佩在胸前，自鸣得意。有一次还瞒着先君，佩着奖章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

剪 辮

一九〇三年先君由日本回国，就剪掉了辮子。其时剪辮子的人并不多，有的人虽然剪了辮子，可是回国之后，又在头上装了一条假辮子，如柳聘农就是这样。

一九〇六年秋天，周震麟先生从国内来到东京，住在先君寓所。第二天，先君有事外出，临走时嘱我陪周先生往浴室洗澡。我因想到日本人素来看不起留辮子的中国人，尤其是小孩们见了就嘲骂，呼作“辮辮波子”，于是便纵恿周先生剪掉辮子再去洗澡，并且说做就做，拿了一把快剪，兴奋地给他把辮子剪掉了。

先君回寓之后，看到周先生剪了辫子，非常惊诧，问明原委，才知道是我的恶作剧。先君把我叫到他的住室，厉声呵斥道：“你晓得吗，辫子要留都留不起，怎么可以随便剪掉？以后再不许胡闹！”

不久之后，谭人凤先生到日，也拖着一条辫子。我因吸取前次的教训，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谭老先生是为了奔走革命便于掩护而留着辫子的，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才剪掉。

刘 道 一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刘道一在长沙就义。他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牺牲的一个人。噩耗传到东京，先君悲痛万状，经久不能自己。

先君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刘道一是最先加入的一个，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开筹备大会，他和先君一道宣誓加盟。刘道一每到一个地方，住上几个月，便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到日本后，日语、英语都说得很流利。同盟会的对外交涉，他曾尽了很大的力量。他生性好动，火气很大，容易和人家发生争论，有的人称他为“暴徒”。

一九〇六年，刘道一和蔡绍南、彭邦栋、成邦杰等被派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振会党。这年十二月，浏阳、醴陵起义，他是领导人之一，后来在衡山被岑春煊派人逮捕，严刑拷打，以所佩印章“锄非”二字罗织成罪。

刘道一被捕的消息，最先是刘揆一告诉先君的。当时他们曾从各方面设法营救，终归无效。先君听刘道一被害的消息后，曾

经不止一次地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对别人谈过：“炳生（刘道一别号）平日锋芒太露，不稳重，人才难得，真是死得可惜！”

先君曾写过一首七律，哀悼刘道一的惨遭牺牲：

英雄无命刘哭郎，	惨澹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兴汉业，	君先悬首看吴荒。
嗷嗷赤子天何意，	猎猎黄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	万方多难立苍茫。

在小石川区

一九一〇年，我随先君住在东京小石川区，同住在一起的，有林时埭、林觉民、何天炳、方汉成、李文甫以及方声洞之弟等十余人。当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有一次连伙食费也筹不出来了，眼看就要断炊。先君拿出他的一件大礼服，要我去当了三十日元。我们十多个人就靠着这笔钱吃了一个星期的红薯，才勉强度过难关。

典当的期限到了，我把大礼服赎了来。在翻晒这件衣服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从衣袋里发现一张一百日元的大钞。这张钞票是什么时候放在口袋里的，先君已经记不起了，我在送当时以及当铺中人收检时，都没有搜出来。忽然添了一笔意外之财，大家都很高兴。

先君对于衣着素来不大讲究，但求其整洁而已。即如这件大礼服，原是一九〇五年到东京后为了会见外宾之用而做的，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的身体虽然发胖了，仍然穿着这件已经不合身的礼服去接待外宾。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一九一一年一月，先君由南洋到了香港，在跑马地三十五号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我于先君到香港后，也由日本来到香港。这次，我冒宫崎龙介之名，穿和服，讲日语，将由宫崎寅藏介绍向日本人仓地购买的驳壳枪五十支、勃郎宁二十支和子弹一万余发，分装四口皮箱，运到香港交给了统筹部。

这年二月，党人龚敬夫从其亲戚张通典（湘乡人，时为广东巡警道衙门文案师爷）处，打听到巡警教练所有几名缺额可补。先君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因为教练所有学员四百余人，枪支二百支，如能掌握在我们手里，对起义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同时，派人进去，既可以联络同志，熟悉广州的街道和当地方言，又可以借巡警学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参与起义活动。于是，决定派我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四人同往应考。我们都是湖南人，陈方度的年龄最大，我最小。在香港动身时，先君嘱咐我两桩事：一是要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二是要听从陈方度的调度，不要各搞一套。我们到达广州后，立即报名应考，结果都考取了。但一时找不到保人，到三月初才由张通典、周达夫（同盟会会员，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分别担保，入所受训。我们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一面等待发难的命令。当时全所学员四百多人，每支步枪有子弹五发。自温生才炸孚琦后，外间风声很紧，巡警道衙门怕学员出问题，把子弹都收去了。

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阳历四月二十三日），先君由港到省，确定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并将原来决定的十路进攻计划，临时改为四路。其中陈炯明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由我们作内应。二十九日午后二时许，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见该所所长夏寿华（益阳人）。陈方度对夏谈了一番革命道理，并出示手枪（统筹部发给我们每人手枪一支）对夏寿华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钟就要发难了。”夏寿华对我们说了一些同情革命的话，并坚留我们喝一杯酒。我们在夏寿华的签押房里吃了酒菜，就飞奔到小东营五号机关里。先君正在发号施令，整装待发，没有和我们多讲什么话，只交代陈方度赶快回去，待机行事。于是我们又匆忙跑回巡警教练所，等待陈炯明来攻，以便里应外合。不料陈炯明不按计划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门，后则并大南门而不守，因而坐失良机，对整个起义影响很大。先君后来还几次对我谈到陈炯明这次的误事，感到十分愤恨。

八字家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中外震惊。先君由香港打电报到东京，要我急速去港。我赶到香港时，先君已经动身去上海，胡汉民坚留我和其他一部分同志在香港，等待广州发难。后因陈其美从上海连来两次急电，说需要人力支援。于是胡汉民叫我和赵光（赵声之弟）、洪承点等七八人速往上海。到上海后，才知道先君刚赴武汉督师。十一月四日，上海方面攻下了制造局，洪承点等即着手组织军队，以原第九镇一部分官兵、上海参与起义的警察以及巡防营士兵为基础，组成沪军，并推洪承点和我担任

沪军正、副司令。

这时，武汉战事正在剧烈进行中。先君托张竹君（女，上海南市医院院长，武昌起义后组织红十字会救护队去汉阳前线，这时回上海采购药品）带信给我，要我赶快到武汉去。我因沪军刚刚组成，又须往镇江、杭州等地联络，不能抽身前往。随后不久，先君从汉阳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拆开一看，仅仅八个大字：“一歌爱儿，努力杀贼”。这是先君因为我不能到他身边去，在军书旁午之际，特地写来勉励我的。

就在接到这封信之后不久，汉阳战事危急。为了策应汉阳战事，牵制清军兵力，我就率领沪军，会同浙、苏、吴各处民军，陆续开到镇江，会合当地民军，推第九镇统制徐绍楨为联军总司令，协力围攻南京。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复。

“南北一家”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四日，南京留守府撤销，先君解职，退居上海。这年秋天，袁世凯邀请中山先生和先君入京会谈。先君本来是不准备去的，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以后，来电极力敦劝，先君才于九月十一日入京，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行返沪。

据随先君入京的秘书陈风光（湘阴人，后任国会议员）告我：先君至京时，袁世凯表面上殷勤接待，礼遇甚优，并请中山先生和先君提出组阁人选，而暗地则密派心腹随时侦察先君的行动。当时京中人士到处开会欢迎，先君莅会演说，宣传三民主义。有一次，湖北旅京同乡在湖北会馆开欢迎会，先君演说之后，会馆负责人请他题字。先君不假思索，立即写了“南北一家”四个大字。斯时斯

地，题这四个字，是十分发人深省的。

拒绝袁世凯的笼络

一九一二年九月七日，袁世凯授先君为陆军上将，同时授为陆军上将的，还有黎元洪和段祺瑞。这年双十节，又授先君勋一位。

授勋令公布后不久，袁世凯派专使到上海同孚路先君寓所，送来陆军上将特任状、授勋令和勋章，另外还有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枣骝玉点马，先君当时勉强收下了。来人去后，我因为好奇，戏将勋章佩在胸前，左右顾盼。正在这个时候，先君上楼来了，我感到非常尴尬。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去，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以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每天清晨，先君要我骑着马到寓所对面的打铁浜骑马道去调教，他自己则站在阳台上观看。

一九一六年双十节，北京政府又授先君以勋一位，先君也坚决拒绝了。

广州起义亲历记

熊克武

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中规模最大、牺牲最大的一次。这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的失败,不过半年,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自乙未到庚戌(一九〇五——一九一〇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已失败九次,而各省单独策动的地方举义,不下数十次之多,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从这些不断的血的教训中,同志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彼起此伏、各不相谋的军事行动,力量分散,不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而牺牲了不少的优秀同志,消耗了革命的实力,实非善策。东京同盟会总部和各省支部更进而主张,集中全党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一举而颠覆清朝政府。于是孙中山先生电约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各地代表,会议于南洋槟榔屿,决定在广州大举。而主要的是钱的问题,因为必须筹得数十万元的巨款,才能购买大批军械,召集多数同志,组织大规模的起义;这个向华侨募款的重任,只有由孙中山先生自己担负起来。当年筹款的方式,一般是到华侨多的地方举行讲演会,爱国侨胞总是尽其所有地把身上的铜元、毫洋、银元和票子掏出来捐献。这常常给革命党人以很大的鼓励。

起义的军事计划：(一)从日本、南洋及内地党员中，征选骨干(后称“选锋”)八百人，分为八路，首先发难，作为领导先锋，并配合新军占领广州；(二)联络番禺、南海、顺德、惠州等地民军，同时起义；(三)派员分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西等省，运动军队反正，及时响应；(四)占领广州后，即由黄兴统一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攻南京。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

一九一〇年——辛亥前一年的秋天，吴玉章、但懋辛、井勿幕和我由上海同伴到香港，与港、粤同志共同策划广州起义问题。我们得知一切都在积极准备，正等待海外筹款的最后结果，以便具体规划购械多少和召集骨干的确实人数，就可决定起义规模的大小。以各有新任务，吴玉章、但懋辛、井勿幕和我分别先后回东京或上海。临行前，黄兴问我们，四川可以出多少人。我们计算了之后说：四川几次起义失败，不少同志逃往云南，交通又不便，如果时间长的话，两百人没有问题；时间若短，大约可以凑四五十人。我到上海后，即函告川、滇同志积极准备，款到就动身来沪集中；要是能够自筹路费先来，那就更好。事务安排妥当，我和但懋辛又由上海来到香港，负责联络各地往来香港同志的工作。我们和黄兴住跑马地三十五号，后来主持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就设在这里。辛亥革命成功后，广东省政府曾与香港政府交涉，保留这所有革命历史的房子以为纪念，结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那时候的革命，主要是靠炸弹作武器，因为枪弹只能向国外购买，困难甚多，运输危险，价钱又贵，而炸弹杀伤力大，运带方便，造价也便宜。喻培伦(云纪)是日本千叶医学校的学生，对于制造炸弹已有相当经验，总部就将这个艰险的重任交给他。喻培伦不幸

在广州起义中英勇地牺牲了，他是七十二烈士之一。关于喻烈士在广州起义前的革命活动，吴玉章同志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中已有较详的记载，并称誉他为民族英雄。在广州起义中，我和喻烈士始终在一起工作，应该补述他这一段的革命事迹，以尽战友的责任。尤其是当他因身受重伤、弹尽力竭而被俘后，在清吏严讯口供时，他声色俱厉地说：“要杀就杀，科学是杀不绝的，革命党是杀不尽的！”这是何等壮烈的英雄气概！

由于在东京不可能进行爆炸试验，喻培伦特地来到香港，在当时还没有开发的九龙海边的荒滩上，找到个试验的地点。喻这次试验的成绩很好，特别值得介绍的，就是他想出了用安全火柴做炸弹导火绳头子的办法，克服了过去不易燃着的大缺点。因此，在这次广州的武装斗争中，几乎个个炸弹都发挥了作用，给怕死的清军以很大的威胁。

统筹部于辛亥一月成立于香港，推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总揽全局，下设八课，分工负责办事。一月底，黄兴派李文甫、林直勉、喻培伦、但懋辛和我上广州，调查城内外地形、交通路线和重要机关地址，画成一个简图。李、林是广东人，道路熟悉，但和我学过军事，喻则因广州房顶有可通行的走道，要勘定狙击清军的投弹地点，所以我们四人便被派去担任这个临时任务。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是个极顽固凶恶的家伙，他是四川人，他的部下四川人很多。我们就抓住这一线索，通过同志同乡李天钧（广州东一区警察局巡官）、邹有章（河南警察局巡官）的关系，认识了水师营同乡王书记，探听了一些水师布防的情形。王书记又告诉我们，观音山炮台是旗人把守的，他们唯利是图，在炮台里卖茶，聚赌抽头。他便邀请我们去喝茶，看看广州市的风景。我们就利用游

的时机，分别检查了几门炮，发现炮虽然是旧式的，倒还可以射击。假使后来不改变作战计划，象这样腐败的守卫旗兵，实不堪一击。而我们如果能迅速把炮台夺取过来，那将有多大的用处！

我们回香港报告情况后，我和喻培伦又来到广州，由于邹有章的帮忙，选租了一幢合用的民房，挂起但公馆的牌子，作为交通站和制造炸弹的地方；我们另外住在市内莲塘街吴公馆。喻开始日夜辛劳地制造炸弹，我有空就帮助碾炸药。个把月工夫，总计做了半磅、一磅、两磅重的炸弹三百多个，分批偷运至吴公馆储藏。

三月十日开“发难会议”，议决三月十五日举事，旋以款械不能如期到达，改为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于三月二十五日到省，设立指挥部，进行作战布置。二十七日，两广总督张鸣岐调回巡防二营驻扎城外，胡毅生（负责购买和运送枪械的储备课课长）、陈炯明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黄兴无可如何，下令除负责的骨干外，其余“选锋”约三百人全部撤回港九。同志们闻讯，均甚愤慨。喻培伦、林时爽即往见黄兴，痛陈利害说：“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的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于今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个大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喻培伦且坚决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听了大为激动，决定集合同志数十人，杀张鸣岐以谢国人。二十八日，姚雨平（调度课长，负责运动新旧军）、陈炯明报告，新调来的顺德三营，哨官中十之八系同志。于是决乘机起事，黄兴又最后确定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半发难，并电报通知香

港。香港方面，以时间来不及，留港的三百余同志实难于二十九日的早班船全部赶到，电请推迟一天。这样一再改期，一切部署都打乱了，更重要的是人数大减，不得不放弃八路进兵的计划，改为集中力量专打总督署，由黄兴亲率百余人攻督署前门，莲塘街的十八人袭击督署后门。这也是擒贼先擒王之计。

二十九日早，黄兴因为还没有得到香港同志晚来一天的消息，派我和方声洞、林时爽去接船，把他们分批带进城内安顿。可是船到了，人却没有来，我就要方、林先进城报告情况。我怀着万一的希望，一直等到下午四时，才失望地赶回指挥部。进南门时，碰着林直勉戴黑眼镜坐着轿子出城，我想他这个时候这种打扮去干什么？接着又遇见陈炯明，因时间紧迫，要他带我走捷径去指挥部，他给我指点方向后又匆匆地出城了。当时我还以为林、陈二人另有特别任务，后来知道他们都做了逃兵。指挥部的同志看见我，几乎众口齐声地问，“到了没有？”我看见同志们已全副武装，正在吃面包，候令出发，不能浇冷水，便简单地回答，“我刚进城。”黄兴心里明白，便催我赶紧回吴公馆，准时出动。本来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战斗，认为他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教给别人，这对革命大有好处。但是无论谁劝他，他总是这几句话：“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制炸弹，现在自己做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有的同志还说：“不少你一个人啊！”他却回答：“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的确，论抛炸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他比谁都高一着。既然大家怎样也说服不了他，只好依他了。

我们正在准备时，忽然听到枪声响了。同志们一手拿短枪，一手拿大刀，炸弹装满了口袋，有的人脖子上还挂一筐子，飞步前进。喻培伦只用了两颗炸弹，就把督署后墙炸开一个大洞口。但恐幸

首先冲进去，右臂中了一枪，但还是随着大家蜂拥而入。枪子与炸弹齐飞，杀得警卫清兵四散逃命。我们一直打到前门，黄兴的大队不见了，我们就和还没有走的广东同志数十人合为一队，直奔督练公所。

当我们一队行进到莲塘街北口，即与水师发生遭遇战。我们即分散于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阻击敌人。负伤的和不会开枪的就搬送炸弹，或代装子弹。喻培伦一个人攀登屋檐，等清军冲过来时，就猛投炸弹，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敌死伤不少，再也不敢凶了。就这样在原阵地上彼此相持至半夜。因为众寡悬殊，看形势是不能再蛮打下去了，我们就商定分批退却，且战且走。原来约定用小喇叭通消息的暗号，因怕被敌人发现目标，不敢随便使用，因此同志间失却了联络，只有张梅生、饶国梁、秦炳、但懋辛、罗允、莫纪彭和我七人还在一起。我们一度商量，决计越城。在半路上遇着巡警队，打了一小仗。待到城墙边芦苇丛中摸索前进时，我们七个人又分散了。最后，只剩下我和但，发现城上也有兵防守，不时打冷枪，看来越城也不行了。我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又值深更半夜，只有坐待天明，再想办法。天快亮时，我们二人躲进个公共厕所里商量。我要但在厕所里等候，由我一个人出去看看情形，再打主意。不料我一走出去，就被往来不绝的巡逻队隔断，回不去了，因此又与但拆开了。我在极度疲劳与饥饿中，走进一老百姓家。老乡当然看得出我是干什么的，他幸好能说普通话，让我坐下休息，叫我刷去满身的泥土，还弄些东西给我吃，至今我没有忘记他对我的热情。后来知道，黄兴等不少人都是在老百姓掩护下脱险的。

当天，我找到了李天钧巡官，请他派人送我到河南，邹有章巡

官代我买好船票，我才回到香港。

此外，尚有可记的：黄兴曾报告说，广州起义共用银十七万余元，其实这只是统筹部直接开支的数字，而其他方面直接或间接用于起义的款项，也大有可观。据我所知，福建同志数十人的公私费用完全是自己筹措的，四川同志的一部分用款是上海同志资助的，其他各省的情形亦大抵如此。又在东京购买的军火，留日学生出钱不少，尤其难得的是，东京同志有人拿官费折子去押款，有人向一个日本老太婆借高利贷，几年之后才还清。这些都表现了同志们对革命的高度热情。

在起义的准备期中，没有任务的同志多在家里下棋，练大刀。大家还想出了一个玩法，就是在墙上挂个小竹囊，用铜板投入，借此来练习投掷炸弹的准确，谁一次不中，就给他脸上画一笔，以资笑乐。尽管武装斗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可是谁也不把死当回事，泰然自得，生活很愉快，这种革命的乐观精神是值得敬仰的。

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前清把革命说成是“造反”，把革命党人叫做“土匪”。张鸣岐除将全部删改过的烈士供词和照片报清廷讨赏外，又精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的领事馆，以夸耀他的“剿匪”之功。而外国人却从这些烈士的履历中，发现多数是留日学生和显贵世族的子弟，日本早稻田大学还为该校死难的中国留学生下半旗志哀。这样，外国人才认识到中国是在闹革命，从而揭穿了清廷的欺骗宣传。

黄花岗起义与炸毙凤山亲历记

陈 其 尤

(一) 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役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难（实际不止此数，后经陆续查明补入史册的尚有多人），合葬于黄花岗，故亦称黄花岗之役。兹役是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以说是后来推翻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的前奏。此次惊天动地、英勇壮烈的起义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从此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促进了我国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义失败后，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审讯这次起义攻打总督署被捕的革命党人的时候，看见他们临难不屈、戟指骂贼的革命精神，为之惊惶丧胆。故他在奏报清廷的所谓“广州乱党起事经过情况”的电文中，悲叹“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此电在民国成立后从清廷广州总督署档案中发现）。由此可见，此次起义震撼了清朝的统治。

我在辛亥前一年加入同盟会，暗号为恢字辈。革命党指派给我的任务，是与同乡陈潮（七十二烈士之一）等住在旗下街，担负在起义时放火焚烧旗人聚居的旗下街以扰乱敌人军心的任务。后来因

清廷驻广州将军孚琦被暗杀，敌人加强戒备，我们因无眷属掩护，被巡警迫令迁出。组织上遂派我住到当时的总督署右旁、现在的中山纪念堂左边的莲塘街一处准备进攻总督署的据点。我和胡珮嫒、何少卿两位女同志同住那里，以姊弟关系作为掩护。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前数天，组织又调我到仙湖街始平书院看管一个秘密储藏军械炸弹的机关。当时因革命党准备起义风声泄露，甚至“乱党准备起事”的消息报纸亦有登载，情势甚紧，仙湖街始平书院一带突然有巡警日夜巡逻。始平书院是我们储藏军械的重要机关，我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到司后街陈炯明公馆向他报告。那天刚巧黄兴早上从香港秘密抵广州到炯明处，正在商谈起义之事，他们一起听取我的报告。我说现在起义尚无确期，万一巡警闯入书院搜查，不但事机泄露，全部军械被破获，整个起义亦将受到破坏，建议组织发给我处守卫人员（均为海陆丰的同乡，精壮的农民兄弟）利刃数柄，以便轮流在内门防守，如果巡警闯入搜查，则以利刃对付，把他们解决，不必开枪，以免惊动敌人。黄、陈二人同意我的建议。黄说他在小东营的公馆藏有利刃，嘱我待他回去后，随即去取。我们在陈炯明处同进早餐。黄离开不久，我即如约前往，黄兴嘱徐宗汉（当时黄兴的亲信助手，后来与黄结婚）从床底下检出利刃八柄交给我。

广州起义原来预定在三月二十五、二十八日或四月一日或更迟一些时间发难，后来临时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事，是因为当时情势突然变化，革命党准备起义的风声已传遍广州，我们的一些组织已被敌人破获；又因为当时策动省内驻军及巡警教练所学员到时反正响应起义的事机又被泄露，水师提督李准将他亲信的巡防营急从外地调回省垣加强防御，以致原来答应到时响应起义的驻军和巡警教练所的学员发生动摇。由于上述情势的突变，同盟会就

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计划。虽然还有一些订购的军械及华侨捐款尚未到齐,但此时革命行动已到了如箭在弦、非发不可之势。黄兴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提前起义,所以临时决定起义提前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实行。

当时起义队伍原拟分十路发动,在这十路之中,黄兴率领的主要一路担任攻总督署,陈炯明率领的一路担任攻存储大量枪械的巡警教练所,准备夺取枪械,并争取教练所学员反正,响应起义。我们这一路队伍多住在仙湖街始平书院。我和几个在广州读书的同乡同志因懂广州话并熟悉路径,故被选派为陈率领的这一路的先锋督队。起义前夕,发给我们到时缠在手臂作为标志的白毛巾一条,对时间用的钢壳手表一只,并决定在陈公馆出发时每一督队再发给手枪一枝。三月二十九日清早,我们督队的人到司后街陈公馆,听取最后指示。当时陈炯明宣布当天下午四点钟再到此处集合,带领队伍出发。我和另外两位督队的同志遂到总督署前卫边街一家饭馆吃午饭,在饭馆故意拖延时间。直到下午快到四点钟,才同往陈公馆。岂料到达时,门户洞开,屋内阒无一人;再进内宅,则见蚊帐被盖书报等狼藉满地。我们初时以为机关被破获,急急走出,打算由双门底逃出城外。出门后,即听到稀疏的枪声,我们不知底细,匆匆走到双门底转永汉路。此时城门关闭,不能出去,幸我平日熟悉路径,乃拐入广府中学宿舍青云书屋找姓卓的同乡处暂避,适卓外出,我也只得留下来。此时,旗下街已报火警(这是前面所说的我们所布置下的行动),火警钟声大作,全城行人绝迹,铺户都关上了门。翌日清早,一队巡警来到青云书屋搜查,才知道从昨晚起,他们即挨户搜查革命党人。巡警把我揪起搜查和盘问。我因留有辫子,同时白毛巾我早收藏起来,他们又不懂得我所佩戴

的钢壳手表的用处，幸而得免于难。及至近午，我偷偷出外打探情况，看见永汉路城门半开，已有行人走动，守军对出城的人搜查盘问后可以放行。我在广州已失掉与陈炯明的联系，只得乘机出城，搭佛山夜船往香港，与同盟会领导机关联系。在船上，我遇到同盟会一位负责人姚雨平同志（现在任广东省参事室主任），他也是从广州逃出准备前往香港的。姚在我看管始平书院军械储藏所时，曾持黄兴的亲笔信向我提取军械，是我认识的人中之一^①。我和姚在船上密谈后，才得悉昨天下午起义的一些情况。

原来，事前商定的十路同时起义，有的因为对起义时间有误会，未及时发难；有的因交通问题，未能及时赶到广州。而陈炯明临时没有率领队伍参加起义的原因，是陈认为事机既然泄露，情势突变，提前起义，不但攻打教练所必然失败，即全局亦无获得成功的希望，不如改期发难，以保全实力，乃于起义前刻派马育航到黄兴处主张改期。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并留下绝命书，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他当时推开马育航，径自率领队伍向总督府进攻。陈炯明见改期不成，即逃出城外，躲藏于河南尾珠江水面一个同乡亚弁的盐船里。如上所说，我们在起义当天下午四点钟到陈公馆时，他已离开，原来是他临阵脱逃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和胡汉民曾联名致南洋的同盟会机构报告起义经过，函中对陈炯明等在起义中表现不力的一些负责人，曾有所指责。

^① 邹鲁在他编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黄兴令陈其尤偕（姚雨平）往始平书院领取（枪枝炸弹）。”实际上不是我偕同姚到始平书院，而是姚持黄兴亲笔信到始平书院向我领取枪枝炸弹。

(二) 炸清将军凤山之役

辛亥革命前夕，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的侵略，大大激发了我国人民的革命思想。到辛亥这一年头，广州方面民气沸腾，革命情绪之高涨，几乎不可遏制。此时同盟会在香港的秘密统筹机关，根据形势，采取相应策略，决定狙击清廷大员，先除障碍，并寒敌胆，以壮大革命的声势。于是辛亥三月初十日，有归国华侨温生才烈士出于义愤，自发地枪杀了清廷驻广州将军孚琦（时孚琦从燕塘参观飞机表演后，归途经东门外）。接着不久，在闰六月十九，双门底有陈敬岳、林冠慈等行刺水师提督李准之举。是役李仅受伤未死，陈烈士中弹而亡，林烈士被捕遇害。这两次壮举，加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英勇悲壮的起义，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两广总督张鸣岐坐卧不安，徬徨无措，奏清清廷续派将军来粤坐镇，企图以武力威吓革命党人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不久，清廷选派了军事上号称足智多谋的旗人凤山为驻广州将军。但发表多时，凤山慑于革命声势，踌躇不敢南下。经张鸣岐力促，凤山才配备了一班人马，于九月初三由北京经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转广州接任。

同盟会香港组织探悉凤山要来广州，早就决定要除掉他，遂指定我和李熙斌主持此事。其所以指定我们两人，是因李能制造炸弹，我则介绍了周惠普女士担任到时行刺。周是广州两粤医学堂的学生，长得高大强壮，富爱国热情，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廷的腐败十分愤慨。她知道我是革命党人，颇表倾慕，一再恳请我介绍她参加同盟会。我经过一个时期的了解观察，遂为介绍。有一天，她

看见报载凤山将要来穗，向我自荐说：如果得到组织的信任，她愿意担任刺杀凤山的任务。我往香港向组织报告，得到许可，给我港币二百五十元作活动费，指定李熙斌和我负责分头进行。李供应炸弹，我则和周联系并布置一切。我回到广州之后，和李熙斌密商，头一件要办的事是择地租屋，以备行事。当时将军衙门位于惠爱中路，历来清廷将军到任，都是从长堤登岸，然后乘轿取道归德门转惠爱路入将军署。我们估计凤山仍必循此路线，不致变更，乃决定在归德门一带租屋，着手布置。但这一带商业荟集，租一间房子很不容易。我们找了多时仍无着落，感到非常焦急。后来看见归德门街当冲地点有一妇科西医李仁轩医馆，凑巧李仁轩又是周惠普的老师，我们情急智生，决定放弃租屋的计划，改为利用李仁轩医馆行事。我们准备到时由周用藤手篮携带炸弹到李的医馆，伴称偶尔路过，顺便拜访老师，在该医馆等候凤山经过，走出门口抛掷炸弹。此时一切计划已定，只候凤山到穗。在等候的期间里，我们三人经常到郊外沙河息轭亭的地方密谈，并给她拍相片，存作纪念。一日，周惠普要求我在她牺牲之前带她到香港见见同盟会的领袖陈炯明等。我虽然知道这样做对保守机密不大适宜，但为了照顾她的情，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带她到香港。到港后，组织派一个代表接见她，对她加以鼓励安慰，嘱她好好听我的指导行事。当晚我们乘船回广州。周以不得领袖们亲自接见，有些不快，我只好婉言加以说服。不数日，我接驻港组织密电，告知凤山已到港，准明早到穗。我即走防李熙斌作最后决策。李说炸弹已准备好，爆力甚强，并约定我和周惠普第二天早上到他的寓所取用。到时我们依照计划进行，预备下手。岂料此时凤山到广州后，为了防备革命党人袭击，突然改变向来惯例，不经归德门而取道偏僻的仓

前街。狡猾的风山虽然避开了我们这个伏击点，但当他经过仓前街的时候，被同志李沛基从一间租用的小铺子楼上滚下的巨大炸弹所炸毙，他的随从多人同时亦被炸丧命。事后，省城各报馆纷纷出版号外，并将风山被炸得模糊一团的尸首附图刊出。这个消息马上轰动广东全省，爱国同胞拍掌称快。原来同盟会领导方面除了布置我们设在归德门的伏击点之外，同时还在仓前街布置了另一个伏击点，以策万全。为了保守机密，领导上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两方面都互不知道。炸毙风山的李沛基是黄兴先烈的夫人徐宗汉的亲属，他的年纪比我还小，当时只有十七八岁。

九月十九日，总督张鸣岐出走，广东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当时因我们还年青，为了培养后进，政府乃以有功民国的名义派送我们出国留学。我被派往日本，李沛基和李熙斌则被派往美国。后来，听说李沛基不幸在美国病逝，李熙斌回国后在岭南大学当教授。至于周惠普竟于民国后在广州遁入空门，削发为尼。当时我因去日本读书，一直没有和她见面通讯。直到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我在广州闻悉此事，曾特别去寻访过她一次。

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记

熊秉坤

(一) 工程第八营发难经过

当三烈士^①就义之先一日，即十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下午五时，邓玉麟偕杨洪胜匆卒到工程营前队第三棚徐少斌处，密召熊秉坤曰：“今日汉口炸弹失慎，孙武受伤入院医治。清吏恐慌，大事搜捕。我等决定今日起事，炮队先行发动。军械所系汝营驻守，今夜无论如何困难，一听炮声，必须即行占领。发难后各营需要子弹，此点甚为重要。旗帜、符号，今日已被搜去。少数子弹、炸药，由杨洪胜随后送来，作为响应之用。”熊与邓、杨、徐等，当拟定简单办法如下：（一）肩章反扣，白绸带缠右臂以代符号，俾易识别；（二）军队出动时，全付武装，去其背囊减轻累赘；（三）工程营进据楚望台后，立派兵一部出城迎接南湖

• 本文原题为《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载《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一九五七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文共分七节。本集节选该文的末三节，并改题为《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记》。——编者

① 三烈士为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他们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在武昌被捕，翌晨就义。

炮队进城，占领阵地；（四）今夜口号：“同心协力”。邓、杨旋即辞去，即将此办法分别通知各标、营同志。

一面又由熊秉坤令支队长郑挺军速通知驻楚望台军械所同志，妥为准备，届对内应勿误。嗣杨洪胜复到工程营，密交枪弹两盒于熊秉坤曰：“少顷再送炸药来。”同志见了子弹，极为兴奋，几有抢夺之势。熊秉坤棚与排长哨棚毗连，恐生事端，急示意于杨，杨会意而去，复曰：“汝营门卫兵须换一同志，免生阻碍。”时营门卫舍长系右队代表杨金龙，当由熊介绍见面，如言照办。杨洪胜去后，熊将子弹自留六粒，各队代表各三粒，平时胆大与长官有恶感者各发两粒。发动时向操场发三响，以为信号，其余留作必要之用。又囑诸同志，如官长不加反对，决不故意残杀。分布已毕，静候炮队动静。

以后杨洪胜又送炸弹到营，适与本营右队队官黄坤荣（系卫兵司令官）遇，虽有杨金龙在场，仍无法掩护，炸弹因以落空。杨金龙事后谈及，杨洪胜携酒瓶式之炸弹一束到营，当时黄坤荣监视甚严，守卫兵不敢启门。杨扣之急，卫兵佯问：“是谁？”杨答以“我”。卫兵不得已再问：“汝姓什么？此时戒严，不能会客。”黄知有异，即呼：“捉歹徒。”杨闻不妙，即返身遁。迨门启，杨已远逸，黄与卫兵亦未追。

杨返寓喘息未定，而捕杨之军警至（杨洪胜住第十五协西营门左侧第一家，房主系李襄麟之差弁，平时见杨形迹可疑，料杨是革命重要分子，遂白李捕杨）。杨见捕者多人，即投以炸弹，未发，返身而逃。军警尾追，杨再以第二弹投之，爆力极弱，未能伤人。追者不舍，杨又投第三弹，亦未伤人。杨力促气败，匿于工程营前伏龙寺后之菜园内，军警搜捕得之，送与督署，此十

月九日夜十一时也。是日晚九时半熄灯就寝，竟夕以待，不闻炮声，实深诧异。炮队本为军中骨干，行动须得步兵掩护，始能发生作用，各方戒备森严，其不果行，亦意中事也。

是日夜间工程营戒严，官长均领弹携枪守各排出口，并武装巡查各棚，嘱各安心睡觉，且曰：“革命不能成事。某时某处杀多少革命党徒。何必拖累家庭。”云云。士兵大小便者，即令以痰盂盛之，防范之严，可想而知。左队支队长任振纲平时勤慎奉公，颇得排长信任，此次戒严令下，即唤任携枪领子弹。但任早受总代表熊指示，右臂已缠有白布，排长一见，即夺任手中枪，枪内且装有子弹两粒，因是被其看管。熊秉坤闻讯，愈加不安，辗转床褥，一夜未曾合眼。翌日，熊派李泽乾出营探听消息，李回告机关均闭门，彭、刘、杨已遇害，城门未开，右路巡防营放哨已自第十五协至我营左右各街。早操毕，熊令李泽乾通知各队代表，饭后不要分散，有话相商。会餐时，官长到者极少，熊谎于众曰：“今日奉总机关令，责工程营首先发难。因军械所为我营所守，如各营响应，亦必先到军械所领取子弹，如我营不先动，别营必不敢有所举动。”当约定下午三时晚操发动，众以无子弹对。熊问昨日所发子弹，则以昨夜未用，置之身边恐有危险，已弃置矣。熊亦无可如何，其余均照昨议，并派人送信至军械所。此时安排虽定，其实毫无把握，正忐忑间，工程营后队传达兵送信来云，今日由熊秉坤棚接守卫班，嘱预备一切。熊闻之喜极，盖工程营守卫向由前、后、左、右四队轮值，一天一换，今日轮班，应归后队第三排，因昨夜附属右队去军械所挖掘战沟（专以供守卫兵抗御革命力量者），辛苦一夜，不能接班，故轮到第一排。守卫班长名曰卫舍长，虽在卫兵司令指挥之下，而换班接哨，均由班长指

挥，无形之中增加许多便利。所虑者厥惟子弹。忽本排第二棚同志吕功超向熊言其家有子弹，问其故，则答：“余兄昔充吴元恺营马弁，恺字营由北通州回鄂解散，余兄携回子弹交余嫂存放楼上箱内，并囑好好保存，将来有大用。余兄现去川……”，话犹未已，该排排长亲信于郁文、章盛恺两同志接言曰：“排长有子弹，如熊总代表要用，我俩负责盗取。”熊即令吕、于、章三人分途去取，各得两盒。当令金兆龙分发给各同志，时已十二点矣。熊囑副班长陶启元在营督率造饭，监视官长，严防匪徒乘机抢劫；又令于郁文盗取腰牌两面，一交李泽乾，一自佩，相偕外出。入第十五协南营门，先至第三十标第三营前队，同志方维、谢涌泉正言今日在操场捕去张廷辅事，见熊至，急问曰：“怎么样？”熊答曰：“干！特来请你标响应。”方等要熊上楼与王文锦商议。王为该队司书，居队官室，熊告以发难事，王曰：“你如何办就如何好，这边不成问题。”旋至第二十九标第二营第二排，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盖因彭、刘、杨惨死故也。熊谓不应作儿女态，并询以炮队发难计划。蔡曰：“哪里有计划？他们都跑了，摇清（即孙武）面部炸伤，只有叫炳三（即邓玉麟）再去炮队试他一试。”熊曰：“我营决定今日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能响应？”蔡曰：“现只有望老哥干一干，我决带队响应。”并约定，发难后带队过第十五协西营门，以放枪三响为信号，直趋军械所会合。蔡允诺，熊辞返营。

下午三时许，谢涌泉来工程营问晚操动静，并谓该标已布置响应。熊以晚操未下，必是汉奸走漏消息，乃另约晚间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点钟时发难，其余仍如前约，并请转知第二十九标。谢去，熊复通知各队及守卫同志，小操场发枪三响，一

齐动手，先杀与我等对抗之官长，即鸣警笛集合，并再次通知军械所。至此，营中排长方定国、队官罗子清均向熊表示不加干涉，熊亦说明革命旨在反清，只要不妨害革命行动，绝不杀害汉人。方、罗均先行离去。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第一排第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遇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堂、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为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曰：“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赶快觉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闹！”云云。熊等见此情景，即将痰盂、花盆、瓦钵、板凳诸物，充作兵器，向下抛击，诸逆仍不退阵。同志吕中秋向阮击一枪，阮带伤返身向前队穿堂人丛中开枪数响，毙同志冯某。同志徐少斌还击，毙阮于水沟内。熊与诸同志见阮返身向前队奔去，即一拥下楼，程定国一枪打死黄、张两逆，其余官佐有越墙者，有匿于厕所者，均未究。熊即鸣警笛集合，惟以人声嘈杂，应者甚少。撬开军械库，得开口军刀二十四柄，当分发各代表佩用。熊与杨金龙领队头，金兆龙等押队后，率队出营。向左转弯，遇前队队官李占魁，李向队头连发三枪，未伤人，杨还击，李即逸去。过第十五协西营门，熊向内放三枪，以践前约。此时随行者，不过四十人，其余仍在营内吆喝。少间罗炳顺、马荣等亦举兵响应，

派人送信与熊代表。同志们闻军械所得手，一个呼哨，即抵军械所目的地矣^①。

（二）革命军占领楚望台与各标营之响应

楚望台为湖北新军军械库所在地，革命党人固以此为目标，清方官吏亦势在必守。自十月二日（八月十一日）之后，李克果等即会同阮荣发派兵在军械库附近建筑防御工事，防止党人进攻。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晚七时，工程营熊秉坤等在营内发动后，枪声与人声即传至军械库，守库之左队同志罗炳顺、马荣等，知本营业已发难，正拟响应，监视官李克果集守卫兵士谓之曰：“余与汝等前在工程营共事五年之久，今有一言相告，不知愿听否？”众云：“可。”李曰：“外间喧嚷，汝等闻否？”曰：“闻。”李曰：“余为汝等计，如系徒手不法匪人来此，汝等责任重大，须要抵抗；如系军队到来，汝等人少，可即避开。”罗等曰：“我等未见一粒子弹，何能抵抗？”李于是令军械所主任纪某，转飭管库工人将库门打开，搬出子弹两箱，分发各兵士。同志等得子弹后，即向空中放一排枪，李等见此情况，即与工程营左队官佐等穿墙逾垣而逃，楚望台军械库唾手而得。

时熊秉坤所率工程第八营同志约四十余人已到楚望台，左队代表罗炳顺、马荣等出而欢迎之。军械库既为党人所有，械弹可

^① 作者云：“陶启胜小腹中弹，奔回家中，翌日毙命。其弟启发却为革命同志。程凤林受伤后以治疗失时，三日后身死。又武昌子药库原在三佛阁，迁楚望台后，改称军械库或军械所，称局者非是。”——原编者注

以自由取用。正议论间，周定原同志亦率队到达。熊集合队伍讲话后，即在楚望台布置防务，又派侦探两班：一由汪长林带领，巡视楚望台至通湘门窥探宪兵营动静；一由汤启发带队巡视中和门正街、西街地段。熊以总代表身份下命令如下：

一、本军应冠以“革命军”三字，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暂袭用旧制。

二、本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

三、本军作战以清督署为最大目标。敌方张彪、铁忠、李襄麟等，在大小都司巷、恤孤巷、吴家巷、望山门正街、水陆街、豹头堤等处布防。

四、敌人兵力为教练队二营、辎重第八营一营、机关枪一连、水机关四挺、第八镇警卫一连、宪兵一连、消防救火队一百名，约共一千五百名左右。

五、本军以楚望台、蛇山为炮兵阵地，自阅马厂、大朝街向南至保安门正街，为步兵防守线。暂以楚望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地。

六、金兆龙带后队第二排及右队第一、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往南湖威胁炮队第八标响应，并掩护进城。

七、林振邦带左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向第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寺方面警戒。

八、徐少斌带领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布防。

九、其余部队均作总预备队，在本军械所待命。

十、今夜口号为“同心协力”。

总代表兼大队长熊秉坤发于军械所，午后八时二十分。

命令发出后，熊精神上极不自在，良以责任重大，稍有差池，即功亏一篑。盖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士兵在防地上条陈大发议论，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无何，汪长林带左队队官吴兆麟来，众兵无不喜形于色，欲戴为总指挥。熊即召各队代表集合会商，多数不以为然，但为发挥全军攻击精神起见，不能不随兵士之愿，即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则处于参赞和监视地位。

先是汪长林等巡哨至楚望台西南城墙附近边沿，见人影幢幢，汪发言曰：“汝等是人还是鬼？”吴答曰：“我。”汪固识吴之声音，即谓：“汝为何不出？”吴曰：“恐遭杀害。”汪曰：“均属同胞，何得如此，我带汝等去见熊代表。”吴意未决，适排长曹飞龙、黄楚楠在傍，谓吴曰：“我们去见熊，有汪老总保护（“老总”二字系兵士之尊称）。”吴亦赞成其说，即随汪去。吴既出，又为众兵士所戴，故愿受临时总指挥之职^①。吴随至各防地巡视一周，每到一地，即大声询于众曰：“汝等代表推余为总指挥，汝等愿否？”众曰：“愿。”吴曰：“愿，须听指挥。”众曰：“听。”吴又曰：“违令者斩。”众曰：“诺。”吴乃就原地复下令如下：

^① 作者云：“吴在刘绳武家暂避。”编者访工程营士兵向炳昆，据说吴十九日夜匿津水闸八号，向劝他出来抓权。其他记载大同小异。——原编者注

- 一、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第一、二两排，经津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攻督署前。
- 二、右队排长旷名功带右队第一、二两排，经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攻督署后。
- 三、马荣带兵一排，向宪兵队东南端进攻，黄楚楠带兵一排，向宪兵队西南端进攻，互取联络，即时将宪兵队扑灭之。
- 四、周占奎率兵两排，固守楚望台北端阵地。
- 五、徐少斌、郑廷钧、汪长林、杨金龙带兵两排，由徐少斌指挥，先夺取中和门，策应金兆龙迎接炮队。
- 六、张伟、任正亮、饶春堂等带兵一小队，由张伟（靖川）指挥，出中和门掩护炮队进城。
- 七、陈有辉带兵一班，往通湘门附近侦查。唐荣斌带兵一班往中和门附近侦查。
- 八、楚望台附近交通，着罗炳顺、程定国、杨云开、刘定基、孙元胜等，分途彻底破坏。
- 九、其余为总预备队，由副指挥（按：一云无副指挥）熊秉坤率领，在楚望台北端待命。
- 十、今夜口号改为“兴汉”。

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发于楚望台军械库，八月十九日（农历）午后十时半。

此时各标、营、队尚无动静。吴即令总预备队一部分进入散兵壕内（此壕系清吏于八月十二日所筑，全为我用），向第十五协猛烈射击，促其响应。未几，第三十标同志方维、谢涌泉，排长马明熙带兵百余名来会；第二十九标蔡济民、胡效寿等带百余人亦到，方兴、李翊东诸同志带陆军测绘学堂学生百余名亦至楚望

台。此时两路进攻队伍方始出发，蔡济民自愿随右路旷队进攻。吴又派马明熙、方维等，带兵出城助金兆龙接炮队。吴令测绘学生作总预备队，旋派往中和门至通湘门一带城墙放哨，以防敌人来袭。逾时炮队进城，即在楚望台布置炮位。

先是金兆龙带兵经中和门，欲出城往南湖迎接炮队。金至城门口，门已下键，守门者逃无踪迹，锁无匙不得开。金兆龙用双手扣锁两端，用力向怀中一拔，长尺许、重三斤之铁锁，碎为数段，得以出城。张彪知我军必迫炮队响应，电话令第三十二标标统孙国安转派队官楚英（旗人）带兵两队，布置要道。在长虹桥与金遇，激战数分钟，楚以兵无斗志而退，金续前进，至南湖阅兵亭，又与马队哨兵接触，数分钟，马队兵士自动退走。金兆龙突破两道障碍，始达到炮队第八标后营门。时炮队内部已响应，金遂与炮标同志蔡汉卿、程国桢、孟发承、徐万年等谈城内同志盼炮队进城如大旱之望云霓。惟夜间不便驾驶，由双方同志与士兵拖炮三门，向城内进发。同去者有李作栋、邓玉麟两同志，系昨夜送信炮队未走者。马明熙、方维亦带队会同进城。

（三）攻占督署及黎元洪之出处

清吏瑞澂、张彪、铁忠诸逆，惊闻工程营兵变，急饬各协、标、营长官，一面制止内部响应，一面囑派可靠兵队会剿。惟各标、营自管带以上各官，均以身家性命是惜，不但无会剿之勇气，且纷纷离营，惟恐祸及其身。只第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将营门堵塞，使外不能入，内不能出；第三十二标标统孙国安，仅派楚英带两队兵士，反抗我军；其他如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及第十

一营炮队管带张正基亦曾反抗于一时，结果均遭失败。足见人心思汉，乃革命成功之基础也。我革命军自炮队进城之后，不独士气为之一振，即武昌完全独立亦由此隆隆之炮声有以促成之也。炮声初起，第二十九标第三营杜武库、杨选青各同志，第三十标第二、三营徐达明、吴醒汉各同志，均举兵来合，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之炮、工、辎各营队同志，如陈天寅、李鹏升、管心源、章斌等亦各率队前来。吴总指挥令炮、工、辎十一营各队占领蛇山阵地，又令第八标炮队总代表徐万年回标，将所有大小各炮扫数运到楚望台。此时兵力增大，士气甚旺，吾人最大而最重要之工作，即攻督署而占领之也。

右路旷名功、蔡济民攻督署后院，至王府口小菜场时即行停止。此处距都司巷仅一箭之隔，敌人有兵驻守，旷、蔡派战斗侦探搜索前进，大队随之。方左转，而敌之机关枪发矣，兼之街市黑暗，殊难进展。蔡将所部分布于官钱局、造币厂、善后局诸财政机关任守护，而旷则带所部回工程营大操场休息。吴总指挥闻此消息，欲置旷于法，经同人缓颊得免，队伍复返军械所。左路进至恤孤巷口，因失察为敌巷内伏兵截断，亦不利，退回津水闸布防待令。

两路进攻均失利，炮队射击目的亦欠准确，吴总指挥及诸同志均主火攻，即令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各带士兵三五不等，分三路前往放火。一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线，一由水陆街进大金龙巷至小菜场一带，一由保安门正街至望山门正街到东辕门。约半小时后，三处烈焰照空，我炮兵乃得乘势猛击。吴并派吕中秋、张靖川带兵十余名，割断电信、电话线，使敌人失却联络。

督署附近火起，炮又猛烈，瑞澂即率卫兵一排，携家小、细软，洞穿督署后垣，由文昌门逃上楚豫兵舰；铁忠、果青阿诸人随行；张

彪、李襄麟则作最后顽抗。此时炮火虽烈，而步兵仍无长足进展，吴总指挥乃将工程营队伍集中，再拟攻击命令如下：

- 一、熊秉坤带后队全队，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攻督署前，伍正林带前队全队协助熊秉坤沿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惟须派兵一棚为两线中间联络。
- 二、黄楚楠带左队全队，经王府口小都司巷攻督署后，以姚金镛带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右队在后跟进为黄楚楠之预备队。
- 三、陈国桢拨过山炮两门，在保安门城上布置放列，向督署开炮射击。
- 四、曹飞龙带右队士兵一排，掩护保安门炮队。
- 五、方兴以测绘学生百余名为总预备队，并巩固楚望台及军械所防务。

总指挥吴兆麟发于军械所，二十日（农历）午前二点钟。

此令一下，各自分途进行。惟所有军队攻督署热心从事者固多，而徘徊逡巡者亦不少。吴兆麟指挥权力虽仅限于工程第八营，幸各单位同志均能和衷共济。吴总指挥以第四十一标与第三十标第一营旗籍军队尚待解决，即令炮队用全力轰击，并曰：“今夜如不将敌击溃，一待天明，吾辈必为所虏也。”适黎元洪派马弁柳国祥至，柳曰：“黎统领命令，决早五时到楚望台。”言毕即走。熊秉坤与邓玉麟呼之返而诘之曰：“黎来系降吾党乎，抑带兵作战耶？”柳不知所对，当囑问明黎氏再来报告。柳去后，熊即与伍正林带队出发，第三十标马明熙、徐达明、彭纪麟各带士兵若干附熊部前进；第四十一标岳少武、阙龙、李宗义，第二十九标杜武库、杨选青、夏一青，

亦各领兵若干附伍正林由城上前进。此时敌将张彪带机关枪暨辎重营约两队，并武装消防队数十名，占据望山门城墙。熊由保安门正街直进，与马、徐诸同志约，将队伍分作三小部，更番跃进，每到一横巷，将敌人驱逐后，即派兵把守，此乃市街战之战术原则也。

先头部队进至望山门街陈宏发警园门口，距督署东辕门不过百米矣，一经冲锋，即可得手。忽后方队伍纷纷退挫，据云望山门城上之敌已下城断我后路，谣风偶播，人如潮落，我徐、马诸同志均无法遏止，退回津水闸。伍正林由城上进攻之部队，遇敌将张彪亲自督队反击，并树大白旗，上书：“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既往，若仍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兵一到，定即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等语。伍等与附属之炮队因奏效甚微，而敌又抵抗甚力，其武装消防队曾两次冲锋我军阵地，我军死伤颇大。因督队鬃龙之负伤，以致纷纷退下，不特失炮两门，保安门城上阵地亦几为敌所夺去。伍正林挥兵反攻，众莫之应，伍欲自刎，为左右救免。际此紧急阶段，熊乃挑选敢死之士约四十名，附带引火诸物，专由保安门正街一线前进。伍正林、马明熙、彭纪麟、徐少孺、陈振武、饶春堂、林振邦、陈连魁、胡效騫、徐少斌、杨正全、张得发、孙松轩在前，熊秉坤殿后，杜武库、杨选青、夏一青等扼守保安门城上。此时敌人专注城上，对于城下略形疏漏，故敢死队得以顺利进展。迨冲至东辕门时，敌守兵不敢撻其锋，退至西辕门以诱我前进。我军志在火焚督署，不与恋战，乃直入头门，敌则反兵包围，前进诸同志均被截断在前。此时我军之危险程度，确属千钧一发，当面大堂有敌机枪放射，后面又被包围。熊秉坤见状情急，即将所有士兵散开，将围我前锋之敌，予以包围，敌遂凌乱，而督署门房又

复着火，敌乃分途溃窜，弃枪投诚者亦夥。

查门房之火，乃工程营同志纪鸿钧所发。纪君勇敢非常，左、右手各挟煤油一桶，附徐、马之冲锋队前进，跃到督署门房，即破桶举火。火发而纪君亦饮弹矣，功成身殒，闻者伤之。至此同人复引火将大堂付之一炬。张彪见大势已去，逆胆更寒，遂率辎重营残卒，沿城墙由文昌门渡江，布防于刘家庙车站。三次进攻之督署，此时始完全占领（此役伤十七名，死赵道兴、纪鸿钧、宗厚德、张斗照、李自新五名）。

黎元洪初闻工程营兵变，不甚措意，继接张正基电话报告，知自领之第二十一混成协直属工、辎各队及炮队之一部亦变，遂集合第四十一标留营全体官佐于会议厅。黎不发一言，亦无命令，盖借此有秩序之集合而防范之也。工程营发难后，即派周荣棠同志^①通信该协。周逾垣而入，为守者所执，黎讯明来历，即用杀一儆百之计，手刃周于会议厅。果也众心慑伏，暂时收效。迨后遭我军蛇山与楚望台双方炮击，士兵亦有哄动之象，黎始令官佐各自回营，并云：“带兵出外避炮，如能维持，不负皇恩，是所至盼，更能维持到底，将来定予重赏，否则听其自便，余不能为汝等负责。”言毕，即带执事官王安澜往黄土坡某号该协参谋刘文吉家避匿，文吉亦愿任保护之责。黎忆及平时积蓄，乃派伙夫回家搬运^②。该伙夫肩挑皮箱三只，恰与前派之巡查汤启发、程定国、马荣等相值，汤等疑为

① 黎手刃之党人，《武昌革命真史》和《湖北革命知之录》作周荣发。又邹玉溪亦为协统所手刃，或作张立成。所隶单位，亦各执一词。本文作者谓周荣棠，安徽宣城人，工程营饲养兵。——原编者注

② 按黎元洪住宅在中和门内，平时居营中日多，改避往黄土坡刘宅时，派伙夫往千家街协司令部取行李也。——原编者注

乘机劫夺之匪类，喝令止步，并欲加以惩治。伙夫答：“余乃此公馆伙夫，原非匪人。”汤诘其奉何人所派，担往何处，伙夫不得已，始吐真情。汤等乃偕伙夫同往刘宅，黎见众至，知难再匿，出叱汤等曰：“余带兵并不刻薄，汝等何事难余？”众曰：“我等来此，特请公出主大计，非恶意也。”黎曰：“革命党人才济济，要余何为？”众曰：“公平昔御众极得士心，今之革命党员，均属同袍。众望所孚，无如公者，请即出领导一切。”黎曰：“到何处？与何人商谈？”众曰：“到楚望台与吴兆麟商。”黎复曰：“吴畏三（兆麟字）乃余之学生，富有军事学识，有伊一人足矣。”众知黎无诚意，程定国厉声曰：“从则生，不从则死，统领自择之！”黎知不可抗，遂由众拥至楚望台。有马荣送信在先，故吴总指挥派兵一排，站队鸣号以欢迎之。黎服青呢马褂，灰色呢长夹袍，瓜皮小帽，王安澜随其后。吴总指挥出为招待，黎笑语众曰：“各位辛苦。”吴当与同志诸人引黎至中和门城楼观战。黎首与吴小语，责吴不应为此，吴以为众所挟持对。

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如杜锡钧、柯锡蕃等。黎闻督署攻下，即召党人代表及前清有官职者会议。黎首发问曰：“督署虽克而瑞澂、张彪未获，汝等将有何法以善其后？”众曰：“请统领主持。”黎复问：“汝等革命党所恃奥援者何处？钱粮多少？”邓玉麟曰：“京山刘英已聚众十万，三日可到。”熊秉坤则以官钱局、银币、铜币两局及藩库所存银币不下三十万对。黎又问：“瑞澂、张彪清兵水陆并进，何以抵御？海军军械尤犀利，吾服役海军多年，故悉知，不需十弹，此城将粉碎矣，汝等将退往何处？”邓玉麟以退湖南答之。黎曰：“有何把握？”邓曰：“焦达峰已约下月初间举事。”黎曰：“以吾观测，殊无把握。依吾之见，汝等不若暂且回营，待吾往说瑞、张，使不追究，何如？”何竹山抗议曰：“吾人革命，原不计生死

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统领意见，绝对不可行。”黎窃叹不已，遂下令各标、营、队暂回营舍，架枪休息，然听者少数。

适汤化龙派人来楚望台云：“汤议长请革命军代表、黎统领及各官于正午十二时到咨议局开会，组织政府。”当由方维同志往第三十标备来骏马一头，供黎乘坐。黎即乘之起行，吴总指挥派兵百余名扈送，熊秉坤、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马骥云诸同志随行。队前有旗帜两面，黎欲去之不可得，意殊不悦。道经第十五协西营门，第二十九标第一营管带何锡蕃延黎入会议厅。献茗后，黎问曰：“汝标回营乎？”何答：“已架枪休息。”复曰：“吾标可用，专待吾公后命。”言毕，以目送意，黎亦领悟。熊蹶邓踵曰：“此地不可久停，恐生异变。”邓大声曰：“吾等开会重要，此间非谈话所。”即挟黎起行。行次熊语邓、李曰：“军械所乃吾人命脉所在，非可等闲视之。兄等偕黎往，弟当返军械所，分工合作，庶无遗漏。”邓、李极以为为是，黎、邓等乃至咨议局。革命军同志以为已将黎劫持，可以依靠，当时固未计及有后患也。

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

王 绩 承

(一) 阳夏新军与革命运动

先是张之洞督两湖时，屡行新政，兴学堂，练新兵，两湖风气为之大开，有志青年汇集鄂垣，或以此为进身之阶，或以此为革命之所。张氏之创设特别学堂，分仁、义、礼、智、信五斋，考选新军中优秀士兵与正副目充学兵，三年毕业，复回原营，选充下级干部。新军各标营中潜伏之革命党人实以此，十月十日武昌举义于各标营者亦以此，阳夏光复亦以此。

阳夏原驻防之新军为四十二标之一、二营。清廷改革军制时，于湖北训练第八镇及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二标是二十一混成协之直属步兵。

清光绪三十二年，四十二标始告组成，其组成之程序，是将原工防营两营合为一营，复将汉防营之一部与护军铁路两营，改编为二、三两营。第一营驻汉阳，防护龟山下兵工厂、黑山下钢铁厂，营部则驻两厂间之龙灯堤，并于两厂间设轻便铁轨，以资运输，兼便指挥。第二营营部驻汉口居仁门，其部队则分驻于大智门车站及

华景街，维护京汉铁路交通终点与汉口商场之治安，而标本部在焉。第三营营部驻信阳，队伍分驻于车站各要地，北自芒山，南迄刘家庙，以保护京汉铁路南段之交通。原属工防护军各营之年老病弱之士兵任其退役，各营于每年招募新兵一队，以身体健康、学行均佳为录取标准，作为补充。此清湖北新军四十二标组成之经过及分驻地点之概略也。

当武昌日知会被清政府破坏后，革命党人及爱国志士遭囚杀者不知凡几。但革命党人益愤恨清廷，对革命事业图之弥力。太湖秋操熊成基谋于安庆举事，湖北新军中应秋操之革命党人曾密图响应。旋熊成基失败，秋操亦罢，事遂寝。但革命思潮益澎湃于吾鄂新军中矣。

原四十二标内早有胡玉珍、张步云、邱文彬、张大鹏、郑兆兰、戈承元、陈建章诸人暗组益智社，外以砥砺学行作号召，实则潜谋革命也。复鉴于以前失败，对革命事业之进行益加机密。适本营派往特别学堂学习之学生黄振中归营，以武昌有军队同盟会相告，于是吾阳夏之革命党人方得与武昌新军之革命党人王守愚、杨王鹏、曹振武、江国光往还，并组振武学社，以光复汉疆为职志。旋因杨王鹏劝四十一标队官潘康时商组社事，闻于黎元洪，黎以潘废弛军纪去职。曹振武所匿藏之革命宣传品被检获，幸曹振武系本标管带曹进之弟，未构成大狱，然受乃兄严厉申斥，已不安于营矣。未几，曹进奉调江苏新军标统，革命党人遂密商以鍾筠、曹振武随往，而播革命种子于江苏新军中。本营之李培基同志亦往东北军队中从事联络，以备日后吾鄂起义时之呼应。同时，为充实革命之力量，与混淆清吏之耳目，遂改振武社为文学社，外以研究文学、进修德业为名，内则广事结纳同志而谋革命之实践，此实为辛

亥武昌举义之准备工作也。

(二) 文学社之组织及阳夏第四支队之成立

四十二标自益智社合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复为文学社，其重要负责人之姓名及职务列表于下：

标代表：胡玉珍	副标代表：邱文彬
书记：王纘承	会计：杨洪涛
一营营代表：陈建章	
前队代表：戈承元	左队代表：邱文彬（兼）
右队代表：胡玉珍（兼）	后队代表：袁金声
二营营代表：赵承武	副营代表：石占奎
书记：朱澄寰	
前队代表：杨震华	左队代表：石占奎（兼）
右队代表：黄斋僧	后队代表：鄒树藩
三营营代表：刘化欧	副营代表：罗群英
书记：周道长	
前队代表：钟建衡	左队代表：胡卓越
右队代表：徐锐	后队代表：彭敦俊

此外，又为便于内外连络，设交通与会议处于营外社员家中，如第一营设于汉阳陈得元同志家，标与第二营交通处设于汉口之硚口郑兆兰家，标与文学社交通处设于汉口范明山同志家。二、三两营之交通会议处，由各营自行择定之。

清光绪三十四年张之洞调京入阁，湖北特别学堂停办。迨宣统时，铁忠任湖北督练公所总办，创讲武堂于武昌，考选各标营队正副目受训，六月卒業。讲武堂无学员宿舍，四十二标受训学员则

寄宿于四十一标营房。凡受训之正副目，概不负营内事务责任，故正副目中之革命党人，得以日事联络，不受羁束。此时革命势力日渐强大，工作亦日益繁重，文学社乃于辛亥正月集议于黄鹤楼，社长蒋翊武提议增设副社长一人以襄理社务，适王宪章受训于讲武堂，遂公推王宪章为副社长。

胡玉珍同志以阳夏一江梗阻，各营复距离遥远，营规甚严，联络时感困难，非扩大四十二标之组织不足以控制全标革命力量，提议于阳夏成立支部组织，以利革命工作之进行。并谓：“夏口尚有汉防营、警察队，非亟事联络不可，若仅以四十二标一个单位，则狭隘难通。”当经决议，先由刘尧激参议调查实际情况后再行复议。后经刘参议调查研究，认为胡标代表之提议，极具见地，于是文学社阳夏第四支部遂告产生焉。

文学社阳夏第四支部成立后，仍以胡玉珍为支部长兼标代表，邱文彬副之，支部组织与总社大致相同，惟人数较少，除书记、会计外，增设参议、交通、惩罚三组。遂以张步瀛、张大鹏、郑兆兰、梁炎昌、黄家麟、朱承堃（后改名澄宇，号旭东）、邱坤镛等为参议；黄振中、祝制六、陈得元等为交通；宋自新为惩罚。其中负参议责任之同志有考核初入社同志之言行并在无形中负训练之责任。又因支部长不能时时请假外出，恐引起上级官长注意，全仗各参议轮流请假外出，接洽社务，且行动极端保密，即营连各同志亦不知其为社中同志，恐失败时受到牵连也。

辛亥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重心移诸湖北。同时，四川铁路风潮汹涌澎湃，革命工作日益紧张。每遇野操休息时即聚集会议，练习测绘时亦聚集会议，旷野墟墓之间全成为进行革命会议之会场，标营机构几成为革命党人之附属组织。革命起义时机，已趋

成熟。

一日，营管带汪炳山约胡玉珍至公馆，突语曰：“外面革命志士甚多，闻我们营中亦有加入者，你我同事数年，不知有无办法介绍参加？”胡佯为不知，因汪突发此问，未知是何用心也。回棚后，召集同志密商，经仔细商讨，金谓仍宜严加保密。果然，不两三日，胡被调营部，充贴写之杨洪涛、贺捷三两同志则被伤下连。事后追思、汪前日之问，殆欲试探胡之口风，险矣哉。胡从此益加谨慎，并以此事勉励同人。

七月二十六日，信阳三营代表周道长、罗群英来汉阳第四支部开会，决定一接到胡玉珍盖有暗章信件即发动举义，并负责占领武胜关，以阻截清廷援军南下。

(三)八月十八日起义布置与文学总社的被破坏

自蒋翊武社长所属之四十一标被调往岳阳以后，文学社在各标营革命活动发展非常神速，同志们以发动起义日趋迫切，于是金议促蒋返鄂。蒋于八月十八日晨抵武昌。先是黄克强由香港来电谓：“鄂省勿徒轻举，候九月初旬，计划中之十一省布置妥善后，互相呼应，一举而光复汉疆。”刘尧激即以告蒋，征其意见，并以居正、杨玉如两同志至上海购枪未妥相告。蒋沉思良久，卒以黄电为是。遂急召各标营代表会商于小朝街机关部，作起义时日最后之决定。俄各代表至，金谓：“现在外面谣言很大，若不及早起事，必将发生意外，那时后悔莫及了，况且军中同志已占十之八九，若一旦举事，何虑武汉三镇不唾手而得，何必以他人转移？”蒋乃反复陈词，痛论全面与局部举义之利弊，各代表始折服其言而散会。蒋

并嘱各代表饬同志以备万一，此九月十八日午前事也。

是日孙武同志于汉口宝善里共进会机关部装炸弹不慎爆炸，汉口机关破坏，俄领事电告江汉道齐耀珊。齐遣侦察四出，大索党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武昌尚未之闻也。迨下午邢伯谦至，始知其事。蒋翊武闻状不胜嗟叹，涕泗纵横。刘尧激则慷慨曰：“事已至此，哭也无益，怕也无益，一不做，二不休，到不如今夜起义吧！”适邓玉麟由汉口来，亦赞助之，并谓蒋乃前所奉总司令，仍促蒋颁发命令（命令全文从略）。

此项命令发出时已黄昏矣，许多处均未送到，而文学社总部被破坏，彭楚藩、刘尧激、杨洪胜三烈士因而殉难，蒋翊武被逮。文学社既被破坏，清吏侦察党人益严，阳夏仅一江之隔，消息无闻。迨十九日晨，营管带汪炳山忽传令曰：“凡属各队充采办员之正副目，须于十二时前归营，否则以逃兵论。无论官兵一律停止会客，卫戍司令官须常在卫舍守卫，士兵严守岗位。”胡玉珍闻后，度武昌必有异，然禁卫森严，消息隔阂，焦灼万状，徒呼奈何而已。适是日采办归到胡玉珍充当，胡即偕伙伙至桥口，以购菜钱给之，嘱自购先归，已则往范明山同志处探问究竟。至则副社长王宪章在焉，王当语以总社被破坏详情，及彭、刘、杨三烈士就义经过，并云仍有同志尚在审讯中。王素薙发短装，不服清制，至此乃清胡制长衣，具假辫，以备出亡时掩清吏耳目。胡恐风声泄露愤事，乃亲自购备予王，王复嘱之曰：“请君令各同志准备一切，予渡江之先，曾送炸药与蔡济民、王文锦，嘱其相机行事。满奴对剪发之人特别注意，予出营已两日未归，恐遭绳责。万一武昌有事，汉阳兵工、钢药两厂与革命军命脉攸关，万不可使落满奴之手，斯责在君，望相机应之。”胡归营已午后七时许。

先是营值日官宋锡全数询胡玉珍归营否？营内同志见营规甚严，胡整日未归，且营下士学习亦停课，因之龟、黑两队同志亦断联络，皆滋疑虑。七时，胡玉珍归营，心境始为一慰。纘承适过其棚，叩以迟归之故，胡漫应曰：“家乡来人，言家慈命买物带归，所以耽擱。”顾其神智沮丧，非若平常，乃辞出。八时半点二道名毕，宋队官命左右两队正副目集合训话，首问胡玉珍迟归之故，拟照军令办理。胡述：“家乡来人，奉母命购物，因近日不能请假，乡人又不克久滞，在汉口就便购买带归，请鉴情原宥！”两队正副目亦多方宽慰，始从宽罚禁闭一月。

十二时许，胡玉珍值日官已就寝，趁纘承棚，邀往操场一谈，始转述王宪章所告武昌总社被破坏经过，并云：“武昌同志若不即日举事，起义命令定有珍名。如清吏到汉阳提人，必以予为首，予决不承认其他。不过珍十五岁离家，投身巡防营，后以新军营较好，又投入新军营，在外十余年，未报养育之恩，耿耿于怀。兹将平日积蓄之七十元及衣料一套、女鞋一双，本拟在举事前寄回家中，刻并交君代办，并以老母托。”纘承诺之，并曰：“倘你我二人同时被捕，再请黄家麟照办，请勿以此自伤！”且解慰之曰：“名册虽然被抄，多数是假名，武昌被捕同志，必不一一相告。至起义时计划姓名，均系军队中人，清吏不能不踌躇而审慎处理。”胡曰：“不能已于怀者，父歿未视殓，母老不能养，革命事业又遭破坏，将来再造此基础，殊非易事，他非所虑也。”复曰：“我乃禁闭之身，武昌消息，本支部事务，望相机处理之。”余于是收其钱物而假寐焉。禁思终宵，莫之所策，明日对右、后两队同志秘此乎？宣此乎？或者武昌同志从死里求生以达成革命之目的乎？斯时予之恩潮若波涛之起伏，遑遑莫能定也。

(四) 四十二标举义经过

一营占领兵工、铜药两厂经过

二十日甫旦，营管带汪炳山电令罢操，并云，“凡充正副目之采办事务，概责成各队司务长办理。”其情事益紧张矣。然纘承于胡玉珍所述王宪章语，益密而不敢宣，盖恐同志聆后更张皇失措也。惟有暂时镇定而待消息之至，以应变焉。适黄家麟接大营卫舍班，于是商定以本支部同志任营门卫兵，以冀或有消息至也，庸知时过向午而仍寂然。

午后一时，袁金声以奉令送公文至标署相告，纘承即囑其急足至标署，候公文投递盖印后，速驱车龙王庙渡江至武昌侦探消息，并限四时半归营。袁果如时返，并告予曰：“汉阳门紧闭，城楼上守哨士兵，左膀缠白布，军帽上无帽花，城墙上署都督黎元洪告示一方，文字内容未暇详视。”由此始知武昌已为我革命军占领矣。盖所述标记，皆前会议时所预定者也。至黎元洪为都督，则不审其故，于是以袁语告胡玉珍，请迅赴汉口通知二营代表赵承武等，言汉阳八时半举义，请二营于九时响应之，并送信至三营代表刘化欧，囑占领武胜关，防阻清兵南下；同时又恐瑞澂、张彪率河南新到之部队来占汉阳，有稍纵即逝之虞，请王宪章来汉阳襄助起义。并由纘承告卫舍长黄家麟，启后水营门出之。胡临行又囑纘承曰：“二、三营暨汉防营，由予至汉口布置，汉阳各队计划，由兄处理之；前、左两队须用命令，责令戈、邱两代表照计划实行，右、后两队亦由兄囑其各自努力。”语毕，乃服便衣而去。当时纘承促胡赴汉口，

竟忘其为受处分之人，胡闻言而起，亦自忘其为禁闭之身，黄家麟启后门出胡，亦忘有管带之命令与卫舍长之职责，盖亦鉴于历次革命之失败，义愤所激，不计其他也。

先是袁金声往武昌后，忽第八辐重营管带萧安国率兵约三百人至汉阳，拟据兵工厂，并声称奉瑞制台、张统制命令前来保护兵工厂。时守卫者左队也，视萧部士兵中有徒手无枪者，有无军帽者，武装零乱，神色仓皇，力却之。萧遂改驻水师营教场。继而汪炳山令各队遣士兵送帐篷至其处，邱文彬啣此命令来营部取帐篷，冀与同人一商究竟，适胡玉珍在禁闭不便详议，邱曰：“特负此差事来，冀能得些消息，诿仍摸不着头脑。”绩承告之曰：“外间无消息来，真要把人闷死，此时到水师营或可侦悉一二，我业已通知两队派差者，不要轮派，选各队机敏同志，由君指挥，倘得武昌消息，总要设法通知，以为内应。”本棚遂派王子卿同志随邱细探究竟，接收者为何队号，苦有熟人，须询来处，并囑以邱文彬同志命令行之。王归，始悉武昌有变焉。然本社同人竟无只字与片语相告，过急恐其愆事，株守又恐失机，焦虑俱集，莫衷一是。至袁金声归，始实之，遂决定如前述，并颁发前、左两队命令如下：

甲、顷袁金声同志至武昌回营报告，“汉阳门城门紧闭，守城士兵左膀缠白布，军帽上无帽花，城墙贴有布告一纸，署都督黎元洪五字。”是武昌同志已占领武昌，本支部“四十二标”有即时占领阳夏与武胜关任务。

乙、本标一营前、左两队今晚九时即将兵工、钢药两厂占领，先取各队部子弹分发各同志，以为进厂之需。

(1) 所有守厂之警察枪枝，一律收缴，如有抵抗，即枪杀之。

(2) 所有厂附近渡河点，须派哨监守，非有各队命令，不

准船只往来。

(3) 两厂工人与职员，一律禁止外出，但不得加害。

(4) 各队中之旗籍军人枪枝均行拆下，如有反抗，即断然以军力处之。

(5) 左队占领兵工厂后，即运大炮三尊至龟山，向刘家庙方向设防。

(6) 驻营部之右、后两队于八时半举义，即率队至兵工厂，协助左队驱逐驻水师营教场第八辐重营。

(7) 前、左两队，注意龙灯堤之枪声三响，即是营部起义。

(8) 起义时，各同志左膀均缠白布，所有军帽帽花，均行拆下，以为识别。龟、黑两山队旗，换以白布，由各队自备。

丙、胡支部长玉珍已赴汉口居仁门，令二营代表赵承武、汉防营范明山等于九时占领汉口，另派人送信至信阳，令三营代表刘化欧，见信即将信阳队伍占领武胜关，特附告。

右通知

前队代表戈承元同志

兼左队代表邱文彬同志

王缙承发于龙灯堤营部

二十日下午五时半

命令拟就后，即交卫舍长黄家麟请守卫同志分送前、左两队戈、邱两同志。连日阴雾霾尘不适之情绪，至此少为之舒矣。左、后两队同志则冀胡支部长玉珍返营取其仅有之三粒子弹，以资发难，故吾辈尔时之心情率以时钟迟迟而郁闷也。或憧憬举义后之情形，或议论起义时之策略，如祝制六同志曾云：“我们取得营部子弹后，

即将营房烧毁，以表坚决。”而缙承则曰：“兵、钢两厂已在掌握，徒惊百姓无益。”黄振中、祝制六亦然其言。此时即非吾辈社中袍泽，亦愿随吾辈共进退而受指挥，由此可以概见人心之向往矣。

七时许，王宪章来汉阳，至营门，适黄家麟在焉。缙承即邀至楼上黄振中棚，待胡玉珍归营，共商举义，竟被排长王大洪瞥见。当王宪章甫言彭、刘、杨死难事，王大洪即潜至九排门首窥伺，缙承恐事败，乃出与之周旋。大洪曰：“此何人？”缙承曰：“此予之同学，甫自日本归国，约往见面，因不能出营，渠又定明日返家，故特来相会。”大洪曰：“管带命令知之否？”答曰：“管带之命令当遵，兵士之人情不能不顾。”宪章睹状恐至决裂，曰：“我去！我们在举义之先，仍须遵守军令，以应万一，我出营待之。”于是送之出，并曰：“胡玉珍未见兄，又加疑虑矣！”后王大洪以此语宋锡全，宋乃径至营门端坐，借与黄家麟语，以何动静。缙承则密语黄家麟备白布，待举义时即向宋之左膀一缠，盖宋原系日知会党人，革命事乃其素愿也。

八时许，胡玉珍将二、三营及汉防营布置就绪归营。问缙承曰：“前、左两队命令下否？”曰：“久已下矣，惟右、后两队待君取子弹举事。”胡闻言即于夹箱底检出子弹三粒，鸣枪站队，两队士兵蜂拥至操场。胡复令取营部子弹分发之。并宣言曰：“武昌已为我革命军占领，我们今天光复阳夏为祖宗报仇，为民族争光，自今而后，我们始为大汉河山之主人翁。”（胡于民元曾将起义宣言录于笔记中印发。）后队代表袁金声得子弹后，即将该队排长翟焕明枪杀之。先是午间袁金声对翟曰：“我们要搞革命。”翟曰：“昔日某某邀我革命我未许可，今天我同你们革命么？”袁忌其语意轻蔑。故枪杀之。

宋锡全于营门口见状，意欲制止起义。黄家麟突然将白布缠

其左膀，且曰：“不要糊涂。”宋始兀立不语。胡玉珍宣布毕，即着曾汉臣、刘星垣两同志率同志三十人往硚口向居仁门二营放排枪，促其在营举事，此胡与二营代表所约定也。缙承大声曰：“请宋队官指挥！”宋乃与胡支部长商，留一排于龙灯堤，由缙承指挥之，以协助黑山钢药厂之前队，其余则随胡、宋至兵工厂。

宋在途次，意尚踌躇，商于胡曰：“武昌已为我革命军占领，汉阳明日全营伙食如何维持。且汉口于前日已由瑞澂调来河南部队驻扎刘家庙，我二营在汉口如何举动尚不得而知，我不得不以为君告。”胡曰：“伙食事藩库银子任我们支取，河南调来队伍闻系巡防营一团，我们一营可以解决之。至我驻汉口之二营，予适与该营代表赵承武分手，约定由我派兵至硚口放排枪，彼即举事。此外湘、赣党人已联络成熟，我们起义后，彼即响应而联军北伐。三营亦已有信去，即时占领武胜关。”宋曰：“请君先率队至兵工厂，我往刘家庙一探究竟何如？”胡颀之，宋即分途而去。

此时，前队代表戈承元、左队代表邱文彬均先后派兵报告占领钢药、兵工两厂情形。并复派李金山同志促遣部队夹击水师营教场之第八辑重营残部（邱等上山，辑重营曾派人来问过他），胡得报后，即率队至兵工厂，见邱正指挥运炮至龟山布防，即共商定驱逐辑重八营计划。胡嘱邱曰：“此间事由君指挥，我昼夜渡江报告武昌同志与黎元洪，借观武昌情形，并嘱通知二营代表赵承武及汉防营代表范明山，于明晨八时来兵工厂会议，共商今后进行事宜。”邱乃按胡语布置之，俄顷宋锡全亦由汉口返。

胡玉珍谒黎元洪于武昌，陈述阳夏光复经过，黎嘱其善维秩序，并手书交胡转原标统张永汉、一、二营管带汪炳山、陈钟麟等，仍维原状，诎知彼辈早已逸去矣。同时胡再访武昌同志，亦多为

军务忙，且有不在洛议局者，复忆阳夏伙食待筹，遂持黎信至硚口大生典当铺假钱千串，以为二十一日伙食之需。

其时关乎阳夏全局安危者，莫若萧安国之来汉阳也。先是瑞激、张彪于武昌出走后，即匿兵舰中布置军事，飭守卫督署之辅重八营萧安国残部，先至汉阳占领兵、钢两厂，以断吾军弹药之接济，并凭借龟山之险以威胁武昌，詎知为守卫兵工厂之左队以无层峰命令而拒绝，只由汪管带允给帐篷为彼营于水师营教场，并给二百元为伙食之需。故二十一日侵晨即有兵舰一艘至黄鹤楼转舵向龟山直驶，为我军发现，邱副支部长即令我炮手王子辉、左福齐、雷声燮三炮齐发，命中船尾逸去。此为武汉人士有目共睹者也。故终阳夏之光复兵不血刃者，当推之于文学社第四支部四十二标一、二两营之党人。而阳夏之有四支部者，胡玉珍、刘尧激二氏之力也，苟是日阳夏直承命于武昌，又无袁金声送公文之便，至瑞、张兵占汉阳，则胜负之数未可卜也。

营中有旗籍兵七名，管天修者系绩承闾棚弟兄，当举义时禁之监所，午间过此，管等诉之曰：“何以拆我等枪支，我们又未犯军令，反置之监所。”纒承告之曰：“我们今日为种族争生存，为国家争独立，故不得不先革尔满人之命，念尔等尚属好人，尔等回荆州可也。”于是各予之七元遣回原籍，后闻彼等在途中为百姓所创。

胡派戈承元同志至汉阳府监，出李亚东于狱，派张步瀛至汉口监，释放詹大悲，而詹已先出狱矣。胡即觅詹转黎致张永汉等之信，而张等已早北逃矣。胡更谓詹曰：“汉口必先受兵，军财事务，非统一机构，不能就近应付裕如，请君预筹之。”胡又派朱璧珍装行脚僧往襄樊告马队同志章裕昆等占领襄樊，防刘魁玉之巡防营东下，章等遂逐喜原而光复襄樊。惟胡支部长遣送驻信阳三营之信

尚在途中，而清廷已派大军沿铁路南下矣，道路梗塞，送信三营者不能完成任务，致三营同志未展所图。然各同志拆桥，毁路，炸敌粮弹库，殉职者不知凡几，是堪痛惜者也。先是刘尧激同志论上策取北京，中策阻敌武胜关外，后均未遂，而彭、刘、杨三烈士复殉难，汉口又罹冯国璋焚烧之惨祸，此皆辛亥武昌首义莫大之遗恨也。

二营占领汉口经过

四十二标二营驻汉口居仁门，标本部亦设于此，因便于指挥汉阳一营、信阳三营也。汉口自十八日宝善里炸弹爆炸案发生，已有密探报知情形，十九日起，营禁出入更严，外间动静一概不知，凡本社同志均互相耳语，莫可如何，只有耐心等待外来消息。至二十日晚六时本社四支部长胡玉珍潜来汉口，告以袁金声同志所探获之情形，约二营于是晚九时举义光复汉口，因一营已下令八时半在龙灯堤举义，前、左二队于九时将兵工、钢药两厂占领完竣也。赵承武营代表曰：“本营有标署在内，前队出紫阳里，右队一部驻循礼门，恐一时难以布置周密，请一营在龙灯堤举义后，即派人枪一排，在礞口外放一排枪，使营内各连便于举事。”胡即允赵营代表之商而别去。赵即通知在营部内之各队同志准备一切，一面通知驻紫阳里之前队代表杨震华、驻华景街庆安里之右队代表梁耀斌，均于九时在各驻扎地举义，将清军制之帽花、肩章拆下，左膀各缠白布，以昭识别，但所有分防任务，概不变动。

九时，礞口外之排枪声果然准时打响，赵营代表即吹哨令驻营各队齐集操场，宣布起义，将标署与营部之军装库子弹取出，分发

各队，每人配以子弹百粒，并派胡光瑞率一排人至四官殿之湖北官钱局驻守保护。鄢树藩、余鸿钧两同志各带枪兵十名巡视街道。又派汪庆祥同志率兵八名到汉阳龙灯堤第一营取得联络，并报四支部长胡玉珍汉口光复之经过和措施。斯时，胡玉珍已赴兵工厂，即向留守营部之王纘承报告一切，王亦告以汉阳兵工、钢药两厂全部占领，并云：“汉口商场治安请赵营代表尽力维持。待汉阳兵工厂设防布置完竣，即将通知二营营代表及负责各同志来兵工厂会议，商筹善后大计。”

三营在信阳之动态

三营之有革命组织，其源由于日知会所发动。先是刘化欧同志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在信阳高等小学校肄业时，经李亚东介绍加入日知会。化欧在校即暗组学生自治会以谋革命事业之推行，一时加入者有刘镇、周雷伯、李绳武、朱孔阳、欧阳祖年、胡金门、胡子明、胡卓越、黄子和、李普三、何东藩、刘次芳、周宗彝、尹宗益、孙亚武、李济武、易世葵、吴连祥、杨少堂、曾履垣、孙家让、余凤翥等二十二人。时化欧虽年仅十五而对革命工作之进行极烈，外面渐有风声透漏。未几，地方官绅以逆党大本营责备学校，几兴大狱，而李绳武终以言论过激被捕，瘐死开封狱中。化欧抱痛奔上海入中国公学，因之得交结各省志士，旋经王文贤（即宪章）、蒋伯夔（即翊武）介绍入同盟会。适徐锡麟、熊成基先后于安徽起义失败，同志会议侧重武汉，并拟遣同志加入军队中以策动之。

宣统元年秋，由上海各学校学生至湖北投入第八镇及混成协

充新兵者頗多，而化欧独注意从京汉铁路沿线入手。是时李亚东因日知会被破坏，受监禁在汉阳府狱中，化欧往谒，并遣来意，尔时四十二标一营驻汉阳，同志时与李亚东相见，间助其狱中零用。亚东曰：“武、阳、夏各营同志甚多，独驻信阳三营尚未入手，北至郑州，南抵刘家庙，延长千里，横跨陇海，尤以黄河铁桥及豫、鄂毗连之武胜关为军事必争之地，关系极重，急应进行。”化欧乃信阳人，遂遣返信阳，谋入四十二标驻信阳京汉铁路之第三营充士兵。宣统二年春第三营在花园、广水、孝感三处招募新兵，遂邀约同志分途前往应募入队。计有刘化欧、何国祿（即何瑛）、周道长、江汉涛、孙亚武、易世葵、彭教俊、郑洪升、樊绍华、李济武、朱文斌、宋济武、杨春三、朱绍武、吴连祥、徐锐、夏茂林、刘鹏程、陈锦堂、康少芳、胡卓超、钟建衡、严正奎、黄云亭、秦秉璋、罗群英等二十六人。未半载，同志多升正副目，而刘化欧与郑洪升、彭教俊更考入湖北陆军讲武堂，得与武汉各标营同志会晤，每利用星期例假与刘尧激、蒋翊武、王宪章、杨王鹏等研讨策进，旋祝制六改投四十二标一营，约三营同志一律加入文学社，当推刘化欧为营代表，周道长副之，钟建衡为前队代表，胡卓超为左队代表，徐锐为右队代表，罗群英为后队代表，加紧工作。适信阳两湖小学之刘克仁、刘延荣、胡云路、危恩元、孙思锦、陈国勋、吴邦英、陈廷龙、段良奇、陈西福等十人，保送到三营充学兵，经刘化欧、罗群英介绍，先后加入文学社。罗群英之魄力虽不及刘化欧，其号召力颇强，故又推罗群英为三营副营代表，改周道长为书记，此第三营同志加入文学社之始末也。

刘化欧自讲武堂毕业返防后，不及两周，应营长樊毓英调至

信阳车站营部担任下士教习，于是更利用机会，召集同志在城内鲍氏街住宅开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吸收官佐与文人，联络帮会暨铁路工人，并贮备炸弹、炸药等重要问题，请同志分途并进，均有收获。不一日，营军需宋荣夫、书记长孙子谷、左队队官陈尧璧、右队队官熊连三、排长殷兆涛、邱充之、胡人俊、宋辅平、司务长邱世成、张绍芝、李炳志均加入焉。陆续介绍入会者，有陈得金、夏应求、李文龙、张德元、王银汉、罗玉胜、胡建勋、汪东海、冷树勋、张鸿钧、沈廷宏等十九人。相继推举信阳易小康、刘克仁为学界代表，应山王春华为帮会代表，孝感余大猷为铁路工人代表。联络群众，劝募捐款，以备购买手枪子弹，结果由同志捐洋一百一十元，王春华募得洋六十八元，易小康、余大猷共募得五十九元。经信阳车站外科医院之日本人井上一雄，偕同刘化欧至汉口日租界栖鹤旅馆购买日式六轮手枪三十枝，子弹二千发。并派秦秉璋、夏茂林、陈锦堂陆续运至广水王春华处保存。更与栖鹤旅馆经理宫崎富多订立合同，以三百二十元订购炸药十二包、小型炸弹十二枚。十五日内，由宫崎富多负责送至信阳西乡易家湾易小康家交货付款。但社中并无余资，同志多嗤化欧不自量力，化欧返家，假其伯母之名卖地七石六斗，得价三百六十元，届时将款如数付讫，此炸弹即存易小康处。化欧因纳月捐，每月必至武汉一次，故六、七两月同志会议于小朝街胭脂巷，化欧必得参与焉。

洎文学社第四支部召集会议时，化欧以布置防务事未及前往，乃派罗群英、周道长两同志参加，结果实成三营守武胜关。化欧乃于八月十三日就鲍氏街本宅召集紧急会议，决议将贮存之手枪、炸药等物，分发各代表，并着易小康募集农民千人，王春华集合

帮会弟兄千人，余大猷通知各车站工友听候调度，刘克仁、陈锦堂、夏茂林、秦秉璋任全段铁路联络谍报及破坏等工作。分配既定，端听四支部之信息到来。而彼时来自武汉之商人，有谓革命党人连日被捕获者络绎不绝，有谓党人制造炸弹不慎，抄出党人名册、旗号等物者，谣诬繁兴，人心动摇，各同志来询消息者日必数起。化欧以未得实信，只好含混其词曰：“此谣言，虽有此传说，未便遽信也。”

八月二十三日河南陆军二十九混成协应龙翔率所部进驻信阳，消息更是不通。化欧判定武汉必已发难，否则，豫军何以均集中至此？四支部之信件岂中途遇险欤？于是决定通知各代表积极准备，集合农民四百人，携带抬枪、戈矛到武胜关与帮会弟兄五百余人会合。并传令各代表定二十五日夜半举义，左膀缠白布为识，化欧率之，向豫军进攻，与应龙翔之步兵一营遭遇于李家寨。战至拂晓，豫军败退，我军以武器过少，士兵未经训练，未敢直追。

越一日，闻四十二标标统张永汉北逃矣，又越一日，唐昌率大军到达信阳矣。多数同志集议，以为形势日趋恶劣，与其以卵投石，不如严密组织，相机袭击，借收扰乱敌后之效，以待武汉大军之到来。遂将农民遣散，仅留帮会弟兄及铁路工人六百余人潜伏于黄土关、平靖关内外相机而动。

九月初二日，化欧至驻马店、漯河等处探察敌军粮秣、弹药储藏地点，同时王春华派队长游长乐、郭洁儿、分队长郝安邦、汪大咀，率领士兵兄弟与工友二百四十人埋伏于武胜关左右侧。翌日清晨，与段芝贵某标骑兵混合队遇于周家凹，激战三小时，卒以众寡悬殊，被其击溃，我部死伤二十余人，郭洁儿、汪大咀、

文老五、陈老公均阵亡（因王春华已故，此四人本名，至今无法查考）。

化歌闻部队失利，更审北军源源而来，敌我兵力悬殊，正面阻击，无有是处。当令王春华将黄土、平靖两关弟兄妥为遣散，并通令各代表嗣后专从事于破坏交通焚炸粮弹工作。即同樊绍华、李济武间道来武汉一睹究竟，如有可乘之机，再行反攻，布置既定，始离信阳三营地而赴武汉，到时适汉口失守，径往洪山总司令部。

十一日，钟建衡谋炸漯河大桥不成，就义于偃城车站。

十七日，余大猷在东篁店北首扳反枪，将敌军车翻倒三辆，余大猷死于敌人皮鞭之下。

同日，李炳志炸明港东方转运公司之粮食仓库，刘克仁焚花园源成转运公司之弹药库，彭敦俊破坏祁家湾铁路，使敌兵车出轨，敌人死伤不少，何奇（即国禄）燃炸萧家港之子弹车，均予敌以莫大打击，皆刘营代表化歌所预定之计划也。

吴连祥、吴邦英均斃死于汉口之役，尸体丛葬于六大堆中，成为四十二标第三营革命过程中之一段痛史。缘于武昌文学社总部被破坏，四支部得信过迟，至二十日晚间之专信因铁路北段已为敌军所占，无法送达，至不能达到刘化歌代表预期之目的，而遗冯国璋焚烧汉口之惨剧也。

（五）汉阳军事布置与武昌都督府

二十一日晨，一营诸同志在会前私议曰：“此后军事责任甚重，须早为计议。”金以胡玉珍劳苦功高，阳夏军事负责人以胡为适

宜，或谓以王宪章任之。胡玉珍曰：“革命非为个人权位也，此后战争责任诚重，本支部同志与武昌方面接洽等事除玉珍及邱副支部长、祝制六同志外，少有联系，珍愿为战事联络参谋，或以王宪章亦可，最好武昌拥黎，我辈即拥宋何如？”缙承曰：“待会议时大家决定可也。”八时，一、二两营同志集议于兵工厂，一致举宋锡全为统制，协、标统以下各官职及关于军事各项措施均经讨论决议，记录在卷。十二时始由胡玉珍支部长缕列呈报于都督黎元洪，其文曰：

(一) 本日上午二时，玉珍业将阳夏光复经过面陈在案。当奉钧座手示囑四十二标标统张永汉、管带汪炳山、陈钟麟维持阳夏秩序，玉珍遍寻张、汪、陈三君，不获踪迹。

(二) 七时许有兵舰一艘向上直驶，行至黄鹤楼前转舵，向龟山冲来，我守炮士兵王子卿、左福齐、雷声燮三同志，由副支部长邱文彬指挥，对该船齐射，弹中船尾，始转舵向下游逸去。

(三) 八时，两营同志会议，均称瑞澂、张彪尚在舰中布置军事，待清兵南下，与我争夺武汉，今日舰上满载兵士，不料第八辑重营昨夜为我一营驱逐也。且汉阳兵、钢两厂为军事命脉，汉口又为华洋通商要地，亦军资策源之所，非扩军不足以资保护而策进取，决议阳夏扩为一镇，公举玉珍与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负其责。珍即申明革命非为权位者，乃荐宋锡全队官任之，并言宋为日知会同志，其学行素为同志所推重，此次举义，亦多襄助，此职界之宋君，必能裨益战守。副社长王宪章首赞成之。乃以宋锡全为统制，王宪章为第一

协协统(战事关系,各协组四标,因马、炮、工、辎筹各不及也),二营代表赵承武同志等推举该营排长林翼支为第二协协统,并举邱副支部长为参谋长,梁炎昌为副参谋长,王纘承、张步瀛、祝制六、黄家麟、宋自新诸同志为参谋,胡玉珍任参谋及交通,郑兆兰任军械兼摄兵工、钢药两厂厂长,兵工厂须即日开工。杨洪涛为军需,黄振中为第一标标统,王殿一、万逢霖、王桂国为第一协二、三、四标标统,此三人皆为一营队官、排长也。陈建章、戈承元、张大鹏、普于斌诸同志为营长,朱承堃、邱坤儒、张仲斌、袁金声、陈得元、黄家麟诸同志为营副队官等职。出日知会党人李亚东于汉阳府监,即由宋督派为汉阳府知府兼本部执法官。并酌留老同志百人不任官职,组织特别队以为临时差遣及战时敢死队之用,由参谋处指挥之。

(四)第二协组织由赵承武、石占奎同志等会同林翼支在汉口组成,迅速具报,并责妥为保护汉口商场及租界安全。

(五)各部须迅速派人就地招兵训练,各机关务须即日成立,以专责成等情,谨呈

都督黎鉴核

文学社四支部长兼原四十二标代表胡玉珍于汉阳兵工厂公署同时令各机构即行成立,并请宋锡全以统制名义颁发防守命令,宋即拟就颁发如左:

命令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发于司令部汉阳兵工厂公署

甲、第一协协统王宪章将原一营扩充一协,防守兵、钢两厂,兼保鹦鹉洲及汉阳各地安全,并速招练新兵以资进取。

一协未组成前，先派防守任务于左：

- 1、陈建章同志营：防守兵工厂，对于泉隆巷与集家咀渡河点，须派独立弁哨防守，左与钢药厂戈营切取联络。
- 2、戈承元同志营：防守钢药厂，所有黑山渡口、钢药厂码头、凤栖寺、通十里铺大道，须派队常川驻守。
- 3、张大鹏同志营：防守马家湖通汉阳城、泉隆巷大道，但马家湖岸常川驻一队，西北与凤栖寺戈营、北与兵工厂陈营，均切取联络。
- 4、普于斌同志营：防守河泊所及汉阳东门外河岸，择要防守，并派队驻鸚鵡洲，西与张营、北与兵工厂陈营，均切取联络。
- 5、各营于哨地配备完竣后，绘图呈报，以凭巡查。
- 6、待第二协组成呈报后，再令各标分担防务，各营均须招练新兵，不得以哨务而疏训练。
- 7、依会议决定，特别队长派王敷武同志充任，由参谋处指挥调遣。

乙、第二协协统林翼支同营代表赵承武诸同志，速往汉口将原二营及汉防营扩充一协，择要布置防务，保护商场及租界外侨，并迅速招练新兵，至设防地点绘图呈报备查。

此外兵工、钢药两厂郑兼厂长，迅速检查弹药、枪支、大炮、炮弹数目，列表呈报，以凭计筹，并即日夜开工，以裕军需。

二十二日晨，据报汉口硚口发生抢劫，当派张步瀛参谋率本部特别队镇摄，捕得抢劫匪二名就地正法，并枭首示众。汉口商民得以安堵。是时，张步瀛见有炮队军官二人，以为逃逸者，乃带至司令部。王纘承出见，系同学沈毓藻（又名平均）、张声贵，于是商诸宋，委沈为龟山炮兵司令，张为团长。后沈于荆州独立之役

阵亡，张以政治日益腐败，于民国二十年剃度学佛，现已圆寂矣。

二十三日奉黎都督批曰：

据文学社四支部长胡玉珍呈报会议录及阳夏军事布置情形一件悉，兹核示如下：

(一)阳夏四十二标一、二营，兵不血刃，阳夏而获光复。

(二)龟山炮队击退清兵觊欲占兵工厂之企图，足征各同志努力兴汉，深堪嘉尚。

(三)各同志所议各节均有见地，惟军府初组，经济困难，扩充一镇，似嫌过大，着以宋锡全为第一混成协协统，王宪章同志暨林翼支均为标统，余照议施行。仰各同志共体艰巨，此令。附发宋、王、林委令各一纸，余俟宋呈报后加委。

胡玉珍遂以此令交宋转饬参谋处存案，金镇协本无轻重，惟军府所计者经济，吾辈所计者战争耳。

同日，三营有右队排长胡英初（本社同志）以铁路均为清军据守，乃间道来汉阳，由王绩承偕见宋，即委为参谋。

二十四日，马队同志陈孝芬由襄阳率马队十余骑到汉阳，大家议举为江汉水师协统，以维水上交通。

是日，军械处长兼摄兵工、钢药厂厂长郑兆兰同志报告两厂处理概略，其文曰：

(一)奉钧令，兵工、钢药两厂厂长郑于即日开工以裕军需，并核查所有枪炮弹药数目，缕列具报等因，兹据副官胡得胜、委员宋自新督率点验各库所存：步、马枪各七千五百支，枪弹二百二十万八千发，五生七过山炮五十六尊，钢炮一百另八尊，其余钢、铝及各种材料甚多，五生七炮弹已成者三千余发，完全装成者三万发，惟碰火、底火

有十万发尚存省库，且急需。派王纘承同周拓疆赴都督府领取存储南湖之火药库器材内之碰火、底火。因需用至急，管库人他出，多方设法始得取出，以供药厂之需要。

(二)钢药厂经张大鹏同志检查，存棉花一库、黄镪百余罇，无烟药及白药（即炸药）陆续运至兵工厂，烟、焦二煤，均三百吨。

(三)并派石仲文督率召集监工王金山、枪厂目余庆鳌、炮厂目沈二颂漏夜开工，以符钧令。右三项谨核。

二十五日，奉都督令，四川同志熊克武回川，拨兵工厂枪枝五百支，并装配弹药及发运费五百元。又枪支五百支，子弹二十万发（王原稿作：“枪三百支，子弹配百发”，令从梁钟汉先生回忆录更正。——畴春志）交日知会党人梁钟汉同志光复汉川及刘英同志光复永隆河，以充军实。

是日，又奉令派员会同都督府所派点名官来阳夏各部队点名发饷，当由王纘承、黄家麟同往办理。

（六）阳夏之役

八月二十六日，来犯者有张彪所部辎重第八营残部，瑞澂调来河南崇钦巡防营、陆军混成协五十七标、五十八标各一部，及由湖南调来巡防营王鼎华、夏占魁两营斥埃队，均将其击退。

二十七日，复奉指挥何锡藩令，驱逐刘家庙之敌，派第二标标统林翼支为左翼指挥。林派第三营营长赵承武同志为前卫，由大智门循铁路前进，刘仲升、吴元胜两同志各率两队为左右侧卫。赵营长奋不顾身，往夺五十八标标旗，与掌旗官李兴旺、排长刘国

璋、雷世凯及士兵三十余人阵亡，萧志忠、王师、黄寅龙等均负伤。

午后四时，复派黄振中同志营渡河接战，战斗彻夜不息。

二十八日，林标统由姑嫂树侧击，黄振中营当右翼正面。敌军由火车运兵增援，被我炮队集中火力袭击，将敌车击翻。我黄营张文彬鸣号冲锋，民众助声喊杀，敌向滌口溃退，遂将刘家庙占领。敌遗弃粮秣、子弹、帐棚甚多，居民与铁路工人争相搬运，老幼男妇送茶送饭者络绎于途，商会亦购面包等至前线餉军。

我军携胜利品回部，途人咸脱帽称贺，商民临时购买红绸布赠送各带兵官，商家自动燃放爆竹，可见人心之思汉也。商民见革命军保商保民，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将借故抢劫商民之匪徒就地正法（硃口二名，华景街一名），商民得安谧，军民买卖一如平时，大为感激。战时百姓送茶水至前线者，我官兵劝其小心谨慎，恐误中敌弹，金曰：“我等亦汉人也。”军人曰：“但我等负责较尔等为重耳。”因之商会于二十三日由吕超伯等筹措阳夏军餉五百万元，交胡光瑞办理粮台之用。可见当时军民合作之心，即革命成功之左证也。领事团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非无因也。

是役虽将刘家庙之敌驱逐至三道桥，我林标之三营长赵承武阵亡，是莫大之损失也。赵随县人（或谓为枣阳人），乃四十二标秘密时代二营营代表，汉口之光复赵为首功。此后汉口之陷，林标之溃散，皆与赵之云亡，部队中无核心作用之维系有关系。赵之牺牲，是文学社四支部第一个损失也。

二十九日，我军又将二道桥之敌击退，进攻至三道桥。敌乘我军进至半途，用机枪扫射，我军死伤甚重。林标虽绕至姑嫂树侧

击，而三道桥之障碍终难突破，乃守造纸厂之线，与敌相持。

九月初一日，我军进至三道桥。

初三日，我军攻至三道桥，敌仍持机枪扫射，我不能前进。敌并由戴家山用大炮轰击，同时在军舰炮击我预备队，我军退至刘家庙北端。是役我黄振中营之队官黄家麟与排长胡有道及士兵四、五十名阵亡，都不记其姓名。

初六日，敌分两路进攻：一由造纸厂挺进；一由姑嫂树侧进，以戴家山炮击为掩护，又用兵舰大炮向我本队发射。我军不支，退出跑马场。

初七日，我军夺回跑马场，黄振中营、王殿一营均加入战斗，并派参谋王缵承、张步瀛率王敷武之敢死队参加攻击。敌火力猛烈，我军凭铁路线与敌相持。是役，王殿一受重伤，各部死伤亦甚重。

初八日，敌占跑马场，沿铁路线通行无阻，向前猛进，我军退守大智门、循礼门一带。

是日午间，黄兴由沪来汉，见战事失利，至都督府会议，宋派参谋长邱文彬与焉。决议举黄兴为战时全军总司令，武昌加派队伍，限下午十二时渡江完毕，抽调汉阳七成队伍渡河，于次晨二时至硃口居仁门待令，参谋长邱文彬于十二日至龙王庙，随总司令部前进。并派熟悉街道之参副十名，为渡江部队袭击敌人之向导。

初九日，宋以林标死亡逃窜者众，派第一标标统王宪章率队渡河担任左翼作战，囑遵黄总司令指挥。但武昌渡江之部队，以渡江工具缺乏，未能准时到达，我左翼在战线上彻夜作战之队伍合王标新加之部队，与敌随进随退。复将敢死队百人由参谋张步瀛、王缵承率领前往。是时，不但不能进攻，且在火线上发生动摇，只得将敢死队加入火线以支持之，而循礼门车站亦告不守矣。黄兴过江

与黎商战守事宜。午后二时，黎令宋锡全为汉口指挥，宋奉命，即电告黎加兵来汉，一面令参谋黄家麟渡河至前线勘查战况，火线已无兵可移，汉阳兵、钢两厂守兵又不能抽调。宋视此困难形势，叹曰：“指挥徒加，于战何益？”

由汉口渡河之外交部长胡瑛至厂，晤宋曰：“汉口无船只渡江，于上午已见有红边军帽之清兵，因我穿便衣，敌不甚注意也。”宋即请电告黎，请求派机枪一连来保守汉阳，宋并曰：“汉口不守，不但汉阳可危，而武昌亦可危。湘、赣援军又不至，新募兵未经训练，不知战斗之技术，当前急务，非从速训练新兵不能为力。”胡曰：“闻岳州尚有守兵，如能抽岳州之老兵来武汉，以新兵在岳州训练，支持现状以待应援，事尚可为，否则此次又不堪设想矣！”并云：“今晨有挂外旗之兵舰上驶，清廷诡计多端，未知有无清兵在内。若加生力军至荆州，将来两下夹攻，武昌更属可危。”时黄家麟参谋返部，带回敢死队十余人，曰：“前方战况惨烈，循礼门失守，我军死亡甚众。”

刘家庙方面，敌人架设大炮向我龟山炮兵阵地发射，兵工厂时有敌弹落下，工人因之停工。

胡玉珍由汉口归，亦述战况不利，林标星散，且不悉林之踪迹。宋曰：“速派人往十里铺招收溃兵，暂交戈、张、陈三营补充实力，以为汉阳之守。兵工厂司令部非移至河泊所不可。司令部之粮弹武器，均当迁移。”胡照所商飭人进行，渡江至武昌。宋即请其面商黎都督，派机枪一连来汉阳，以助防守。

王绩承往厂内觅工人，架火车头于兵、钢两厂铁道上，以便夜间梭巡，表示我方之镇静。

七时，宋与王等均未晚餐，伙夫送饭至前线未归，贩食品者亦

闭门。缙承与黄家驊往西门收买饼食不得，拟进西门城内收集，李亚东竟将城门紧闭，守城人坚不肯开，转至山头黄桂国团内造饭果腹。至兵工厂见宋，宋尚未晚餐，兵工厂监工王金山，江苏人，令其伙伙代宋煮饭。王金山原为兵工厂监工，郑兆兰兼厂长后，委王为总办以资熟手，此人同情革命，至危急时尚不避也。

宋令防守汉阳之戈、张、陈三营仍照前月二十一日防守命令遵行，不得疏忽，司令部即暂移河泊所办公。

初十日上午四时，宋带收容的士兵二、三百人，乘船驶往岳州，为岳州守军所阻，未能登陆，乃径至长沙。适湖南有杀焦拥谭之变，黎元洪电谭，以宋临阵脱逃之罪戮宋于长沙。宋锡全，湖南人，投军湖北，除操课外，读书写字以自遣，待人和蔼而严毅，对于训练操学毫不宽假，为全营军官之冠。曾加入日知会革命团体，为党精心力学，治事不紊，尤多独特之见。忆辛亥六月载洵来鄂阅操，渡江乘小划，舵工为一未成年之孩提，舟至中流，宋曰：“我们全船人生命，付此小孩之手，岂不可危？”宋于操课之余，亦时发此种言论。阳夏未举义时，彼尚不知本标有文学社之组织，全标人推举为汉阳军事首长者，皆由于平日对他有信仰，亦我四支部之四十二标革命党人只知推翻清朝，毫无权利之私介乎其间也。宋被杀乃革命党人之损失，亦湖北文学社四支部之四十二标第二个最大损失也。

初十日晨，黎得宋赴岳州之报告，即派蒋肇鉴继宋职。蒋至汉阳兵工、铜药厂见陈、戈两营防守极严，当即召陈、戈、张三营长会商，充实部伍，将戈、张两营归并陈营，令戈、张另行招编，陈则充第一营营长。

汉口之我军有未尽退者，各同志据街自守，造成一时混乱状态。

敌人占据集稼咀时，借怡心茶楼上架设机枪，向我兵工厂扫射，守厂士兵受其威胁，陈建章营长令同志仇凤山、陈华建、刘国材、江正清、黄子松等设法将茶楼烧毁。后黄兴来汉阳任总指挥时得以成隔河对峙之局，与此有关。

胡玉珍招收之阳夏散兵，乃原四十二标一、二营同志，又组一营随刘公北伐。先是曾派朱璧珍同志往襄阳联络马队同志，阻截刘蕴玉巡防营尚未返，意随刘北伐，朱同志在襄阳必得健儿，故先随季雨霖招讨使至仙桃镇。胡玉珍充营长，王纘承为营副。诎行至钟祥，有张楚材、钱明汉阻命，胡联络钱明汉，张楚材见势孤逸去，而钱亦为季招讨正法。即至襄阳，适南北议和，乃商诸王纘承，由王先返武昌，如和议成，即不来襄，战则率四十二标老同志北伐。逾王至武昌，陈建章已在武昌平湖三巷设招待所招纳前本营同志。

当陈建章随蒋肇鉴在汉阳防守兵、钢两厂，而黄兴总司令亦到汉阳，另布置防务，派陈随蒋守锅底山、扁担山、美娘山等地。至十月二十六日，敌由金龙面粉厂渡河取琴断口之战，恰陈建章营守之，日人古前川随陈营御敌阵亡，营副袁金声、队长刘子清、陈占奎负重伤，薛占胜、赵良佐、刘国材、吕家楨、黄春山、张钦福诸同志见此情形，以极猛烈之火力支撑，始得将袁金声等抢救抬下火线。此役阵亡者有林福生、孙正仁及姓名不能记忆之军官甚多。

全营退至汉阳城内整顿时，仅剩三、四百人。我革命军能如此为国牺牲者，实由我革命党人平素有以养成也。陈建章同志以两月来连日战斗，精神颓疲不堪，遂将营长职务交陈得元代理，渡江至武昌平湖三巷休息，袁金声亦因伤重送医院诊治。未几，汉阳即告失守，时我龟山之炮兵团长张声贵（后改名复初，号养吾）为殿后渡江之一人，在万分紧迫之时，将所有炮弹各件全数搬出，退至武

昌。后黎元洪复委陈建章为第十八标重营营长，陈辞不就，而与王绩承在平湖三巷设扩大四十二标招待所。

胡玉珍于和议告成后，将其营长职务交与马队同志章裕昆，只身返武昌，将所收容之老同志安置于警察学校（后改湖北军官学校）。此文学社第四支部之四十二标于阳夏光复战争中所经历之概略也。

（七）和议告成与文学社合并于同盟会

和议既成，南北复归一统，言政治者或倡责任内阁制，或倡各政党联合组阁者，以是组党之风若雨后春笋，而革命运动初期之秘密组织某社某会，以毋庸秘密，相继扩张组织，重树名义，以事标榜，而广结纳。文学社同志鉴于党会林立，乃会商于民心报社三日，检讨文学社从事革命运动之得失及其存废问题。金主另立党名，而宗旨要在为国家民族谋幸福。或以既欲组党，应广纳党员，于文学社之已往规章，是否有妨？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故集议数日，终不得一结论。适同盟会于鄂省组织支部，以石瑛为支部长，石瑛愿与文学社合并，由文学社举一副支部长及交际与干事数人，襄办合并手续。众以同盟会于海内外素著声誉，遂决议与同盟会合并，公推王宪章为鄂同盟会副支部长，杨王鹏为交际主任，王玄奕、曹振武、黄家麟、陈善策诸同志为干事，办理文学社同志名册归并手续，而辛亥首义前后文学社之革命组织名义，遂寿终正寝矣。

原文学社四支部之四十二标地属阳夏，与京汉铁路线上驻地均陷敌。所有光复时之称协统、标统者，因战事变迁，凡易其人。秘密负责者只知排满达目的，又未负军事、政治重要责任，至此名既

假人，器当别属。故时有论者曰：“革命成功，革命党消。”岂非确论也哉？和议成后，胡玉珍与王纘承于三道街组织春秋报社，郑兆兰于汉阳开设皮革厂，复与邱文彬等组织普利公司开矿，避不与争。但造归并名册时，胡玉珍召同志集议于春秋报社，欲以效力于阳复战事之同志加于秘密时之名册内以昭大公，乃有人密报黎元洪曰：“胡玉珍秘密开会，组党加盟，恐有异图。”黎即暗令驱胡。此时，黎已杀三十一标秘密时代表江国光、滕亚纲与四十二标秘密负责者祝制六于汉阳门，未整审讯即行枪决。胡鉴此，惟有出走以避之。顾黎氏之在湖北兴党狱时，昔日携手革命之同志，则分为座上客与阶下囚矣，甚有借故诬枉者。如春秋报社甫出刊，八月即有马队之变，黎竟以春秋报社为同盟会之机关，或与之有关。幸充主笔者之王宗藩、总编辑范希仁、编辑何道存辈，皆非同盟会会员，故未遭封禁。至其他同志往各地遭惨杀者亦多，如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死于桂林陆荣廷之手，副社长王宪章死于南京冯国璋之手，胡玉珍于洪宪时死于沪西监所，其他死于各省者不胜屈指也。

癸丑讨袁回忆录

耿 毅

一九一二年六月，黄兴卸南京留守职，劝王芝祥北上就直隶省都督职。王以第八师既归中央直辖，其余军队都已给资遣散，遂邀我同到北京，拟用我帮助直督的事务。我允同行。

离南京时，召集第八师军官茶话。我说：“此次随王铁老（王芝祥字铁珊）晋京，一为帮助直督事务，二为侦察袁世凯究竟对于共和是否忠实。我总疑袁对于共和政体及吾同盟会会员都有异心，将来还需要战争，你们责任极重，务望切实训练军队，以备意外。”众军官都说：“只要支部长有命令，我们一定遵从。”随又谈及整理会内各事，并请炮营长邓鼎封、步营长甘尚贤等负责办理。后随便闲谈，吃点茶食，尽欢而散。翌日，随王芝祥到上海，乘海轮赴天津。

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乱造谣言，说王芝祥带了许多军队，将来要把北洋军队一律遣散，凡反对革命者一律杀却。他还发了许多传单，叫天津人民反对王督直。此种举动皆系袁所授意。但是天津知识分子多表示欢迎王督直，双方开会，舌战极烈。王不便多住，遂转火车至京，寓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次日，我随王谒袁，袁称誉不绝，并请吃饭，聘王为高等顾问，月支伏马费八百元，我为参议，月支伏马费五百元（当时凡上将都聘为顾问，中将聘为参议，

少将聘为咨议)，但总不提王督直事。北方一般同盟会会员及新人物，如刘汝贤、王震三、温世霖、郝濯等都忿极，连日催总理唐绍仪发表任命。

唐和袁商，袁说：“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么？”唐说：“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袁说：“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预闻。”唐说：“这是责任内阁职权，我要发表。”袁说：“我不盖印，就能生效么？”二人相持数日，终不能决。后袁竟不和唐商，任命王为南方裁兵大员，并办理善后事宜，劝王南下。王亦觉为己督直一事，使他们常相争执，恐惹越天局扰乱，遂允任裁兵事。

唐闻王允任裁兵事，大怒，并说：“王铁珊真不够朋友，我为他的事和袁争执，他反拆我的台，我还有啥话说。袁竟不和我商议，自行任命官吏，我这内阁还算甚么责任内阁呢？不如早走为是。”遂微服乘三等火车赴津，转轮至沪，不问政事了。

我随王先到上海，裁沪都督府所辖的军队二十五、六两师。两师因枪械不全，遣散甚易，惟张宗昌所部三百余人原系东北胡匪，如遣散后流落上海，仍以抢劫为生，将会惹起外交事件。王和我商，拟将张部编入第八师内。我说：“八师皆广西、湖南人，张部皆东北人，言语不通，久住一处，恐生误会。且一系革命军队，一系胡匪，抢劫成性，犹如水火，更难相处，不如编到徐州第三师内。”王亦觉妥当，令我电徐州冷逸师长，请其收编。冷亦首肯，遂将张部暂编为第三师骑兵团，张为团长。南京各师则缩编为三个师。

湖南独立时，乱招兵士，将原来的一混成旅扩充为六师、两旅。都督谭延闿因兵太多，无法发饷，决定裁兵，并电袁请王芝祥协助。袁极愿南方裁兵，借以削除异己，遂电促王赴湘。谭得袁允，

亦电王赴湘商议裁兵事宜，并请酌带军队，以资镇兵。王令我和赵恒惕先到湘和谭详商办法，并言经过江西时，将第八师三十一团及机枪炮兵各一连带至长沙。先是，马毓宝为江西都督，乱招兵士，极为赣人所不满。及南北和议已成，赣人请李烈钧为都督。李回赣时，他的机枪和炮太少，恐不足镇慑被裁部队，遂到汉口和我商谈，酌借机枪和炮若干，我遂令三十一团和机枪、炮兵各一连归李指挥。现李已将五旅十三团十七营杂滥官兵改编两师，均已妥贴，无用兵镇慑之必要，故令三十一团团团长率该团及机炮各连先集合到九江，随我开至长沙。

我们到长沙和谭商裁兵事，谭说：“所有官兵都是起义有功之人，不便遣谁留谁，莫若尽数遣散，较好办理，已跟师旅长和参谋长商妥，即或有极小部分不愿意者，亦不至出特别事故，即请王速来办理吧。”

王来湘三月，将所有军队遣散，平静无事，惟第五师的官兵系拥护谭为都督者，回乡前愿和谭督话别。谭的参谋、秘书，有劝谭出去和兵士谈话者，亦有胆小的人，恐谭和兵士见面闹出意外的事，议论纷纷，久不能决。众兵士在都督府大门外候久了，即有性急者出言不逊，渐次激烈，有的说：“你做都督系我们所推举，现在我们还乡，你却不见一面，难道说我们是老虎么？你真不见，我们可到后边见你吧。”

谭觉不能不见，遂出来说：“我并不是不见你们，适有要事要办，遂使你们久等，甚为抱歉。”并说：“你们还乡后，务必和一般乡人谦和相处，乡中有公益事，先自领头办理，不要因为自己为独立有功的人而傲视乡里。以后如有事故，仍请你们来省”云云。

众兵士闻之，都说都督所说，铭记在心，遂告别而去。湘军都

已遣散，长沙无兵镇慑，遂将八师的三十一团留湘，扩充为旅，仍以赵恒惕为旅长。癸丑讨袁失败后，袁任命汤芑铭为都督，将此军队遣散，我至今思之尚有余恨。

湖南裁兵完竣，王芝祥令我到京报告一切。我见袁世凯历陈经过，袁不甚注意，惟闻我说的是北方话，甚为惊异。袁问：“你是那里人？”我说：“是直隶顺德府任县人。”

袁又问：“你在南方甚久，想必朋友甚多，南方情势亦必明了。”我说：“大概明了。”袁大喜，遂说：“我在彰德府住家，你在顺德府住家，相距不过二百余里，可称为近乡亲。我这里甚缺知南方各省事情的人，你以后可每日来府帮助。我手下甚缺这样的人物，现在有你，我就不愁了。”我唯唯。

我以为袁真想和南方和好，用我同南方联系，当时我大喜过望，后来始知他是想用我当他的私人，要我供给情报，便于他消灭南方革命势力。

从此，我每日到总统府上班，所有袁的亲近大员，如段芝贵、陈宦、唐在礼等都和我交好。陈宦告我说：“上午非闻袁总统上去吃饭，不可下班，下午可以不来。”我问何故，他说：“上午系会客时间，南方各省代表由你领见，所以你非在此不可；并且他和代表所谈各节，或有疑问，或有所遗忘，都须你为他帮忙。下午是他处理内部事务的时间，不用我们伺候了。”陈如此照顾，我只好说谢谢而已。

在总统府办公四月，每日我领南方各省代表谒见者至少一人，多则七、八人。各人向袁请示，虽有多至三、四件者，袁都当面决定，能办者就办，当时不能办者缓办，不能办者不办，处事明决，丝毫不乱。在此四个月中，袁仅有二次问我，某代表所说三件事，一二两件记得，第三件忘了，令我说明。我如实答复他。袁说：“到底

你们年轻人记性好，我老了，事多就忘。”

其实所有代表凡有请求事件，必先和我详商，某事能办，可以直陈；某事不能办，现时可以不讲；某事可以办，但是应当如何说法，他才愿听能准，如此再三研究，再作决定，所以我都能记得清楚。若使事先不研究，后来都能记得，我虽年轻，亦难做到。我见袁能如此强记和果断，如能实心为国，国家富强，指日可待，因而我此时真想竭诚相助。

他看我忠心为他办事，他的真意渐渐露出来了。一日，阎锡山派代表送来汾酒百坛、羊皮千张，尚有许多珍品。袁大喜，对我说：“百川近来真好，听我的话了。”我说：“公为国家元首，各省大吏那有不服从的道理。”他说：“胡汉民、李烈钧二人就不听话，我曾使人叫胡送点迦南香、肉桂等物，至今尚未送来，胡大概不愿意送吧。李烈钧是个硬头蛮子，不懂道理，我还不愿和他打交道哩。”我和李烈钧是极好的朋友，袁说这话，我心里非常不快，但也不好当面驳他。当时我想：他为国家元首，不能做到政治清明，使各省大吏衷心悦服，而专想使大吏送东西，听他个人的话，这和前清政府王大臣的骄横贪污有何分别呢。

我起先尚疑他当清廷官僚甚久，骄横贪污的恶习熏染甚深，所以他到民国仍然不能改变他的作风。又想他是枭雄之辈，不是平庸官僚，对于政权，当有野心，如曹操、王莽者流，将天下稍有能干的人尽纳入掌握之中，专供己用，非其类者则锄而去之。他的意中必有特别计划，我以后必须故意和他亲近，察其所为，究竟有何用意。每当引见代表后，稍有时间，必和他谈几句，表示殷勤，使他相信我也象他的心腹。此后他每见一人，必加批评。如条陈时局应如何办理者，他就说少年躁进，不堪大用。如专事逢迎者，他就说将来

可做外省大吏。他是一个好任用私人、好揽权之人，无怪段芝贵等都是他的重要人物。看此情况，深感从前议和是个大错，将来国家败坏，尚不知到何地步，恐怕还要比前清政府更坏。我将此情密函告中山、克强，他们只有叹息而已。

袁主张“军民分治”，意在削弱各省都督的职权。各省都督知他的用意，都甚反对，然不便明言。唯赣督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廷闿、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表面托人疏解，暗派人挑拨离间，迭出事故，各省不能抵抗。

余嘉松本系李督同学，和李平素甚好，因李把他的军队（余为旅长，其实不过六七百人，且枪支不过三百余）编到别人队内，委他为省府顾问，余心不愿，遂跑至北京谒袁，辞气之间，对李颇露不满，袁知可利用，遂给以咨议名义，月支三百元。此时袁甚恨李，遂给予重金，叫他到赣便宜处置，只要能够倒李，就任他为江西都督。余官迷心窍，到南昌竭力运动往日军队，遂有一月某夜之兵变。幸变军仅为余之旧部，李派军击散，至天明即平定。余知所谋不成，连夜逃京，袁尚慰劳，并说将来再说吧。

李督幕府中人深知此次兵变的原因，力劝李督暂时忍耐，并说旧军既已遣散，新兵尚未招齐，羽毛不丰，不能高飞；且袁的异志尚未全露，不能声罪致讨，不如暂时虚与委蛇，一面充实军队，一面寻觅时机，决不可冒昧从事。

李亦觉以隐忍为妥，但袁既要“军民分治”，若听他任命省长，深为不便，不如寻一合宜之人转荐给袁，谅袁也不好拒绝。李再三思维，始想起前当学生时，学堂总办系道台汪运闿，人极聪明，处世温和，尚能和自己契合无间，请他为省长，不至和自己不合作，但不知他是否愿就，遂派员到安徽和汪商议。汪是漂亮官僚，不甘寂寞

的人物，当然愿干。汪认为李既叫他当省长，江西方面不成问题，惟闻袁和李极不睦，专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当，岂不更好。遂进京谒袁，述李荐他为省长固然好，但甚愿请大总统径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这不是表示中国更统一么。他又尽力施展官僚手腕，曲意逢迎，博得袁之青睐。袁遂任命汪为江西省长。

李闻汪先到京运动求袁任命之举，大为忿怒，以为他所以请汪为省长者，乃希望汪帮助他，不为袁用；现汪反求袁信任，不为他助，他要汪有何用呢？遂使蔡锐霆、陈廷训联络一批人士开会，谓汪系官僚，不配当民国官吏，通电各界各县反对汪为江西省长。

先是，李初为都督时，鉴于江西在前清时只有一混成旅，现虽将滥杂军队缩编为两师，枪支所缺尚多，遂在日本购枪两千余支。这批军械恰在闹省长问题的时候运到，袁遂使陆军部电知九江关扣留，并令非有陆军部命令不准任何人领去。这又是一个双方争执的问题。

于是谣言四起，李、袁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王芝祥深觉大局初定，又起战争，国家元气必大受损伤，他表示愿去江西调停。袁初尚犹豫，后王对袁说邀我同去，袁遂赞成。盖袁表面上同意调和，实则欲利用我解决李协和矣。

一日，我领代表谒见毕，袁问我：“能早起否？如能，明日早六点半来，我和你有事相商。”我唯唯。

翌早，我六点到，袁已在办公室内等我，一见大喜，说：“年轻人都是贪睡，你能早起真好。”并问：“你是顺德府任县人，你们那边是种高粱、麦子、豆子、小米么？”我答：“是的。”袁说：“究竟那一种多？”我说：“西方高亢，多种麦米；东方低洼，多种高粱。”袁说：“你

县十年有八年水淹，我在直隶时，很想把附近河道疏浚一下，使你们地方免遭水灾，至今未果，深为愧作。现在还是每年水淹吧？”我说：“大概是的，这几年在南方，不甚清楚。”袁说：“我又忘记你在南方了。如果水淹时，一般人打的粮食够吃么？”我说：“水淹时粮食不够，如果一年不淹，洼地甚肥沃，打的粮食甚多，足够二年吃的。俗说洼地不养家，倒可发家，即是说如数年不淹，贫家也可成中等户了。”如此漫谈，墙上挂钟已打八下了。袁说：“我们叙叙家常，把正事忘却了。今天八点钟，法国公使来见我，我们不能再谈了。明早六点还来，再谈正事吧。”第二日六点到府，袁问：“你家中有多少人，都是什么人？”我说：“先严在我十岁时病故，家母健在。我兄弟三人，长兄已死，有一子二女；二兄在家务农，有一女；我无子女。一家共十人。”袁问：“老太太高寿几何？”我说：“家母六十九岁。”袁问：“你家有多少亩地，水淹尚够吃么？”我答：“高地有十八亩，洼地六十余亩。若是淹了，不够吃，只好加点糠了。”袁说：“如此，老太太太苦了，七十岁的人，那能还吃糠呀。”说着，由袖里拿出一张支票，并说：“把这个寄回家去，买几亩地，或做点生意，老太太就可以不受罪了。”又拿出一件皮外套说：“你也拿去吧。穿上，在路上不至受寒。”我看支票上写的五万元，那外套是海龙领子，呢子面，狐腿里子。钱如此的多，衣如此的好，我如何敢受呢？我说：“家中虽不宽裕，也可以勉强吃饭，况且今后将我的薪金每月寄家一半，不但丰衣足食，数年内就可成富家了。南方天气温暖，这种外套也穿着不着，还是留着大总统自己穿吧。”袁执意给我，我坚意辞谢，正在争持间，墙上挂钟又响八下了。袁哎呀一声说：“时间这么快呀，现在要谈正事了。你同铁老到江西，我这里有个办法，你照此而行就可以了。”说罢，从袖子里拿出一封信并密电一本交我。我看这

封信是封好的。按官场中的规矩，信不封，可当面观看，如有疑问，可当面请示；如已封好，就不许拆开了。我对他既有疑心，凡他交付我办的事，我都要细心研究一番，况他和协和平时就是对头，现在又闹省长、枪支两件事，这封信的重要不问可知，我不能不立即拆开一看，究竟是什么内容。当我拆开的时候，袁立色变，即说：“这是我的办法，你照着行就对了。”他本来觉着我已经是他的心腹，一定会按他所定办法照行，现竟拆开要看，真出他意料之外。我一看不胜惊异。他写的是：一、汪运闾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锐霆、陈廷训重办；四、李烈钧下野。我看完后，说：“大总统办法既定，那就不必调和了。”他说：“你聪明，你明白。”我说：“我不聪明，不明白。这事必须先察看情形，再用调和办法，倘仍不行，就照大总统的意旨来办。”他最后说：“你既说不能先定，那就你先去察看，再来电商量办法吧。”我仓皇出门，也没拿支票和外套。他唤我拿去，我装作不听见，逃出来了。我第二天到府，收拾我办公室自己所用的东西，陈二庵（宦）听我来了，就到我屋内闲谈。他说：“主峰（指袁）说你人极忠实，惟不懂世故，此次到江西，不见得能办妥。”我说：“我太年轻，无识见，大总统教我随王铁老到江西调和，可是他已经规定办法，叫我执行，我真不明白。”陈说：“此次叫王去调和，不过让外面好听点，实在请你主持。我看若你愿为主峰的心腹，你就按他的办法执行吧。”我说“好！”含笑而出。

我和王铁老乘津浦火车南下。到浦口的时候，王说：“我到上海，和克强先生谈谈近来所作的事情，你先到江西和协和商谈吧。”我渡江到南京，又召集第八师军官密谈，详述在总统府四个月中和袁接触的经过，并说：袁野心甚大，非把民党消灭不可，此次我到江西，名为调和，恐怕难免一战。随嘱他们加紧训练，以备万一。众

军官都说，只要支部长有命令，我们立即执行。

王命我先到江西，正合吾意，因袁氏所提四条，不能使外人知道，只可和协和密商。我乘江轮到九江，转小轮到南昌。协和闻我到，邀我到他住的楼上畅谈，我将袁的四条交他细看。李阅毕即说：“这事易办了，只要我辞职，所有的事都不成问题。”我说：“你若辞职，那还有啥话可说？我觉共和局面，尚赖我们维持。”并将我在总统府和袁共事四个月的经过详细陈述。我对他说：“以后我们非坚持硬干不可。袁既要你去职，不如假意允他。但我得说你现在实力尚厚，不能立即就办，必须将你的部下运动成熟，然后动手，保无他虑。至于汪本不是他的嫡系，不叫他来，也未必不行。蔡、陈是无识之辈，办与不办，无大关系。枪枝非拿回不可，我有方法叫他发还。你若赞成，我发一密电请袁考虑，候王铁老来，也按此意发电，双方进行，谅可做到。”李表示赞成。我遂拟一电，大意是：“北京袁大总统钧鉴：鹤密，到南昌后，详察情形，拥护李某者尚众，现时不能照办，请假以时日，候将李的羽翼归为我用，再设法下手。汪本不洽輿情，似无使他到任之必要。蔡、陈无聊之辈，办与不办，无大关系。在清廷时，江西军队本只一旅，此次独立，多经变乱，枪支损失不少，现陆军部既定在该省编一师、一旅，即便将所扣枪支发给，所差尚多，若不发，未免表现中央狭隘。况枪支现时发给，将来必为我用，似应飭海关放行，此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之意，不知能中我大总统之意否？请速电示。复电武穴王参议转交为盼。”

李阅电稿后说：“姑且试之，候得复电，再行商办。”未几，王铁老来，和王密谈，大意相同，王亦按所商者电袁。袁复我电大意说，均如所请，惟应办之事须速准备为要；复王电则尚表示中央威信不能不顾，惟对于大局安定，亦属重要，汪既不洽輿情，亦应择一本省

贤明之人充任省长，枪支已仿海关放行，惟须使李督知中央维护和平之至意，云云。袁、李争执，至此告一段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着又有协和逐戈之举。原来，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暗和袁通，李知后，派欧阳武等率军由德安到九江逐戈，又电镇守使所属的步兵第九团和金鸡坡炮台军队归省府直辖，使陈廷训安抚一切。两处官兵亦知戈之大势已去，表示服从李的命令，愿归陈指挥。戈知所谋败露，仓皇逃去。

李拟派军政司长俞应麓或师长刘世均为镇守使。袁复电说，镇守使应属中央直辖，拟以李纯或王占元（均系北洋师长）充任。李协和又去电说，前镇守使是江西都督府委任的，当属省辖。如此争执，又是一场风波。王从中调解，并劝我为九江镇守使。我深知南北战和关键即在九江，我安能当此重任，遂坚持不干。王说：“你和协和系好友，你若充任，协和决无他说。你在公府四月，和袁相处尚洽，袁亦可勉强赞成。为大局安稳计，你不能不勉为其难。”我仍坚辞。王乃密以此事分电袁、李，双方均无异议。我就任九江镇守使后，从此在南北夹持、各方责备之下，无一日安静了。

江西军界中，如彭程万、余维谦、俞应麓、伍毓瑞、李明扬、周璧阶等，知我是同盟会中人，对我均甚友好。而一般文人，则对我表示冷淡。省议会的议员们，都以我是北方人，大概和袁有关系，甚至疑我为袁的间谍，所以屡逼我走。我不便表明我的主旨，只好用开玩笑的说法说：“我是到处沦落人，请你们宽容我吧。我在此吃几个月饭，江西出米甚多，总不至因我吃饭缺粮吧。”他们说：“我们江西不是孤儿院呀。”我不觉忿怒说：“你们把我当作甚么人呀！你们以为我在江西吃闲饭么？我在此煞费苦心，维持大局，甘受闲气。若是照你们的话，我走开了，袁氏又有借口说，前逐走戈克安，现又

逐走耿某，江西目无中央，不是派李纯就是派王占元来当镇守使，你们江西当然反对。这么一来，不是因我闹起战争么？你们不懂现在局势，不必在此乱说，你们去向李都督说话，叫他驱逐我吧。”我将此情形函告协和。他复信说：“好人总得受气，你将来受的气还多着呢！暂时忍耐，以后自有出气的日子，只要我李协和信任你，一切你不理就是了。”

宋教仁案发生后，一时舆情沸腾，凡属国民党人士和军队，都主张讨伐袁氏。南京第八师众军官更为激烈，派代表到九江询我主张，并责我过于软弱。我告以此系大局问题，吾辈不能决定，得看孙、黄和全党要人共同商定办法，诸君系军官，尤当静观一切，如有决定，我当先知，必电诸君实行，望勿躁急。

当时一般人士，有主张宣布袁为凶首，即行讨伐者，亦有主张俟七月选举总统时，不选袁氏，而袁必恋栈，到时再行讨伐者。此时国民党重要人员和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各省代表或政治活动中人，都四处奔走，发表主张。江西为反对袁的策源地，九江是交通要道，一般人士莫不先到九江问我的意见，再到南昌询李的主张，兼述他们的意见。一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我在总统府时，深知袁除北洋六镇外，又招募了几个混成旅，并使段芝贵练拱卫军二十营，倪嗣冲在皖北练二十余营。而南方各省，均系独立时乱招的军队后来改编者。如苏省许多队伍，编成不完全的三师，皖省杂乱军队尚未编好，湘省旧军都已遣散，新编成两混成团，加第八师的三十一团扩为一旅，仅足维持地方，粤省号称四师，人枪两缺，训练尤差，赣省号称两师和两团，其实老兵仅三团，新招四团，巡防营改编三团，其善战者仅为林虎由广东钦廉带来的步兵第一团，附机枪两连，炮兵一连，前为南京政府卫队，后拨

归江西者，其余均无战斗力。如此兵力，若加紧训练数月，再补充军实，尚可和袁军一战。在前方的军官深知此情形，所以皆不愿速战。我和岳州赵恒惕、徐州冷遯，皆是在广西的同事，情若弟兄，常通电讨论时局，深觉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

带兵者多力主慎重，而不带兵的党人则多主速战。九江的旅馆饭馆，无时不满，我每日接待者不下数十人，而每月的酒饭费（西餐每人一元，中菜每桌十元）且逾千金之多。

北方的总统府、陆军部、参谋本部和北洋各军，都暗派间谍来窥侦察军情。亦有明派我的同学和友好，表示亲密，请我为袁出力；更有袁最亲近的唐在礼来问我倒李的准备何时可以实现。我虽多方应付，费尽心力，但都不能使他们满意。

武汉方面，黎元洪的态度关系至巨。黎专门求和，以保全他的位置。鄂省革命党人对他深为失望。在北京的张振武、方维等，常常对众宣传黎的卑鄙的行为，黎羞怒交加，请袁氏惩办张、方等人。袁早想离间南方，遂乘此机将张、方拿获枪毙。群众质问理由，袁言系黎所交办者。于是鄂人既深恨袁，更仇视黎。鄂革命党人都想倒黎，谋之于黄克强，黄派宁调元、熊越山到汉察看一切。

宁、熊路过九江时，曾和我商谈一切。我说：鄂人好谈，多过其实，必须多方侦察，尚不至有大误；若听一面之词，就去实行，恐有失败之虞。彼等二人到汉两月，未通一函，不知进行若何。一日夜间，突接黎急电：“九江镇守使耿毅、金鸡坡炮台司令陈廷训、龙鹰舰长林某均鉴：詹大悲、蔡济民在鄂谋乱未成，现乘岳阳丸逃走，路过九江，务望捕获解鄂惩办。黎元洪。”我初接此电，甚为惊异，细思大概是宁、熊在鄂所谋失败。宁、熊情形，既亟应探明，而蔡、詹事

更须急速处理。闻陈廷训已投降袁，林又素不相识，均难与之商议，只有自己设法通知蔡、詹二人勿在九江下轮，迅速赴沪，为最好的办法。但是谁能去通知他们，使他们脱离虎口呢？九江大阮旅馆，系日本人所开设，内有青木、佐藤、可儿、丰臣四人和我素有接洽。我当即同他们密商，叫可儿先在码头等候，俟轮到后，即到轮上通知蔡、詹不要下轮（他们均通日语），并决定万一他二人下轮，被陈、林捕获，我只好派兵抢来放走，就是因此引起战端，亦所不惜。

天刚明，陈、林二人来我处商谈捕蔡、詹的方法，我说：“此二人皆系谋反，亟应拿获。惟岳阳丸系日清公司的轮船，不能到轮上捕人，这是清廷和外人订有条约的。外人有治外法权，至今尚未取消，我们不要闹出外交上的麻烦。只好在码头上等候，等此二人走出租界后，才能捕获。”陈、林唯唯称是。

天大明时，陈、林二人和我所派的便衣队伍，都在码头等候。岳阳丸一靠码头，可儿就上去站在舱口，见有人下轮，他就用日语问那两位是詹、蔡先生。詹、蔡答应后，可儿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能下轮，码头上有队伍捕你们，赶快到舱里去。”可儿回报，我始放心。

陈、林所派的队伍，明知詹、蔡躲在轮上，不能拿捕，遂派两军官见我陈说此事。我说：“上轮绝对不能，我办一照会送领事馆，叫领事派员捕来，送我衙门再办。”我即大声唤陈秘书来，赶快办一照会，请日领事馆抓蔡、詹二犯，送我究办。一时日领事回文说，岳阳丸上并无蔡、詹二人（此亦是可儿所授意）。陈、林所派队伍非上轮船检查不可，轮上绝对不允，双方争执，愈来愈烈。我又使可儿到轮上和船主商量，请其速开。船主说：“在浔应卸的货物运至上海，回运至浔，如此辗转，所费水脚八百元，由谁赔偿？”可儿告我，我立

付八百元，轮即离码头而去。三方所派便衣军队都来报命，我只好口头上安慰一番。

谁知蔡、詹到沪晤诸同志及中山、克强重要人员说：“耿某为袁世凯所收买，我们过九江，他还派人捉我们，若非日人告知，几遭捕获。”（讨袁失败后，大家都到日本东京，詹大悲在目黑李协和寓中遇见我，尚有余忿，我亦不愿辩白。后由可儿将交涉经过详细告他，他才恍然大悟，和我和好如初。）

他人听说我为袁收买，都将我痛骂。黄克强听到后，深为痛心，遂写一密函，由日人青木交我。我因当时不便多说，仅复“将来自知”四字。

未几，宁调元、熊越山二人由汉口派专人送来一函云：“刻在德领事馆被押，急需用款五百元，请交来人，并再给来人路费一百元”等语。我向来人询问宁、熊二人为何在领事馆被押，彼答不知。我说：“你若告我详情，再给你一百元。”彼才说：“宁、熊在汉和湖北乱党联络，勾结军队，意图造反。事泄后，黎副总统行文拿捕，遂由德领事在德国饭店拿到，暂在馆内扣押，将来或交湖北都督府”云云。我当即交来人二百元，并请转交宁、熊五百元。

越三日，宁、熊又来函说：“吾辈交谊，尚不抵五百元么？请速交来人五百元，再交来人路费一百元。”我细思前所交五百元大概为来人吞没，即仅给来人路费一百元，另派陈参谋带款千元，同来人到汉口德领事馆面晤宁、熊二人，如该馆人员勒索，即可照给；但如不能见面，此款即不必再交。陈参谋到汉，德领事馆果然不准与二人见面，前送之款，皆被领馆中人吞没了。但宁、熊不知此种情况，定骂我无朋友义气。

当时南北情况更形恶劣，一般民党中人逼我起义，袁暗使陈宦

连电催我在赣行动，并说在汉口中国银行已准备二百万元备用，惟须行动有效，方准动用此款；并速电复准备情况及发动日期。

我得此电，知事迫切，即赴南昌和李商议说：“时局万分紧急，宜速决定，不然袁先下手，吾辈恐来不及。”李说：“沪、粤、湘、皖往返电商，尚未定议，现再电决定办法，请你速回九江，先设法应付，两日之内，决定办法，必有电话复你。”

我回九江后，那知唐在礼在浔已候我一日，问我进行若何。我答以“亲到南昌与各方接洽，尚须稍缓数日，望转禀主峰勿性急”。唐唯唯。

唐回汉后，已知我所说都是假话，电袁发动。越二日，袁即免赣、皖、湘、粤四都督职矣。

赣事袁本派我专办，后知我靠不住，遂派赣人游说赣众议员欧阳成劝其弟欧阳武投降，得其默许，遂罢李烈钧职，特任黎元洪兼江西都督，欧阳武为护军使。

因南方尚未决议，李不能不卸职，遂乘小轮到湖口，邀我和李明扬、周璧阶、卓仁执等谈话。我们一见都说，现在可讨袁吧，再拖延时日，袁定派大兵压境，欧阳武为了清理内部，也会收拾我们。大家议论极为激烈。李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众说，若是一班要人不愿发动，我们也不愿在此受人的气，只好辞职，走远方隐居了。李说：“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大家总是愤恨填胸，不能平息。翌日，李乘轮赴安庆晤皖督柏文蔚，我们返回九江。

先是，宋案发生后，袁知南方人心愤激异常，将来总有一战，遂派二、六两镇由京汉路南下，二镇驻汉口（此时黎已降袁，党人逐黎

虽未成功，而黎心惊胆寒，请袁派军镇慑地方，兼保护自己，所以二镇驻汉），六镇进驻鄂、赣交界的兴国县，监视江西，并派四、五两镇由冯国璋指挥，沿津浦路南下，协助在兖州的张勋所部，又令倪嗣冲编好皖军二十营，驻扎阜阳，以备进攻淮上。

此时四督解职，人心更为忿怒；各处均思发动，浔、湖尤为激烈。袁知非战不可，而首难必在九江，遂令李纯进驻距九江五里余的官排甲，直逼九江。我看势已至此，无可游移，非战不可，即使战败，亦所不辞。当即一面急电李协和速回主持战事，一面召集三、六、九团的三个团长开会，商榷夜间袭击北军计划。那知六团团长李定国别有用心，力说日间未曾筹备，夜间不易战斗。三、九两团长因此亦不积极，所以夜间袭击计划未能施行。加以陈廷训亦驻九江城内，屡次和三、六、九团下级官兵联络。我深恐各团被陈引诱，遂下令各团移驻九江城外的八里坡，声言防北军袭击，城内不好作战，用意实为防陈。

这时李协和已到湖口，用电话通知我，我将军情告诉他。他说：“你赶快来湖口商议大事，军队可归方声涛指挥，他当六、九两团的旅长，或者能听他的命令。”

适第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由湘回宁，路过九江，到镇署会我。他尚不知大局变化至此，我将现势详述，并说：“李纯军队已进逼九江附近，李协和已回湖口，非战不可。闻陈叔良（名之骥，八师师长）尚主慎重，不过战端一开，我和御秋（冷遹字）皆在局中，八师官兵怎能坐视？若中下级官兵欲战，上级制止，恐闹成火并王伦的局面。你和陈等交情尚洽，八师中下级官长皆是广西同盟会会员，随我等由桂林援鄂的同志，必能听你老分部长的命令。你要苦劝陈等和中下级官兵合作才好。不然的话，我或御秋随便派一人去说。我们

都加入战斗，你们迅速响应，必皆闻声而起，那时你处在两方相持的局面，稍有不当，恐怕你的一生令名受到损失，不如事先商妥，临时不至张皇，你以为何如？”刘团长沉吟少许，遂说：“你说得很对，我就回去准备，我就不坐了，上轮走吧。”说毕就要出门。我说：“我也要到湖口，协和叫我去，大概商议发动事，不过一二日就要动作。”于是我们二人同出门至码头，送他上轮，我雇民船前往湖口。

我至湖口，协和说：“你和各省人士有私交者甚多，先分别发电，说明我们讨袁大义，请他们响应，然后我们再发通电，请各省讨袁，似易响应。”于是我分电各省友人，说明讨袁的大义，请他们响应。

各省复电情形如下：长沙谭组庵和岳州赵恒惕复电大意相同：长沙军械局被奸人放火，把军械子弹尽行焚毁，不能作战，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惭愧。徐州冷御秋复电：刻下各团正在各地剿匪，实难集中备战；万一开战，亦只有拼之而已。寿州张梦杰复电：械弹两缺，不得已拼之而已。南京陈叔良复电：本师仍持稳健主义。杭州吕公望复电：现势险恶，总望调和，不要固执己见，以大局为重。广州陈炯明复电：现已准备妥当，兄处发动，弟即继起。（以上各电，均系大意，原文不能记忆。）其余各省均无复电，大概已被袁收买，或者受袁威胁，心虽恨袁而不敢发，只得暂作旁观，看形势如何再作决定。

事已至此，只有前进之一法。李在上海时，和各方代表商妥，推他为长江上游讨袁军总司令，请我为长江上游讨袁军司令部参谋长；任林虎为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在十里铺的北军；任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在九江城南的北军；任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十团的一营和水师各部。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为起义日，左翼军林虎司令早已由德安进驻沙河，距北军只有九里，是日拂晓发起攻击，战到十点左右，敌被击溃，退至赛湖附近，我军占领瓜子岭。右翼方声涛即在八里坡附近和敌相遇，战斗极烈，九团团团长周璧阶阵亡，兵士惊慌，幸赖十团团团长李明扬维持战线。日暮，敌军拟退却时，用炮连放十数响，声音颇大。赣军兵士素未听过这样大的炮声，不知所以，忽然乱退。官长喝令不许退却，亦不能制止，竟退至沽塘。

江西战端已开，黄克强、蔡子民等由沪到南京，拉着陈之骥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独立。程初不允，经再三软劝硬逼，才发通电宣布讨袁。程本多病，言语不能发声，全赖秘书看其嘴角动作而猜其意旨。程又坚请到沪调养，遂推黄兴为总司令。

袁知南京独立，遂令张勋所部和第五镇联合进攻徐州。黄电冷师长迎战，惟冷部仓卒未能集中，只好一面应战，一面召集零星队伍加入，战况甚为不利。黄令第八师出援，由骑兵团长刘建藩率步兵二十九团、三十团一营、机枪两连、炮兵一营增援，酣战半日，将张勋所部和第五镇击溃，退至兖州。后因扬州徐宝山之弟有不稳消息，又将刘部调回蚌埠，监视徐军。

缘徐宝山本为盐枭，占据扬州，扰乱盐政，极为地方之害。他乘独立的时机，乱招土匪，有万余人，编为二师，自称军长，后又投降袁氏，与民党作对。金谓此人不除，为害不浅。闻徐最爱古董，遂使福建陈某（忘其名）造一伪装古董的炸弹，准备派人送去，将他炸死，并开秘密会议，问谁愿去。广西柳州人罗方侯（此是号，名亦忘记，系在桂林入同盟会者，后改叫秦明，一九二一年我到柳州，曾相遇，并劝其出来做事，他表示甘愿为农夫）表示愿往。他到扬州后，直到徐宅。他本拟当面将炸弹打开，和徐同死。适徐正睡，号

房说：“暂放此处，候军长醒后再呈。”罗说：“此物极贵重，你们不能开视，非我自开不可。”他告号房住何旅馆何号，军长醒后，通知他再来。不一时，突闻一声巨响，房屋震动。他猜想必系徐开视古董，触发炸弹爆炸，急跑至徐寓附近视察，房屋已尽焚毁。罗见目的已达，急觅轮到镇江转至九江，向我备述详情，同居月余，适广东有友函邀，遂分袂矣。徐宝山被炸毙后，袁遂委其弟（忘其名）代为军长，接统其部队。

右翼军退至沽塘，第九团官兵在夜间乘民船偷过湖口，向九江敌军投降，只剩三团和十团的一部，连夜挖筑工事，以备防御。余维谦旅长带四团来援，但该团皆系新兵，不能作战。翌日，敌派大队和大炮来攻，我方仅能保持战线，不能出击。

湖口方面，敌派七只兵舰和陆军一旅，联合进攻甚急，终被攻陷。何子奇司令率所部由鄱阳湖东岸绕道乘民船退至吴城，沽塘后路临鄱阳湖，受敌舰威胁，只得退至吴城。右翼军既退，敌军集中全力，十倍于我，压迫左翼军。左翼军以右方空虚，亦不能不退至建昌。右翼军由吴城开至山下渡，拟和左翼军联络，而鄱阳湖又有警报，不能不将右翼军撤至樵舍巩固湖防。又闻林率第一团和机枪、炮兵向乐化退却，使七团防御乐化，右翼军又退至王家渡。总司令部移至南昌北门外轮船上。

李协和向我说：“我们自湖口失守后，两月以来，各省战况毫无消息，请你赶拟一电与谭组庵，请他速告各省战况，以便再作计划。”我立即拟一电发出。谭复电大意谓：“湘省自军械局焚毁以后，不能作战，专听各省捷音。惟皖省淮上，仅有接触，即告失败。现仅龚振鹏在芜湖，亦将失败。苏省初战甚利，后因主张不同，无形停止。现第八师不甘罢战，又举义旗，由何海鸣

领导，与张勋所部酣战于南京附近，但成弩末，亦难持久。粤省龙济光由梧州率军直下广州，粤军望风而逃，早已平静。大局如此，兄等可早抽身，弟所以在此赧然暂留者，实为兄等留一条路耳，望速来湘，再俟良机，把晤非遥，余容面罄”云云。

我得电后，正和李商议办法，忽报乐化七团已溃退，王家渡被敌舰占领，牛行岸上放炮数声，细看有军队数百，红旗两面，正是敌人的旗帜。又见河中船只都往上游开走，岸上的军队亦向南昌城南奔跑，总司令部的小轮只好随众船而行，至滕王阁前，秩序纷乱，不能停轮，只好再向上游行驶，到津树镇，始能停泊。但见兵士散乱，如丧家狗，仍是不便在此久停，遂令开至临江，始见平静情况。

休息片时，我见李在观看地图，我问他何意，他说：“我们的兵真不成为军队了，一闻炮声，就是乱跑，不听命令，现在一哄而散了，只剩下我们这些人，还能讨袁么？依我看，我们上山当土匪吧，如此下场，真是惭愧。”我说：“你看地图，大概是想当土匪。我觉得现在袁氏气候正盛，我们干什么也不行，不如找个安全地方，等待时机。再过二三年，袁氏觉天下平定，就要发野心做皇帝了。那时普天之下，都要反对他了。到那时候，我们乘机而起，召集旧部，与各省联合，再唤起民众一致声讨，定可成功。况且谭组庵在长沙滞留，专为我们准备一条路，我们不能辜负他的好意。”李说：“如此了局，实在惭愧。”我说：“势已至此，现时尚有何法？俗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况决到不了十年，不过二三年间，再看胜负吧。”

休息一夜，次早顺着大路而行，三日到袁州。此处尚有银行一所，据该行长说，行内尚存现洋两万余元，票子十余万元，不

如提去，暂以维持在外生活。李说：“此次讨袁失败，使江西父老受战祸的痛苦，已经惭愧万分，如更将江西的金钱拿去，不是更添罪孽，受人唾骂么？不如仍存银行，为江西留一点元气。”行长说：“你们不拿，还不是叫敌人拿去么？”我说：“这是个人天良，不能顾及他人。”

本晚即宿在行里，李说：“我们行动，总得光明磊落。从前讨袁曾通电各省，申明讨袁大义，现在失败，也不能销声匿迹，应该再通电表明态度，方是政治家本色，你就拟一电吧。”我随拟一电，请李修正后发出。通电的大意，先述讨袁大义，次叙作战经过，终叙失败后将残破军队遣散，不使扰乱地方。最后几句，尚能记忆，是“赣军散矣，嗣后共和与否，一凭袁氏天良，铁血共和，谁负维持之责，区区之忧，尚祈亮察”。

翌日，至安源乘火车至长沙，晤谭组庵，畅谈数月情况，深愧我军训练未精，民气未伸。

越三日，乘武陵丸赴汉口。船靠汉口码头时，本想下轮访晤前年共抗北军的好友。日人日野突来说：“码头上黎派许多侦探，正想捕拿你们，尚能下轮么？暂在轮上休息，将来下轮，尚须另想办法呢。”我总觉黎宋卿和我们尚有交谊，谅不至如此无情。当初汉阳失守，黎逃至葛店，我和协和带兵援鄂，他才敢回武昌，所以后来他每次晤谈，总是说感激的话，并请吃西菜。现在我们战败，他真就反脸无情么？后来据鄂省的友人说，我们才到长沙，黎就电谭捕拿我们；我们乘武陵丸到汉时，黎早派数十人在码头等候。黎的参谋长金永炎曾劝黎说：“李、耿援鄂，都有大功于鄂，且和你有不平常的交谊，何必这样认真呢？况且政治问题是无定的，将来的胜败谁能决定呢？加以日人竭力保护，你能不顾

治外法权，上轮抓他们么？”黎说：“此等乱党不除，中国没有安静之日。湖北起义，各省响应，都是此辈所造，若不开灭净尽，中国还有安静的日子么？”金永炎听黎说出这样无情的话，只好叹息而已。晚十时许，忽有日本小火轮靠在武陵丸船边上，青木、可儿等将我们当病人，把头蒙住，扶着下船上了小轮，开到刘家庙，又把我们请上野村军舰，舰长佐藤极表欢迎，並言拥护共和，虽至战败，也是光荣。我们只有说惭愧而已。翌日，野村军舰送我们至大冶，请我们上岸到大冶铁厂办公处暂住。处长是日人西泽，亦表欢迎。该厂和汉阳兵工厂、萍乡煤矿，系前清两湖总督张之洞所创办，号称汉冶萍公司，后清廷因借日款，押给日本，即由日人西泽经理，厂内任何事情，清廷不能干预，所以我们在此勾留，袁、黎即使闻知，亦不能捕拿我们。住五日，即乘运铁往日本的轮船往日本避难。

轮至南京时，两岸寂然无声，想第八师的同志们亦完全失败矣。回思数年来大家费无数的心血，造成此一支革命军队，现在一旦丧失无余，所有官兵不知流离何所。悲念交加，不觉泪下。次日，出吴淞口，过黄海至日本门司上岸到东京，作起亡命客来了。

我等起先默察列强对我革命党的态度，认为德、英极端仇视，法、美纯取旁观。惟有日本独持“友好”态度，我们的函电肯代为交递；袁的军情，也肯告知；作战计划，又加帮助；失败后，仍竭力“保护”，处处便利我们，大家都是感佩不已。后来方知袁氏对我们的计划，日人固通知我们，而我们所有的计划，他们也通知袁氏，使双方势成水火，愈闹愈凶，以便从中坐享渔人之利，其用心阴狠可见。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程 潜

我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十二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殷承璩、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翌年八月，同盟会成立，我因仇亮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我加入同盟会不到几天，仇亮引导我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蔼可亲，与同志谈，谆谆不倦。我请面示革命方略，先生指示三点：

- 一、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
- 二、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占领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
- 三、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孙先生言尚未竟，我插问一句：

“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

他讶谟在胸，不假思索地说：

“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

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统辖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

此外，他还讲了许多有关革命的道理与经过，我都能有所领会。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诲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悦诚服地敬佩先生。此情此景，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

不久，我到姬路野炮兵联队入伍一年，随即转入陆军士官学校，至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毕业。适川督赵尔巽调我和姜登选、舒和钧、王凯成四人入川训练新军，于是受同盟会委派，我担任了长江上游联络员。

我们到达四川后，赵尔巽派我充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姜登选充任工兵营管带官。就职一个月后，我同同盟会少数同志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研究了四川的情况，认为要在四川进行革命，就应立个行动纲要，以为守则。当时拟定的行动纲要，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二、稳步发展组织；三、切实把握军事实力，应付事变；四、联络一切力量，共策进行。我们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纲要能够切实做到，那么，他方一有动作，我们可以

立即响应；他方未有动作，我们也可以掌握时机，随时发难。我们商妥后，即邀集林修梅、杨瑾、季雨霖、舒和钧、梁达沅等同志开秘密会议，讨论行动纲要，得到一致同意，当场并推我主持其事。这是一九〇九年二月的事。

那时协统是旗人锺颖，我们对他很为警惕。到三月间，川督调他带兵入藏，协统一职另调东三省道员朱庆澜接充。在朱未到差前，锺颖把混成协的事务交我代办，他专筹划入藏事务，有时也同我商量调动军队与安排人员的问题。入藏军队约二千余人，编为三营。第一营由防营改编，管带官陈庆；二、三两营均由陆军合编，二营管带官为张葆初，三营管带官为林修梅。五月间，锺颖所部从成都开拔入藏。锺走后一个月，朱庆澜才到成都接事。

朱庆澜素有廉洁勤敏之名，有虚心好善之意，同我相处，亦颇融洽。赵督打算扩编新军为一镇，交朱筹划。朱问计于我，我说：

“由协扩编为镇，要解决五个问题。其一为总方略。其二为迅速设立讲武堂以训练干部。其三为购买枪炮器材服装。其四为加紧建造营房。其五为增购马匹。除第一项属于国防，须经我们拟定后呈请军咨府核定外，其他四项，应有一年半的准备，才能成镇。”朱以为是，属我草拟计划，交赵督批准。朱推荐我担任购买枪炮器材服装的任务，并得督练公所总参议黄忠浩的同意，于是赵尔巽委我为主任，派兵备处杨瑾、曾广开为随员。我本不乐意担任这个工作，经姜登选力言，到长江中下游走一趟，多多联系同志，对革命大有好处，我才决意担负起来。

这年十一月，我们一行三人从成都出发。到了武昌，见到了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我们在武汉三镇，参观了兵工厂、纺纱厂和陆军三十二标。三十二标训练甚好，士兵体操技术也很高明，为各

地所少见。协统王得胜、刘锟玉，统带曾广大、李襄邻，将湖北建立陆军的经过情况，向我们作了详细说明。与这些高级军官接触，给我一个印象：我认为他们都是循规蹈矩、怕惹是非的人，一旦军队有事，他们是不会从中作梗的。

在武汉逗留期间，我特别着重对下层情况的了解。经过考察，得知党人在两湖一带活动最力，革命空气十分浓厚，许多青年学生都投入新军，以展其救国的怀抱。上年冬，湖北陆军中，即有蒋翊武等组织群治学社（文学社的前身），社员如李六如、杨王鹏、廖湘芸等，都是思想进步、才能出众的人物。杨瑾与蒋翊武是旧交，我这次到武汉，因杨之介，得与蒋见面。我们两人谈话的内容，多为有关革命运动的进行问题。翊武说：“在湖北一镇与一混成协的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志士；不过因为禁网严密，侦探密布，我们文学社未便在他们之中大事发展，只能稳步前进。宪兵方面已有联系，所以我们的活动得以安然无事。”我当即告以四川方面的情况，并谓只要军队训练成熟而又为我们所掌握，只要切实执行我们的行动纲要，我想四川虽暂时落后于两湖，不久也可以迎头赶上的。翊武又说：“孙武、居正等领导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得还好。听说谭人凤、焦达峰在湖南也有共进会的组织，今后亦应联合一致，共策进行。”我对他的意见极表赞同。接着他又问我：“你看革命何时可以成功？”我说：“三年五载不为多，不过不能专就湖北一省的情形来下判断。因为在湖北，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快的。且主义已渗透到了军队下层，只要人心不死，成功是会很快的。”翊武深以为然。我们相约各自努力而别。

我们一行三人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时候，正是一九一〇年的新年。听说同盟会正竭力策动广州新军起义，倪映典率领新军

进攻省城，已战败阵亡。消息本不好，但这一次究竟是军队革命起义的开端，所以闻之也很兴奋。我这次到沪，虽为购械而来，不过更重要的还在留心物色革命人才，其中尤以物色联络员为最。有一天，我在马路上散步，得遇上年同船入川的但懋辛。此人精悍明敏，最适宜做联络工作。他这时正在中国公学教体操，彼此来往颇密，因将我的打算同他商量，他同意回川。我当即电请朱庆澜转请赵督优予录用，复电照准。至于购械，经过调查、决定向上海制造局订购七生五管退山炮，向泰来洋行订购马克沁机关枪，向日本太平洋行订购工兵器材，其他马鞍、皮带、服装等军用品，也同有关洋行签定了合同，定期交货。

我在沪任务完成之后，又抽空到南京一趟。南京陆军第九镇成立在湖北第八镇之后。第九镇的高级长官，多半是日本留学生，个个烜赫有名，在训练军队方面，形式上模仿日本的一套，实际上用处并不大。不过从前赵声等人对革命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坏，所以革命思想已深入到中下级军官的头脑中。但自一九〇七年端方屠杀了革命党杨卓林等人，逐走了军队将领赵声、柏文蔚、冷遁以来，禁网森严，致使军队中一般官长对革命工作多采取过于稳健的态度，惟革命潜伏力量仍然不小。好在南京离上海很近，将来南京一旦有事，是可以得到上海方面的支援的。这就是我在南京期间经过与各方接触所得到的印象。不两天，我回到了上海。

四月间，在沪购械事务已告结束，便命杨瑾、曾广开先行返川，我个人告假一个月，回湘省亲。路过长沙，与文斐见面，交换了彼此所知道的情况。其时长沙抢米风潮刚好结束，巡抚岑春煊、藩台庄庚良受到撤职处分，劣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也受到严

厉处分。我听到不少奇闻和新诗，都是描绘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与老百姓铤而走险反抗政府的情形的，写得有声有色，奇趣横生。我认为，这次抢米风潮，乃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事前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但仍然收到了同革命不相上下的效果，不能说不是一件十分可喜的现象。“万里云程初发轫”，革命前途，大可乐观。

我在醴陵老家住了半个月，于六月间回到成都，仍供原职。四川陆军扩大为镇的准备作业已完毕，估计十二月可以成立为镇。因再与姜登选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四川情况，认为形势于革命十分有利，问题在于加强我们的工作。谈话中，我把这次出川考察的情形告姜，大意是：长江中游革命力量在日益发展，长沙抢米风潮尽管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但足以说明革命条件业已成熟。长江下游各省也有进展，上海为下游各省的中心，同盟会已派人在沪主持。今年广州起义虽告失败，但影响甚大，并且尚在再接再厉的奋斗中。四川居长江上游，应与滇、黔联络一气。留日云南同学大多参加了同盟会，这是一股很大的革命力量。两湖对军队宣传主义、组织力量的工作做得好，特别着重中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比四川侧重军队中上级要好得多，我们应该向两湖学习。我这次在沪遇见但懋辛，四川会党最多，已约但回川联络会党。姜登选听了我的汇报，觉得分析恰当，因而增加了大家对革命的信心与勇气。

一九一〇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正式成立，统制为朱庆澜，我任正参谋官，两位步兵协统由五十五、五十六两标统带施承志、陈德都升任。步兵中有一位统带叫叶荃，是同盟会会员，与炮兵统带、工兵管带一起，均同我们有联系，一旦有事，可以运用自如。惟姜登选没有升任为步兵统带，是一缺点。过了年，即一九一一年正月间，接但懋辛来信，大意是，“近得异人传授法术，要往广州学道，

无法分身回川，有负盛意”等语。这是暗语，不久果有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但懋辛是亲自参加这次起义的。但既不能回川，我们只好另外找人来代替他做联络工作。

四月间，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川边大臣赵尔丰接充川督。此时全国人民正受着黄花岗烈士死难的刺激，义愤填膺，复有铁路国有风潮，川、粤、湘、鄂四省人民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各派代表赴京吁请清政府收回成命。闰六月中，接家电，得知父亲病故，只好请假回籍奔丧，把我担负的同盟会的工作交给姜登选接办。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动身，取东大路返湘。朱庆澜送我至成都东郊，以时局演变甚剧，究应如何应付相询。我因简略进言，大意是：“老百姓与士绅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越来越扩大，十七镇新军是为捍卫国家而设的，以不介入这次风潮为好。我闻新督性情急躁，统制似应多方进言，总以不激起大变为妥。去年长沙抢米暴动，岑春煊、庄庚良受到撤职处分，连新军协统杨晋也牵连受累，可为前车之鉴。此次风潮远远超过长沙抢米暴动，希望统制相机行动。如有紧急，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倍，遇事请与他商量。”朱颇首肯，互道珍重而别。

我从成都急行七天，到了重庆，其时川南、川东各大城市已纷纷罢市。从渝坐船东下，七月二十日抵达长沙。在长沙，见到了文斐。他说：“自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胡汉民已不能在沪露面。但宋教仁、陈其美等已奉命从港到沪，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络长江各省同志，指导各地工作。”我说：“这个组织极为重要。我们近年来，各省工作都是各自为政，既无联系，又无统一计划，徒然使工作受到损失。现在有了这个组织，今后工作定会大有进展。”此外，又谈了一些有关湖南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形，彼此预感到革命

时机行将成熟，遂互相勸勉努力革命工作而别。

七月底，我回到醴陵，安葬好父亲，已是八月上旬了。其时，接朱庆澜来电，大意是：四川省派我为永平观操员，须于二十日赶到北京报到。我因于十四日从家动身来长沙，又会见了文斐。他说：“浏阳人焦达峰在湖南组织了共进会，对新军士兵有联系，对会党也进行了不少工作。”我说：“四川会党极盛，我竟对之束手无策。我认为，会党流品很杂，运用这种力量，如不能操纵自如，以后必致发生流弊。我是着重在军队方面进行工作的，对会党，我不甚重视。我现欲借观操机会到北方看看，你以为如何？”文斐很赞成我北上一趟。恰好在长沙碰到程子楷由广西省派赴北京观操，正好同行。

八月十六日，我与程子楷到了汉口，到武昌寻找蒋翊武，没有碰到。十八日乘车赴京。十九日车抵彰德，得知武昌起义。是日午后到京，始知秋操停止举行。因与程子楷商量，最好立即南下，参加革命，以遂平生之愿。时京汉路已停止客运，只有赴津航海南下一条路。其间因子楷得病，稍留至二十七日才到天津，候至三十日搭商轮南行。沿途在各港起货上货，直到九月七日始抵上海。从京至沪，沿途所见，截然不同。京津两地，熙来攘往，仍然一片昏昏沉沉。上海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尤以工、学、商三界表现最为热烈，令人兴奋。计自武昌首义，至九月十三日上海独立，不出一月，全国即有七处起义，声势之壮，为前所未有的。

在沪得知黄兴已于月初从港经沪转赴武汉。我与程子楷商量，决定同赴武汉。同路还有邓希禹、黄子伟二人，他二人均系清廷文官，愿意弃职从军，真是难能可贵。我们一行四人，于十三日从沪乘轮赴武昌，轮船准期到达汉口附近，停泊洪山江心。我们

雇了民船陆登，面见洪山防守司令，说明我们是随黄兴来武汉助战的。防守司令立即写了介绍信，让我们进城。这天下午，下了一场秋雨，泥泞载道，我们冒雨步行三十里，到了武昌，城门紧闭，守城士兵验看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城。城内人人精神焕发，意气轩昂，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又见市上间有青年，身着青缎武士袍，头戴青缎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红绒花，足穿一双青缎薄底靴，同舞台上武松、石秀一样打扮，大摇大摆，往来市上。我想，这大概是“还我汉家衣冠”的意思吧！

黄兴得悉我们到了武昌，即于当晚派唐桂良前来，把我们招待到客栈住宿，并表示欢迎我们参加汉阳战事。第二天，即十八日，唐桂良带路，由鲇鱼套过江，到了汉阳昭忠祠总司令部。克强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我们谈论了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形，得知湖北陆军自起义后，破坏了原有建制，原有管带以上官长，由于士兵不服，多已离开军队，因此，汉阳军队虽有三协和一标步兵，但由于统兵官不够，或者统兵官军事水平不高，所以力量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士兵为革命精神所鼓舞，士气尚好。至于敌方，此时业已起用袁世凯，并派冯国璋率军两镇南下，与我作战；惟山西、陕西先后独立，清廷在在需要设防，所以除冯部两镇外，要再派兵南下，也很困难。又自十三日上海宣布独立，十五日苏、浙宣布独立后，为张勋所窃据的南京已成一座孤城，只要苏、浙、沪合军进攻，南京即可攻下。可见汉阳战役，关系至巨，如果一战而胜，则革命形势即可稳定。

以上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这次见到克强同大家谈话后所总结出来的。克强并说：“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军四十九标和巡防营数营援鄂，我们革命声威益振。”言下对战局殊为乐观。当

时谈话在座的，我记得有谭人凤、参谋长李书城、副参谋长吴兆麟和同学曾继梧等。谭白发皤皤，语言耿直，给人印象最深。总司令部组织异常简单。克强留我们吃便饭，饭后继续谈话。克强说：“湖南关系甚大，在焦、陈（作新）遭人暗算之后，问题颇多，最好我们有同志前往联络，共策进行。汉阳战事，我已派曾继梧指挥炮兵团，颂云来得及，就请你帮助凤岗（继梧字）。”我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都是应该做的。凤岗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谈至此，即辞出。

从总司令部出来，我与继梧随即亲至龟山下选一古庙作为指挥部，并委派邓希禹、黄子伟任秘书。接着又上龟山察看炮兵阵地，见有日本三十年式七生五野炮六门、汉阳仿造克鲁森五生七山炮十八尊，炮位布置合法，还构筑了临时掩护工事。询问炮兵，得知是第八镇炮兵团的老兵，是训练有素的。惟山炮口径小、射程短，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所幸野炮虽已陈旧，尚属可用。我在龟山瞭望汉口，得见租界外的房屋，大都为清军焚毁，情状异常凄惨。平日万船云集的襄河，也空无一船。一幅战时景象，呈现在眼前。我认为，既有这样的阵地，而清军却纵火焚毁人民房屋，甘与人民作对，可以说，我们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器械虽窳朽，只要发扬革命精神，是可以取胜的。

二十二日，湘军统领王隆中率军到了汉阳，这是武昌起义后首先得到的援军，人心为之大振。王隆中与我，是日本士官同学。湘军将领卿衡、鲁涤平、胡兆鹏等都是湖南武备或陆军速成学生，尚能团结一致。只是湘军五十标自杀害焦、陈，拥护谭延闿后，势力有所扩展，而四十九标奉命援鄂，反而不免向隅，所以四十九标官兵咸感不平。不过自从开来汉阳后，由于大敌当前，大义

所在，大家也就没有什么议论了，军心仍很坚固。二十二日夜晚汇报，我把此事报告克强，克强答应格外加以慰勉。汇报时，在座的除新添王隆中一人外，仍旧是谭人凤、李书城、程子楷、吴兆麟、曾继梧和我几个人。这晚集中讨论进攻问题，谭人凤首先说：

“湘军已到，正好从速进攻，不能拖延。”

克强接着说：

“许多同志都与谭石老所见相同，这是个重要问题，请大家多多讨论。”

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即说：

“我军士气昂扬，胜敌百倍，这是不待言的。但就现时情况论，我军兵力单薄，建制已破，新旧兵参差不齐，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独立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势准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一步。再派得力部队渡过襄河扰乱敌人侧背，牵制敌人，使之力量分散，不敢一意向我进攻，这也是用兵的通常办法。只要再坚持一月，援军日多，北方定有变化。”

克强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

“你这办法十分稳妥。不过以今日情形论，即使扼守汉阳不动，也嫌兵力单薄。”

程子楷插一句：

“防守汉阳，必须巩固蔡甸。蔡甸巩固，汉阳万全。”

李书城立即接上一句：

“蔡甸已派得力部队防守，且与此地相距很近，亦可随时策应。”

谭石老迫不及待地大声说：

“现在我军士气旺盛，正好进攻，无须迟疑，还是趁热打铁，不必‘刻舟求剑’的好。”

我看谭石屏的议论，跟我针锋相对，因而我说：

“石老的话必有所本，能够代表多数同志的意见。我意力主速攻的同志，因为受压迫太久，怀恨甚深，屈蟠求伸，自是热血灌顶的表现。但这个敌军，非有坚强的实力或革命的内应，是不可能一击即破的。事关重大，值得再三思考。”

王隆中初到汉阳，勇气百倍，也力主速攻。我看主速攻者太多，孤掌难鸣，最后只好说：

“必须就敌我情势、兵力多寡、训练优劣，作通盘打算，最好请总司令作出最后决定。”

至此，讨论中止。是日各方传来消息，如桂、闽、粤三省的独立，海军的起义，都足以振奋人心。尤其是海军起义关系特别重大，因为有了海军巡弋江面，首义的武昌便可解除许多顾虑。

二十四日汇报，同志们莫不意气昂扬，兴高采烈。有的说：“在这样有利形势下，即使进攻不利，但因海军在我们这一边，敌人也无法飞渡长江，更何况各省都在陆续响应，宣布独立，声威之大，足以寒敌之胆。”我对进攻虽持不同意见，然大势所趋，我也不能独执己见。克强因作最后决定，准备进攻。当时总司令所辖各军兵力如下：

鄂军：

步兵第一协

协统 蒋肇鉴

步兵第四协

协统 张廷辅

步兵第五协

协统 熊秉坤

步兵第四标

统带 胡效寿

炮兵团

司令 曾继梧

工程第一营

管带 李占魁

湘军：

步兵第一协

协统 王隆中(四十九标全部)

湖南巡防营四营

统领 甘兴典(约千二百人)

总司令部兵站司令 王安澜

为了过河进攻，总司令下令工兵营在琴断口附近架设便桥。总司令于二十六日下令，定于二十七日拂晓进攻汉口大智门之敌，企图一举突破，收复汉口。关于攻击目标、各军攻击部署和任务以及各部队渡河时刻，命令中均有详细规定。总司令亲率幕僚，于二十六日夜随同各军前进。我指挥龟山阵地炮兵，准备射击，以掩护各军前进。各军遵照命令渡过襄河。湘军为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博爱书院堤岸前进，与敌前哨线发生了冲突，惟枪声不密。我在龟山上看得大智门一清二楚。我想，我们这样堂堂正正的进攻，敌人当然早有准备。我自到汉阳后，每夜听到敌人机关枪声通宵达旦不停，而今晚却万籁俱寂。由是我才悟到：敌军官长平日为了睡得安稳，不惜牺牲子弹，乱放一阵，表示有备；今夜不同，官长不睡了，各自站在火线上，是准备要跟我们拼一下的。

当前哨战开始时，离拂晓还有两小时。我命令向大智门发炮十余分钟后，敌炮才对我回击。在昏天暗地中，敌人的炮弹全落在龟山后面。我们的炮更处于劣势，也没有命中目标。经过前哨战一小时左右以后，遥望博爱书院堤岸一带，始而大火熊熊，继而步枪声拍拍作响，又继而机关枪声砰砰齐鸣，最后则炮声轰轰震动。不到一个小时，这些声浪渐来渐稀，知道敌人前哨已撤回本阵地

了。于是我又下令大小炮位，向大智门猛轰。敌炮不稍示弱，也向我阵地反击。正在炮战激烈中，东方渐渐发白。在龟山上，我看到两军的动作，历历在目。剧战经过三个多小时，敌军总在原阵地胶着不动，这就说明我进攻部队遇到了顽强抵抗。敌人能够顽强抵抗，必有工事与地形地物的障碍，阻滞我军不得进展。因忆数日前，我谍报报称：大智门一带，地形复杂，障碍甚多，敌火焚汉口市后，又利用残垣破壁，做了许多工事。我想这些工事，如无重炮对直摧毁，是不易攻破的。如今战斗呈胶着状态，我军不得进展，势必要受到挫折。果然未到正午，忽见我军有一部分队伍，从博爱书院堤岸后退，未几影响全军，各部队都争先恐后地纷乱溃退。这场暴风骤雨的战斗不终朝而风消云散。从军语上说，我军在这场战斗中，叫做攻击不奏效。不过敌军始终居于被动地位，当我军退却时，并未跟踪追击。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经验，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验。

这天午后四时，克强回到昭忠祠。他跟平日一样，仍然态度雍容，意志坚定，真不愧是个革命领袖。他从来就不以失败归罪于人、成功引为己有，而是遇事引咎自责，所以能够博得同志们的敬仰。这次进攻受挫，他的态度还是如此。有人说：“这次进攻，功败垂成，是因为湖南防营要吃中饭，一部分后退，才牵动全局的。这虽于总司令声名有损，但作战命令对动用携带口粮已有明确规定，防营不照命令办事，岂能归罪于最高长官？”也有人说：“军队复杂，未经整理，即上阵作战，受此挫折，也是责有攸归的。”平心而论，克强抵鄂不过十余日，湘军到汉阳亦不过数日，各军官兵都急于要迅速进攻，革命意志高昂，气氛紧张，也是不能让克强从容加以整理的。总之，在这样情急势迫中，能够指挥进攻，取得主动，即是一种胜

利。人们不察其时实情，事后论长道短，不是历史家应有的观点。何况此一战，影响所及，实际上结束了清廷二百六十九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自有其一定的价值，事实俱在，岂容抹煞！

克强因进攻汉口失败，某日找我谈话。克强认为，我军进攻失利，汉阳岌岌可危，要我迅速返湘，联络湘省当局，准备一种持久力量。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建议克强，在中山先生未回国以前，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及早摆脱汉阳前线指挥任务，驰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克强深以为然。越数日，我即回湘，克强旋亦离鄂赴沪。

我回到长沙不久，南京即告光复，从此转入停战议和阶段，因此我回湘后的活动，就没有在汉阳作战时的那么紧张了。此时同谭延闿的接触则很频繁。

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组庵）以一咨议局议长一跃而为湖南都督，应该是心满意足、笑逐颜开的。但他终日坐困愁城，眼红脸黑，感到很苦恼，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有这么四点：一、他好用权术，联甲制乙，用丙控丁，使之互相牵制，彼此猜疑，而皆倾心于一己，不过以此却使内部意见分歧，不能团结一致。二、革命后，人事安排最不合理，投机者捷足取得高位，有功者依然屈居下僚，以此咸感不平。三、湖南六个师，系由焦达峰、陈作新执政时缩编而成，其中许多干部为革命元勋，动辄恃功集会要挟，以致纪律荡然。四、各师有名无实，兵多械少，虚糜国帑，经费异常支绌。组庵面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所以烦恼起来了。一九一二年五月间，他听到黄兴在南京大刀阔斧地一次解散了十几万军队，风平浪静，安然无事，使他景慕不置。有一天，他找我密谈。他说：

“克公在南京，仅仅两个月时间，遣散了十几万军队，没有发生

事故，不知他采用什么方法，而收功如此神速？”

我针对组庵的弱点，对他说：

“克公公忠体国，解散南京十几万军队，不是靠留守地位，而是靠他平日革命的声望取得成功的。”

他紧接着我的口气说：

“湖南经费支绌，养不起许多军队，你看，能否假克公的威望，来一个大裁兵？”

谈至此，我对湖南军队情况作了点分析，便说：

“凡是爱国的人，都认为湖南应该裁兵。比如第三师，程子楷和我，便心同理同，具此愿望。第一、二两师，实力较薄，裁兵亦较易为力。应当注重的，反而是四、五两师，如能得到这两师同意，问题可迎刃而解。”

组庵高兴地说：

“第五师，我可与梅馨商量；但一、四两师则非你去说服不可。”

同时，他并请我到上海走一趟，向克强请求援助。我即说：

“此事一旦泄漏，诚恐发生意外，还是请你另派妥员办理的好。我能力办得到的，无不尽力帮助。”

他认为妥善，乃于六月中派机要秘书吕苾筹赴沪谒见克强，请求克强对湖南裁兵事作出主张。克强不赞成裁尽，主张留两师或三师以应缓急。吕用电报将克强主张告知组庵，组庵回电，大意是：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但组庵手无寸铁，要实行这个方案，甚感棘手。适当时第八师赵恒惕一旅，原系从广西带来的新军，器械精良，因赵与第八师将领不甚融洽，从南京返桂，路过湖南，如组庵截留调用，则湖南裁兵得有监视的部队。而第八师也可以新招一旅补充，以解除上

述不融洽的矛盾。广西陆荣廷平素厌恶新军，赵不回桂，亦足以解除陆之顾虑，而于赵旅则得到安身之所。一举四得，皆大欢喜。经过与有关方面的协商，组庵的裁兵方案就决定了。八月中，赵恒惕率旅回桂，道经长沙，借炎暑为名，假长沙休养。至是赵旅为组庵截留调用，即开始裁兵运动。组庵求我对第四师作说服工作。我和王隆中是同学，交谊很好，前后与王商谈两次，结果他竭诚赞成裁兵。王隆中耿介忠厚，深明大义，殊令我钦佩无已。我把这个消息告知组庵，组庵闻之大快，并亲自与王商谈一次。经过以上的酝酿与协商，才正式组织裁兵委员会。委员会开过几次会，我主张每师留二营，加以训练，作为今后成立新军的干部，但结果却作出了一律裁撤的决定。决定对各师所有官兵，分别年资与革命功勋，一律优给退伍年金。计共裁撤官兵四万几千人，跟南京遣散军队一样，没有遇到阻碍。只有各师学生出身的军官，事后颇有怨言，惟因兵心安稳，也鼓不起什么风波。到十月三十一日克强回到长沙时，裁兵已将办理完竣。

克强回到长沙，全省各大中城市居民欢喜若狂，长沙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欢迎会。组庵对他推崇备至，事事都听他指示。克强主张：革命党人应该团结一致，政治上展开民权运动，经济上振兴实业，教育上培养人才，多派学生赴欧美留学，军事上训练一支新军，并推荐张孝准任军事厅厅长。张曾在德、日学习军事，学识很好，担任过留守府军务厅厅长，经验丰富。如张出任厅长，湖南可速建立一支新军，以为全国楷模。其时，组庵心广体胖，安心做个文治都督，把所有师长，如余钦翼、赵春霆、王隆中、梅馨、蒋国经、向瑞琮一起送赴北京授官给禄。从表面看，湖南局面一时好象海晏河清，于是专心致志筹办第一届议员选举。至于训练军队工作，同盟

会的同志都属望于我，不过我有志兴办实业，在岳阳已筹办一所制革厂，所以对于练兵的事不感兴趣。那时，湖南原武备、兵目、速成各学堂及两标学兵出身的军事人才很多，裁兵后他们失业了，而政府却以为发给了退伍年金，即可安然无事，诟知事实正相反。到一九一三年新年，渐渐议论纷纭，局面开始出现动荡状态。张孝准建立新军的计划，在四个月中并无若何进展：一则由于组庵优柔寡断，拖延时日；二则由于孝准人缘不熟，无法推动。而大多数失业军官，则已由口头议论，进而结党成群，企图推翻张孝准。至于政治方面，议员选举结果，国民党虽取得多数，实则全无根柢，许多人不仅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并且醉心利禄的官僚分子亦多摇身一变，混入国民党内。幸因宋教仁回湘，一番欢迎伟人的热闹气氛，暂时掩盖了上述的矛盾。

宋于二月十七日回湘，到处演说，力倡责任内阁制，企图以议会为武器来制服袁世凯的专横独裁。我和宋在欢迎会和宴会上，几乎每日见面，可惜无法深谈。因私人设宴招待他，我得间向他提出三点：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部复杂，即令将主义与政纲降低水平，意志亦不能统一；二、起义各省，其属于同盟会者，有名无实，同志间精神涣散，并无中心力量作为国民党核心；三、袁世凯依靠武力，专横独裁，目无法律，安问政党。有此三点，而欲实行责任内阁制，不能无疑。宋答以实行责任内阁制正所以制服袁之专横，如政治不能上轨道，再作道理。我又劝他，工作应以训练党员为中心。他认为有此必要，并说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谈话并不投机，草草收场，此后便没再谈了。

宋离湘后，省内骚动即日趋紧张。到三月十三日，退伍军官以兵目学生易堂龄为首，假反对张孝准为名，运动少数巡防部队，围

攻都督府，当经卫队击退。翌日查出主使人犯，组庵大起恐慌，请我到府会商处理办法。我建议：将主谋拘禁，其余从宽，只要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可迅速解决。组庵深以为然，即将易堂龄拘禁，其余从宽一概不究，一场风波，归于平息。

风波平息后，孝准辞职，组庵要我继任。我早看到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必将尖锐化，湖南关系甚大，即令此时迅速练兵，亦势难挽救危局，我若陷入军事机关，实在用非其才。但组庵坚持要我担任，并谓：“这回风潮虽已平息，但人心浮动，非你出来不足以镇定人心。”至是我乃推荐陈强、程子楷以自代，组庵均认为不可，组庵反挽程子楷与赵恒惕劝驾，再三怂恿，我始应允。我于三月十五日就职，打算首先成立两团，严格挑选干部，加强训练，作为模范。詎知二十日即有宋案的发生。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中枢一面坚持由法律解决，一面准备实力以应付事变。四月底，由李烈钧发起赣、皖、粤、湘四督秘密联盟，并以黄克强为中心，进行反袁斗争。四省反袁的实力和情况，大致如下：

克强上年在南京解散军队后，又另外编成了四个师，以陈之骥（第八师）、章祥、章驾时、冷遯分任师长。四师靠苏、皖两省财力支持，不虞匮乏，器械也比较精良。假使从建军起，克强能慎选将领，严加训练，则到宋案发生时已有一年之久，南京四师应该业已成为劲旅，足以应付任何事变。无如一年以来，领导无人，致使军队有名无实。例如陈之骥系冯国璋女婿，官僚气味浓厚，旅长黄恺元为湖北富商之子，两人虽具有爱国反满的热忱，却少推倒袁氏的本领。王孝缜（第八师另一旅长）算是耿介之士，但亦非济变之才。章祥虽富于革命性，却为一纯粹文人。其他自邹以下，不足深论。这

些军队以领导不得其人，所以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实无作战能力。南京之外的四省，如皖省军事力量，即包括在南京四师之内，此外别无军队，而在政治上，又意见分歧，尔虞我诈，在在堪虞。江西军队号称两师，实则只有留守府拨给的林虎一团可以作战，其他皆蹈言过其实之病。广东僻处岭外，亦无训练有素的军队，而胡汉民与陈炯明同床异梦，更是致命之伤。至于湖南，已如前述，一兵一卒未练，仅恃赵恒惕一旅，倚为长城。由上所述，可见四督联盟，军力异常脆弱，内部团结亦有问题，只不过在政治上提出反袁的号召而已，而四督联盟之不足以抵抗袁氏的进攻，却早在意料中。加之，黎元洪倾向袁氏，论地利与政治影响，均对四督联盟十分不利。原来宋案发生后，黎元洪即力主和平，甘为反袁路障。不仅如此，他并利用组庵依违两可、反袁不坚决的弱点，先后派金永炎、程守箴来湘作说客，企图破坏反袁联盟。金、程以同学之谊，首先以我为游说对象，经我严词拒绝，晓以大义，黎的阴谋遂不得逞。组庵在湘，也因反袁派势力占了优势，只好跟着走反袁的道路，而未为黎氏游说所动，但只要局面不好，组庵还很有可能发生动摇的。

当时形势对反袁联盟不利的因素，还有一点应当提一下。那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已被袁利用为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工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蔡锷才以同乡同学的关系打电报给我，对我们表示格外关怀，并劝告我们勿走极端。经我复电辩明是非，力言湖南只有与国民党同进退、共始终，不能另作主张，事势如此，只有各行其是。

在袁世凯一方面，自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即着手准备武力统一全国、消灭国民党的计划，宋案只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及见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四督有不稳之势，于是不顾一切，投靠帝国主义，竟向五国银行团贷款两千多万镑，作为消灭异己的费用。袁以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率第二、第六两师及毅军屯驻豫、鄂边境，以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率第三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宁、皖推进。军事布置既妥，才转而从政治上向国民党采取攻势，其步骤有四。第一步，非法杀害《民主报》主笔仇亮，并于五月六日下所谓“除暴安良令”。第二步，唆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痛责国民党利用多数捣乱议会、反对大借款。第三步，恶毒毁谤黄克强，捏造去年季雨霖的“叛变”为黄所指使，张勋、张作霖均指控黄运动军队并争为大总统候选人。第四步，授意北洋各将领呈请“枕戈待命，讨伐有罪”。然后，第一军由豫入鄂，黎元洪敞开大门，任北洋军队通行无阻。六月九日，袁下令免李烈钧赣督职，以黎元洪兼赣督。十四日袁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派陈炯明为粤督。三十日袁下令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派孙多森为皖督。四省都督，独对湘督谭延闿未加处理，仅下令缉拿湖南“叛乱”首犯程潜及附逆程子楷、陈强、唐蟒等人归案惩办，同时阴使向瑞琮、唐乾一、杨宏图等于七月七日火烧湖南军械局，湘省所储军火付之一炬。

当李烈钧被袁免职的时候，我曾电李力主抗不交代，联合四省尚可一战。乃李因受内外压迫，竟于六月十日遵命免官，交卸赴沪。他至沪后，大受国民党急进派的谴责，而李又不敢明言江西实力有限，无力抗拒北军。他迫不得已，乃于七月十二日返回湖口，起兵讨袁。袁亦于同日任李纯为九江镇守使，率第六师入赣，战事由是爆发。时林虎一团已扩编成旅，惟战斗力已大减。所以当李纯部队从东北向南昌进攻、敌海军进入鄱阳湖以后，李烈钧、

林虎就被迫率部退至赣西。

当时南京各师见湖口起兵讨袁，亦跃跃欲动，尤以八师下级军官与士兵义愤填膺，鼓噪特甚。王孝缜、黄凯元两旅长见时机紧迫，乃于十四日赴沪，向克强请示。克强即于十五日偕同两旅长驰赴南京，被推为讨袁军总司令，宣布起义。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闾反于此时逃往上海。战事开始时，第一师与第八师一部，在徐州附近与张勋部队交锋，迭见胜利。嗣以苏皖战线过长，乃于七月二十二日放弃徐州。克强命前线各军在临淮关构筑工事，令第八师刘建藩团增援前线，以柏文蔚为临淮关防守司令。柏文蔚因安庆内部不稳，不能赴临淮关执行任务，于是主帅无人，再加以江西战事失利的消息影响士气，于是军心涣散，各师相率自由撤退。二十九日，克强得悉江北岸军队溃乱情况，在前线既无可战之兵，在后方又因苏督程德全等不与合作，致无可靠之饷，迫不得已，只好乘日本军舰而去。

柏文蔚在安庆，因内部受到袁世凯的策动，胡万泰、洪承点等从中捣乱，安庆一夕数惊。柏无力应付，终于八月六日一逃了局。倪嗣冲不折一兵，安然进入安庆。从此长江北岸国民党势力丧失殆尽，仅剩南京孤城一座，坐待北军攻陷。

湖南方面，我接任军事厅厅长刚刚五天，宋案就发生了。我默察当时局势，认为终必出于一战，所以我的唯一任务，便是抓紧时间，训练军队。计在四、五、六三个月间，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与一个炮兵营。进一步拟从巡防营改编三个团，合赵恒惕所部桂军一旅，共为两个师。假使战事能延缓三个月爆发，我在军事上就有相当把握。但时不我与，战事终于在我尚无准备之时就发生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袁世凯其时也无兵力进攻湖南，但

他收买湖南败类向瑞琮、唐乾一等火焚荷花池湖南军械局，却使湖南军队断绝了军火来源。湖南当时有以上两方面的困难，但国民党人反袁的斗争并未因此稍衰。例如谭人凤、蒋翊武等由沪由汉连袂来湘，领导反袁运动。又如刘崧衡、邹代藩、周名南等，组织公民联合会，公开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集会反袁，对湖南讨袁运动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只因突遭军械局的大变，必须等到粤、赣两省接济的军火运到，湖南才能发动，所以迟至七月二十五日才宣布讨袁。讨袁军成立，以程子楷为第一军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湖南作战，主要是集中力量援赣；至于湖北方面，袁氏既利用黎元洪为盾牌，我亦可利用黎元洪为缓冲，以此只派一部分部队防守边境。这时，江西方面因湖口已被攻陷，赣军苦战兼旬，已到精疲力竭的地步。至敌海军驶入鄱阳湖以后，南昌告急。我因派唐蟒率军从萍乡进入新喻，掩护赣军主力集中。无如赣军节节败退，渐成瓦解之势。最后李烈钧、林虎仅率残部千余人，于八月八日退保赣西，幸得我军支援，并收容其逃散士兵，李、林二人才得从容入湘，并由我军保护他们离湘赴日。赣军战败，已使谭延闿心神不安，至八月八日得到陈炯明弃职潜逃的消息，他更感不安。他此时又眼红面黑，大起恐慌了。于是跟我密商，他说：

“湖南在上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担保，可免生灵涂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我深知组庵的意思，因说：

“我很谅解你的苦衷。黎元洪的代表金永炎来长沙时，我对

金说过，湖南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今日事势如此，玉碎不能，瓦全亦难。但黎元洪倒在袁氏怀中，他无实力，其本身已是‘皮之不存’，湖南以他为护符，真所谓‘毛将焉附’。你的办法，只不过暂时避免危险而已，将来演变，仍然未可乐观。我决意马上辞职，把一切责任都担在我个人身上，这样做，你对袁氏也有话说。”

组庵甚是高兴，但仍装出一付共患难的样子，说道：

“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你身上，所有罪恶皆归于我。”

谈至此，再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于是组庵于八月十二日通电取消独立，待罪查办。我呢，一面设法保护同志离湘，一面办理移交。当时如谭人凤、蒋翊武、程子楷、陈强、周震麟、唐蟒等，都是由我设法，使他们潜往上海转赴日本的，其中只有蒋翊武一人，不愿经过汉口，改走桂林转香港，竟为陆荣廷所害，迄今回忆往事，仍感痛恨。组庵宣布取消独立后数日，公民联合会刘崧衡等，因痛恨谭氏二三其德，遂组织一部分党员进攻都督府，遭到失败，刘亦为谭所杀害。我掩护同志离湘的任务完成以后，办好移交，也就于八月底离长赴沪，一路改作商人打扮，得以混过密探耳目，安全抵沪。在沪流离月余，十月底便到东京作亡命客了。后两月，谭延闿由黎元洪、熊希龄担保入京待罪，黎亦被迫离鄂入京，过其“瀛台生活”。

广东方面，胡汉民与陈炯明不能合作，前面已经提到。再加上内部情形复杂，派系门户之见很深，更难以团结一致，全力讨袁。如新军有陆军、海军，旧军有防营，绿营，各自为政，不相统摄，东江潮汕，南路琼崖，可称军队如林，土匪亦如林。上年姚雨平率一军开赴南京，实际上只有一混成旅，调回广东后也未

加整理训练，使之成为可以统摄各种杂牌军队的中心力量。所以坐令地方杂牌军队为袁世凯所收买，到七月十八日陈炯明为势所迫宣布独立之时，汕头莫擎宇、南路陈德春、惠州鍾鼎基等部，从暗中反对，根本也就动摇了。到八月六日，陈炯明见大势已去，只好一逃了局。

癸丑讨袁之役，就我所知，已如上述，至于上海战事、福建孙道仁、许崇智和重庆熊克武的宣布独立，因我未亲历其境，不敢深谈。

回忆辛亥革命

张 奚 若

(一)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陕西支部长是井勿幕，一个了不起的人。井勿幕是井岳秀（民国初年直到民国二十几年在榆林做陕北镇守使）的弟弟，幼时在家中读过不少旧书，光绪末年曾到日本留过学，在日本结识了不少从事革命运动的人物。宣统元年回国，宣统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他，当时他不过二十二三岁。陕西人中运动革命出力最大的，一个是在上海办报的于右任，一个是他。他在陕西运动革命，活动的范围很广。他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新学”，也能和中年的秀才举人们做诗谈旧学，而且因为他的哥哥从小习武艺（井岳秀是武秀才），他也在一起学过，对于所谓“十八般武艺”也都会耍，所以更能与江湖上的人结交。

陕西的江湖人物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哥老会，当时在新军里颇有势力；还有一种是所谓“刀客”。“刀客”是一种侠盗，崇尚侠义，

• 编者注：本文原系作者所述，丕强记录并整理，最早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五日的上海《文汇报》；同年十一月由生活书店印为单行本出版，改题《辛亥革命回忆录》。本文收入本书时经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劫富济贫。清朝末年，有一个大刀客头儿，叫王振乾，外号王狮子，朝邑人，是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刀客的领袖，在辛亥前就死了。他的党羽遍布各县，尤以陕西东部的十几县为多。井勿幕是同州蒲城县人，与他们很容易发生关系。那时有名的刀客头儿，一个是阎孝全（朝邑人），一个姓严，忘其名，外号叫白翎子（渭南人），后来均在革命军中出过力。阎孝全阵亡于辛亥攻打醴泉之役。刀客和土匪当然是不同的。杨虎城是刀客出身，后来有人说他原是土匪，实是错的。那时的哥老会人物和刀客们，看见井勿幕这样一个张子房式的白面书生，居然也会各种武艺，而且有时比他们还好，所以对他很钦佩，情愿听从他的意见。

辛亥四月间，我从上海回到西安才两个月左右，正在养病；井勿幕在北山（陕西人称同官以北为北山）养马，预备养好了将来革命时编马队的。同盟会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当时的陕西谘议局议长郭希仁，此时也不在西安。我住在藩台衙门（后来的民政厅）里土地祠中养病，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同盟会会员李仲三来找我，惊惶惶地说有一件大事要我出主意。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哥老会的人决定就要起义了，怎么办？李仲三是潼关厅（现在潼关县）的秀才，外貌粗陋，面孔很黑，绰号叫做李遼，是遇事不易有主张的一个人。我想，我在此对一切都不熟悉，就问李仲三已经去找井勿幕没有？他说已经去找了，但不一定找得到，而哥老会想这两天就起义，找到也来不及了。我此时感觉责任非常重大，也无别人可以商量，沉思之后，乃告诉他：目前第一要劝哥老会暂勿举事，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准备，领袖又不在，起义之后也无法组织政府；我们的军火也不够，当地有新军，还有旗人的驻防，万一起义不成，我们就要被消灭，以后就再难有革命的机会了。我叫李仲三劝他们忍

耐，我们对外省也没有联络，就是在陕西革命成功了，也太孤单，随时有被围歼的可能。第二，要赶快去找井勿幕回来。

第二天，李仲三又来了，一进门很高兴地说：“伙计，你的办法真灵，他们听了。”这一次起义计划因此并没有发动。不久井勿幕回来，一方面对哥老会重新又说了一遍需要忍耐的话，一方面就加紧准备，派我到日本去买炸药和手枪。

(二)

我病还没有全好，可是必须就动身。买军火的钱，由井勿幕筹措。井勿幕父母已经不在，只有他和他哥哥两个人。他把家中好的字画挑出两箱，托我带出去卖了来买军火，我还记得其中有王石谷、郑板桥的画，刘石庵的字等珍品。当时大家为了革命，是不顾一切的。我又拿了井的介绍信，到汉口去找一个陕西泾阳的财主柏筱渔（柏在汉口有大生意），预备找他捐钱。柏筱渔原是我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时的老同学，不过在此以前没有革命的关系罢了。这又可见井勿幕运动革命范围之广。

我坐了八九天的骡车到洛阳，换火车到郑州，再转车到汉口，找到柏筱渔拿到一些钱（我记得数目不大）后，就乘船到了上海。

井勿幕叫我到上海所找的人里面，有刘亚休。刘是四川人，同盟会会员，同井在日本认识的，我和他本来也相识。他为我介绍了到日本后的四川同乡，并谈到过运军火的计划。

又到民立报馆找宋遯初（教仁），因为陕西哥老会如一定要首先发难，则陕西就要设立革命政府，可是陕西那时候没有法政人材，所以要和宋商量派一个法政方面的人到陕西去。当时

有两个人可能去，一个是吕天民(志伊)，云南人，一个是居觉生(正)。

因为宋的关系，认识了谭石屏(人凤)，湖南人，哥老会的大头儿。那时常常开会，地点也没有一定，有时在北四川路谭家开，参加的人有淡宅畹(四川人)、吕天民、宋遯初等。结论是吕天民不能离开上海，东南方面需要他，居觉生可以去。

陈英士(其美)也是这时认得的。那时候陈英士当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的姑娘是他最喜欢的。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花酒，也是陈英士请的。可是那个时候最熟的还是宋遯初。

不久我就去日本买军火，刘亚休介绍的四川人，就是任叔永(鸿雋)，后来又在他那里认识吴玉章。此外又认识一个怪人洪承点。洪是江苏北部人，喜欢讲究慷慨悲歌的英雄派头，爱喝酒。有一次聚会时，他已喝了五瓶啤酒，走来叫我喝。我说我一点也不会喝，他认为我不行，要我一杯茶对他一瓶酒地乾杯。我觉到这还可以，欣然奉陪。不料他又喝了五瓶啤酒，还要再喝。我喝了五杯茶，已经胀得不能再喝了，只得认输，当然被他认为不够英雄了。他又喝了三瓶，前后共喝了十三瓶始罢。洪后来在二次革命时一度任革命军南京卫戍司令。

我把我来日本的目的告诉任叔永等之后，他们都说买手枪、炸药没有问题，就是运输回国困难，在上海检查时不易逃过。他们问我曾否注意上海近来检查偏重那方面，不注重那方面，因为这些情形是常常变化的，如能得知，就较易隐藏这些武器了。我在上海不

知这些事情，没有注意，于是大家商定由我再去上海看一次情形，调查明白之后再回日本运武器。

从日本回上海之后，常常和陈英士商量运武器的事，来往比较多。陈住马霍路，答应帮我将东西由上海运到内地。陈英士有一个听差，穿得很好，人很强壮，管包扎装运军火。我有一次看见他装运军火，办法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当时上海还没有汽车，沙发也极少见），将手枪塞在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看起来天衣无缝，决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运起来虽然分量不轻，好在沙发本身已很重，当时人也不大知道沙发到底该有多么重，所以更不会看出来。这个听差的姓名我记不起了，而他的相貌如今想来还历历如绘。后来我曾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有人知道。

我好象记得当时黄克强（兴）不在上海。有一次他从广州来信，大家在民立报馆传观，我见他的字写得很好。

（三）

正想回日本，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了。上海紧张起来，大家一天到晚在开会，都认为武汉是四通八达的地方，可能遭到清军围攻，必须发动各地响应，以分散清廷兵力。大家推我赶快回陕西策动起义。当时汉口不能走，京汉路南段已经因运兵完全不通，所以我决定绕天津、北京、郑州到西安，虽然知道京汉路北段未必通客车，但是总希望这一段比南面一段好，能够通行。

我在光绪三十四年由陕西到上海时已经剪掉了辫子，这次又是在风声鹤唳中经过北京，当然相当危险，然而装了假辫子又容易看出来，所以还是没有装。北京我是初次去，所以请人写了信介绍

给当时《民意报》的赵铁桥(同盟会员)。我带了两箱子没有卖出去的字画,匆匆地在八月二十二日离上海北上。

我记得到北京的那一天已经将近晚间八点,因为没有辫子,在前门车站就被仔细检查了一番。我住在前门外西沿河的中西旅馆,从晚间八点钟到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一共被检查了八次。检查者包括内城外城各种军警机关。还有一次是一个斯斯文文、戴眼镜的便衣密探,询问我许多话之后,居然还要我的字画看。幸而这个密探不大高明,否则那时我一点也不懂字画,恐怕就要露马脚了。

第二天上午到民意报馆去找赵铁桥,没有见着,回旅馆后,下午就有人来问我今天到民意报馆是去找谁的。我于是明白出入有人钉着了,只得随机应付,说是间接辗转找别人的,总算支吾过去。后来看到赵铁桥,也是约在窑子里见面的,在旅馆中住了两星期,忽然铁路通了,我就离北京南下,经过郑州到洛阳。

(四)

这次从北京到西安,一路所见全是革命时期的变乱现象。当时由北京回陕西的人约有四五十个,有的是由日本归国的,有的是在北京读书的。从北京坐敞车(本来是运马的,这次的确有马与我们为伴)走了两天到郑州,从郑州换车到洛阳以西的一个小站铁门。当时陇海路还只修到这里,向西就要换骡车。铁门在平日总有骡车来兜问是否到西省(当地人习惯称西安为西省)去的,这时因为“天下大乱了”,没有人肯出门,雇不到骡车了,我们四十多个人就搁浅在铁门。后来我总算雇到了一辆骡车。平常从洛阳到西安车资只要十来两银子,这次却要二十多两,比平时贵了一倍多。平

常雇车是先付两三成车资为车夫安家费，其余一部作为车夫路上各种用途，大约还有一半到西安再付清。这一次车夫却坚持先付全部，否则不肯走，无奈只得全部付给他。同伴们雇到了从陕西驮货到铁门来的四十来匹骡子（叫做驮骡），这些骡子是从陕西运货来，本来要回陕西去的。车和驮骡一起出发，走了一天，到英壕镇歇夜。在店中，车夫忽然说不走了。问他原因，他说听到西面来的人说那边已经乱了，杀人并且杀牲口。我去打听时，才知这些消息是从陕西来的河南人说的（陕西东部比较富饶而豫西贫瘠，所以豫西的人有移居陕东的，也有每年农忙时到陕东去作工，秋收后再回河南的）。但是这些人只说陕西已经乱了，却讲不出所以然来。

我同车夫商量，在这一个小镇上是雇不到车的，能不能明天一天赶到陕州（陕州离英壕镇一百三十里，离潼关一百八十里），陕州是一个大地方，我可以在那里再雇别的车子西行。车夫起初不肯，后来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

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天还没有亮，就趁月光出发了。走了二三里路，向西走的骡车突然又掉过头来，转向东方，飞快地跑回英壕去。我原在车中打盹，这时被颠醒了，问车夫什么事，车夫只说：“杀人啦，杀人啦。”我从车后望出去，果然看见西面一大堆人，有哭叫之声。回到英壕之后，我说这是抢劫，天亮后行人多，就不会再有，但车夫一定要说是杀人，再也不肯走了。我只得骑了同伴的驮骡队让出来的一匹驮骡，带了两箱很重的字画西行。

（五）

走了几天，经过陕州，到了距离潼关只十几里的地方，得知前

面走不通了。问人时，说是袁世凯的第六师和陕西革命党在潼关打仗，这才确实知道陕西已革命了。西去不成，大家计划北行渡黄河，经山西入陕西。但这时因为天下已经乱了，各地都纷纷图自保，河南、山西虽都没有革命，可是山西已不准河南的人过河去，把黄河渡船都控制在北岸，我们找不到船只。

这时我忽然想起以前在宏道读书时有一个同学，住在潼关东十几里的小镇上；这小镇属潼关，所以他仍是陕西人，但因为到底是在潼关外了，我们常常笑他陕西人住在河南地方。这时正好去找他，居然找到了；他也答应设法找船只，居然也找到了，我们才能过河。

我们好几个船同时由河南向山西出发，将近北岸时看见岸上聚了一大堆人。船渐渐靠近岸时，岸上有一个人朝天放了一枪，以手作势，不许我们登岸。我们商量了一下，派一只船，上面只坐了两三个人，上前去解释，告诉他们，我们是预备经过蒲州转往陕西去的，总算说好了。上岸时见一个老头子，提着一把手枪，方才放枪的就是他。我们这四五十人连驮骡和这些监视我们的民团，一起到芮城县去，预备由芮城去蒲州（现在的永济县）。

将到芮城时，看见芮城又在严阵以待了。城门楼上及城墙上挤满了人。靠近时有人大叫：“骑马的下来！”我们就从我们的“马”——驮骡上下来。他们又叫：“不准进城，到东关去！”我们乃到东关（东门外）的一个小店中。一会儿，城里来了一个人，说守城的武官叫我们举几个代表去接头。我们一共举了四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跟着那人到了城门口，看见城门开了尺把宽的一条缝，只能容一个人走，城门里面，上面一把刺刀，下面一个枪口地排满了。我们

问他们说：“这是做什么？到底要不要我们进去？我们四个人又不带武器，何必如此对待？我们这样走进去，若是刺伤了人怎么办？”经辩说后，他们总算把刺刀和枪都退后一步，让我们走进去。

守城的武官站在他的桌子后面，穿着一件紫红袍子，右面的袍角提起来别在腰带里，右手提一把手枪。他凶狠狠地问我们的姓名，问我们从哪里来，干什么的。等到问明白了，他放下了袍角，把手枪丢在桌上，长出了一口气，说：“弄了半天，什么革命党？原来是些念书人。”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当作革命党看待了。回到东关客店，店里的掌柜的才告诉我们说，方才传说我们这些革命党的“马队”来了，县官吓得溜之大吉。城上安好了“大将军”（一种土炮），里面已装好了火药、钉子、铁片等等。一个年青的民团看见我们走近，已经点着了火香预备去引燃“大将军”，幸而被一位老年人止住了，说这些人载了这许多东西，人在马上东倒西歪，不象是马队，不要打错了人。于是才叫我们下“马”来，幸而我们顺从了，没有开炮，否则，不打死人，也要重伤几个人。县官到此时还未找到。

（六）

次日，从芮城走了一天，到了蒲州城东南十五里的韩阳镇。在客店里我刚掸完尘土、正要洗脸的时候，一位同行者面无人色地跑进来，急得只能说“达达，达达，达达”（陕西话称“爸爸”为“达达”，说“不得了”为“好达达呀”）。我们问他什么事不得了，他说店中

掌柜的告诉他今晚这里要闹事，叫我们大家小心。我们听了他的话，不知是什么事。我想所谓闹事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附近盐滩中有土匪，土匪听说我们这样四五十个人带了箱笼物件路过，可能前来抢劫；另一个可能是革命。不久店里掌柜的来了，也只说要闹事，却说不清要闹的是什么事，叫我们顶好不要睡觉。他的严重语调使我们有些人听了毛骨悚然。

晚间我支持不住，就和衣而睡，并告诉同伴们有事时务必叫我醒来。睡得正好，被人摇醒了。起来走到一间大屋子里，全客店的人除了几个人爬到房顶上去以外，都聚集在这里，大家站着等候有人进来。等了半晌，并无人进来，只听见街上有许多声音，脚步声很多而比较整齐，象过军队一样。我们到院子里，从大门罅隙向外看去时，看到过路的人两个一排，由东往西去，每隔几排有一个骑马的。我们听见他们敲一个染坊的门要白布（当时革命军以白色为标志，打的是白旗，兵士臂上也围白布条），才知道他们是去革命的。他们向西去，一定是去蒲州府。大家计议，我们原定第二天去蒲州，如今蒲州革命，不能再去了。有人主张在韩阳镇等着，有人说蒲州清兵和革命军打仗，若是清兵败了，退下来经过韩阳镇时恐要抢，不如退回东面去。我说即使败兵要抢，我们也不能转向东面去，芮城的经验告诉我们退回去也不一定就平安，况且我们的目的地在西面，哪有向东走与目的地背道而驰的道理？终于决定在韩阳镇等一天。这一天上午没有败兵来，得以平安过去。我们料想蒲州革命已成功，就计议此后的行程。蒲州既已由革命军占领，必不能再通行。蒲州以南到风陵渡有三十里河岸，由此过河是朝邑县的南乡。第二天我们就这样走，渡河到朝邑县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七)

朝邑是我的故乡，这时我父亲就住在县城里。然而我却不想回去，因为恐怕我父亲看见我回来，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不肯再放我出去；而我则是负了同盟会的使命，非到西安去不可。所以我预备悄悄地在店里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可是，店主东又说夜间要闹事。问他是不是革命军要起事，他说不知道，但确有人说因为知县那天下午杀了一个刀客，刀客的弟兄们今夜要报仇。同伴们因为我是朝邑人，公推我出去打听一下到底是闹什么事。

我走出了店门，当然没有想去向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处去打听。可是出门没有走几步，忽然迎面遇到了父亲。父亲晚间出门，常叫人提一把灯笼走在前面，街上的灯笼很多，我也不能都注意到，父亲却先瞧见我了。他叫我的小名，问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到父亲的声音，知道过门不入是不成的了。

我参加革命的事，过去父亲也许有些晓得，但不知真相。这一次我完全对他说了，并且说明第二天就要往西安去。我对老人家解释，如今各地虽然乱，然而都是革命党，我自己就是革命党，总不会自己人杀自己人。父亲听了默然，没有对我第二天去西安的事表示反对。我又问到今晚闹事的传说，父亲说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我说，同伴们叫我出来打听，今夜就要回到店里去告诉他们，住在店里，明早一齐走。这次父亲却表示不赞成了，他说：“你明天早晨走可以，但今天却望你住在这里。”我只得到店中告诉同伴们说，闹事传说的真象没有打听出来，便又回到家里。

半夜里，果然闹事了。有人打我家的大门，也打街对面铺子的

门。我家的房子在城外，靠城门很近，为了怕变乱，不久前特地
在后屋屋顶上开了一个天窗，下面放了一架梯子，这时大家都爬上了
屋顶。忽然城楼那面来的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陕西较好一点
的房子，屋脊是相当高的，我们蹲在屋脊后面躲着，听见城楼上的兵
士问下面的人：“城下是人是鬼？”如答“是鬼”，就不开枪；如答“是
人”，就开枪射击。“鬼”，大概就是当夜革命军的口令了。我们还
看见城内有火光（后来知道是知县衙门被烧了）。过了一阵，下起
雨来了，我们大家只得都下来，幸而以后再没有什么事。

翌晨，天亮了许久，还没有人敢开门。大亮之后好些时候，街
上才有人走，城门楼上已经挂了一面大白旗。邻居们也逐渐出来
张望，大家才知道知县衙门昨夜被烧了，县官也被捉住了。我这时
也无暇去打听本县革命的消息，赶快去找了同伴们，即日同去西
安。四天之后，到了西安。这时已经是九月二十四五，离开上海已
经一个多月了。到西安后，过些日子，才知道那晚在朝邑起义的是
我私塾时代的一个名徐召南的老同学，才知道知县李煥燾（湖南
人）虽被捉而并未被杀，后且为一“刀客”出身之某小军官做秘书，
得全性命。

（八）

到了西安，才知道陕西的革命九月初一就发动了，那时我还在
北京等火车。又知道因起义时井勿幕不在西安，是由张翔初（凤
翮）领导的。当时清朝的新军在陕西有一混成协（相当于后来的
旅），协统（旅长）是旗人，张是协统下面的一等参谋官。革命后陕
西的首领没有称作都督，而叫做大统领（后来为与各省划一，改称

都督)。在大统领张凤翥之下另设四个都督，象后来的厅长一样。

到了西安之后，最感意外的是除了张凤翥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四个都督好象全是哥老会的人——至少有三个是，张凤翥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郭希仁在张凤翥下面做个秘书长之类的事，终日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戏称他为“郭丞相”。此外又设了四个参议，我到西安后也补我做参议。参议们每天批公事，什么实际的事也不管，例如有人来告状了，就顺着状子上的语气批一下，也不问事实真相如何，整天纸上谈兵。李子仪(元鼎)、茹卓亭(欲立)终日在做批公事的参议。

过了两三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想走。井勿幕庸了陕北招讨使的名义驻节三原，这时也回到西安，他也觉得不满。同同盟会的人谈，大家都认为革命失败了。我预备到汉口，井勿幕希望我见到黄克强(黄当时是大元帅)和黎元洪(黎是湖北都督)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这时已是民国元年春天，清廷大势已去，袁世凯已出来要求媾和)。井勿幕写了两封信给黄克强和黎元洪，张凤翥也以陕西都督的名义备了一封正式公事给湖北都督黎元洪，都由我带去。张凤翥给我一张离开西安的护照，以为可以凭此出城。不料到城门口时，大统领的护照和参议的身份都没有用，兵士不许出城，说一定要有“大哥”的护照。这位哥老会的“大哥”叫张云山，是当时四都督之一。我又去找张凤翥，对他发了些牢骚。他叫秘书去请“张大哥”另发了一张护照，我才离开西安。

(九)

当时河南还在清廷手中，从郑州到汉口的一条路是不能走的。

我预备由西安翻过秦岭到龙驹寨，听说龙驹寨到汉口水路仍远，而且当时龙驹寨电报局局长杨叔吉是我的老同学，预备到龙驹寨去找他。这一次到汉口去，井勿幕叫我请黄克强接济军火，我当时因为自己不内行，另找了一个同伴，陕西陆军中学毕业的，四川人，叫汤万宇，一起出发，作为我的军火顾问。

到龙驹寨，找到电报局局长杨叔吉。杨说去汉口不成问题，因为电报局有一位师爷贾东垣去年冬天曾到老河口买过电线（当革命的时候，农民间因传说电线杆子破坏了风水，以致收成不好，于是把大部分电线杆子全砍断了，电线也拿走了，所以必须补添），过几天还要再去，可以搭他的船同行。由龙驹寨到老河口这一段中，经过河南，或有危险，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的清军长官姓任的与贾师爷认识，可以请他关照；至于老河口到汉口，则在湖北境内，换坐大船，毫无问题了。为了小心起见，我又去找贾师爷，问在河南境内一段究竟有无危险。贾说“任大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和职位，当时确是如此称呼的）绝对可靠，不但从前见过，吃过他的饭，过年的时候他还派人送礼来。因此，我也不再疑惑，乃同贾东垣、汤万宇，带了四个卫兵启程东下。

两天以后，到了荆紫关。上午十点左右就到的，贾师爷上岸去拜访任大人，请他派兵护送我们出河南境。但一去四五个钟头不见回来。汤万宇说：“要是出了什么事吧？”我经他一说，也担忧起来，但推测也许贾在城里抽鸦片（贾是一个秀才，喜欢抽鸦片烟）或是打牌，所以没有回来。到下午四五点钟，任大人派人来，请我和汤万宇进城去吃晚饭，我们此时才比较放心，但因为和任不认识，托故辞谢了。天快黑的时候贾师爷才回来，说在任大人那里打了几圈牌，任已答应派兵护送我们出河南境。果然不久就有二十个兵到

来，他们另外准备了一条船护送我们。第二天清早，就一齐出发了。

又过了两天，到了浙川厅（现在的淅川县）。船还没有靠岸，远远看见岸上黑压压一大群人。我还以为有庙会，但这些都望着我们的船，向我们的船指指点点。这时我们还未细想，忽然对面划过来一条船，把我们的船撞停了，跳上来三个人——后来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代表政军学三方面的，政方是知事衙门的师爷，军方是团练方面的武官，学方则是士绅之流。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几个人，做什么的。贾师爷实告是去老河口买电线的。我说是因为有个弟弟在汉口病重，到汉口去看弟弟的。汤万宇说是回四川去的。武官问他，由陕西回四川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他说，因汉中广元这条路上有土匪，所以绕道汉口。武官于是说：“我们接到了荆紫关任大人的电报，说你们是革命党，叫我们来捉拿你们。”我们当然不承认是革命党。那个办学的士绅就把我拉到一边，轻轻地对我说，叫我告知实情，以便代为设法解脱。我怕他骗我，矢口不认。三个人见没有结果，就走了，派了两个兵在船舱两头口上把着看守我们。

他们走了，我想这回可糟了。但若没有证据的话，我们可以坚不承认，或可幸免。而我身边所有的证据是两封给黄克强和黎元洪的信和一份陕西都督给湖北都督的公事，必须立即毁去。我想着毁去的办法：若是丢进河去，恐怕他们特意派了人在下游等着，如被他们捡了去的话，是我们送证据给他们；若是吃下去，这样厚的长信和桑皮纸制的大马封，如何吃得下去；若是用火烧的话，有烟，也有纸灰，况且还有两个兵眼睁睁地看着。想了一会，最后决定还是烧。幸亏那时天气还冷，舱里生着炭盆，我就佯说太冷，叫添炭，又

故意挑了几块没有烧熟的炭加进炭盆里，烧得满舱是烟。我们还故意骂拿炭的人太笨，为甚么拿这样的炭。“烟幕”布置好了，为减少两个兵的疑心起见，我乃走到两边舱口，请那两个兵进来烤火。两个人看见这样的“先生”请他们烤火，有些不习惯，同时大概也是因为怕进舱后我们若逃掉一个人，他们会犯嫌疑，所以不肯进来。我一再请他们，他们推辞着更走远了一点。这当然是正中下怀，于是我们三个人便围着炭盆，把信和公事撕成一片一片放进炭盆去。又因没有火苗，纸燃不起来，我们就一面嚷火不行，一面拿一把扇子扇火。纸灰飞起来了，我们就说，谁这样糊涂，拿炭的时候连纸也夹在里面了。两个老实的兵士就被我们这样骗了过去。总算把信烧完了。

证据消灭了还不到十分钟，检查的人就来了。把我们所有的行李都查了一遍，一无所获，只有贾师爷所带的二千两和我们的几百两银子。他们又说，厅知事请我们到衙门去住一夜，可是我们离船时他们又叫我们将全部东西都带着，连四个龙驹寨电报局的卫兵也带着。我们知道这次事情将很麻烦了。可是因为证据已全毁了，所以也不太怕。

(一〇)

我们三个人进了厅知事的衙门，从大堂到二堂，从二堂到花厅，两旁密密地排了武装的兵士，背对背地站着（所以实际上是有四排了），情形看起来很严重。走到花厅门口，厅官走到屋外来迎接，他把我们打量一番之后，举手让我们进去。贾师爷年纪大，被

让到上面平床上，汤坐在东面，我坐在西面，厅官也坐在西面我下首的椅子上。他是个小个子，八字白鬍须，浙江湖州人，说起话来滑头得很。照例的官派的寒暄过了，问了我们的来历，我们的回答和船上所说的一样。他又说到荆紫关姓任的军官的电报，我们说根本无此事，希望他小事化无，放我们走。他不肯，说，“这事兄弟不敢担肩（负责任），要送三位到南阳，由军门大人发落。”他说的军门大人是指南阳府的镇台，姓谢，因为是道士出身，百姓叫他作“谢老道”，素以杀革命党出名。我们想，一送到南阳便凶多吉少，但是和厅官争执也难有效果，就辞了出来。

出了会客厅，我们马上从客人降为囚犯，进了监牢。第二天，我们从监牢里被提出来，点名后在颈上拴上铁链，向南阳出发。路虽是山路，但允许自己花钱坐轿子。所谓轿子，是用一只椅子和两根槓子组成的，比四川滑竿还不如，我们每人都雇了一乘。颈上的铁链始终有一个“解差”牵着，每到一个村镇似乎是招摇过市，引得大家都来围着看。后来我总算同解差讲好，把铁链子交给我，藏到皮袍子里面去，拖下去的一段放在皮袍子底下的西装衣袋中，虽然很重，到底不会处处被人围观了。解送我们的卫队一共有二十个人，队长特别同我拉拢，称我为同志。我怕他有花样，不愿答理。后来他说，谢老道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知府知县都是旗人，叫我们特别小心，最好到南阳以前先写好几封信和稟帖，到后分送政学各方面，叙说自己实是冤枉，这样或可得到开脱。我想倒也有理，后来是照办了的。后来想，他也可能真是同志。

到内乡县，渐川来的人算有一个交代，把我们送到县衙门大堂上点名换铁链（他们给换铁链取了一个很雅的名词，叫作“换线”）。在内乡我们是住在待审所（比监狱好得多），知县还派人送了一桌

酒席来。我们生死不可测，心绪很坏，谁也吃不下，就送给待审所的人们吃了。大家对这县官是什么用意，也猜想不出（现在想起来，也许是“一脚踩两只船”，投机一下而已，那时年青，还以为可能他是在酒席中放了砒霜要毒死我们呢）。县官又派人来说，晚饭后有空的话想见一见我们。后来因为我们同来的龙驹寨电报局四个卫兵，突然逃走了一个，县官大概怕我们也逃走，那么他如会见我们，岂不有了嫌疑，所以又取消了这个约会。

次日，由内乡到镇平，也是住在待审所中，也是在大堂上点名“换线”，递解的差人也换了。第三天到了南阳府，并没有直接送到镇台衙门，而是送到南阳县衙门。由这时起我们三个人就被分开了，进了南阳县三个不同的监狱。

(一 一)

我住在一间非常肮脏的小屋中，挤满了十来个人，没有床或炕，也无法在地上把铺盖打开。夜里睡醒时，常发现别的犯人拿我的腿和脚做枕头。空气当然是非常污浊。到后第二天早晨，我拿出几两银子托狱卒换一点钱。那时一两银子可以换两吊钱，但狱卒换来的行市是一两合一吊二百钱。他问我要吃点什么，我说不想吃什么。他安慰我说：“事有事在，饭总要吃啦”，并且建议我吃“糊辣汤”（是一种河南街头食品，或者是因为吃起来胡拉有声，故名）和饼。我同意要一碗汤、一张饼，但他叫出去时却说“要二十张饼，二十碗糊辣汤”。我告诉他我只要一碗汤、一张饼，他回答说：“先生，这些人也要吃啦。”我才明白新囚犯应当请旧囚犯的道理：旧囚犯

穷了，等新囚犯来，大家吃他的；新囚犯吃光了，他也就变成旧囚犯，再吃后来的新囚犯。

我在镇平的时候，就把给各方面的信和禀帖都写好了，此时托狱卒找人送一下。我想特别多给点钱，付他二百钱作送力，可是他竟要两吊，只好照付。

这里又有一件奇事出现。那天早晨，忽然外面叫问有张先生没有，某师爷（我忘了他姓名，后来知道他是知县的亲信师爷）来看他。接着就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人走进来。我站了起来，他却客气得很，一下子就坐在地上，攀谈起来。他说：“听说诸位来了，敝上司派兄弟来看看，敝上司深恐诸位是冤枉的”，等等。我于是又说了一遍弟弟在汉口生病的话。他满口答应：“等军门大人回来，敝上司一定代各位说说各位冤枉的情形”，并且说：“现在兄弟先回去回敝上司一下，一两天敝上司有空时还想见见各位。”又问我有什么事，他可帮忙。我说要换银子，他连称不必，“回头兄弟叫人送钱来。”果然走后不一会就送来四吊钱。后来我才得知他看过我之后还去看过贾、汤二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用意，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总之，他很帮我们的忙。狱卒从此对我当然也客气得多了。

不料这位师爷一去十几天没有下文。一天夜间我已经睡了，忽然被叫醒，说：“请张先生出去。”我以为夜里提人大概是要行刑了，可是出门后看见贾、汤二人也从外面（他们的监狱在外面）向里走进来，又似乎不象是解往刑场的样子。紧接着我们三个人的铺盖也搬进来了，而且直带我们向里面走。走过大堂后，在一间屋子里见了上次那位师爷。他说，因为知县事忙，所以到今天才能接见我们，很对不起。我问是怎样见法，他含含糊糊，不愿给一个具体回答。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见时是不是应当跪下。他吞吐许久，最后说：“还是跪下好。”我又问他是不是应当称“大人”，他吞吐之后也说：“还是称大人好。”知县是在二堂“接见”我们的，贾东垣第一个进去，第二个是我，走进去时才知道根本就是坐堂审问。县大老爷顶戴马褂高坐上边，堂下两边站着十几个衙役，其中有的手执刑具。当我走近阶下时，十几个衙役同声喝“跪！”这时才恍然方才问那位师爷关于跪不跪的话真是多余。

审问的情形是官样文章，他完全照我禀帖上叙述事实的次序问了一遍，毫无挑剔。最后知县说，他也觉得我们象是冤枉，等军门大人回来，他可以替我们解释，并且叫我们住到外面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去，不住在这又小又脏的监牢了。临退堂前，他还嘱咐我们在那里安心住，意思自然是叫我们不要跑。

我们当晚搬到一个优待的监狱里，一个小院，只有三间房子，据说是“告上状”（各县到府来上告）者或有功名的人住的监狱。从此以后，我们三个人又住在一起了。搬过来之后，那位师爷最初来看过我们几次，还送一些他自己家中烧的红炖牛肉等食品，但是后来又不来了。我们一住两个月，愈过愈焦灼不安。

这两个月的日子真不好受。隔墙就是重犯监狱，铁链的声音时常可以听见。镇台处的下文听不到，我们以为不免一死了。半夜里灯光如豆，听到门外马蹄声或是刀枪的磨擦声就不由感到心惊。日子就随着恐怖的黑夜蠕动地过去。这两个月中，白天还可以拿看书来排遣，就是夜里睡不着时特别焦躁。贾东垣有他的烟灯作伴，还好，我和汤万宇最觉烦闷。

我在上海念书时有一个同学周起孟，是南阳府人，当时并不太

熟，别后亦未通信。我这次到南阳后与学界人的信中有一封便是给他的。信去后多日没有消息，我以为或者是信未送到，或者是他不愿来。不料有一天有一个身穿粗布小棉袄，系着腰带，完全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来看我。他说他是周起孟的哥哥，特来告诉我说起孟到湖北参加革命去了，所以不能来。此事给我一很深的印象，因为周起孟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心气和平、与世无争的人，而现在居然也参加革命，可见当时革命思想传播之速之广。后来他回南阳后，也来狱中看过我一次。

(一 二)

看守我们的有四个兵，三个年老的很谨慎，一个年小的才十四五岁，常偷偷告诉我们一点消息。南阳与湖北襄阳接壤，襄阳的革命军由季雨霖率领，准备攻打南阳，因此谢老道常在南阳、襄阳边境部署军队并构筑防御工事，偶然回南阳府也很忙。有一次那个小兵说谢老道打败仗了，我们一喜一惧，因为固然希望革命军来，可是又怕谢老道放弃南阳时临走把我们这些革命党全杀了。有一次那个小兵又来告诉我们说，季雨霖快要来了，城内住户的灯笼都已拿到官家去准备作守城之用。可是那天夜间革命军并没有来攻城。

南阳光复的前两天，情形越来越严重。我们全靠那小兵报告消息。有一天，他说季雨霖离南阳只有五十里了，次日上午还说有三十里，到下午又说只有十几里了。谢老道在南阳以倔强嗜杀著称。因为他倔强，我们总以为他到退无可退时一定要背城一战，因为他嗜杀，我们恐怕他在弃城逃走前或者要杀我们以泄愤。因此，

我们对于季雨霖越来越近的消息是有相当矛盾的反应的。不过因为只有季雨霖来了我们才能出去，而谢老道的临时泄愤却是或然的，所以还是希望季来的心切。何况在公的方面讲，当然也是盼望革命军从早光复此地的。

最后一天的演变几乎是戏剧性的。清早起来不久，一个老兵说：“昨天知县下乡去查乡，没有回来。”小兵在一边插嘴说：“哪里是查乡？我看他是跑了。”又过了一会，忽然另外一个老兵叫我们到院子里去看，说镇台衙门起火了，谢老道已经跑了^①。再过几十分钟，听见街上有人放枪。小兵从街上回来，背了半个小猪，说这是他抢来的。又过了些时候，看大门的老头子跑进来笑脸相迎地对我们说：“张爷，汤爷，你们的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出去了。”

我们到门外去看，有些老百姓，包括男女老幼，在抢一个当铺，大家抱了很多衣服出来。季雨霖的部队这时只有四个骑兵进城，告诉大家不许抢，果然大家都不敢抢了，把已经抱出来的东西都放在十字路口堆起来，预备退还当铺。过一会，家家门上都插白旗，表示欢迎革命军。我们因为外面太乱，而且流弹也很多，所以决定暂时在狱里再住一两天。由那时起，狱中一切便由我们支配了。

第二天，我们正预备搬到旅店去住，季雨霖的参谋部有人来找

^① 我当时在南阳听说他带了亲信卫队逃了出去，在路上他的卫队把他抢了，他愤而自杀。杀人不眨眼的镇台或“妖道”下场如此。然而后来有人却不愿让他这样平凡地死，甚至也可说不大光荣地死，又造出些神话来。抗战前有一本叫做《辛亥殉难诸臣记》（金梁著）的书中，却说他死得非常壮烈，是于兵败后，衣冠顶戴，北向三跪九叩谢恩而后“尽节”的。

我们了。原来我们在浙川南阳途中在内乡逃掉的那个卫兵，回龙驹寨报告我们被捕的消息后，张凤翥也就知道了，早打电报通知湖北方面，叫季雨霖到南阳后立刻释放我们。出来之后，季雨霖的参谋部还请我们帮忙。我们因急于赴汉沪，自然谢绝了。离开南阳前，游了一次卧龙岗，看见岳武穆所书出师表石刻，是此行唯一值得纪念的事。经过襄阳到武汉，看见湖北的革命也是一团糟。由汉口到达上海，已是四五月间了。

(一三)

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曾到南京去看过临时政府的情形，也感觉很失望。在陕西，我感到是一些无知的人代替了另一些无知的人，由武昌到上海，沿路所见，也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颇感觉革命党人固然是富于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但革命成功后对于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因此除了推翻清室，把君主政体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革命是徒有其表的。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而中国并没有更现代化一点。某些人所说的“破坏容易建设难”一句话，不幸完全证实。在这种失望情形下，我便决定到外国去读书，预备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

在未出洋前，也就是在上海的后一段时期中，有两件事或者值得谈谈。一件是与孙中山有关的，一件是与选举国会议员有关的。

孙中山当时已经让袁世凯做临时总统，他自己决心办实业，并

且以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为号召，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会员多半是同盟会会员和后来的国民党党员，我也是会员之一。当时袁世凯为了排挤孙中山，乃叫他的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叶恭绰在北京又组织了一个铁路协会，包括一批北洋官僚（即后来所谓交通系），以与南方的铁道协会对抗。后来再进一步，铁路协会竟要求取消铁道协会，不久又调换枪花，要与铁道协会合并（实际上就是要吞并铁道协会）。当时我们听了都很生气，觉得袁世凯不但在政治上容不了孙中山，连实业，甚至连一个空洞的铁道协会，都不许他办。大家生气得很，谈起来都坚决反对合并。

过了几天，铁道协会要开会了。我们纷纷议论，以为这一次开会一定要决定反对合并。果然，开会之后，孙中山请我们发表意见，发言者大概都反对合并，大骂袁世凯。不料孙中山自己在最后发言，却主张合并。他举了许多理由，分析得很清楚，大家听了觉得也很合理，到表决时竟然大多数都赞成合并了！这固然表示大家当时对他的信任和拥护，但同时他的口才的确也真令人佩服。那时的革命党人每个都是自负不凡，他居然能列举各种理由（不管在现在眼光中看起来是否正确），完全依逻辑方式推论，毫不煽动地折服了人心。这确是他的一种过人之处。

后来章行严（士钊）有一次曾同我谈起孙中山的说话本领，他也很佩服孙中山的辩才。他说：“我每次去看孙中山，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见了面听他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从章氏此话也可见孙中山的口才的一斑。

另一个与孙中山有关的事，是他有一次应当时的中国社会党

党魁江亢虎之邀，在丹桂茶园讲社会主义，一天讲两小时，连讲了三天，我也曾去听讲。他的讲题是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那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公开讲演，也觉得他的完全逻辑式的陈述中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讲到马克思学说中共产主义实行后社会没有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说：“那时候人生的物质需要就象我们的苏东坡先生所讲的两句话，如山间明月，江上清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这几句话曾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到现在虽相隔三十多年，犹觉如闻其声。

(一四)

我在上海准备出洋的时期中曾回陕西去过一次，这一次回乡很有意思，是选举国会议员去的。这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次选举，有些情形或者值得记述。

当时选举国会议员是采复选制。每个县分为几个区，每区选出几个代表，这些代表称为初选当選人。再将全省分为几个区，由每区所辖各县的初选当選人投票，选出来的才是国会议员。我在上海，忽然接到家中来信，说我已在初选中当选为代表。我当时很奇怪，感到我在十一岁即离开乡间（我是朝邑南乡人），十八岁即到外县去念书，知道我的人很少，谁会来投我的票？同时我更感到奇怪的，是乡下人不识字，如何会投票。我当时对于是否回陕西去在复选时投票，也考虑很久，不能决定。回去吧，这一次实在太远，路费也不少，回去了，还要出来准备出洋，未免太不经济。不回去吧，我们在当时读的讲民主政治的书上都说投票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若是公民都不尽这种义务，政治就要被少数人把持操纵。

考虑的结果，认为既然参加过革命，对选举也应当尽公民的责任。因此就自掏腰包，路迢迢地回陕西去投票。

到家之后，才明白我何以能当选及乡下人如何会投票的道理。原来自从要“办选举”，朝邑就设了一个选举事务所，并由事务所请了各乡绅士，商量选举的办法。依照法律规定，朝邑县按人口比例应当有二十一个初选当选人，又规定大约有若干选民。选举事务所请下的各位帮忙的绅士的实际任务有二，第一，他们要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第二，他们要雇些书记为这些“应当”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拿二十一除全县选民的总数的得数）抄写若干票（譬如说每人二百张或三百张）。抄写好了，还要把这些票封在一个柜子里，再把这柜子送到县里，定期开柜数票。数票后当然是人人当选，因为不能当选的人的票，书记根本一张也没有写。也可以说，因为要当选才写的，不当选何必写呢。当年“办选举”就等于“办差”。别县的办法或技术如何，我不晓得，我们朝邑的确是这么“办”的，我的故乡属于朝邑南区，选举事务所的绅士们有许多知道我和革命有关系，就把我的名字列在里面，我也就因书记先生一番抄写之劳而当选了。

朝邑县在复选时属于陕西东区，在潼关投票。前一两天，闾区十几县的人都陆续来了。我到了潼关，认识我的人见我从小回来，都以为我是来竞选的。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出洋，这次是来投票的。他们之中除了和我很熟的人以外，都不相信，认为决无从上海不远千里赶回来投这一票的道理。

可是无独有偶，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我的同志，这人就是在抗战第一年作古的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李宜之（仪祉）。他是从南京赶回来投票的。李宜之是蒲城人，他的伯父李仲特是数学家，是陕西

高等学堂教过数学，父亲李桐轩，是文学家（后来陕西从事改良戏剧的易俗社初期所用的剧本，多出于桐轩先生之手），两人都赞成革命，和井勿幕是小同乡。有一个时期，李宜之的伯母和母亲既都已去世，而他和他的哥哥又尚未结婚，所以朋友说他们是“一家人四口，革命党两双”。他是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后去德国留学，回来后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做教务长。他虽未积极奔走革命，但对革命始终极同情，所以这一次也赶回来尽公民义务。他是有名的书呆子，我和他又根本没有从事竞选活动，所以大家终于相信我们并不是为了想做国会议员而来的了，终于相信天下竟然有为尽公民义务，不远数千里而回来投票的傻子。

这一次选举，可以说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选举中最清白的一次，大家根本不懂行贿赂，连请客的事也没有，完全是靠情面拉票子，真有点“古风”。到二次选举，大家晓得票子可以卖钱，就一塌糊涂了。

我们东区选举出来的众议院议员共有五个，其中后来为人所知的现时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马彦祥（骥），抗战初起时张自忠做天津市长，他是秘书长；一个是寇胜浮（遯），在段祺瑞执政府时代曾因国民二军关系做过农商总长，是一个出名的书家。

从陕西回到上海，我就加紧准备出洋。革命朋友们当时对我“游洋”（那时不叫留学）之举颇有表示反对的，认为是不负责，把革命事业让给进步党和北洋军阀官僚就不管了。而我则深感到没有现代知识或技术一切都办不到，于是就不顾朋友的批评，决心出国赴美。我在出国前，本来是预备学土木工程的，这自然与上面所说的铁道协会会员一事有关。不幸到美（民国二年七月）后，因数学不好，对画图又乏兴趣，未入学即改变计划。当时陕西派的留美学

生共四人，除我外，其他三人是严庄、刘楚材、林济青。林济青是山东人，革命后因在陕西外交司做事，又因当时革命党人颇富大同思想，没有省界观念，所以就派到了他，以后可就不容易了。

辛亥上海光复前后

—座谈会记录—

据《上海史料选辑》编者按：我们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中、下旬两次约请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傅墨正（傅孟，沪军都督府成立后任沪军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二十三师第九十团团长）、李健育（李定夷，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李净通（李健生，当时任上海《时事新报》编辑）、余芷江（余沅，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在该府总务处工作，南北议和时任南方代表团秘书）、张志鹤（张伯初，当时在川沙办自治）、林道源（林孟鸣，当时为商团团员）、贾粟香（贾丰芸，当时在敬业学堂任教）、张斯摩（张仲书，江浙联军攻南京时任该军参谋处长）、周斌（周克新，当时在上海湖州旅沪公学读书）、唐执夫（唐在礼，当时在袁世凯处负责招待各省代表的工作）等老先生座谈辛亥上海光复前后情况。座谈会由上海市文史馆严谔声副馆长主持，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协作下进行。馆员所提供的情况间或互有出入，也有与报章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之处，均辑录如下，供同志们分析考证时参考。

光复前的活动

傅墨正：武昌起义后，形势一度危急。如果上海不赶快响应，各省起义就要推迟，辛亥革命恐不能迅速成功。上海光复后，浙江、

苏州、镇江、南京在政治、经济和军械上都曾得到上海很大的支援。上海为中外瞩目之地，一旦起义，影响很大。所以，上海的独立是辛亥革命的转折点。

李健青：我很同意傅老的看法。上海未独立之前，只有湖南、陕西、九江、南昌、山西、云南等六处响应武昌起义。上海独立，东南响应，关系全局很大。

李净邇：辛亥上海光复的准备工作，如运动军警以及联系青洪帮，都是陈其美去进行的。光复时，我在《时事新报》任编辑。光复前一天的上午，我亲见陈其美来报馆说，“明天上海就要光复了。”果然，到了当天深夜，就有访员来报告，陈其美已率领部队进攻制造局。到了天明，全市即悬白旗。稍迟，访员又来报告，陈其美已做了沪军都督。

严得声：上海光复时，陶成章在不在上海？青洪帮是谁去联系的？

傅墨正：陶成章当时在上海。当时，同盟会和青洪帮的联系是很秘密的，只有横的联系，没有纵的联系，所以没有参加联系工作的人不知道。

余芷江：各省的革命党人到上海后，或到哈同花园，或到“铁笔报”（即在大陆报馆楼上另辟一室，“铁笔报”只是一个机关，没有出版过）。起义前，陈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在“铁笔报”研究，究竟是先以全力支援湖北还是先在上海起义。后来因为湖北形势不好，乃决定先在上海起义，以为声援。进攻制造局以前，已与各方有接洽，让进攻的部队在沪军营集合，也是因为事先有过接洽的原故。陈其美和各方面的联系工作是做得很好的。“铁笔报”本来只有吴稚晖、柳亚子、戴天仇、叶楚伦这些人，后来陈其美也参加了。

夏霖香：我晓得李平书常在小花园一个馆子里请客，请的都是地方自治机关里的人。

林道源：那个馆子叫“都益处”。

余芷江：当时，时报馆楼上有一个“息楼”，对外称“俱乐部”，吃吃喝喝的地方，其实，里面都在搞政治活动。赵凤昌、沈恩孚、李平书、狄平子、袁希涛、陈冷、雷奋、史良才（即史量才）、龚子英等，都是息楼里面的人物。姚文楠、袁希涛、陆文麓没有参加辛亥上海光复。雷奋和陈冷是郎舅。赵凤昌是湖北候补知府，张之洞手下的一个红人。他住在上海，与同盟会南北方的人都有接触，是一个跑腿朋友。

严调声：是不是可以说，息楼是以张謇为首呢？

余芷江：可以这样说，但他不常到。狄平子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张志鹤：张謇是江苏独立的首脑。由程德全领衔的江苏独立的电稿，据说是张謇在苏州铁路旅馆拟就后交程拍发的。

余芷江：我记得有一份电报是沈恩孚起草的，张謇看过。电报底稿一直在我家里，抗战时被日军搜去了。这份电稿内容是江浙士绅要求清帝退位的，本来要张謇起稿，张说，清廷对他还有点恩，他起不下手，所以改推沈恩孚起草，由张謇、汤寿潜两人领衔发出。以后又有军政界程德全领衔的电报，也是要求清帝退位的。

傅墨正：听说苏州程德全独立，是上海独立之后同盟会派章梓去活动的结果。

张志鹤：江苏都督府民政司以李平书为司长，沈恩孚为副司长。民政司下分总务、教育、实业、交通、警务各科。李平书因在上海沪军都督府任民政总长，并不到司办事。史量才在民政司任实

业科长，但也不去办事，因其时张春为盐政督办，史正受张命筹办松江盐务。

进攻制造局

俞芷江：进攻制造局的日期，是在信成银行（南市毛家弄码头）协商，最后在乡绅里“尚义队”里商定的。

林遵源：进攻制造局前，商团休息的地方就在汉口路云南路口乡绅里，名为“尚义队”，凡商团团费住居在租界者在此集合。

贾粟香：进攻制造局的时候，只有商团，没有军队。商团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商团开到制造局，起先并没有进攻。当时也没有人说起有陈其美参加。陈其美忽然站出来说，他来说服守卫制造局的军队，可以不流血。这时，李平书才晓得陈其美也在场。陈其美对张楚宝的军队作了一番演说。军队方面认为他既不是沈恩孚，又不是李平书，不理睬他，并出其不意，把他推了进去。外面要里面释放，里面不放；外面就要进攻，里面说，“不睬！”正在相持不决的时候，忽然有人说：“张楚宝溜掉了。”有人说：“张楚宝既然溜了，上吧！”于是才开枪进攻。里面也还枪。伤人不多。有人就去制造局后门放火。道台衙门和右营衙门都烧起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天夜里要攻制造局，所以清朝的那些官吏都早已溜走。老百姓皆安然无恙。放火以后，制造局算是攻下来了。大家逃去以后，陈其美还绑在那里，故陈后来有“一榜（绑）都督”之称。

林遵源：攻制造局，除商团外，刘福标（即刘福彪）的敢死队大有力量。

俞芷江：刘福标原来是在吕庙卖拳头的。攻打制造局的时候，

他本来是打前队的，即敢死队。打不进去，他退下来，退到老西门外万生桥。制造局后由伶界潘月樵等和商团部分团员攻入。刘后为福字营营长，我未见过这人。

傅墨正：刘福标后来做福字营营长，驻在斜桥附近。

严得声：刘福标的福字营是临时搞起来的吧？

傅墨正：只有几十人，临时组织的。那时，有几十几百人就号称营，号称军。也没有什么武器，有几个炸弹就行了。

俞芷江：关于进攻制造局的情形，据亲身参加攻打制造局的许奇松先生告诉我说：进攻时，有商团、民军（包括敢死队福字营）和伶界人士，先在沪军营集合。陈其美拿来了两只箱子，里面全是手枪、步枪和炸弹，发给大家并叫大家臂缠白布。陈其美自己拿了一面白旗，大叫“冲呀！”大家从沪军营一冲冲到制造局。到了那里，陈其美先进去说服总办张楚宝，没有结果，反而被张扣留，绑在会客室。大家把陈被扣的事去报告留守救火联合会的商团等，于是决定进攻。这时，张楚宝已经逃走，李平书也已从制造局出来了。大家推李平书做进攻制造局的总司令。李平书乃委托李英石。李英石是骑马的，看见过的人说，他骑在马上，一点也不神气。

闸北方面的革命党人，知道南市方面制造局打不下来，就派人去支援。一直打到天亮，制造局的前门打不进去，改打后门，还是打不进去。那时，制造局附近有一个小店，店老板看见这个情况，就说：“打不进去就烧吧！”他还捐了十几听火油。一烧，制造局前门的守卫就乱了。制造局就是这样攻进去的。

傅墨正：攻制造局时，我不在上海，我听曾经参加攻制造局的俞凤翔说，攻的时候，商团是进去的，还有伶界的许多人。和陈其美同时进去的还有高尔登，都被绑起来。他们被绑起来以后，外面

急了，由杨谱笙和俞凤韶到闸北，向闸北警察署长陈汉钦恳求共同攻制造局，这才把陈其美救了出来。杨谱笙和俞凤韶是夜里一两点钟到闸北的。第二天清晨，制造局就攻下了。

余芷江：攻制造局时，商团只有团员张沛如中流弹伤重而死。

傅墨正：光复会也有人参加攻制造局。还有几个女子如尹锐志、尹维俊等。陶成章恐怕也参加的。

李健青：我听说，上海光复，闸北先于南市。公历十一月二日那天，地方上谣言很多。闸北巡警总局巡防队因请领枪弹未发，鼓噪起来，往外散。不知怎么一来，有民房失火。大家以为革命党来了。闸北巡警总局长姚捷助派巡警去镇压。各区巡警闻警毕集，但巡警回来时已臂缠白布。姚就逃入租界了。上海道刘燕翼也逃入租界。上海县田宝荣晚上继之出走。巡防队推陈汉卿为司令，闸北即告光复。制造局总办见此情形，就加强防范，因此进攻时比较困难。最后是由局后踰墙而入，举火焚局才攻下来的。不知是否如此？

余芷江：是的。闸北在农历九月十三日上午就光复了。本来是约好南北同时动手的。

林遵源：攻进制造局以后，里面混乱得很。

余芷江：是的。当天下午，我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形，没有人理会。满地是枪。大家都在抢枪。也有许多子弹，但和枪的口径不合。正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谣言说，北方派了两艘兵舰来攻制造局了。于是有人说，里面的人一概不许出去，准备抵抗。前后门都关起来了。到了四点钟，有人请求看守门的杨谱笙开门，杨谱笙不答应。快五点钟的时候，李平书派人到局说，现在要清理制造局内部，把门开了。于是大家一哄而出，枪和臂上所缠的白布也丢掉

了。我就到海防厅，遇到朱少屏。他要我帮他搞都督府总务处的工作，我答应了。又遇到陈其美。陈要我和伍廷芳联系，我即到伍廷芳寓所。大约在六点钟的时候，领袖领事问伍廷芳，听说北方有军舰攻制造局，他们没有得到情报，问南市的情况怎样？伍廷芳转问我，我就把我被关在制造局三小时中所见告诉了伍廷芳，但伍廷芳没有把这种情况告诉领袖领事。

李健青：听说进攻道衙时，有小队民军手缠白布，由小东门入城，一路并未遇抵抗。道衙的卫队反正后，还参加进攻制造局。道台刘燕翼则已先遁入租界。

推举沪军都督

贾粟香：不知为什么，制造局攻下以后，倒有人恐慌起来，搬到租界去。李平书一看情形不对，第二天（农历九月十四日）召集地方自治机关商会、商团、救火会在海防厅署开会。那时我在敬业学堂教书。制造局攻下以后，大家都无心读书了，停了三天课（农历九月十四、十五、十六）。我晓得那天要选出重要人物，就去看看情形。到了海防厅，看见李平书、顾馨一、姚文楠、李英石、穆恕斋都在场。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李平书见了，点点头。穆恕斋就对在座的说：“今天的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我也不理他。开会了，先举出李平书为民政总长，举穆恕斋管警察，王一亭管财政，葛尚彪做审判厅长，吴怀玖做民政长。接着就选军事方面的人。有人提出要成立军政府，大家赞成。于是举陈其美为军政长（这两个意见是谁提的，我记不起了）。快要散会时，忽然又出来一个不速之客。他站在会议室当中，摸出手枪在桌上一拍，说：“上海与中

国全局有关，武昌起义，选出鄂军都督，声望不小。陈其美昨天吃过大苦头，现在给他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大家听了都不响。这人又说，他看应该组织都督府，要陈其美做都督。没有人反对。大家一拍手，事情就停当了。这个不速之客姓刘，不知是陈其美的什么人。

余芷江：这个姓刘的就是刘福标。

严涛声：选举都督时，有没有人提李燮和？

林遵源：不敢提。

余芷江：李燮和没有势力。

严涛声：陈其美方面的湖州帮势力大。

贾翼善：选举军政长的时候，曾有人提钮永建，但是另外有些人说：“我们不认得他。”这些人当然也是陈其美的人。

张斯馨：李燮和也想当沪军都督。陈其美当了沪军都督，李燮和就去吴淞当都督了。那时，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是被周南陔说服反正的。

余芷江：李燮和虽然在光复时没有参加打仗，但他在光复前参加过策划，所以也有资格做都督。当时，李平书曾要钮永建做都督，因为钮是上海人，但钮不愿。有人想提李英石做都督，因为认为陈其美没有军事知识。但当时湖州人的势力大，拥陈的人多。李平书虽然参加了光复，但他和革命党人还有些距离，认为大家既然推陈其美做都督，这样也好。

傅墨正：当时上海一般人士对上海光复是满意的。把清朝统治者赶下台，是大快人心的。后来对于沪军都督府不满，也有一部分乡土观念问题在内：“湖州人怎么能够来管上海？”

余芷江：上海士绅本无革命思想，他们的看法是：“你要革

命，你就去革命吧！”有些老士绅甚至连邑庙里桂花厅前那块“皇帝万万岁”的牌子都不肯拿掉呢！

傅墨正：陈其美是在日本学警察的。辛亥革命时，回国的士官学生倾向于陈其美，所以陈有军事方面的支持。同时，陈其美在进攻制造局这件事上也有功，所以许多人推他做都督了。当时，新闻界也有许多人捧陈其美的。同盟会上海分部由陈其美主持，所以，以陈为都督比较相宜。陈其美和各省的联系工作做得很多。浙江光复前，他也曾到杭州去联络过。

那时，闽北方面以陈汉卿的势力最大，成立了游击队，号称两团，后来被陈其美解散。当时部队的名目繁多，女子队也有好几个。还有湖南、广西、广东方面来的部队。后来都逐渐改编，编成两个师。一个师以吴兆麟为师长（第一师），一个师以黄郭为师长（第二十三师）。另外还有李征五的光复军，下分两个团。张宗昌当时在李征五手下当营长。李英石亦带一部军队。我当时在第二十三师任第九十团团长。黄郭的参谋长是何澄（亚农），副官长是吴荣曹（震修）。黄郭的部队里，留学日本士官的很多。旅长许厚德就是士官一期的（以后改编为第六十一团）。还有刘建绪、金骥平、蒋介石、杜炳章、陈韬、陈其蔚。陈其美的哥哥陈其采也是士官第一期的。所以士官生与陈其美的关系很密。蒋介石在光复时回国，他和何应钦、张群、王柏龄等都接近黄郭。他们都捧陈其美，所以陈其美的势力较大。

李净邇：听说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先生面前劝陈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又听说，陶与徐锡麟均为光复会的发起人，光复会是苏浙皖三省的革命团体。自徐在安徽被难后，陶成章即成为光复会的唯一主要人物。上海光

复后，沪军都督一席应由陶成章担任，三省革命同志才能信服。陈其美探知这个情况，遂下毒手，阴谋将陶暗杀，以绝后患。

傅墨正：我曾在浙江参加光复会。秋瑾是光复会在浙江方面的主持人。秋瑾、徐锡麟遇难后，光复会的名义在表面上没有了，但他的精神和实质还是存在的。至于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关系，光复会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一部分。同盟会当时与很多组织有关系，光复会就是其中之一。同盟会在浙江的活动，以光复会为主干。秋瑾失败后，光复会的一切活动都以同盟会的名义进行。起义以前，同盟会和光复会的成员都在一道做地下工作，并没有什么争执。上海光复后，上海的同盟会由陈其美、宋教仁主持。陶成章、李燮和是光复会的。为了争夺上海都督这个位置，光复会和同盟会发生了磨擦，陈其美和陶成章暗斗很烈。一般人都说，陶成章是陈其美派人去暗杀的。陶成章死在广慈医院。在斜桥安徽会馆开追悼会时，陈其美曾去主祭，当时防范甚严。陶成章曾想做浙江都督，但他资望不够，他在浙江也没有什么活动。

周斌：一九〇九年，我在上海湖州旅沪公学读书。那年秋冬之交的某一天，我在学校看到一个陌生人，年纪三十岁左右，穿小袖长袍、西装裤，着皮鞋，发辫已剪去，梳成在左边分开的西洋式，戴眼镜。他这种打扮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后来得知此人姓杨，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湖州旅沪公学任代课教员。上海光复后，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曾在湖州旅沪公学教体操的金铁军。我问他在那个学校教体操。他说，他在沪军都督府里做事。我问他：“你怎样进都督府的？”他说：“都督陈其美就是当年湖州旅沪公学的那个代课教员。”他又说：“从前在湖州旅沪公学当教员的，现在都在都督府里做事。”我这才明白彼时的杨某就是陈其美。

上海解放前三年，我在上海组织“辛亥革命同志会”，经常和曾任湖州旅沪公学唱歌算术教员的王汉强见面。据他说，陈其美留学日本以及他回国后进行革命活动，都得到湖州旅沪公学创办人之一的杨信之的帮助。王一亭、张静江也介绍陈与各方面联系，陈本人也很积极，因此当选为沪军都督。陈后来委杨信之的兄弟杨谱笙为军需科长，委王汉强为总务科长。杨谱笙又是王宠惠的叔丈人。

林遵源：王汉强是人事科长。

余芷江：沪军都督府成立时，财务先推王一亭。王一亭没有钱，要他搞财政，是“摆摆炮”。后来改推沈绶云，因为沈有信成银行可资活动。府里的秘书多半是学校教员，如杨济沧、杨保恒等。我当时和朱少屏在政务处下面的总务处里工作。

光复后第一张安民布告是军政府发的，由陈其美出面，用的是黄帝纪元多少年。军政府存在的时间很短，连徽章都没有发过。

张志鹤：军政府的存在还不满一天。

李德青：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陈其美联络程德全、汤寿潜等召开十三省区代表会议，在爱俪园开会，倡议组织临时政府，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鄂军反对这个决定，黎元洪也不愿。后来重行选举，改以黎为正，黄为副，但要黎到南京就职，黎不能来，黄也不愿。虽无成就，但已是组织临时政府的先声。第二件事是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直到赴宁就临时总统为止，一切招待皆由沪军都督府负责。

傅墨正：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内部组织分六处：参谋处（黄郛任参谋长）、军需处（杨谱笙）、军务处（许伯铭）、军械处（大概是张祥）、传令处（姚舜）、谍报处（应桂馨）。此外还有何应钦、朱绍良、

沈鼎吾、沈鹏、王子良等人分散在各地。都督府外面有秘书处（李平书）、财务处（沈缙云、周佩箴）。沪军都督府谍报处是做特务工作的。

李德甫：沪军都督府的谍报处组织最乱，投效的人都安插在此，阿猫阿狗都可以参加。

俞莹江：沪军都督府成立以后混乱得很。经济帐目，包括许多人的捐献帐目在内，始终没有弄清楚。我曾看见过一篇帐，买两把藤椅竟要二十八元之多。

严涛声：应桂馨组织的共进会的情况怎样？

傅墨正：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应桂馨做谍报处处长，陈其美有许多事是要他去做的。蒋介石当时不在都督府，他在军队里当团长（后改隶黄郛部下）。另外还有一个团，团长是刘基炎。这一团后来派到山东烟台去北伐了。

俞莹江：我与应桂馨同过三天事。他是绍兴人。听说共进会成立后，应桂馨极力避免出面。共进会的成员主要是贩运私盐的“盐梟”。他们原来与政治没有关系，只是为了生活。当时的盐梟加入共进会的不少。应桂馨手下的人到长江两岸，可以不带钱，有吃有住。我和应桂馨在一道的时候，起先并不知道他是共进会的。有一次，我和应桂馨同到四马路大西洋西菜馆去吃饭。第二天，我又去吃饭时，那里的一位茶房问我为什么和应桂馨在一道。他说，应桂馨了不起，是共进会的头脑。我这才知道应桂馨是共进会的首领。

我在沪军都督府代朱少屏做了三天总务处长，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当时是管钱的。当时领款的手续是付款单子上由陈其美盖私章后，交财务处沈缙云付钱。陈其美把他的私章放在我那

里。我到都督府的第二天，有一个叫王钟声的到都督府找到了我，问我要三千块钱，说是要去解救他的弟兄。我说，我没有陈其美的因素。王钟声气势汹汹，拔出手枪，一定要钱。这时，陈其美的卫队在隔壁房间听见了，跑过来对他说：“要钱！要到都督那里去要，不许在这里吵”，并把王钟声拉了出去。他走了，我也就从后门溜走了。第三天，我才知道王钟声在马路路（今黄陂路）撞到了陈其美，逼着陈其美给了他三千块钱。王钟声拿到钱，买了船票，连夜逃去天津。谁知应桂馨已经有电报到北京，说是上海有革命党到北方来。他的电报里也没有指明是谁。王钟声坐的船一到天津就被搜查，王钟声被搜到了。三千多块钱，还剩二千多。王钟声马上被枪毙了。

夏霖香：李平书因为是制造局的提调，所以在财政方面比较有办法，上海独立后，他搞到三十万两银子。

傅昌正：张静江对于上海同盟会也有经济上的补助。

俞龙江：陈其美想从大清银行来解决一部分经济问题。那时，宋汉章任大清银行行长。陈和宋谈，要接收大清银行。宋汉章不答应，陈其美就再捉宋汉章。但是大清银行开在租界上，陈其美不能去捉。有一天，宋汉章在麻惠脚和吴芝瑛家小万柳堂吃饭，被陈其美侦知，用小火轮由黄浦入苏州河到麻惠，就从水阁上去，把宋带上小船，关在曹家渡都督府。各国在上海的领事认为陈其美是在租界上捉人，不答应，并找伍廷芳交涉。伍廷芳（这时伍已任南方外交代表，是黎元洪聘任的，他素来崇美）认为陈其美胡闹，不应该在租界上乱捉人，就派人和陈其美商量，银行事由伍廷芳负责，要宋停止将款项解往清廷，但要释放宋。双方谈妥后，伍廷芳要我和陈其美接头，并且搞了一辆汽车把宋汉章接出来。宋汉章一

见汽车，吓得发昏，以为要枪毙他了。我对他说：“出了小东门就是租界，你放心好了。”宋汉章为了对商界标榜自己吃过这回苦头，后来编了一本《伍公平法记》，要我到著易堂书店去印，印刷费用由宋汉章自己出。宋后来到北京去开会，把这本书带去送人。据说，这本书对他后来出任中国银行行长有关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上海广肇公所两天内支借了八十二万两或八十三万两。温宗尧当时是广肇公所董事，这笔钱是温宗尧向广肇公所说项，由旅沪广籍商家借给南京的。

南北议和

俞芷江：南北议和前袁，世凯当时已经认为清帝退位是不成问题的了，而南方不知道。南北双方决定议和后，汪精卫从北京牢监里出来，还以为没有恢复自由。他到了旅馆里，押送他的军警走开，他还真明其妙。直到旅馆的人送报给他看，他才知道武昌起义了。

议和本是要在湖北举行的。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已经准备带一班人去了。南方的伍廷芳不敢去，他不敢出上海租界。黎元洪派雷奋到上海来接伍廷芳，伍廷芳仍不肯去，反而要唐绍仪到上海来。经过湖北方面与唐接洽，唐也同意到上海开会。南方代表团有参赞温宗尧、王正廷、王宠惠。温是总参赞。正在组织议和工作时，汪精卫忽然到了上海，也是参赞之一。南方所有有关议和的文件都由他执笔起草。南北议和时，我和汪精卫闹了几十天事，常听他谈天。他说，他在牢监里很受优待，善书还送许多书给他看。伍廷芳手下人才很多，但是写文章写得又快又好的人没有。汪来，正好。他一天到晚在伍廷芳家里。汪精卫、伍廷芳、王宠惠、唐绍仪

等交谈时，说广东话，我听不懂。

陈其美主张在南市开会，唐绍仪和伍廷芳不同意，要外国人保护，于是就借南京路上的工部局市政厅开会，对面就是巡捕房。

会议时，各省派来的人都不参加，只由伍、唐两人谈。王正廷等虽也出席，不过听听而已。汪精卫起先也不参加，后来因为要他写写东西，也就参加了。唐绍仪带来的人，我知道有许鼎霖和赵椿年等是参加的。

这次议和是一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两回事。我当时管会议的电报，明码、密码都管。白天开会是在做文章，谈停战问题，规定你让出多少里，我让出多少里。白天打出去的电报是互斥对方违反协定，等等。重要问题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的优待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要外国承认问题，等等。所以夜里打出去的电报才是会议真正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会议进行时并不公开。会议开了几天以后，袁世凯将唐绍仪的职务撤销，改由袁与伍廷芳直接电商。这时就完全通过电报来开会了。南方的电报全由汪精卫执笔。议和结束后，汪精卫带了一班人到北京去了。

陈其美这班人没有参加议和。张謇、赵凤昌参加过会议以外的会，商量对策。唐绍仪被撤去北方总代表的职务后，虽不出面，但参加了南方的会议以外的会。

李燮青：我听说，当时一班名流常借赵凤昌宅开会，伍廷芳、张謇等均在其列。清廷逊位诏书是送经南方修改过的。诏书末段“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民国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是幕后人刘厚生的手笔。

唐执夫：南北议和告成后，袁世凯不肯到南京，并且指使曹錕

在北京发动兵变。南方迎袁代表蔡元培、汪精卫就打电报给孙中山先生说，只求赶快统一，实现共和，小问题不要计较了，而且听说日本已要派兵干涉，其他国家也要效法日本。南京就回电说，北方总要派代表到南京来谈谈北京情况，南方才会谅解。那时，王揖唐很想当代表，他自荐，南京不同意。后来袁世凯就派范源濂和我为代表到南京（这大概是梁士诒和唐绍仪商量决定的），叫我们第二天就动身南下。要在南京讲的话，范源濂早已和袁世凯商量拟好。我们到南京，见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陪我们到参议院。范源濂叫我把他拟的几句话念一遍，我就照念一遍。几句话的内容，无非是说袁世凯来不了，我们算是代表袁世凯来说明情况。一篇谎话。我念过以后，全场鼓掌，算是同意了。其实，孙中山先生早就知道袁世凯想做总统。从清帝退位的诏书里也看得出来。这篇诏书据说是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起草的。诏书由世续呈进隆裕，隆裕率宣统退位时就照发了。当时，我也在场。进宫时，有胡维德、赵秉钧等十来个大臣。袁世凯没敢去，叫胡维德代。他们进宫时，心里也发慌。袁世凯叫四个军官姚宝来、刘恩源和我（另一人回忆不起）穿军装同去接受诏书。

俞芷江：蔡元培他们在北京住的招待所，隔壁是一个教堂，就是准备让他们在“兵变”后逃到那里去的。兵变后，袁世凯要大家开损失帐。大家都不开，只有同去的一个姓曾的开了，说他在兵变中失去一只表，价八百元。袁世凯就给了他八百元。

领事团的态度

俞芷江：上海光复前伍廷芳在上海作寓公，武昌起义后，黎

元洪聘他为外交总代表。当时他的外交工作很少。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领事团不承认，也不否认。都督府成立后送照会去，领事团只是收下而已。各国领事接洽公事，都找伍廷芳。都督府后来就聘伍为外交代表。起先，伍也没有什么工作，后来，革命军队伍要通过租界，要伍和领事团接洽，伍和领事团接洽后通知陈其美说，军队只能由南到北或由北到南，横越南京路，不能由东到西或由西到东，经过南京路。领事团始终没有和都督府直接办过公事，他们只和伍接头。陈其美总想使军队能到租界，领事团始终不答应。伍廷芳起先和陈其美处得很好，后来认为陈不懂外交而与陈疏远了。其实，伍廷芳崇洋崇得厉害。

傅墨正：第二十三师成立时，司令部在闸北南海会馆。我的部队先负责守卫制造局，我常要到南海会馆司令部去。我每次去都要路过租界。我武装骑马过租界时，领事团从未干涉，这说明他们当时是很重视革命军队的。我骑马经过的地方，外国人的马车总是让我先走。这虽是小事，但证明领事团的看法与过去不同。我经过南京路时，也从未遭拒绝。

严得声：这是民元时的情况。

傅墨正：后来完全是袁世凯搞坏的。

余芷江：我认为外国人并不重视当时的革命军，实在是因为带枪的人在租界进进出出的很多，都督府的人连去买一把椅子也随身带枪。外国人防不胜防，怕弄出事来，革命党要到租界上去“捣乱”。而且，华商商团是准许带枪的。外国人也搞不清谁是商团，谁不是商团。他们始终只重视北方政府。领事的公事上对沪军都督府的称呼起先总是用“乱党”，后来经伍廷芳交涉，才改用“革命党”，还是不称“沪军都督府”。南北议和时，沪军都督府要

派军队保护双方代表，领事团不答应。伍廷芳坐的汽车和办公地点都由英国巡捕保护。开会时，从浙江路到西藏路一带的南京路断绝交通，由外籍巡捕戒严。

傅墨正：革命初期，人民民气旺盛，国际方面对我们的看法就两样了。

林道源：上海光复后，我每天早上到小东门海防厅去，要经过租界。我穿军装带枪，租界上的巡捕眼开眼闭。只有一次，有一个巡捕对我说：“你把枪放在下面好哦，不要露出来。”尹村夫续弦，迎亲队伍经过租界，队伍里有洋枪队，租界当局也没有干涉。

袁世凯扩充势力

傅墨正：陈其美在被发表为工商部长后，就辞沪军都督之职，南北议和以后，他就辞过好几次。当时，江苏人认为江苏省内不能有两个都督，上海士绅也有这个意见。

余芷江：陈其美辞职，是因为江苏各地的都督都取消了。

李健青：事实上是袁世凯的意思。

傅墨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地域观念。他是湖州人，不是上海人。

傅墨正：沪军都督府撤销后，上海的民政军政由江苏都督府管。我由第九十团调到江苏都督府做上校参谋，与黄某负责编遣无锡至上海一带的部队，对于那些编余的军官，给以“参议”、“谘议”、“差遣”等名义，并给以相当的薪给。

袁世凯在上海扩充势力，主要是用钱收买。上海制造局局长陈梈被收买了。驻制造局的第六十一团团团长陈其蔚（和陈梈同乡）

等也被收买了。应桂馨也是被收买的。其他各方面的人被袁收买的也很多。暗杀宋教仁、陈其美，就是收买了人去干的。

贾粟香：癸丑之役，陈其美第二次攻制造局，商团、商会和地方上的人都不参加。第一次攻制造局，大家不逃难；第二次攻制造局，大家知道要失败，纷纷逃难。陈其美一打就失败。陈其美走了之后，上海还有自治，但一切请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林道源：商团就是郑汝成奉袁世凯的命令解散的。

傅墨正：癸丑革命失败，原因很多，当时袁世凯虽派了郑汝成和臧致平率兵一团及海军一部到上海监视，但主要原因是南方没有统一的组织和划划——你失败了，我才来，致被袁世凯各个击破。有些省份和队伍还被袁世凯收买了。此外国际方面的关系也很大。我带六十一团攻制造局失败后，就是被租界当局缴械的。那是癸丑年公历七月中旬的事。

癸丑革命以前，我因南北业已统一，有志深造，到北京入陆军大学旁听，所以对北京方面的情况比较有点了解。我们暑期回南，适遇南京开会讨论独立问题。我认为按照当时我们的力量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回到上海，孙中山先生召我去谈话，我们明知要失败，但仍决定干。中山先生和上海同志们决定要干，我不能例外，就担任前敌司令。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没有计划了。

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

于 树 德

(一) 滦州起义

武昌起义后，新军第二十镇的一部在滦州起义。我曾亲身参加过这次起义，谨就个人的亲历和见闻，叙述其梗概。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调集关外新军和北京禁卫军在永平府（现河北省卢龙县）打秋操（即秋季军事演习）。秋操尚未开始，因武昌起义，清廷就把应调各军转调到各省前线镇压革命去了，只有第二十镇留滦州待命。第二十镇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很多抱有民族革命思想。该镇统制张绍曾也倾向革命，但不彻底。他在阴历九月间曾向清廷提出十九条，要求立即实行宪政，清廷表面答应敷衍他，又派他为宣抚长江大臣，调虎离山，等到袁世凯起用后，就逼迫他离职，并把第二十镇分散各地驻扎，以防起事。

当时京津一带的革命人士，正在千方百计地想在京津一带发动革命，响应武昌起义，动摇清廷的基础，而第二十镇实为当时争取的最主要的对象。张绍曾在任时，曾有不少人奔走联络。张离职后，其中下级军官对清廷更加不满，因此，滦州和其附近一

带的第二十镇的部队，更加成为革命党人策动的对象了。

当时我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附中读书，曾参加过“克复学会”（同盟会的一个支派，以排满恢复汉族统治为目的，用“克复”两字，语义双关，会中有童启曾、童冠贤、段亚夫、张砺生、李季直等，曾出版过几期《克复学报》）。武昌起义后，会员分投各地，天津只剩我一个人了。大概是农历九月间，法政学堂地理教员白雅雨（名毓昆，南通人）、学生胡宪（字伯寅，河南人）、凌铤（字子黄，河南人）、张良昆、熊飞等和我，还有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和其他人等共同组织共和会，推白为会长，胡为副会长，从事革命运动并与同盟会的王法勤及湖北派来北方联络革命的胡鄂公等取得联系。我们本来就注意第二十镇，张绍曾被逐离职后，我们认为更有机会可乘。乃派凌铤、张良昆等和我赴滦州，鼓动该地驻军起义。我们的机关设在雷庄一个花生货栈内，栈主李棠原在东北拉竿（做绿林侠客），后来洗手不干，回家开设了这家货栈。我们前后结合了十四个人，组成敢死队，在雷庄龙山结拜为盟，号称“龙山十四郎”。十四人中李棠最长，凌铤排三，何英排四，张良昆排九，我年最幼（十七岁）排十四，公推凌铤为领队。

当时滦州驻军只有一个步兵标（团），分驻城内、车站、师范学堂和火柴厂等地。一标三个营，第一营管带施从云，安徽人，施从滨之弟；第二营管带王金铭，山东人，王金钰之兄，他二人都积极赞成革命；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依违两可而倾向于反革命。队长以下的军官中如郭凤山（鸣周）、张殿甲（捷三）和汤寿麟等赞成革命的更多更热烈。我们同他们来往很密切，出入军营几乎没有什么禁忌。有一次因为起义日久不决，我们十四郎携带手枪、炸弹深夜排队入火柴厂王金铭营部，促迫他起义。他对我们说，

军队中大都赞成，只有标统（团长）岳兆麟反对最力，非除掉他不可。我乃告奋勇暗杀岳某。经过辗转介绍给团部师爷（秘书）王墨村当勤务兵。天津师范教员张幼匡给我无色透明的毒药一包，据说毒性很厉害。有一天我乘机把毒药下在岳某面汤里，他吃了只是呕吐，并没死，我以为毒药下少了。标部十来个人，除王墨村沉默寡言对革命不表态度外，其余都是反革命家伙。隔了几天再给岳某单独下毒不得手，我就把剩余的毒药都下在大饭锅里，他们吃了都在呕吐，我也只好在他们呕吐的地方假装呕吐，以免起疑。当时他们认为是山岚瘴气，闹着要标部搬家（起义失败后，他们发觉是我下毒，把王墨村枪毙了，冤哉！）。后来王金铭等通知我已经定期起义，速谋脱身，我这才托故回家探母脱离标部。

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滦州军民宣布起义，公推王金铭为北方革命军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张叛变后由施兼），施从云为总司令，白雅雨为参谋长，我们这班人都称参谋，誓师讨满，通电全国，布告安民。全城内外均悬挂白旗，表示反正。商店照常营业，居民安堵如故。滦州部队宣布起义后，因等冯玉祥的响应（当时冯也在第二十镇任管带，本与王施等约好同时起义），一等四五天并未进军。在这期间（大概是十一月十四日），袁世凯曾派通永镇总兵（驻开平）王怀庆到滦州进行宣抚，王、施等认为他也是汉族，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也参加革命，共同反满，并愿以大都督相让，想利用他号召他部下准军起义，以扩大革命的声势。王怀庆慑于形势，狡诈地答应了，暗中却以到各军营地巡视为名，乘隙逃走。

等了四五天不见冯的动静，军情日见紧急，不容再等，乃于辛亥年十一月十六日（公历一九一二年一月四日）扣留火车，准

备晚间全军乘车出发，直扑天津。这天下午派我和另一孙姓士兵前往古冶、雷庄间破坏铁路的电话线。当时我们很幼稚，只携带手枪、绳索和斧子，借了两匹驴就出发了。初更时分到达目的地，因工具关系只砍倒两根电竿，砸碎几个绝缘磁瓶。当我们在路上行进和破坏电线时，看见一列接着一列的军车向滦州方向开去，已经料到事情不妙。我们本来任务完毕应该回天津的，但是我们不放心，决定沿着铁路翻回滦州，心想万一遇到我军或者他们没有出发，向他们报告情况，好作准备。我们走到雷庄附近时约三点多钟，忽听炮声隆隆，枪声嘣嘣，知道是我军同敌人遭遇开火，我们正在敌人后面，不能前进，孙姓士兵领路绕道南行，到一个在乡村务农的退伍军人家，那人和孙姓士兵是同时入伍同时退伍的，他们还是盟兄弟。到他家时，天将破晓，炮声已经停止。那个退伍军人叫我们休息，他背了一个粪筐到交战地点替我们打听消息去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说：敌人在小山头上架起了大炮，拆毁了一段铁路，我军火车行进中突然翻车，又遭敌人炮击，虽经奋战，但终以众寡悬殊，地形不利，武器又不如敌人，因而大败，死伤很大，王、施两都督均壮烈牺牲，其余部队被俘的被俘，逃散的逃散。我二人无法，只好把两匹驴子托他设法交还原主，就回天津了。

我们回到天津后，听见逃回的军官说，当革命军登车出发时，第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关闭城门（第三营住城内），坚不登车，并向起义军开枪射击。王、施两营决定照计划行事，未与计较，即行出发，但人数已不足一千了。又听说敌军除王怀庆的淮军外，袁世凯又从石家庄调来第三镇曹錕的一个协（旅）来参加截击。

白雅雨等一行七八个人，逃离战场后，十九日误入古冶，古冶为王怀庆的总部所在地，搜查很严，因而被捕。我们得到消息后从各方面进行营救，甚至连北洋法政学堂监督（校长）李锡也出面说他们是考察地理的，吁请直隶总督陈夔龙予以营救。但他当天就被王怀庆杀害了。白被杀害时，倔强不屈，不肯跪下受刑，被残暴的王怀庆砍掉一条腿。后来家属收尸时，既找不到头又少了一条腿，真是惨烈。王、施等牺牲时听说也是一样的惨烈。

过了几天，传说有一部分起义士兵逃到迁安县长城内外一带，生活极苦。共和会因我是北方人又未剪去发辫，行动比较方便，乃派我去联络收容这一部分革命力量。我单人独驴走遍迁安建昌营、冷口、罗店、太平寨、崔障子一带，但并未遇到一个士兵，也未打听到他们的一点消息，只好怅惘地回了天津。

（二）天津共和会始末

天津共和会是辛亥起义后，以北洋法政学堂和天津女子师范学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也有学堂以外的人参加。公推白雅雨为会长，胡宪为副会长，与南方和京津一带革命团体联系，大概是辛亥年九月间（阴历）的事。机关设在天津里附近生昌酒店楼上。

天津共和会用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参加滦州起义运动。十一月间滦州起义失败后，白雅雨牺牲了，而这时候会员增加了，会务扩大了，事务繁剧了，担子加重了，胡宪的声望不够，能力又差，财务又没有办法，他就同天津的另外一个革命团体合并起来，并推那个团体的成员唐某（忘其名，广东人，据说是唐绍仪的侄子，又有人说是袁世凯的侦探）为会长，胡宪为副会长，但大权由唐某一伙人执

掌，胡宪形同赘疣。参加滦州起义的会员们都没参预这次改组的计划，对胡宪的这种独断专行很为不满，对唐某大权独揽更为不满。

滦州起义回来的人很多，一般人生活困苦，投诉无门。其中有些人自以为出生入死，不免有些骄矜，而唐某等高楼大厦，洋服革履，生活非常优越，相形之下，更激起一种不平之感。这时候正在南北议和，酝酿清帝退位，很多人都在等待革命成功，革命空气非常消沉，大家都无事可做，更助长了共和会内部的矛盾。

我在滦州起义失败后回到天津，又被派去迁安县长城一带寻找溃散的军队。再回天津后，看到会中一部分人腐化堕落，一部分人粗暴骄矜，互相埋怨，互相攻击，没有一点组织初期的那种慷慨激昂纯洁天真的气概了。于是我就消极起来，不同他们来往，并想退出共和会，更不愿意参加他们的明争暗斗了。

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凌钺被唐某、胡某诬为盗匪，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我听了很气忿，认为自己会内内讧，不应该借助外力，更不应该任意诬陷。我在气忿之下去找胡宪说理。我找到一个旅馆里(大概是长发栈)，胡宪不在，唐某一见我，就不容分说，喝令他手下人把我倒剪双臂，送赴法租界巡捕房，巡捕房略问几句，就押进看守室。凌钺已先在，还有其他从滦州回来的人(同我破坏电线的孙姓士兵也在内)一共七人，另有惯窃二人，共同押在一个肮脏小屋内。我们十来个人都用铁卡子卡住双脚，穿在一根长铁条上，依墙而坐，屙屎屙尿都要穿下穿上。茅坑就在屋内，而且同另外一间看守室相通，奇臭难当。

第二天把我们放出来站在院内，有几个衣服整洁的男人和女人相看了我们一番，摇摇头好象说不是他们。又把我们押回原室。

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法租界被抢劫人家的失主来认贼的。那时候袁世凯对租界上的党人常常诬为盗匪以便引渡。第三天，一个法国人据说是副领事，分别传讯我们。我们都同进来时一样异口同声地承认是革命党，是被唐某、胡某陷害的。讯问毕，就把我们改押在巡捕的宿舍里，也不带刑具了，我们就在巡捕轮流出勤的空床上休息。

当法国人问到凌铎时，他就把共和会所有的秘密机关和储藏军火炸弹的地方都供出来了。因为他恨极了唐某、胡某，他知道租界上是不允许私藏军火的，他不惜同归于尽和盘托出，以泄私愤。这天晚上，胡亮也被逮捕来了（没见唐某），同我们同住了一夜，凌铎责备他，他直叹气，还落了泪，好象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第四天，法国领事告诉我们，说我们违反租界法令，私藏军火炸弹，应该驱逐出境。又说法国政府已承认南京政府为交战团体，他可负责送我们到上海，不愿去的应该迁出法租界。那时大部分人都愿到上海去。但我对革命已很消极，又因南方并没有熟人投奔，乃迁居奥租界的小旅馆中。那时共和会的会员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汪精卫所组织的京津同盟会，对于共和会这一根底很浅的革命团体毫无留恋，从此就没有什么活动了，不到一个月清帝就宣布退位了。

附言：胡鄂公所写《辛亥革命北方实录》关于滦州起义部分和关于共和会部分，都与本文所述事实略有出入，当然作者认为自己的见闻是属实的。

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

刘 星 楠

(一) 在上海

清宣统三年辛亥，阴历九月二十二日 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姚桐豫、高尔登，通电武昌、南昌、福州、广州、长沙、昆明、安庆、桂林、太原、贵阳、成都、西安、济南、天津、开封、沈阳、吉林、齐齐哈尔、兰州、迪化等处，请各省公认伍廷芳、温宗尧二君为临时外交代表，并请各省派遣代表来沪，会商组织临时政府。

九月二十五日 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沪军都督府代表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长民、潘祖彝，在上海江苏总会开会，议决本会定名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九月二十六日 雷奋、沈恩孚、朱葆康、俞寰澄、袁希洛、林长民、潘祖彝到会。

九月二十七日 雷奋、沈恩孚、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潘祖彝到会，镇江都督府代表马良、陶逊到会。

沈恩孚报告在苏州都督府阅广东来电，武昌都督亦曾通电各

省，请派代表赴鄂，组织临时政府。

议决：致电武昌黎都督、黄总司令，本会各代表以上海交通便利，多主张在沪开会，倘蒙同意，请即派代表来沪与会。

九月二十八日 雷奋、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潘祖彝到会。

九月二十九日 沈恩孚、朱葆康到会。

九月三十日 雷奋、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潘祖彝到会。山东都督府代表谢鸿焘、雷光宇，湖南都督府代表宋教仁到会。

议决：先由到沪各代表所代表省分电黎都督、黄总司令，承认武昌为国民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各代表所推定之伍廷芳、温宗尧二君为国民外交总、副长。

十月初一日 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潘祖彝、谢鸿焘、雷光宇到会。江北都督府代表王熙、陈官彦、徐钟令到会。

按：当时镇江都督为林述庆，江北都督为蒋雁行，曾某割据一隅，僭窃名号，本无派遣代表的资格，而沪上代表会居然接受，令俱列席，殊属失当。

十月初二日 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潘祖彝、谢鸿焘、雷光宇、徐钟令到会。

十月初三日 沈恩孚、朱葆康、林长民、潘祖彝、谢鸿焘、宋教仁、雷光宇、徐钟令到会。浙江都督府代表汤尔和、湖北都督府代表居正、陶凤集到会。

居正报告：九月十九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请派全权委员来鄂组织政府等情，并述此次来意，系与到沪各代表商议，同行赴鄂。

议决：各省代表均赴湖北。

十月初四日 袁希洛、朱葆康、潘祖彝、王照、徐钟令到会。浙江都督府代表陈时夏到会。

十月初五日 沈恩孚、袁希洛、林长民、潘祖彝、马良、谢鸿焘到会。

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有一人留沪，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

十月初六日 朱葆康、林长民到会。沪军都督府代表马君武、陈陶遗到会。

十月初七日 袁希洛、林长民到会。直隶咨议局代表谷钟秀、张铭勋，河南咨议局代表黄可权到会。

十月初八日 林长民、汤尔和、陈时夏、谷钟秀、张铭勋到会。

议决：电武昌黎都督，报告赴鄂代表，本日启行。

议决：通电各省都督府咨议局，报告各省代表赴鄂议组织临时政府，沪设通信机关于西门江苏教育总会。

(二) 在武昌

十月初十日 潘祖彝、谢鸿焘、雷光宇到会。湖南都督府代表谭人凤、邹代藩，湖北都督府代表胡瑛、时象晋、孙发绪、王正廷到会。公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

胡瑛报告：民军自汉阳失利，北方即有人来商和平解决，驻汉英领事亦出为介绍，向两方商议停战。停战问题，分为两层：一长期停战，以全国为范围，应与清内阁电商；一短期停战，只就武汉一隅而言，即与清军统冯国璋商议。现英领事已交到冯军统所开停

战条款，请诸君讨论。至长期停战，据英领事云，黎都督须能代表各省，方可议及。

议决：由临时议长致函黎都督，追述代表会在沪时，曾经议决公认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君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议决：答复清军统冯国璋停战条款。

十月十一日 雷奋、袁希洛、马君武、陈陶遗到会。安徽都督府代表王竹怀、许冠尧到会。

十月十二日 雷奋、袁希洛、马君武、陈陶遗、谷钟秀、黄可权、汤尔和、陈时夏到会。广西都督府代表张其德，浙江都督府代表陈毅、黄群，安徽都督府代表赵斌到会。

议决：先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推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起草员。

十月十三日 谭人凤、潘祖彝、谢鸿焘、雷光宇、时象晋、王正廷、孙发绪、胡瑛、邹代藩、赵斌、王竹怀、许冠尧、张其德、谷钟秀、黄可权、陈毅、黄群、汤尔和、陈时夏、马君武、雷奋、陈陶遗到会。

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附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第一章 临时大总统

第一条 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

第二条 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

第三条 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

第四条 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

约之权。

第五条 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任用各部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之权。

第六条 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

第二章 参 议 院

第七条 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八条 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

第九条 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条 参议院之职权如左：一、议决第四条及第六条事件；二、承诺第五条事件；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四、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五、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事件；六、议决暂行法律；七、议决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八、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

第十一条 参议院会议时，以到会参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但关于第四条事件，非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之同意，不得决议。

第十二条 参议院议决事件，由议长具报，经临时大总统盖印，发交行政各部执行之。

第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复议。

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条办理。

第十四条 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十五条 参议院办事细则，由参议院议订之。

第十六条 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三章 行政各部

第十七条 行政各部如左：一、外交部；二、内务部；三、财政部；四、军务部；五、交通部。

第十八条 各部设部长一人，总理本部事务。

第十九条 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其召集方法，由参议院议决之。

第二十一条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

十月十四日 全体代表到会。

报告：英领事得无线电称，南京已下，特派人来会道贺。

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有十省以上之代表到南京，即开选举会，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

十月十五日 全体代表到会。四川都督府代表周代本到会。

议决：密电请伍廷芳来鄂，与北使会商和平解决，并公举胡瑛、王正廷为之副。

议决：对北使开议条件：一、推倒满洲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

十月十六日 全体代表到会。

议决：答复停战条件，不承认清内阁所派北方居留之各省人有代表资格，并不得以区域方向混称为南军、北军。

附录：清内阁电开停战条件

- 一、停战三日，期满续停十五日；
- 二、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兵向北；
- 三、总理大臣派北方居留各省代表人，前往与南军各代表讨论大局；
- 四、唐绍仪充总理大臣之代表，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
- 五、以上所言南军，秦晋及北方土匪，均不在内。

议决：答复条件：一、停战三日，期满续停战十五日；二、全国清军民军均按兵不动，各守其已领之土地；三、清总理大臣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

十月十七日 全体代表到会。

报告西报电称，上海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议决：由黎大都督电沪都督，查实如另有人在沪联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等名目，请其宣告取消。

议决：各代表于十八日同航出发赴南京。

(三) 留沪代表之谬举

留沪代表，按照原议，只是一个通信机关。

十月初九日 林长民、吴景濂、刘兴甲到会。

十月初十日 林长民、居正、吴景濂、刘兴甲到会。

十月十一日 沈恩孚、林长民、宋教仁、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浙江都督府代表朱福洗、屈映光到会。

十月十二日 王照、张铭勋、屈映光到会。

十月十三日 沈恩孚、林长民、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到会，湖南都督府代表廖名掇、刘揆一到会。

十月十四日 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洗到会。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到会。章炳麟、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赵竹君、顾忠琛、彭锡范到会。

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议决：票举大元帅、副元帅，大元帅黄兴，十六票当选，副元帅黎元洪，十五票当选。

按：此次选举，完全是宋教仁、陈其美二人恐怕武昌真成了中央政府，于同盟会不利，所以鼓煽留沪的一部分代表，扮演了这一幕滑稽戏。他们二人的本心确是忠于同盟会，然自此事发表后，同盟会的声誉却因之一落千丈。

各省代表赴鄂者与留沪者，原是一体，他们二人只利用留沪一部分，而瞒着赴鄂代表，瞒着鄂军政府，皆不令闻知，其谬一也。江苏都督，浙江都督，沪军都督，皆令其到场投票，淆乱职权，蔑视其他各省都督，其谬二也。开会时，加入不伦不类、毫无根据之章炳麟、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赵竹君、顾忠琛、彭锡范诸人，令其列席，令人怀疑这一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其谬三也。

又按：是日到会之湖南人欧阳振声，并不是湖南都督府或咨议局的代表，而是宋教仁个人委派的代表。教仁只是代表之一，而居然委派代表的代表，此等举动，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总之，宋教仁为人，眼高识阔，志大才疏，说话则夸张不伦，办事则杂乱无章，自身取祸则有余，担当天下大事则不足。

十月十五日 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陶逊、欧阳振声、王照、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廖名播、刘揆一、赵学臣到会。江苏都督程德全、沪军都督陈其美及顾忠霖、彭锡范、田桐、胡子笏、钮永建、成国屏到会。

欢迎大元帅莅会。

十月十六日 朱葆康、林长民、欧阳振声、陶凤集、廖名播、刘揆一到会。河南咨议局代表李盘、江西都督府代表吴铁城到会。

十月十七日 袁希洛、朱葆康、林长民、欧阳振声、王照、居正、廖名播、刘揆一到会。

十月十八日 袁希洛、朱葆康、林长民、欧阳振声、王照、居正、廖名播、刘揆一到会。

十月十九日 陶凤集、廖名播、吴铁城到会。江西都督府代表林森到会。

十月二十日 朱葆康、欧阳振声、王照、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廖名、刘揆一、赵学臣、李盘、吴铁城、林森到会。

议决：各代表于二十一日同赴南京。

(四) 在南京

十月二十二日 江西代表吴铁城、林森、赵士北、王有兰、俞应麓，浙江代表汤尔和、黄群、陈时夏、屈映光，湖北代表马伯援、杨时杰、陶凤集、居正、时象晋，湖南代表廖名播、邹代藩、刘揆一、欧阳振声，奉天代表吴景濂，河南代表李盘、黄可权，山西代表仇亮、

乔义生、景耀月，福建代表林长民、潘祖彝，江苏代表雷奋、陈陶遗、马良、袁希洛，广西代表马君武，广东代表王宠惠、邓宪甫，四川代表周代本、萧湘，直隶代表谷钟秀，安徽代表赵斌、王竹怀、许冠尧，齐集南京，在江苏咨议局开会。

福建代表林长民到宁时，被人指为汉奸，在车站枪击未中。

议决：由代表会致电福建都督孙道仁，请代林君剖白。

按：江西代表林森，系福建侯官人，与长民同乡同姓同宗，然素有嫌隙。某日在同盟会本部开会，林森曾讪发长民系福州著名的宪政党员，现在他长期潜迹代表会内，显然是宪政党一种作用。此语为陈其美所闻，遂派青帮打手，向长民打了一枪，并不是要他的死命，而是催他赶快离开南京代表会。长民遂辞职回闽。

十月二十四日 全体代表到会。

选出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经奉、晋、赣、粤四省代表签名追认。

议决：本月二十六日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十月二十五日 全体代表到会，浙江代表陈毅由鄂续到。

浙江代表陈毅报告，袁内阁代表唐绍仪到汉时，黎大都督代表已与会晤，据唐代表称，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并谓伍代表廷芳如不能来鄂，可移在上海开议云云。

议决：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

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追加一条如左：“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

十月二十六日 全体代表到会。

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追加条文后，增加一项如左：“大元

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以副元帅代行其职权。”

十月二十七日 全体代表到会。陕西代表赵世钰、马步云、张蔚森续到。

报告黄克强君来电，力辞大元帅之职，并推举黎大都督为大元帅。当经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按：前于十月十四日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相距尚不到半个月，突然又将黄、黎二人姓名倒置。古人云，置君如奕棋，此则举元帅如奕棋，狐埋狐搆，真儿戏也。

议决：黎大元帅暂驻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十月二十八日 全体代表到会。

十月二十九日 全体代表到会。广西代表章勤士续到。

十一月初一日 全体代表到会。湖北代表王正廷续到。

汤尔和因病在沪，王宠惠因议和事留沪，当即另举景耀月代理议长。

议决：各公函请黄克强君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

十一月初四日 全体代表到会。

报告黎大元帅来电，承受大元帅名义，并委任副元帅代行其职务。

十一月初五日 全体代表到会。

报告接到沪电，称孙中山先生将到沪，请派代表欢迎，由代理议长指定马伯援、王有兰、许冠尧三君赴沪欢迎。

十一月初七日 全体代表到会，湖南代表谭人凤续到。

王正廷报告，前数日黄克强君已允来宁组织政府，迨孙中山先生抵沪后，黄君又变更主张，请速由代表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议决：十一月初十日，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议决：通电各省，作战计划仍宜继续进行，并推定谭人凤、马君武、王正廷三君面谒徐绍楨，商议作战计划。

十一月初九日 全体代表到会。云南代表吕志伊、段宇清、张一鹏续到。

议决：选举临时大总统，用无记名投票法。

议决：推举临时大总统候补者。

十一月初十日 山西代表景耀月、李素、刘懋赏，陕西代表张蔚森、马步云、赵世钰，江苏代表袁希洛、陈陶遗、雷奋、马良，安徽代表许冠尧、王竹怀、赵斌，江西代表林森、赵士北、俞应麓、王有兰、汤漪，浙江代表汤尔和、黄群、陈时夏、陈毅、屈映光，福建代表潘祖彝，广东代表王宠惠、邓宪甫，广西代表马君武、章勤士，湖南代表谭人凤、廖名播、邹代藩、刘揆一、欧阳振声，湖北代表马伯援、杨时杰、王正廷、胡瑛、居正，四川代表萧湘、周代本，云南代表吕志伊、段宇清、张一鹏，山东代表谢鸿焘、雷光宇，河南代表李鏊、黄可权，直隶代表谷钟秀，奉天代表吴景濂到会，由议长汤尔和主席。监选员刘之洁（是日监选员，原定程德全、徐绍楨二人，因风闻是日有人在议场投掷炸弹，故均于初九日逃避赴沪），监视先开推举票，揭示被推为临时大总统候补者三人如左：孙文、黎元洪、黄兴。

各省代表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到会代表十七省，共计十七票，投票结果如左：孙文得十六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议决：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沪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

议决：通电各省都督府，请每省选派参议员三人来宁组织参议

院，参议员未到院以前，由本省代表暂留一人乃至三人，代行参议员职务。

议决：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员系由各省都督府所派，至各省谘议局所派代表，仍称某省代表，得列席于参议院。

十一月十一日 全体代表到会。

议决：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开国民会议一节，应由本会致电伍廷芳代表，请其答复唐代表，本月初十日十七省代表在宁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

十一月十二日 全体代表到会。

大总统特派黄克强君到会，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经议决自阴历十一月十三日起，即阳历元旦，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称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滇湘鄂代表吕志伊、宋教仁、居正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经议决如左：

原文第一章“临时大总统下”加“临时副总统”五字。

原文第一条，修正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原文第五条修正为：“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五) 代理参议院

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全体代表到会。

临时大总统孙文由沪莅宁，各省代表到车站欢迎。午后十时，大总统行受职礼，各省代表暨海陆军代表齐集总统府。大总统宣布誓词及宣言，各省代表上印绶，大总统盖印，各省代表致词，海陆军代表致颂词。

一月二日 全体代表到会。

议决：以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职权。

举定赵士北为临时议长，马君武为临时副议长。

皖、苏、浙、闽、桂五省代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经议决如左：

原文第一条，修正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原文第五条修正为：“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及任命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原文第六条后，增加一条为第七条（原第七条改为第八条，余递推），条文为：“临时副总统于大总统因故去职时，得升任之；如大总统有故障，不能视事时，得受大总统之委任，代行其职权。”

议决：一月三日开会，选举临时副总统。

一月三日 张蔚森、马步云、赵世钰、袁希洛、许冠尧、王竹怀、林森、赵士北、王有兰、俞应麓、黄群、潘祖彝、邓宪甫、马君武、章勤士、邹代藩、廖名播、刘揆一、马伯援、杨时杰、胡瑛、居正、周代本、吴景濂、谷钟秀、李肇、谢鸿焘、景耀月、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到会。临时议长赵士北主席。

举行临时副总统选举会，监选员徐绍楨。

各省代表投票选举临时副总统，每省一票，到会十七省，共计十七票，投票结果如左：

黎元洪得十七票，当选为临时副总统。

议决：大总统交议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案。

大总统莅院，发表国务员名单如左：

内务总长宋教仁 外交总长王宠惠 财政总长陈锦涛

陆军总长黄 兴 海军总长黄钟英 司法总长伍廷芳

教育总长汤寿潜 实业总长张 謇 交通总长程德全

旋因多数参议员反对宋教仁，遂将宋教仁取消，经同意通过如左：

内务程德全 外交伍廷芳 财政陈锦涛 陆军黄 兴

海军黄钟英 司法王宠惠 教育蔡元培 实业张 謇

交通汤寿潜

一月八日 议决：政府交议军需公债章程案（章程原文从略）。

一月九日 江西都督府派代表王有兰、汤漪为参议员。

议决：和局已将破裂，公推马君武、陶凤集二君质问陆军部作战计划如何。

一月十日 马君武报告，陆军部作战计划已定，拟分五路进兵，如和局破裂，即行宣战。

按：所谓五路进兵，系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六军，向北京前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破敌巢。

一月十一日 江西都督府代表赵士北，经广东都督府电派为参议员，即将江西代表名义取消。湖北代表居正函称已就内务次长职，请将代表名义取消。

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请大总统颁布各省。

一月十二日 湖南参议员刘彦、彭允彝、欧阳振声到院。

一月十三日 湖北参议员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福建参议员林森到院。

一月十五日 浙江参议员王正廷、福建参议员陈承泽、安徽代表常恒芳到院，福建代表潘祖彝，经闽都督派为参议员。

一月十六日 十三省参议员，出席二十人：赵士北、吕志伊、段宇清、林森、汤漪、吴景濂、赵世钰、谷鍾秀、周代本、李璽、彭允彝、刘彦、潘祖彝、王有兰、常恒芳、陈承泽、王正廷、刘成禺。赵士北主席。

主席宣布大总统交议：黎副总统电商，拟向道胜银行借款案，议决办法：一、此项借款，为中央政府借款；二、借款数目，为一百万镑，以镑计不以两计；三、指定武昌四局栈，汉口韦尚文、刘人祥之地皮，为抵押品；四、签约事由中央财政部会同鄂军办理。

一月十七日 十三省参议员，出席二十二：赵士北、马君武、刘成禺、汤漪、段宇清、王正廷、彭允彝、谷鍾秀、李璽、欧阳振声、周代本、刘彦、吕志伊、潘祖彝、王有兰、常恒芳、陈承泽、景耀月、马步云、时功玖、吴景濂、章勤士（林森请假）。

汤漪、刘成禺提议，考议员不得兼任行政官吏案，全体可决。

一月十八日 十三省参议员，出席十五人：潘祖彝、吴景濂、刘彦、王有兰、王正廷、段宇清、陈承泽、赵世钰、刘成禺、谷鍾秀、赵士北、彭允彝、周代本、常恒芳、陈陶遗（李璽、汤漪、

林森、欧阳振声请假)。

主席提议：电催各省参议员迅速到院，俾参议院完全成立。讨论结果，公议电催限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各省参议员须一律到院，参议院即于是日正式成立。

一月十九日 十一省参议员，出席十三人：潘祖彝、陈承泽、段宇清、刘成禺、张伯烈、王正廷、李肇、吴景濂、谷鍾秀、赵世钰、王有兰、刘彦、赵士北（汤漪、欧阳振声、彭允彝、景耀月、马君武请假）。

赵世钰报告山陕危急情形，关系全局利害，请讨论设法维持。

王正廷提议质问政府作战计划如何，请其答复。

张伯烈提议，请亟筹统一军队办法，以利进行。议决办法：一、质问政府继续停战十四日事，不特未得参议院同意，且未通知参议院，实为违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继续停战事，无论已否实行，仍当立即进兵，救援山陕。山陕属我民国范围，自由进兵，与和议条款并无违背；三、停战期内，江皖所有进行军队，当与武昌援山陕之军，同时并进。

附：咨大总统文

参议院为咨请事：照得议战议和，关系军国重要，固不宜默武，以致生民涂炭，亦岂宜老师，甘堕敌人奸计。自议和以来，清军阴施其远交近攻之手段，既攻陷山西，复集兵河南，以为大犯陕西之举；近且闻清军由甘肃进兵，与驻豫清军成夹攻陕西之势，危险万状，陕西果失，则清军即长驱窥我南京。观袁世凯致段祺瑞电，有陕西土匪不在停战之内等语，其阴险狡猾之战略，已见于言外；且将唐绍仪所签之约，任意推翻，有何和约之余

地。我临时政府越起观望，竟冒冒然将议和日期一再继续，殊不可解，亦未闻有统筹全局之计划，甚至继续停战之约，并不通告本院，尤为骇异，兹本院于本日开会，议决办法三条，除推举参议员赵士北、王正廷、陈承泽三员面陈外，抄祈查照办理，并希先行见复施行，此咨。

一月二十日 出席十五人：赵士北、段宇清、王有兰、文群、张伯烈、时功玖、吴景濂、谷鍾秀、赵世钰、陈承泽、潘祖彝、刘彦、常恒芳、周代本、陈陶遗。江西参议员文群到院。

一月二十二日 出席二十人：常恒芳、汤漪、文群、王有兰、刘显治、熊范舆、陈承泽、潘祖彝、谷鍾秀、刘彦、张一鹏、段宇清、赵世钰、张伯烈、时功玖、赵士北、周代本、李肇、吴景濂、凌文渊。贵州代表刘显治、熊范舆到院。

大总统派秘书长胡汉民到院，紧急交议和议条件五条：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二、袁世凯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大总统接到外交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大总统辞职后，由参议院另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五、袁世凯被举为大总统后，须遵守参议院所定之约法，乃能接受事权。

胡汉民报告完毕，右列五条，经议员全体可决。

一月二十三日 出席二十人：赵士北、汤漪、王有兰、张一鹏、潘祖彝、林森、陈承泽、段宇清、刘彦、熊范舆、刘显治、谷鍾秀、常恒芳、时功玖、赵世钰、周代本、吴景濂、李肇、凌文渊、王正廷。

一月二十四日 出席二十一人：赵士北、林森、潘祖彝、王有兰、杨廷栋、赵世钰、张伯烈、时功玖、文群、汤漪、刘显治、

熊范與、谷鍾秀、刘彦、段宇清、吴景濂、景耀月、常恒芳、凌文渊、彭允彝、周代本。

主席报告贵州代表熊范與、刘显治，前由云南都督蔡锷代给委任状，委派二人到院，刻贵州都督杨蔭诚续委平刚、文崇高二人，本院应承认熊、刘二君出席，抑承认平、文二君出席，请公决。

公决：承认平刚、文崇高二君出席。

按：熊范與、刘显治是贵州宪政党主要分子，此次到院，只出席三次，即被杨蔭诚所派代表驱逐，他们二人认为奇耻大辱，所以回到昆明，联合蹇念益、任可澄、戴戡等，秘商假途灭虜之计，由唐继尧率兵潜入贵阳，将杨蔭诚根本解决。

一月二十五日 出席二十一人：段宇清、林森、陈承泽、彭允彝、刘彦、欧阳振声、汤漪、王有兰、文群、赵世钰、谷鍾秀、常恒芳、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赵士北、平刚、文崇高、吴景濂、陈陶遗、凌文渊。

公议：优待满清皇室条件未经公认，应请补交追认。

附：咨行大总统文

参议院为咨复事：一月二十三日，准大总统咨开，依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四条，昨已将和议条件各草案，委由秘书长书胡汉民提出其优待清皇室各件，经得贵院同意，随于昨日午间得北方急电，又电复五条，因事紧急，只由委员口头报告，亦既得贵院同意。兹更将各条文抄呈，请加追认等因，兹经本院开会议决，除咨开五条，合加追认外，嗣后政府对于应由本院议决事件，无论如何紧急，得要求本院即时开会议决，不得要求追认。其优待清皇室各条，未得正式公文，应请补录咨复。此咨大总统。

一月二十六日 浙江参议员殷汝驷到院。出席二十三人：王有兰、文群、汤漪、段宇清、文崇高、平刚、殷汝驷、马步云、陈承泽、林森、周代本、赵士北、李素、刘彦、彭允彝、欧阳振声、谷鍾秀、张伯烈、时功玖、刘成禺、陈陶遗、凌文渊、李璠。

主席谘询正式大会，定期何日，请公决。

公决：仍以一月二十八日为期。

主席宣布议员提议预防奸细、严密检查案，全体可决。

附：咨行大总统文

为咨请事，窃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之地，设有奸匪混迹其间，酿出危险之事，纵与大局无碍，亦必惹起军民惊惶，况与大局终有妨害乎。昨日六合北伐队司令官张承樾入城领枪械，去陆军部不远，暴徒突以手枪击之，幸误中马车玻璃，人未负伤。又闻花牌楼之军士，以食汤圆中毒死者二十余人。似此情形，是已有奸匪混迹入城，倘不从此严加检查，奸匪源源挟炸枪毒物而来，其为祸有不可思议者。兹经本院开会议决，咨请大总统转飭卫戍队，妥定检查章程，于入城紧要之处，设检查所严加检查，以防奸细而遏乱源，即希查照办理，此咨。

一月二十七日 出席二十二人：林森、陈承泽、段宇清、平刚、文崇高、李素、马步云、赵士北、汤漪、文群、王有兰、刘彦、凌文渊、陈陶遗、殷汝驷、谷鍾秀、吴景濂、彭允彝、赵世钰、周代本、欧阳振声、常恒芳。

林森报告筹备正式大会秩序并一切设置。

主席宣告大总统因停战期满，咨商解决主战抑主展期事，并派秘书长胡汉民到院陈述意见。讨论结果：全体可决主战。

一月二十八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

按：辛亥各省代表会议，系一流转不定、杂乱无章的局面，此篇将出席代表按日排列，实出于不得已，非不惮烦也。又，各书纪载辛亥各省代表会议，多错误遗漏。此篇系根据著者当日在旁听席上所纪录（当时充上海《民立报》驻宁通信员），故比较真确。

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鳞半爪

王 文 德

辛亥革命那一年，我虽只九岁，却也在幼小的心灵上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根据我儿时的记忆和成年后的了解，把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些情况写在下面。

孙中山先生到台湾

一九二五年春，在台北市举行的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上，蒋渭水曾谈到：孙中山先生在惠州起义之前，曾经到过台湾，逗留了好几天。孙先生一登岸，就被日警包围，不让他和当地人民接近。孙先生到了台北，便被送进了日人经营的旅社兼妓院“梅屋敷”去住宿，实际上等于软禁。因此，孙先生不得不通去中国厨司同住台湾的同志进行联系。那时，台北医学校有些学生到“梅屋敷”去要求谒见孙中山先生，都被驻在那里的警戒的日本警察所拒绝了。日本当局还封锁了这次孙中山先生到台湾来的消息，因此绝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兴中会老会员杨心如

兴中会老会员杨心如，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革命同志。他原籍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县），和孙中山先生是同乡。他在壮年

时代就到了台湾，一向居住在台北市。他的公开职务是美时茶行的账房，七七事变后退休，一九四六年间病故。他死后，国民政府也曾去电吊唁，表彰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功绩。据杨心如的儿子杨东华说，他的故乡中山县，曾把该县的一条街改称为“心如街”，以纪念他。

杨心如在职时把元配程氏和长女秀兰留在家乡，单身到了台湾。他在台湾，绝对隐蔽自己的来历和政治身份，因此，在台湾极少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一九二八年冬，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前后，广州各报刊都介绍了孙先生的革命历史，有些文章中提到了杨心如的名字。那时我正在广州，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杨心如的元配程氏（杨心如的第二个妻子是我父亲的族妹，所以我也叫程氏为姑母）。她就给我介绍了杨心如年青的时候在家乡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故事。孙中山先生最初与杨鹤龄、杨心如和另外一些同志在家乡密谋革命。有一次，他们正在开秘密会议，听说清朝官府已经派人来逮捕他们，并且很快就要来到，大家都非常着急。幸好孙先生会驾驶电船，他就带着同志们驾上一只电船一同逃往香港，得免于难。

“漩桶”退位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台湾，台湾社会各阶层人们都一传十、十传百地奔走相告，纷纷谈论起来，连一般家庭妇女和儿童都知道这么一回事了。人们把这个重大事件概括成三句话：“唐山发生了革命，‘漩桶’已经退位，孙逸仙做了大总统”。台湾从来称呼大陆为“唐山”。“漩桶”和“宣统”二字谐音，是“尿

桶”的土语。台湾人故意把“宣统”读成“淤桶”，以表示对清朝统治者的痛恨和蔑视。

“断发”维新

台湾的社会风俗本来和闽粤相同。辛亥革命之后，大陆的社会风气逐渐改变，台湾的社会风气也随之而改变了。最显著的例子是“断发”。台湾男人本来都留着辫子，以为这是祖宗世代相传的习俗，不可改易，否则就是“背祖”。而在辛亥革命以后，他们从画片上看见了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都剪了头发，知道大陆已经在易俗。最先由居住在台湾城市的广东原籍的一些人领头，把辫子剪掉，以表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不是清朝遗民，更不是“日本国民”。他们在剪辫子时，像办喜事一样，鸣放爆竹，以志吉庆；有的甚至备办酒宴，请亲戚朋友喝喜酒。这样，就影响了附近的居民，我就是受了影响而在一九一二年春天剪掉辫子的。由是，剪发的风气开始在台湾各城市流行起来，而终于遍及到广大农村。记得那时候，在台北市一般理发费是大人五分钱，小孩三分钱，而“断发”费，无论大人小孩，都是四角。日本侵略者在辛亥革命以前早就强迫台湾人民剪辫子。因为他们认为台湾人留着辫子，是不驯从日本的统治的表现。他们首先迫使受过日寇的学校教育的人们剪发；但是，除了在日寇机关、企业、学校当职员、教员的那些人被迫剪了头发以外，谁也不肯剪发。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日寇侵略者看到“断发”的风气在台湾各城市开始流行，就利用这个机会，加紧进行“理发会”（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二月）的活动，通过警察和学校施加压力，

进一步强迫台湾人民剪发。后来，台湾人民普遍剪掉了辫子，但是，很明显，这并不是表示他们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屈服，而是出于他们对祖国革命事业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

“五色旗上了天”

自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台湾以后，台湾人民被禁止悬挂祖国的国旗。辛亥革命以后，台湾人民知道在祖国，清朝的黄龙旗已经改换为民国的五色旗了。他们自然很高兴，然而由于日本统治者的严禁，不能悬挂五色旗来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许多青壮年似乎确有其事地互相传说：“中国的新国旗已经上天啦！……”有许多儿童——包括我在内——就依照他们指点的方法去观看上了天的祖国的新国旗。其方法是在中午的时候，把一盆清水放在露天地地上，盆里放一块玻璃，让阳光照射而形成虹采。观看了这种虹采，孩子们都相信：“这就是祖国的新国旗，祖国的新国旗确实升上了天。”孩子们成群地站在盆的周围，拍手欢呼。这个带着几分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故，充分反映出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渴望回到祖国怀抱、重见天日的心情。

对辛亥革命领袖们的敬仰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在上海发行的对开和四开大小的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人的画像和武昌起义的图片，在台湾无论城市和乡村都很畅销。人们买了这些图片带回去贴在厅堂上或房间里，并

给家属和来访的亲友介绍这些领袖人物领导革命的事迹。

台湾人民对祖国辛亥革命的领袖是如此的崇敬，对日本侵略强盗的魁首却处处表现出极度的憎恨。他们常常把印有日本天皇照片的报纸当作擦屁股的手纸使用，而不怕犯“不敬罪”。

那时候，台湾有些走江湖卖艺的人用和大陆“拉洋片”一类的方式，让大家观看孙中山先生等人的画像和武昌起义的图片，并加以讲解。城乡的男女老少都很爱看，所以影响很普遍。

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台湾城市一些说书场的“讲古”（即说书，台湾方言）先生，公开给听众讲上海刚出版的《孙逸仙演义》（或是《辛亥革命演义》，已记不清楚）。有些木偶戏团，如台北的“赤解颐”，也给观众表演辛亥革命的戏文。人们都很喜欢听，很喜欢看，每场都满座，散场以后，大家就津津有味地谈论起来，并且给邻居和亲朋介绍所听所看的这些故事和戏文。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其影响也就愈来愈广，而且日益深入人心了。

那时候，有些说书先生还借题发挥，诅咒日本强盗。例如台北市有一个名叫福先的说书先生，在说书休息时，以“拆字数”为名，说日本天皇的年号“大正”这两个字拆开来是“一人一止”，那就是说，日本的国运，到“大正”的下一代就将绝亡了。听众（包括我和其他一些儿童）听了都很高兴。

“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

辛亥革命后，台湾城市一些中文私塾的小学生们，很喜欢念上海新出版的《新三字经》。这书开头四句是：“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

那时在台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流行着这样的童谣：“红兮乌兮二十八，警察被我踢”，意思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不能长久。我们在游戏时常常唱着这两句童谣，甚至警察从旁边经过，也还是照样大声唱，丝毫不害怕。

青年学生的动态

台北医学校的一些台籍学生如蒋渭水等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怀有深刻的仇恨。他们从辛亥革命，从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得到了鼓舞，就以该校为中心，展开学生活动。当时主要是联系同仁，结交朋友，互相勉励，提高民族自觉，反对日本师生歧视台籍学生，反对把台湾人民叫做“清国奴”。这些人毕业后，虽然散居在各地做“开业医”（私人经营的诊疗所），但还是继续保持联系，进行活动。那时，他们听说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地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就暗中在同仁间和朋友中进行募款，而且派人携带捐款去援助孙先生。派出去的人从大陆回台，又带回来了辛亥革命的影响。这些人后来曾受过寓居在台湾的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受过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到一九二一年，他们为了在台湾鼓吹民主自由思想，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日的改良主义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

哈密维吾尔农奴起义

包尔汉

极不平凡的两年

很早以前，住在乌鲁木齐的几个民族成份不同的朋友们偶尔集聚到一起闲谈，不知道为什么，话题转到新疆近代史中的几件大事上。

一位维吾尔族朋友说：“在这几百年里，极不平凡的两年是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二年。其所以不平凡的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这两年无论在乌鲁木齐、伊犁、南疆，尤其是在哈密发生的重大事件，已经不是民族间的战争或仇杀，而是各个民族中的被污辱、被损害的人们起来反抗本民族中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这些反抗运动中，不同民族的底层，有时还互相支援，打击他们的共同敌人。”座中人都同意他的看法。的确，去当时不远的史实摆在那儿，伊犁起义和革命军向乌鲁木齐进军，目的是推翻清王朝在新疆的封建统治，当时盘据在省城的保皇派的代表人物袁大化和组织领导起义军的首领杨缙绪都是汉族；在南疆各地杀官戕吏的哥老会中的人同各地官吏差不多也都是汉族；在哈密反抗维吾尔农奴主——

哈密亲王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是亲王统治下的维吾尔农奴。伊犁地方的少数民族曾以人力、物力支援起义军；乌鲁木齐的封建统治者曾以武装协助哈密维吾尔农奴主“进剿叛民”。……象这样南北疆同时峰起的鲜明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是过去几百年中所罕见的。

当然，那时候的谈话者们还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分析这些事件，尽管他们从这里嗅出了时代转变的新鲜气息。

一个农奴的往事回忆

提起哈密王府对属民的残酷剥削，我不禁忆起一位出生于哈密农奴家庭的维吾尔族木工的谈话。他说，那年头，他一家九口人依靠他父亲、哥哥和他的劳动维持生活，生活是很苦的。他们种王府的地，“说地不好，那可是对胡大^①说谎啊！地可真肥啊！”但是每年收不到多少粮食，一家人难得温饱。他家没有牛，租牛呢，得出租钱，单凭人力又怎能把地种好呢。还有，他们身不由己，要给王府服无偿劳役。按老规矩，每个农奴每月要给王府当三天差，可是那些年竟累增到七天。贫苦的农奴谈不上什么文化程度，好多人连记日月的根据都没有，只是就自然界的变化的变化来识别四季，月份是弄不清的。记工帐握在本苏木的都尔嘎^②的手里，就是你一个月的差已经当满，都尔嘎派人来招呼你再去下苦，你也拿不出根据来同他算帐，何况那些凶恶的王府爪牙也不容许你同他算帐呢！

王府的徭役，种类繁多。到过哈密的人大都观赏过回城高埠上

① “胡大”意为伊斯兰教上帝。

② “苏木”相当于县以下的“区”（乡）。“都尔嘎”当时汉、回族人把它读成了“大耳瓜”，等于千户长或总管。

的王府，那是座相当宏壮的建筑物。王府的花园，花木亭榭，布局美观。尤其是伯锡尔王时代费时二十年修筑起的王陵“阿勒同里克”^①，更是辉煌壮丽。这些都是当地历代维吾尔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王府的农田、牧场的经营，家务的操作，对官府的人力供应，土木工程，军事征发，主要都由它所辖的农奴负担，除了出人力，还要出畜力，给王府种地用的就是农奴自己的耕畜。王府的爪牙也驱使农奴替他们劳作。在这样繁重的劳力役使下，农奴的生活永世陷在贫困里^②。而且农奴主——哈密亲王还掌握着对农奴的审判权，生杀予夺，随己所欲。

上述的那位木工谈到，那年头，他同他的父兄都得给王府当差。有一次，他的父亲患病，两腿浮肿，但是在鞭杆的威胁下，还得去给都尔嘎家上房泥，他的两个妹妹就是因为家境贫困，生活环境恶劣而夭折了。他说，冬天他们得不到温暖的衣服，遇到好天气，他带着小妹妹在没有窗户的土屋门口晒太阳，捉虱子。小妹妹呆呆地望着远天的云朵，似乎想在那里找一块可以快活地蹦蹦跳跳的地方。他当年所以学木匠手艺，也是为了凭这个手艺到外乡去求衣食，摆脱王府对他的人身控制。可是他逃出后，他的父兄却增加了负担，要把他抛下的劳役补偿上。

不只是他一家，所有的农奴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有的还不如他家呢！

① 阿勒同里克意为“金陵”。

② 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载，哈密回民一九五〇户，一三二九三口。《新疆建置志》载哈密一二五一户，四五六八口，回王所辖回民八四四七口，两书编纂出版中间相距将近百年（前书在十九世纪初，后书在二十世纪初），但人口不见繁殖，除战乱影响外，主要是沉重的农奴剥削制度造成的。

农奴主

现在该介绍一下哈密农奴主。

哈密农奴主世代相袭已经很多年了。由于他们从清王朝建立之后，一直为清廷效力，协助清廷的远征军，因而远在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便被封为郡王，一八六七年（同治五年）还被晋封为亲王。

王府的领地广阔，东界喀尔喀，西接吐鲁番，南抵星星峡，北至天山界巴里坤。在清廷设在这里的最高官员的监督下，亲王对辖境的土地、人民有完全的管辖权，他管下的农奴对清廷不负徭役赋税义务。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新疆正式设省，建哈密厅，对上述关系也未予改变。清廷对哈密农奴主如此优遇，无非是企图以此拉住他，使他永远尽忠王朝，农奴主也甘愿依附靠近他的强大的大清帝国，巩固自己的剥削地位。

哈密农奴主对其属民有一套统治组织。本世纪初的情况是：他所辖的人民被分为十三个苏木，每个苏木设一个由王府委派的世袭官吏，就是上述的那位木工所说的都尔嘎。都尔嘎掌管本苏木的宗教、农牧、诉讼等事务，一手遮天，作威作福，农奴被严密地控制着，甚至没有迁徙的自由。

农奴主过着豪华的生活，挥霍的资财都来自对农奴的残酷剥削。农奴在中世纪式的黑暗生活中，一般是忍熬岁月，有的人甚至对前途都失掉了希望和幻想。

一位参加过一九三一年哈密暴动的农民说，那年头，不少农奴都认为，下苦的人，父一辈、子一辈到世上来就是来下苦，没看到那

一家从贫困里爬出来，等到把这笔苦债还清，也许会到天国去。当王爷做大人的人，父一辈、子一辈就是由真主派遣来管治人的，将来他们到另一个世界去，恐怕也有奴仆侍奉。农奴们只希望真主能派一个公正的人来管治他们，让他们的生活不至于比要死不死还痛苦就够了。

这位农奴说，他们世代被闭锁在这里，不知道世界和中国发生过什么事情，也弄不清新疆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有个地方叫北京，北京有皇帝，皇帝派大人来管治新疆。他们的王爷也是北京皇帝封的，皇帝把哈密交给他管治。老百姓要服从他，把好东西献给他，替他作工，听他指挥。当然对他的残暴怀着仇恨，然而这是世道，从他们的远祖延续到他们这一代，就是这样的世道。

世道变了

然而这个世道从一九一一年起开始发生空前的大变化，这个变化不是以往改朝换代的变化，而是要把由皇帝代表的封建统治制度从中国土地上铲除掉的巨大的变革。

北京皇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了哈密。

当时，新疆好多地方的官府不肯把“清帝逊位”一类文告向人民公布，就是伊犁地方响应武昌起义的军事行动，在东疆也只是得自传闻。但是哈密这个地方是新疆同内地的交通枢纽，来自东西两方的商人总是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是维吾尔族商人，他们口述的消息在当地农奴中引起了空前的反应。到了一九一二年年初，一般农奴不只是了解到北京已经出现了五族共和的政府，不是由

皇帝，而是由有一定任期的总统来管治老百姓，还了解到清朝皇帝派到新疆来做大人的人让了位，反抗这类大人的人已经取得胜利。

如果象北京大皇帝那样的贵人都被人撵下宝座，那么，向这位大皇帝称臣纳贡的哈密亲王也不是什么不可触犯的了。

那些年，哈密农奴在无可奈何中，有的人有过这样的想法，宁愿给当地官府纳粮纳税，做普通老百姓，不愿作王府的奴隶，给王爷及其爪牙服无偿劳役。

哈密这个地方素来就有来自内地的汉、回两族农民，开垦熟荒，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每年除了给官府完纳钱粮，没有固定的给官府服无偿劳役的义务。哈密的可耕地大都肥沃，水源充足，移来的农民纵不似在内地那样，对土地施肥，深耕细作，收获量也是可观的。有的农民还雇用哈萨克人作帮工，成了富农。比起维吾尔族农奴，他们自由得多，生活也好得多，因而也就成了农奴的羡慕的对象；如果他们也能象汉、回两族农民那样，摆脱王府对他们的人身控制，他们的生活总会轻松一些。一九〇七年在这里发生的农奴用砖坯堵塞王府大门的运动，便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理。当时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愿归哈密厅管辖，不再作哈密亲王的属民。但是亲王在清廷官吏的支持下，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运动的首领被骗到乌鲁木齐去，背上“叛逆”的罪名，丧命刑场。在哈密，许多维吾尔人被杀害。

现在，新疆和内地都起了巨大的政治变化，维吾尔农奴的上述想望又趋强烈了。

曾参加一九一二年哈密起义的人们后来谈，北京皇帝的被推翻，在他们看来，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农奴们私下谈论，

希望哈密也来个改变。一些人固然不敢想象，他们的王爷会一举被推翻，但是他们的奴隶地位总能得到改变吧。农奴们世代对王爷，尤其是对直接压迫他们的主府爪牙是蕴积着仇恨的。在平时，他们不敢发泄，为了避免麻烦，对高踞在他们头上的人表面上还表现得特别驯顺。

“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该大声出口气了！”上述的一个参加过一九一二年起义的人说。“阿克苏、喀什噶尔的大人们，不也是被他们的属民杀掉，杀掉白杀掉么！”

哈密维吾尔农奴世代蕴积的对表奴主及其爪牙的仇恨，在周围以及南地的政治变革影响下，化为震撼农奴主统治的万量了！

武装起义

一九一二年二月，以铁木耳为首的哈密维吾尔族农奴举行了反哈密王府的武装起义。

革命英雄来自人民群众，铁木耳就是哈密的普通农奴。他出生在哈密北部山里的库勒依村，幼年丧父，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从十七岁起学木工。由于王府的差徭过重，他曾逃到乌鲁木齐。在外乡流浪几年后，他又回到故乡。从本身的遭遇上，他深深地意识到，不摆脱对王府的人身依附，哈密的维吾尔农奴是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他平素同村民们接近，肯帮助人，而且有文化，因而在群众中拥有一定威信。内地革命和伊犁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他同许多村民一样，认为这是他们摆脱奴隶地位的好时机。

当时，以铁木耳、帕赫兰库尔班、哈拉布苏克等人为中心形成一个团体，这些人经常聚集到一起，谈论时局和出路。他们的认识

是一致的，就是继一九〇七年起义者，完成先烈当年未完成的志愿。但是哈密一带在民国成立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动，王爷还是王爷，以前的大人仍然是大人。

一九一一年冬，新疆巡抚袁大化为了抗拒伊犁革命军东进，曾向哈密沙木胡素特亲王征调了二百人到军前服役。一九一二年初，袁大化又照会沙亲王，请他继续提供人力。沙亲王又征集了五百人，由当地驻军装备好，开赴省城。

铁木耳抓住了这个机会，亲自率领亲密战友到哈密应征，随同大伙出发。当这五百人西上到达哈密城东北的一处山口时，铁木耳便号召同行者开入山里举事，反抗王府的残酷剥削，用武装行动来结束王府对维吾尔农民的人身控制。

在铁木耳的鼓动下，二百人随他进了山。起义的枪声从此就在库勒依打响了。这是一九一二年二月间的事情。一九〇七年事件被流放到沁城一带的人们也跑来参加了。其中有那一年被杀害的农民首领土尔帕克的儿子胡素和加阿和麦提。

在残酷剥削下的维吾尔农奴，平素有时虽以宿命自慰，但一朝有人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农奴主并汇成实际力量时，他们却象洪水一样，由一处决口冲了出去。铁木耳起义之初，人数不过几百，但一两天内便汇成几千人的大帮了。他们提出了不再给王府当差的鲜明口号。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铁木耳起义得到了巴里坤（镇西）汉族人民兄弟般的支持和帮助。巴里坤是汉族人民在新疆聚居最多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起来反抗官府了。巴里坤驻军中的革命分子以胡登科等人为首，举事杀死了镇西厅丞张存仁。他们同铁木耳的起义军取得了联系，希望共同来反抗清朝余孽。在新疆

都督杨增新所著的《补过斋文牍》中，对铁木耳起义一事，于文电中一再声称：“查此次哈密疆民本系为镇西乱党勾结。”^①“哈密复叛，原有汉奸为之播弄。”“惟念作俑者不过一二汉奸与三数刁横。”^②哈密知事白文超也掌握了一些密报，在山西人王某的密报中，提到有些“汉奸”与铁木耳来往，通报军情等。^③

沙木胡素特亲王袭爵不久，但年已逾五十。他为人精悍，通晓汉语，与乌鲁木齐、哈密、镇西的满汉族官吏关系搞得很好。他熟悉官场中的一套应事驭人的手法和新疆各方面的情况。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被推翻，最初曾使他震惊，但是进入一九一二年，袁世凯作了总统，新疆巡抚袁大化作了新疆都督，新天下仍然由旧人物来掌领，他感到这同过去改朝换代并没有什么两样。北京和新疆当局对他这位处在管辖东疆入口的亲王仍然会倚重的，何况北京方面还一再宣布尊重并保护王公权利，总统府还直接与他来电，慰勉有加。

沙木胡素特经受过一九〇七年的变故，深知在当前的时局变动中，威胁他的统治的还是他的奴隶。这样，他除了派人去库勒依说服铁木耳，还邀请巴里坤镇台易盛富领兵前来“平乱”。

这个在一九〇七年欠下哈密人民血债的易盛富果然领兵前来哈密。起义军事前得到巴里坤方面同情者的密报，在巴里坤、哈密间通行必经的要隘南山口设下伏兵，一夜之间消灭了这个镇台的部队，并且把镇台本人也活捉住，拉到空场上杀掉。

① 见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乙集《勘定篇》三页。

② 同上，七至八页。

③ 见哈密知事白文超致都督府密报。原文已销毁。在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同上七至八页内露其梗概。

阻击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并且缴获了不少武器。这是一九一二年四月间的事情。

事态的扩大，震动了东疆。这时候卸任的都督袁大化正经过哈密，准备晋关。他自报奋勇，助沙亲王一臂之力，派护送他的团长钱广汉率兵进山剿办。钱广汉是从伊犁革命队伍中叛变出来投降袁大化的伊犁新军团长。他的队伍的装备和战斗力都比较精强，但是一开进山里便落入铁木耳起义军的口袋里了。结果被农民军打得七零八落，大败而还，钱广汉本人也受了伤。据参加那次战争的农民谈，那时候，很少人会打仗，有的人拿到火枪还不懂射击技术呢。但是大家都存着拼命的决心，不顾敌人的枪弹，有的人抡起大头棒、砍土钎从山上往下冲，喊杀声甚至淹没了枪声。有的敌兵在这种声势下丢下洋枪，掉头逃跑。

这场仗打过后，起义军的声势更大了。哈密城戒严，沙亲王派人到各苏木去，晓喻属民，勿为“叛逆”所惑，并会同哈密知事白文超、副将姜国胜吁请就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不久的杨增新派兵来哈密“平乱”。沙亲王还派人到省城去，向杨增新馈赠重礼，声言“进剿军”的饷精王府可以供给。

可是杨增新有他自己的算盘。他认为，如果单恃武力，很可能把事变转成不可收拾的战争。他到新疆来以前，在甘肃做过地方官（中卫知县，河州知州）。过去在甘肃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伊斯兰教民内部发生武装冲突，各自要求官府派兵去弹压，结果官兵到后，反引起了教民们联合一致与官兵对抗，酿成大乱。他从经验出发看问题，是不肯蹈这个复辙的。同时，当时南疆哥老会四起，伊犁革命派也没有完全服从他的领导，外蒙喀尔喀进图阿尔泰，东疆边境不安，他不能也不敢轻易地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因而派通

晓维文维语的都司张彩廷率兵去哈密，指示张都司务必设法进山招抚。

但是沙木胡素特还是力持以武力“削平叛奴”。他认为如果容忍“奴隶作乱”，他的地位和农奴中的威信就要失堕，因而仍然一再向杨增新呼吁，并鼓吹地方文武，招募兵丁，进行“讨伐”。但是起义军不但没有退缩，而且经常出击头、二、三堡和一棵树，使哈密驻军在防堵上疲于奔命。这是一九一二年十、十一月间事。

杨增新深恐事态不可收拾，影响整个东疆安全——这个时候吐鲁番维吾尔农民响应铁木耳，已在穆依登阿匄领导下起义了——于是专电沙木胡素特，说明对“叛民”不能用兵的理由，教劝沙亲王统筹全局，妥速进行收抚（这个专电是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同时严斥哈密知事白文超，不得妄用武力。

圈套

从一九一二年秋起，杨增新的招抚企图虽没有实现，但一再严令哈密驻军不得入山，以缓和对起义军的武装冲突，也麻痹了起义军的战斗意志，使他们放松了武装活动和继续发动群众。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下，从武装斗争中集聚起来的群众，其团结与组织性，其战斗力，只能从不断的战斗中得到锻炼、巩固，部众的扩大，也须军事上的新胜利来影响，战斗一间断，便容易趋向涣散，甚至发生内部矛盾。当时帕赫兰库尔班、哈拉布苏克就同铁木耳暗中不和。铁木耳本人还遭到叛徒的冷枪袭击，引起了他对事业的一时灰心。

一九一三年一月，杨增新派营长回族人李寿福率兵去哈密。

办理收抚事宜。他指示李寿福应利用宗教关系，亲自入山，面见铁木耳，用尽一切办法，务必把铁木耳骗到乌鲁木齐来。

原来一九一一年迪化和伊犁先后起义，迪化起义遭到镇压后，当时任镇迪道兼提法使的杨增新请准新疆巡抚袁大化，招募回族壮丁，组成了五营新军，营长均由回族人担任，杨自任统领，负责指挥。杨的实际目的是，利用一个民族牵制另一个民族，并在民族间制造矛盾，以便于他从上边来控制①。

李寿福果然进山，见到铁木耳，把杨增新的信译给铁木耳听，并介绍杨的为人。最后捧起古兰经盟誓，保证王府的徭役可以全部免除②铁木耳同他的部众由政府收编，作为国家军队。李寿福说，杨都督一向信任穆斯林，他的亲兵都是伊斯兰教徒。李以他本人作例，说自己就是杨都督部下的管带（营长）。杨都督正准备编组头部队③，哈萨克部队，……象铁木耳这样的英雄人物正是杨都督寻找的。如果铁木耳成了国家的武官，都督的战将，哈密王府也就不敢再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了。至于哈密改土归流一事，只是时间问题。中华民国，五族共和，总不会让王爷永远管制老百姓的。不过改变地方行政组织，权在北京政府，不是新疆当局所能擅专的，新疆当局可以把老百姓的请求呈报北京大总统，听候中央政府决定。

铁木耳这位虔诚信教的农民领袖，终究缺乏斗争经验，在李

① 杨增新亲自招认过，“故增新两年以来之政策，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疆牵制汉人，既以汉人牵制回疆，更以內地此省之人牵制內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杨增新《补过斋文集》甲集上，《呈文编》上十七页）。

② 这是李寿福对铁木耳耍弄欺骗手段，在官文书中，沙木胡索特是阿意把徭役减为每月二日。

③ 当时官文书及汉回族人都把塔塔尔人呼做头。

寿福的巧言令色，特别是捧古兰经盟誓的欺骗下，落入了杨增新的圈套。

铁木耳率领的部众在妥协后，一部分人离开队伍还乡，其余二百余人由省方收编，给了定边马队第三营的番号，由铁木耳任营长（并更铁木耳的名字为铁正元），全营移驻乌鲁木齐。

一九一三年四月在定边马队第三营开入乌鲁木齐时，受到当道的欢迎，领到了服装和粮饷。

铁木耳在乌鲁木齐住了一两月后，就常常接到哈密来信，说沙亲王和地方官府并没有履行妥协的条件，徭役不但没有取消，王府还要农民赔偿起义以来王府所受的损失。起义后由铁木耳委派的地方头目人都被王府撤免，有的还遭到捕押。铁木耳至此才觉悟到他当初不该轻信李管带的誓言，离开农民群众。于是同他的亲信计议，暗地里把枪支运出，准备在开斋节率部众逃出乌鲁木齐，去吐鲁番一带，同穆依登的残部联合，再次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他的这一企图，在他运出部分枪支后便被杨增新发觉了^①。一九一三年九月六日铁木耳被捕押，当日与穆依登一同牺牲在土牢里。他的部众经都督府发资，递解还乡。其中许多人在东去途中被屠杀于奇台县东大石头（乌兰乌苏）山口。

轰动一时的一九一二年哈密农奴起义就此结束。但是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扑灭，也是扑灭不了的，反封建的政治组织一直在秘密活动。一九一四年铁木耳的弟弟夏克尔同艾买提在一起还在吐鲁番组织起义。之后，在历届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整个年代

^① 他部下的一名叛徒，曾私去哈密，把铁木耳的企图、活动报告给沙亲王，沙亲王派专人到省城，向杨增新告密，并赠送杨金银，请求杨务必把铁木耳及其部队处死，以绝后患。

里，受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农奴主、封建地主、巴依、拜克的斗争是始终没有中断过，它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在党的领导下新疆和平解放。哈密人民，只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日子才真正得到了解放。

伊犁革命回忆录

邓 宝 珊

我是辛亥革命前两年（一九〇九年）因为家庭贫寒，从兰州应募去新疆伊犁参加新军的。起初，我是新军协统杨缙绪部下的士兵，后来因我粗通文字，提为司书。这时，我年十五，但已有富国强兵的爱国理想，对于清政府的残暴腐败感到不满，而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党人的累次起义，则敬佩无已，心向往之。

伊犁虽远处边陲，但在那里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其中的主要人物，就记忆所及，有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李梦彪诸人。他们深入到新军和哥老会中进行革命活动，并在伊犁办有《伊犁白话报》，鼓吹革命思想。此时，我经过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甘肃人）、张愚生（陕西人）介绍，和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他们向我宣传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的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我认为这是救国救民之道，就在一九一〇年七、八月间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了我年轻时代的政治活动，在新军的朋辈中积极鼓吹革命和暗中联络哥老会，还团结了一些倾向革命的人，如新军排长彭开远等。

伊犁是天山以北的一个边疆重镇，且是多民族地区，有汉、哈萨克、维吾尔、锡伯、索伦等民族，按照清朝的建制，辖有惠远、绥定、宁远、霍尔各斯、芦草沟五个县。清朝的伊犁将军驻镇惠远，镇台、道台分驻绥定和宁远。伊犁周围是天山以北气候温暖、物产丰富的地区，人民本可安居乐业；可是就在这远隔内地的边疆，清王朝那一套军事政治机构同样地迫害着人民，不论将军、总镇、知府、道台，乃至旗兵、绿营，都是横征暴敛，蹂躏地方，为当地各族人民所痛恨，使得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士兵日渐倾向反清的革命斗争。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间，伊犁将军长庚到任后，为了标榜办新政，练新军，就兴学校、办工厂，并从湖北调来一营新军为基干，又在关内和各地招募了一些士兵，成立了新军混成协。新军的成员大都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他们由于受了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残酷剥削，经过革命党人冯特民等人的积极宣传活动，新军中加入同盟会者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伊犁反清斗争的一支主力军。

一九〇九年，长庚调任陕甘总督，以蒙人广福继任。广福目不识丁，但对部下较宽厚。这对革命来说，是既有利，又有害，利是军队中管束不严，便于党人的活动；害是因广福采取怀柔政策，对大部分官兵尚有羁縻作用。所以当时上海党人由俄国转来密电，指示在边疆先行起义，使清廷顾此失彼，乃因时机尚不成熟，未敢发动。

到了一九一一年秋天，川汉铁路争路风潮日益扩大，革命已到了一触即发之际。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到任后，首先下令解散新军，停办讲武堂，将协统杨缙绪免职。对新军是只收子弹，不收枪

支，勒令新军遣返关内，却又迟迟不发遣散费。弄得新军官兵坐困伊犁，冻馁交加，怨声载道，更增强了革命的斗志。于是协统杨缙绪所率大部新军官兵加入了同盟会。志锐的倒行逆施，更加促进了革命时机的成熟。

未几，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震撼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新疆的革命党人刘先俊、田昔年等联合哥老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首先举义，进攻抚台衙门，为清巡抚袁大化所挫，暂告失败。但消息传到伊犁，人心为之振奋。加入同盟会的新军官兵，一致认为时机已迫，不得再事蹉跎，公推冯特民、李辅黄为指挥起义的干事，并由李辅黄联络军界，李梦彪联络商界，马凌霄联络回族，谭玉书联络哥老会，决定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二日举事。旋因奸人向志锐告密，遂提前于元月七日晚九时起义。李辅黄任总指挥，首攻东关，再入城策应。郝可权、冯特民率领铁血团直攻将军署与北库。这时志锐仍自恃城内外驻有大量武装齐备的满蒙兵，不加戒备，并深信新军子弹已收，单恃空枪，不足为惧。殊不知这些受革命影响的新军，事先早已秘密囤有部分子弹，同时，管理南库军火的黄立中又是同盟会会员，这就更不愁得不到充足的军火了。

当时，我是新军司书，亦参加此役，手携五响马枪，带了五粒子弹，随同李辅黄猛攻东关，满兵望风披靡，迅速占领东关，并率部进入南库，取得大量弹药，军心为之大振，陆续进入城内，占领各要道。同时，郝可权所率一部分铁血团员亦顺利攻入将军署，志锐慌忙越墙逃入东街乌协领衙门内。冯特民所率铁血团进攻北库，遭到新满营正蓝旗协领蒙库泰所部顽抗，不能得手，情况万分紧急。这时大家考虑到，时间如稍有拖延，驻绥定的绿营防

军和牛录的锡伯、索伦营军队都会前来增援，势必重蹈迪化的覆辙。革命党人急在商会开会商议，决定利用志锐与广福之间的矛盾^①，争取广福出面号召蒙旗兵放下武器。广福既恨志锐平时和己为难，又在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敦促下，遂出面向北库蒙旗官兵宣告：只要放下武器，交出北库，即与官兵们无关；如有其它事故，本人愿负担保之责。以广福平日尚得军心，而且蒙库泰和他同是蒙族；又是他的旧部，就立刻停止抵抗，缴械投诚，交出北库。至此，惠远已为革命军全部占领，志锐亦从乌协领衙门东夹道内搜出，并立即处决。到天拂晓时，绿营和锡伯营虽已出发，但听到志锐已死，惠远又为革命军占领，遂中途折返。

元月八日，革命党人集会，商讨组织临时都督府，推广福为临时都督，杨缙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冯特民为外交部部长，贺家栋（原伊犁知府，起义时投诚革命军）为政治部部长，郝可权为参议院院长徐国楨为东进支队司令。

临时都督府成立后，即电告新疆巡抚袁大化，劝其认清时局，向革命投诚。袁不接受，反于二月初派陆军协统王佩兰率部向伊犁进攻。临时都督府即派东进支队司令徐国楨前往迎击，准备击溃敌人，攻取迪化过春节。不料徐国楨所率钱广汉、乐乐善两营旗兵叛变投敌，致令王佩兰得势，占领了精河以东的沙泉子。沙泉子系战略要地，伊犁的前卫，这样一来，伊犁形势顿形紧张。总司令部部长杨缙绪急率基本队伍和新招军队昼夜增援，我亦随军出发。在精河、沙泉子激战一天一夜。我当时担任右翼攻击，

^① 广福在与志锐办理新旧任移交时，志锐有意与广福刁难，以致广福不能前往杭州到任。

敌人反复猛扑，指挥官连长阵亡，军心有些动摇。我当即表示，应坚守阵地，如右翼失利，影响全线，则伊犁危殆，乃率领士兵竭力苦战。适杨缙绪赴前线督队，我当即建议抄敌人左翼后路，以扭转战局。杨缙绪遂令我率部突袭敌人后方，冲到敌人指挥所跟前，敌军大乱，后方动摇，始转败为胜，王佩兰狼狈退回四棵树、乌苏一带。革命军乘胜收复沙泉子，伊犁革命政权得以危而复安，我亦因战功调升为参谋。

此后双方相持不下，革命军遂派人联络哥老会，在天山南北到处发动起义，使袁大化穷于应付。不久清帝退位，袁大化在不得不承认共和的局势下，派人在塔城同伊犁革命军议和。喀什都督府派贺家栋、黄立中为代表，在和议中，袁大化尚欲延宕时日，以观大局变化。到四月喀什独立，推举前道台袁鸿祐为新疆都督，电到迪化，袁大化感到四面楚歌，即电北京袁世凯，请命袁鸿祐主持新疆军政。但袁鸿祐甚不得民心，在喀什为其部下所杀。袁世凯又命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主持与伊犁革命军的和议。杨增新急欲取得新疆政权，遂在塔城与伊犁革命军达成协议。塔城议和后，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飞霞为伊犁镇守使，贺家栋任新疆民政长，杨缙绪调任喀什提督。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郝可权、李梦彪等则留在伊犁，维持后方。

杨增新系云南人，清进士出身，尚权术，曾任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知州，清光绪末年，调任新疆镇迪道。由于当时革命党人缺乏革命的彻底性，使他在混乱中窃据了新疆都督的职位。杨是一个阴谋家，他预料中原将从此多事，企图把持关外，形成割据局面，上台后，尽力招揽河州回汉旧部，培植亲信队伍，到了羽翼已成，遂出其阴险毒辣的手段，首先残杀革命党

人，次及思想进步的人士。到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在各地屠杀革命党人时，杨增新在新疆也就大肆残杀革命人士，领导伊犁革命的冯特民、李辅黄和留在后方的参谋长李伯泉，都在他的屠刀下壮烈牺牲了。郝可权、李梦彪等也被迫逃亡。我当时也在被拿之列，在伊犁势难立足，遂从惠远逃到宁远，避入帝俄领事馆，拿了俄国护照，经霍尔各斯取道西伯利亚，回到京津，转赴陕西，在华山下和陕西老同盟会员郭希仁、刘禹如等相结识，参加了“共学团”，密谋讨袁，于一九一五年又参加了讨袁、靖国诸役。

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

博彦满都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我在沈阳蒙文学堂读书，学习蒙、汉文。当时在这个学堂的藏族同学有一百二十余人，都是一九〇九年由内蒙古各旗扎萨克保送来的。按清朝制度，本是禁止蒙族人学习汉文的，而我们保送到内地学习汉文，这还是第一次。以后才明白，这是当时革命形势所带来的机会。

辛亥革命前二年，全国学生请愿开国会运动的时候，我和同学萨音巴雅尔（包悦卿）被派为我们蒙文学堂的代表，曾参加了多次当时奉天省的学生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听到了很多学生代表的讲话。我开始认识到，当时中国的积弱不振和人民所受的重重灾难，完全是由于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腐朽无能。

当时我们除在校内和校与校之间经常鼓吹开国会、颁宪法的意义外，还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到自己的家乡去宣传。这个时候我们把头上的辫子已经剪掉了，在乡村做宣传时，还要带上假辫子掩在帽子里，因为乡村老乡们看不惯没有辫子的人，他们说剪辫子的人是要随外国当鬼子。

剪辫子的人成了当时统治者严密注意的对象，他们说，剪辫子的人都是革命党。我们好几位同学因剪辫子受了他们旗下王爷的

责罚，有的挨黑鞭子，有的罚款、罚牲畜并停止上学。大刽子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武昌起义后，为了反对革命，不择手段地调用了张作霖、吴俊升等部匪军，逼走蓝天蔚，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他们更注意剪辫子的人，不知有多少剪辫子的人被他们杀害。我曾亲眼看见沈阳城的城墙上悬挂着一排一排的没有辫子的人头，城门内站立着几十个手持枪刀，身穿灰衣、垂着大辫子的张作霖的喽啰，正在那里以凶恶的贼眼注视来往人的发辫，有时他们还叫人把帽子摘下来验一验。幸而我没有受到检验，但从此我没有出校门。

武昌首义，举国响应，清帝退位，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被压迫的各族人民无不拍手称庆。在我们内蒙古地区来说，这更是一件空前的大喜事，满以为数百年来来的奴隶制度可以随着清朝统治的复灭而告废除了。孰意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革命的果实很快地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了。

袁世凯统治内蒙古民族的方式是，拉拢怀柔上层封建王公，利用他们来统治蒙族人民。在一九一二年一年内，就公布了蒙古王公优待条例、蒙古王公待遇条件，用新的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旧的封建王公原有的统治权利。在这一年内，又用“深明大义”、“效忠民国”、“赞助共和”等冠冕堂皇的词句，大肆晋封原有蒙古王公勋爵。如亲王无爵可晋者封其子孙，郡王晋封为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他布囊，都依次晋一级或晋三级。此外，又依据各旗扎萨克王公的保举，任命了许多的贝勒、贝子、镇国公和辅国公。这样使蒙旗的封建奴隶主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如我的家乡哲盟科左前旗，清朝时只有一个扎萨克

郡王，袁世凯执政时就增加了五个辅国公。这些新贵们，巧取豪夺，贿赂公行，摊派日多，大大增加了人民的供应和负担。再加军阀盗贼和后来国民党的压迫蹂躏，最后竟招致了日寇侵入和血腥统治十四年的空前浩劫。

辛亥革命的同时，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由于帝俄的煽动，宣布“独立”。内蒙古一部分扎萨克王公和喇嘛活佛，以及封建上层人物和土匪头目，就起来响应哲布尊。有的秘密往投库伦，如哲盟的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扎萨克郡王棍楚克苏隆，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公爵那孙阿尔比吉呼，克什克腾旗的台青满都嘎尔扎布，卓盟喀拉沁右旗的管旗章京海山和土默特左旗的匪首巴布扎布、穆荣阿等。有的还举兵起事，和哲布尊遥相呼应，如哲盟科左前旗扎萨克郡王乌泰和葛根庙活佛等。这些人到了外蒙后，都不过呆了三、五年，除棍楚克苏隆死在库伦，哲盟郭尔罗斯前旗台青陶克陶等极少数人留在库伦外，其余的都先后归来，一律受到袁世凯的封赏。这就证明袁世凯的拉拢、怀柔政策，对内蒙古的民族上层统治者起了有效的作用。

从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间经过三十八年的漫长岁月，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怀着敬仰的心情，永远怀念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们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这次革命虽然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毕竟教育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日益发展。

回顾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情况

桑颇·才旺仁增 朗顿·贡嘎旺秋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就是伟大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自古以来就是优秀的中华民族成员之一。从元朝起，西藏一直是祖国统一政府直接统辖的一个区域，它的上层统治者都是经过历代皇朝加封后而执政的。如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亲到北京请清朝皇帝加封，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清朝就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称号，就是从此规定下来的。

十七世纪末期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方侵略，曾以传教、游历等名义进入西藏。十九世纪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邻近的各国，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竟妄想用武力侵略西藏。因此，一八八八年和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两次奋起抗击英国侵略者。一九〇四年八月，英军一度侵入拉萨，但是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江孜附近的一大批英军坟墓就是证据），而且不能不很快地撤退。藏族人民这一次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有许多可泣可歌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西藏民间流传着，在全国各地的书报中刊载着。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西藏人民积极抵抗英国的侵略，可是清朝政府却对英国侵略者妥协了，以致英帝国主义

的势力伸入了西藏。

一九〇八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当时清政府的驻藏大臣对于处理西藏事务与达赖喇嘛意见不和，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各自任命官吏，互不承认。驻藏大臣还企图扶持被达赖喇嘛革职的丹林活佛，排挤达赖喇嘛的亲信官员。因此，达赖喇嘛在觐见慈禧太后时，请求今后有关西藏事务，不经驻藏大臣而直接上奏。清政府拒绝了达赖喇嘛的要求，在上谕中说：西藏“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这样的上谕，自然引起了达赖喇嘛的不满。再加以清政府降封达赖喇嘛为“诚顺赞化 翊天大善自在佛”，且迟迟不举行受封典礼。直到慈禧太后死后，清政府又说：“国有大丧，受封未便举行。”诏命达赖喇嘛先行回藏，到塔尔寺再行受封。而受封时，又以国丧的关系，不能隆重举行典礼，招致了达赖喇嘛对清政府的不满。

在达赖喇嘛进入北京以前，刚刚到达五台山的时候，英国、日本、沙俄等国驻华公使，就带着大批礼物去见他，企图用拉拢达赖喇嘛的办法来进行侵略西藏的勾当。以后英国驻华公使便趁着达赖喇嘛对清政府不满的机会，从中挑拨离间煽惑西藏执政者和清政府对立。

一九〇九年达赖喇嘛回到拉萨的时候，和驻藏大臣的关系更趋恶化。他拒绝接见驻藏大臣，并下令取消对驻藏大臣的官员和各地驿站人员的供应，还扬言要驱逐驻藏大臣，警戒驻藏大臣的行动，并且招兵备战。驻藏大臣亦奏请调兵入藏，还在拉萨招收了五百名藏族志愿兵（称为吐兵），给予和川军同等的待遇。这时清政府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办理改土归流。这样就更加加深了达赖喇嘛的疑惧。一九〇九年冬，锺颖率川军一混成协入藏，于十

三月进入拉萨的时候，达赖喇嘛便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带领一部分藏军逃亡印度。达赖喇嘛居印度二年，英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用物质拉拢（为他花费了五千英镑），一方面加紧挑拨汉族和藏族的关系。达赖喇嘛就在英帝国主义的挑拨、拉拢、欺骗、煽惑之下，由最初的抗英而变为亲英，充当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工具。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前，驻藏川军为了几个月不发饷正在准备闹事。适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叶纶三等就率领驻拉萨的川军士兵于一月十三日（阴历辛亥年九月二十三日）起义。十四日，起义士兵举兵备处书记官李治平、标部书记官范金为总参谋。十五日，起义士兵逮捕了驻藏大臣联豫。新军统领锺颖还能掌握一部分士兵，他就派队官丁克敌率兵十余人，到起义士兵的营中刺杀了叶纶三。二十一日（农历十月初一日），联豫从起义士兵营中潜逃，回到驻藏大臣官署，锺颖又把李治平、范金囚禁起来。二十八日，联豫又逃入哲蚌寺，锺颖代署驻藏大臣，杀死了李治平和范金，更激起了起义士兵的愤恨。这时驻在江孜一带的川军士兵也起义了，于二十九日开到了拉萨。锺颖竟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出钱来贿赂起义的士兵，每人犒赏三个月的正饷，并发给由西藏回四川的路费。西藏政府都照办了。

联豫住在哲蚌寺内，派遣戈什闪圆光和落后的喇嘛等去勾串英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达赖喇嘛，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他们借口革命是汉人发动的，就以攻灭汉人为目标。英帝国主义者就乘机支持（实际是指挥着）达赖喇嘛积极进行镇压起义军的活动，派人调集藏兵五千余人向起义的川军进攻，先攻江孜，后攻拉萨。十二月中旬，驻在波密的川军起义，杀死了左参谋罗长禧和标统陈庆，离开波密，回到拉萨。这些起义士兵有许多人过去是散兵

游勇，他们不止夺取清政府的官库，而且劫夺商人和藏族人民的财产，因而激起了藏人的反感。他们到了拉萨以后，便包围了三大寺中最富的色拉寺，企图抢劫，曾被色拉寺的喇嘛打退。斗争愈来愈复杂，这又造成了英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挑拨的空隙和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机会。英帝国主义操纵着达赖喇嘛，利用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认识不清楚的人，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达赖喇嘛下令波密等地的藏军攻打起义军，命令西藏地方政府以后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还命令各地头领把汉人驱逐干净。帝国主义分子还宣传什么：“西藏独立”，“英国的力量强大”，“在野蛮的地区谁能杀国王谁就能当国王”，“驱逐驻藏大臣能得到好处”等等危害祖国、危害革命、危害藏族人民利益的谬论，以制造更大的混乱。帝国主义分子公然污蔑西藏为“野蛮的地区”，是我们西藏人民所不能忍受的；帝国主义企图分裂我们的祖国，更是我们西藏人民所不能允许的，因此，许多藏族人民不相信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并且反对他们所策动的阴谋。

当英帝国主义指使达赖喇嘛以藏人攻击汉人的时候，西藏大臣联豫与达赖喇嘛相勾结，代理驻藏大臣的鍾颖也是支持反革命的。九世班禅反对这种反革命的阴谋，不肯出兵去攻击起义军，三大寺的喇嘛们大多数也不肯与起义军为敌。真正攻击起义军的，只是一小部分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的人。一九一二年二月间，江孜起义军受到达赖喇嘛的藏军攻击的时候，驻后藏扎什伦布寺的川军赶来支援，经过几昼夜的战斗，起义军弹尽粮绝，英国领事出面，借口“调停”，逼迫他们经由印度离开西藏。

以后，英国军队护送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一九一二年七月间，英帝国主义唆使达赖喇嘛对驻藏军队和驻藏大臣发动

总进攻。经过了七八个月的战争，达赖喇嘛的藏军驱逐了驻藏军队和驻藏大臣，抢占了拉萨的大小衙署和军械局、铜元局等机关。英帝国主义者操纵达赖喇嘛发动的所谓驱汉事件，不仅发生在拉萨，而且煽动西康的藏人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但是大部分藏族人民是热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驱汉事件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与西藏人民为敌，在拉萨杀害了爱国人士察绒旺秋杰布等人，又打击住在日喀则的九世班禅等人。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九世班禅被迫带领一部分随员离开了西藏，逃亡内地。

十三世达赖喇嘛投靠英帝国主义、控制了西藏之后，英帝国主义者不仅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引起了连年的战祸，而且英国的工业品大量输入西藏，促成了西藏的经济破产，西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从而西藏人民对于英帝国主义的痛恨亦日益加深，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不断进行着反帝爱国的斗争，而上层统治集团也逐渐分化。到了一九二一年，西藏爱国人士秘密集会，准备驱逐英国侵略者，西藏人民也自发地奋起殴打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卖国求荣的亲英官吏。西藏人民的这一次爱国反帝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西藏上层统治者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一下亲英政策，因此解除了亲英叛国的总司令察绒达桑占度的职务（这个叛国罪犯，到了一九五九年又是叛国的头目之一）。

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狰狞面目，愈来愈露骨地暴露在西藏人民面前。英帝国主义借口西藏财政和兵源困难，竟想提用寺庙财产作军费；还向达赖喇嘛提出：西藏嘛喇太多了，可以转征僧兵。甚至提出，达赖喇嘛不要过问政治，要做一个专门念经的喇嘛，也就是要进一步推翻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新的傀儡政权。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引起了西藏人民和寺庙的一致反对，又直接侵犯

了达赖喇嘛的利益。从此，十三世达赖喇嘛逐渐认清了英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于是逐渐改变了亲英政策，把一批亲英官吏杀的杀，撤的撤。并且在一九三〇年派出代表，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

西藏在辛亥革命时期虽然也受到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它的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在当时也不可能改变），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倒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西藏人民才获得了解放。

回忆过去的历史，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紧紧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民族团结，才能击破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才能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才能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帝国主义奴役西藏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辛勤的劳动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辛亥前后彭泽民先生 和吉隆坡华侨的革命活动*

陈其璠 翁会巧

中国青年益赛会的成立

彭泽民先生是一九〇二年去马来亚吉隆坡的。当时在吉隆坡华侨社会中，有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个是保皇党，一个是革命党。革命党为了避免英殖民政府注意，所用的公开名称是“中和讲堂”，以宣道为名，实则宣传革命主张。中和讲堂后来因听讲之人渐多，大触殖民政府之忌，加以保皇党告密，遂被下令解散。一九〇六年，孙中山先生来吉隆坡酝酿组织同盟会，彭泽老就在此时参加，积极活动。当时同盟会的会员只有十余人，由于中和讲堂的被解散，组织仍然不能公开。彭泽老与会员们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研究结果，认为可以利用教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那时英帝国主义正在利用基督教会为开拓殖民地的先锋，它在吉隆坡设有一所美以美教会进行宗教活动。教会内设有一种联络群众的组织，名为益赛会。于是彭泽老等就用中国青年益赛会的名义，把会员组

- 这篇材料是由我与彭泽民夫人翁会巧同志从彭泽老遗稿中整理出来的，其中有些内容是彭泽老生前我与他过从谈话时记录下来的，因此用会巧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共同发表。——陈其璠

织起来，附属于教会的宣道堂，以这个合法组织来宣传同盟会的宗旨。依照教会规定，益赛会设正副总理主持会务，由会员推选，正总理必须是教徒，副总理二人，教徒与非教徒各一。彭泽老初时被推选为副总理，后来会员逐渐增多，同盟会的革命主张逐渐为群众所信仰，彭泽老又被大家推选为总理。他以非教徒身份当选为正总理，改变了教会的传统规定，这个改变说明了群众的力量在逐渐扩大。

中国青年益赛会成立后，借用宣道堂为会址，同盟会也就有了集会和办事的地方。初期所进行的事务，是以益赛会的名义，在华侨社会中做一些慈善事业和组织戒烟会等等。由于会员们多是青年，能以革命精神努力办事，特别是能为有困难的侨胞服务，所以会员人数虽少，事情却做得很多，也做得很有成绩。不久，益赛会就在华侨社会中取得很高的信誉，得到当地广大侨胞群众的支持，入会的人数也逐渐多起来了。同时，同盟会会员也随着增加，活动也一天一天有了发展。

十二张木椅和一万元捐款

在中国青年益赛会创立时，一切都是由会员自己动手，会所的一切陈设也靠同志们捐赠。有一位做木工的会友陈良，用节余下来的工作时间，亲手制成十二张木椅，制成后亲自挑送到会送来。这件事在有钱人为之并不稀奇，可是陈良全靠一双手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他这种热爱会的行动，给会员大众以极大的鼓舞。后来这位同志因为失业，上山砍柴为生，不幸被倒下来的大树压死了。不过他这种

一心一意为革命势力的精神永远活在全体同志的心中。他亲手制成的十二张木椅一直被同志们珍重保存着。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在吉隆坡公开活动，会员们有了自己建筑的会所，这十二张椅子还陈列在会所客厅里，作为陈良生平革命事迹的纪念物。每遇来宾到会访问，会友们就把这十二张木椅的来历向来宾介绍一番，来宾听到这个故事，都很受感动。

当时，为同盟会总部的革命事业募集款项，也是海外各地支部重要工作之一，吉隆坡支部也以此列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只要总部来一个电报要钱，会员们立即踊跃自动认捐。如果数目不大，就由同志们自己分担，一般都能在数天内把款项凑足汇出。会员中有一位黄扬同志，原是工人出身，由于勤俭刻苦，有些积蓄。有一次总部要筹一笔较大的款子，他便慷慨认捐一万元。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多的现款，便拿着自己住的房屋契据去找当地的一个华侨大资本家某人，向他抵押一万元，并说明这笔款子是用来捐助祖国革命事业的。这个大资本家是反对革命的，当然不愿意支持黄扬同志，乃很冷酷地对他说：“如果能把房子卖给我，我可以要，抵押借款是不行的。”黄扬同志听了非常气愤，痛斥此人只爱金钱不爱祖国，不能称之为中国人。会友们知道此事后，也很愤慨。两种立场之人，两样不同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演习被捕口供到革命实践

自吉隆坡支部成立之日起，同志们每天晚上都聚集一起共同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研究如何刺杀清朝大员，一种是演习如何在不幸被捕时回答反动法庭的讯问，即是口供演习。

口供演习的方式，是以一人扮作法官，余人扮作被捕的同志，一问一答，轮流扮演。供词内容必须首先表明自己是革命党人，同时还必须宣传革命的宗旨。这种演习对于同志们的革命斗志的锻炼和牺牲精神的培养，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役，壮烈牺牲的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吉隆坡支部盟员罗成、李晚两同志。这两位同志都是工人出身，他们的壮烈牺牲固然显示出革命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但与平时在组织生活中所受的锻炼也是分不开的。

“李竹痴”来到了吉隆坡

有一次，支部接到总部通知说，孙中山先生要来吉隆坡，让彭泽老与同志们准备招待。彭泽老和同志们商量后，一面找到当地一位有名望的船姓绅士，请他出面欢迎孙中山先生；一面通知中山先生来时不用真姓名，以免英政府干涉。中山先生于是易名为“李竹痴”，登岸时果然并未遇到阻碍。那天同籍华侨并不知道中山先生抵埠消息，到码头欢迎的人数不少。同志们为了避免英殖民地政府注意，还打着龙旗去欢迎他。中山先生在吉隆坡一所新开的戏院受到盛大的欢迎，参加的侨胞人数很多。到会的同盟会会员也有百数十人，全体担任警卫工作，彭泽老亲自守卫大门，以防备反对派——保皇党的捣乱。孙中山先生那天讲话大意是：“我们要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什么样的国家才能称为民国呢？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公有，国家之事由人民共同办理，不能由少数人甚至一人一家所得而私。国家好比一个公司，人民都是股东，政府的官吏就象公司雇用的职员，公司的事情应该听命

于股东，国家事情亦如此，应该听命于人民，不能由一个人、一家人专制。”孙中山先生这次演讲深得人心，这也是由于彭泽老与支部的同志们平日革命工作做得好，在侨胞群众中生了根。同时，这次大会由于事前布置周密，得到同情者的帮助，使反对派无所施其伎俩，所以开得很成功。

孙中山先生到吉隆坡后，住在威山公馆，由同盟会会员担任警备。有一天，中山先生问及当地华侨大资本家陆佑其人，要想见他一面。同志们说，陆的派头很大，不肯随便见人，要见他须事前用电话与他联系，约定时间，才能见面。孙先生听了，当时没有再作声。翌晨，同志们发现孙先生不知哪里去了，大家很担心，便四出寻访。到了中午，中山先生方从外面回寓，对同志们说：“我已经会过陆佑了。”同志们说：“应该事前和陆约好，让我们陪你去。”孙先生说：“我对陆某并没有什么要求，只想问他爱祖国不爱祖国，既然他不爱祖国，也就不须和他谈什么了。”这是一件小事，然而彭泽老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当他数十年后对我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仍然激动得很，充分表现出他对于这个不爱祖国的人的强烈憎恨。

青年益赛会的被封和复兴

孙中山先生到吉隆坡演讲革命的道理后，影响极大。吉隆坡同盟会会员的人数由百数人发展至千余人，会务活动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会所内附设了阅书报社、招待所。此外，还要传达各方面革命活动消息，募集革命军饷，任务日益繁重。于是，支部成为马来亚半岛的革命总枢纽，并获得多数华侨的同情和支

特，活动也成为半公开的了。这时，保皇党也在吉隆坡设宣孔教堂来与青年益赛会对抗，双方听众往往因辩论而发生纠纷。英殖民地政府本来就怕我们演讲中国革命道理，担心会影响马来亚当地人民也起来革命，所以想利用保皇党来破坏华侨的团结。可是保皇党愈来愈不得人心，不能发生什么作用，英殖民政府乃不能不亲自出马了。黄花岗起义之后，有一天，华民政务司（英殖民地政府管理华侨事务的行政部门）派人到青年益赛会会堂检查，看见会堂上悬挂着罗成、李晚两烈士的遗象，便借口说我们是暗杀党，把两烈士的遗象拿走，并立即解散青年益赛会，封闭了会堂。

数月后，武昌起义，清政府被推翻，民国成立，海外侨胞民气也随之大张。英殖民地政府乃换了一副“亲善”面目，改用软化手段，准许益赛会阅书报社恢复，由半秘密而公开，又准许益赛会自己建立会所，但仍附属于教会之内。殖民地政府的七州府议政局员朱嘉炳君并捐助了巨额的建筑经费。新会址建筑堂皇，规模更大。在这个时期内，会员日增，声誉日盛。一直到一九一三年国内二次革命失败后，彭泽老尚凭借青年益赛会的基本会员群众，响应和拥护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华革命党的号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马来亚支部。

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

赵 昱

一 海外洪门的发展

明亡后，明末志士兴起义师，反抗清朝压迫，屡败屡起，直至清康熙年间，因大势已去，无可为力，乃创洪门会社，以从事秘密反清活动。

洪门会社发展得很大。洪门又别名三合会、三点会，在广东方面称洪顺堂，福建方面称青莲堂。

洪秀全、杨秀清起义师于金田，曾有许多洪门义士参加。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余部为避免清军迫害，纷纷走海外，此为洪门在海外发展之嚆矢。相传平南王黄德滋赴澳洲（澳洲大金山 Bendigo 现尚存平南王手创之义兴公司会所），辅王杨辅清（杨秀清之弟）赴美。

自太平军余部逃亡海外后，华侨逐渐增多，加以清朝统治者政治腐败，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日深，农民破产者日众，许多人象卖猪仔一样，出洋谋生，于是华侨人数剧增。华侨出国谋生或者卖身去做劳工，在矿主及庄园主残酷剥削之下劳动，备受摧残。

他们在国内已有了一番血泪史，侨居国外，又受尽帝国主义的欺侮，所以爱国情绪热烈，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甚表同情。

洪门会社以“反清复汉”为口号，又以“联卫共济、手足相助、患难相顾”为常规，很容易得到华侨的共鸣，因而参加者日众。同时，团体也发展得很快，对外名称多采用义兴公司，含“以义兴复中国”之意。但会社名称并不一律，亦有其他种种别名。美洲方面洪门会社多称致公堂。后来致公堂分支为秉公堂、合胜堂、协胜堂、萃胜堂、萃英堂等。在纽约一带有安良堂，是由司徒美堂、阮本万等人创立的。檀香山除致公堂外，还有国安会馆。

海外华侨十有八九加入洪门，所以洪门在海外势力甚盛。

二 保皇会在美洲的活动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组织“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他们为便于进行保皇活动，设法打进洪门组织。己亥年（一八九九年），梁启超赴檀香山，在国安会馆加入洪门，由邓玉钦大佬作主盟人，钟兆养作介绍人。梁入洪门后，即首先在檀香山发展保皇会。同年，康有为、梁启超到加拿大和美国活动，在两地发展保皇会甚速。至辛丑年（一九〇一年），康梁党徒欧榘甲（欧自称曾在国内加入洪门）运动美国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创立《大同日报》，鼓吹改良政治。后欧因攻击孙中山先生，反对革命，为致公堂所斥逐，改任刘成禹为主笔。梁启超宣称保皇会的宗旨是“外称保皇，内实革命”，所以赚得许多洪门人士相信，跟从者日众。保皇会发展迅速，对于同盟会的工作阻力甚大。

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何以能将保皇会发展得如此之速呢？

其中尚有一番原因。康诈称在出京时，曾奉光绪帝密诏“保护朕躬”，其徒更张扬其辞，谓将来太后死后，还政光绪时，康先生便可回朝作宰相了。人多信而入其彀中。康梁借此骗款不少，骗款办法，为巧立名目，声称办银行、办实业，骗得款项，群朋分之，卒因分赃不均，发生内讧，徐勤指使何其武暗杀在海外招股之刘士骥，于是华侨憬然觉悟，不再受康梁之骗。

三 兴中会与同盟会在美洲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于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得其兄孙眉先生之帮助，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丙申（一八九六年）正月，孙中山先生又赴檀。六月，到美国旧金山，发展兴中会。当时中山先生因未参加洪门，在美国运动成效不大，参加者甚少，只有邝华泰博士、陈翰芬牧师等六人加入。这是陈翰芬牧师告诉我的。

癸卯年（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先生再度抵檀香山。他觉得在多次国内革命活动中，都有许多洪门有力量人士参加，因而革命活动如火如荼，但因海外华侨十有八九皆洪门中人，而他自己不是洪门中人，虽竭力宣传，终属见外，相从者少。他深感自己必须加入洪门，方能鼓动洪门中人赞助革命，所以在再度抵檀时，于国安会馆由钟兆养介绍，彭福大佬主盟，加入了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棍”即先锋，故洪门中人皆称孙中山先生为孙大哥）。同年十二月，孙中山先生由檀赴美，因康梁党徒勾结移民局官员从中作梗，不得登岸，被困于木屋。这时中山先生因已入洪门，故致公堂视为圈内兄弟，即由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大佬（即盟长）黄三德、英文书记唐琼昌为之雇请律师，向美京华盛顿申诉。终

得登岸。

孙中山先生同黄三德周游各埠，倡导革命，提倡洪门重新注册，想以收注册费用来发展，但收效不大，仅筹了一些旅费，数目不多，因当时保皇会势力很盛。

己酉年（一九〇九年）孙中山先生第三次赴美，由欧洲先到纽约，华侨赵公璧、李铁夫、吴朝晋、陈永惠等表示欢迎，并加入同盟会。继而抵芝加哥，得到华侨萧雨滋牧师及梅乔林等的欢迎，遂在芝城创立同盟会。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旧金山，李是男（李早年回港加入同盟会）、黄伯耀欢迎于车站，因环境艰难，此次只有黄伯耀、黄芸苏、温雄飞等人加入同盟会。

我于一九〇六年赴美，半工半读，因睹国事凋敝，愤外侮凭陵，乃于一九〇八年在卜技利组织求是学社，研究国是，社员有工人和学生三、四十人。曾恭请中山先生演讲，中山先生向社员阐明革命救国之理，听者十分感动。乃由中山先生作介绍人及主盟人，介绍我和周叙五、邓盛煜、邝辉、伍进、邓荣等十余人加入同盟会。

庚戌年（一九一〇年）正月十八日，旧金山同盟会成立，有张鸾蕴、黄超五、雷祝三、李萑、刘日初、刘鞠可、许炯黎、黄富、邝林（佐治）等四、五十人加入。孙中山先生委我和黄芸苏等为主盟人。中山先生回日本后，由我和雷祝三、黄芸苏、张鸾蕴等周游各埠宣传革命，从者日众。美国西部各埠发展甚速，故金山大埠同盟会支部遂成为南北美洲总支部。美国东部方面，纽约、芝加哥同盟会诸同志亦努力发展，各埠同盟会相继成立。同盟会初成立时，对外名称为少年学社。我和黄芸苏、张鸾蕴、许炯黎、黄富等于每星期晚向群众作露天演讲，鼓吹革命，工作推动甚

快。

庚戌春夏间，加拿大温哥华致公堂创办《大汉日报》以宣传革命，收效颇大。

四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美洲筹款情形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正月初二，孙中山先生抵加拿大温哥华。他鉴于起义屡次失败，皆因此起彼落，未能同时并举，以致牺牲者众，损失甚大，遂努力筹集巨款，拟在粤进行大举。

中山先生在加拿大时，到处演讲，灌输革命思想，听者感奋。时全加致公总堂在域多利埠。域城致公总堂盟长马延远感于中山先生之号召，对赞助革命、筹募军饷一事甚表赞同，并将公产抵押，借款筹饷，以为之倡。一时各地致公堂多相继抵押公产，借款筹饷。由于马延远的带动，洪门中人捐输者甚众。域城致公总堂公产抵押于银行，筹得港币三万元。温哥华致公堂公产，抵押港币一万元。都朗度致公堂亦将公堂公产抵押得港币一万元。孙中山先生偕谭义大佬（加拿大东部致公堂盟长）、李汝大佬（加拿大中部致公堂盟长）由加拿大西部起，历各埠而至加拿大东部，沿途向各致公堂演讲，宣传革命，捐输者亦甚众，共筹得港币三万余元。连前共筹得港币八万余元汇港。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用款共约十六万元，而加拿大致公堂所汇之款约占其半。

美国同盟会方面，汇港币约二万元。美国巴士杰致公堂汇港币八百元，均汇港接济。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不幸失败，殉难烈士，慷慨捐躯，感动全国，使革命浪潮日益汹涌澎湃，海外华侨捐输亦更加积极。

赵声对此役失败，非常痛心愤激，在未死之前，曾致函孙中山先生，报告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经过，悲恸万分，并谓恐怕不能再见面云（中山先生曾将赵声原函给我看过）。

温雄飞曾对我说，据当时在港的皖籍老同盟会员谈，是役后，赵声认为胡毅生擅自解散战斗队伍，影响革命，按纪律应处死。但以胡汉民袒庇其弟，多方回护，终未受处分。有一晚，赵声在胡汉民家中食粥，回寓后，腹中剧痛，旋即毙命。有许多老同志怀疑赵乃胡氏兄弟所毒毙。

孙中山先生见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牺牲同志甚众，乃奋起赴各地宣传。辛亥夏间重游金山大埠，在丽婵戏院大开演讲会，竭力鼓吹革命。又亲到美西各埠葛仑、士得顿等华侨农场，向侨胞演讲革命，我亦陪同前往，晚间同宿于农场木屋中。我和刘鞠可睡在中山先生床边之地板上，以作护卫。中山先生赤心为国，至诚动人，侨胞大为感奋，纷纷加入同盟会。

五 洪门筹饷局与辛亥革命

辛亥夏间，中山先生见同盟会与致公堂双方意见不甚融洽，认为对筹饷大有障碍，遂运动致公堂与同盟会合作。致公堂方面要求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洪门，中山先生便介绍黄芸苏、赵昱、张鸾蕴、李是男、黄伯耀、刘鞠可等与所有在美国的同盟会会员都加入致公堂。双方合作后，革命事业推进甚速。

五月二十二日，在孙中山先生的推动下，致公堂与同盟会共商筹饷事，组织洪门筹饷局，对外名称为国民救济局，黄三德为监督，朱三进为总办，唐琼昌、黄伯耀为西文书记，黄任贤、刘

鞠可为中文书记，李是男为会计。发行金公债，券面有十元、百元两种，由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及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即李是男）签名盖章，规定凡捐款五元以上者给以两倍币值债券，即以十元券给之。洪门筹饷局设于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内。

六月二十六日，洪门筹饷局公推孙中山、黄芸苏、赵昱、张鸾蘊四同志为游埠筹饷专员，孙、黄担任北路，赵、张担任南路。七月初二日出发，沿途演讲，到处劝捐，成绩斐然。

孙中山先生抵盐湖城时，接黄兴由港发来的密电。当时因密电码本置于行李箱中，已运去典化城（Denver），中山先生即赶赴典化，从行李箱中找到密码本，将电文译出。电文大意是居正抵港，向孙报告武昌即将起义。中山先生接电后彻夜不眠，研究形势，考虑再三，拟翌晨复电黄兴，待筹集巨款，各方配合后再大举事。次日晨阅西报，知武昌已举义。孙中山先生遂拍电至圣路易城，催我和张鸾蘊速筹旅费。我和张乃急赴芝加哥，筹得五千金，直往纽约，在亚灵顿旅馆见到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留我和黄芸苏、张鸾蘊同寓数天，谈及武昌起义后种种事情。中山先生在纽约劝勉诸弟兄努力筹款，随即携朱卓文经欧洲归国。筹饷局亦陆续汇旅费与中山先生。而我和张鸾蘊即回旧金山，我则准备回国效力。

九月间，芝加哥同盟会萧雨滋、梅乔林、梅光培建议购买飞机，以充军用。经筹饷局核准，至十月初旬，购买寇缔司式（Cutia）飞机六架，聘请威尔霍士（Wilcox）为飞机师，年俸一万美元。芝加哥同盟会会员李绮庵、余夔志愿从军，学习飞行。十月下旬，我偕飞机师威尔霍士夫妇及李绮庵、余夔回国。十一月十二日抵沪时，中山先生派人乘战舰迎接。

飞机队归国，对革命战争虽无甚帮助，但对促成共和，其功匪鲜。威尔霍士飞机师自谓飞行经验丰富，但奉母命，不得凌空飞行，只能教练。老师尚且如此，学生学习成绩自然可知。但据唐绍仪对我说：“革命党飞机队抵沪后，袁世凯亦获情报。袁乃据以入奏帝后，故作危言耸听，谓革命党飞机队已抵沪，声称倘不即议共和，行将轰炸皇城。一时寡妇孤儿，意为之夺，乃决定退位。故飞机队对促成共和，其功不少。”

孙中山先生于十一月十三日（即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由沪赴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

十月，洪门筹饷局办理结束，派冯自由回国，携未发行之公债余券缴交孙中山先生，计筹饷历时三月，共筹得美金十四万四千元，中南美洲致公堂均有捐款，尤以墨西哥致公堂为多。

武汉首义，各省陆续响应，海外人心大为振奋。虽筹饷局已告结束，但各处洪门弟兄及同盟会会员仍努力捐输，影响各界华侨，亦纷纷输将。有一人捐几百元者，有一人捐几千元者，甚至一人捐几万元者。所捐款项有汇至南京总统府者，有汇至上海者，有汇至福建军政府者，有汇广东军政府者。是次海外各地华侨，万众一心，争相捐输，空前踊跃。

当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初，筚路蓝缕，艰苦备尝，即一榻一宿，亦常见拒于人。当此困难之际，华侨中毁家纾难、投笔从戎者，大有人在。革命军兴，华侨捐输，靡役不与，每次举义失败，不为之气馁，反益增国难家仇之感，捐输益形积极。故中山先生缅怀往昔，不禁感慨系之，喟然叹曰：“华侨乃革命之母也！”